

西欧共产党

〔英〕 尼尔·麦金尼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尼尔·麦金尼斯系英国人，现为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据作者自己说，他长期从事研究西欧各国共产党，本书就是他在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协助下多年研究的成果。

本书主要叙述西欧各国修字号共产党的现状及其在西欧各国的影响。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及其所属的各种团体组织；第二章说明今日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的成员来源、阶级成分及政治表现；第三章详细论述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第四章则分析当前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如何走上鼓吹议会道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及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情况。

本书资料比较丰富，对了解和批判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必须指出，本书作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揭露今日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公然歪曲，肆意污蔑，胡诌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欧各国社会阶级的分析已经“过时”，甚至荒谬地把西欧各国

修字号共产党的某些主张归因于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还必须指出，作者从西欧各国修字号共产党的堕落进行臆测和推论，有意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污蔑攻击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凡此种种，我们在阅读时都必须加以严肃批判。

原书附注较多，其中大部分是说明作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所参考使用的书刊及资料出处，一般略去未译。

本书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外语系、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部分师生共同翻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对西欧各国的现状了解不深，译文中一定有不少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7年10月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一、西欧共产主义表现的情况 | 7 |
| 青年组织 | 14 |
| 工会 | 16 |
| 阵线组织 | 19 |
| 报刊 | 28 |
| 共产党选民 | 32 |
| 共产党选民是如何变化的 | 43 |
| 二、谁是共产党人？ | 52 |
| 地区 | 57 |
| 年龄 | 65 |
| 性别 | 69 |
| 宗教 | 75 |
| 社会阶级 | 80 |
| 新阶级 | 102 |
|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 105 |
| 政治心理 | 115 |
| 三、共产党内的组织机构和权力 | 128 |
| 正式的组织机构 | 131 |
| 基层支部组织 | 132 |
| 党员积极分子和专职干部 | 141 |

| | |
|--------------------------|------------|
| 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 144 |
| 中层组织 | 148 |
| 大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 153 |
| 总书记 | 155 |
| 秘密机构 | 162 |
| 经费来源 | 169 |
| 清洗、审讯、不同政见 | 175 |
| 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动态 | 189 |
| 四、西欧共产党人与新资本主义的民主 | 211 |
| 经济政策 | 211 |
| 共产党人与议会民主 | 221 |
| 执政的决心 | 229 |
| 通向掌权的和平道路 | 230 |
| 无产阶级专政 | 232 |
| 选民的裁决 | 235 |
| 政治冒险主义 | 238 |
| 欧洲的联合与防务 | 243 |
| 政治上的结盟 | 255 |

前 言

看来直到 1974 年,人们才第一次感到,在 1980 年之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芬兰、挪威和冰岛的政府中,共产党人很有可能当上部长。可以想象,他们会一下子在这些国家,也就是说在西欧一半以上的地区中,分掌国家权力。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尽管他们的这种机会较为微小)不仅在专心致力于通过符合宪法规定的手段来争取分掌权力,而且在若干小国(芬兰和冰岛),他们已经达到目的,在若干大国(法国和意大利),他们似乎差一点也可达到目的。葡萄牙的共产党人用不那么正规的,然而还是和平的方法参加了政府,这一情况只是增加了在情况类似的其他地方(如在西班牙)采取同样手段的可能性。共产党人在一个地方的成功,或是具有可能成功的希望,似乎都增加了他们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的机会,最终导致半个西欧都由共产党所支持的联合政府统治的想法变得十分现实,足以在各个不同阶层中激起热情,使人沮丧或者引起明显的忧虑。

同样可能的是,西欧在这十年中还不会发生这类事情。把七零八碎、毫不相干的资料拼凑起来,煞有介事地断言某种不容怀疑的动向,这是写外交报告和时事述评的一套不足信的手法。就在共产党人想在欧洲大陆许多地方掌权的企图开始

受到人们认真对待的时候，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共产党统治的可能性减少了，或者至少没有象人们普遍猜测的那样增加。首先，正如共产党所一再说明的（人们认为他们这样说是真诚的，因为这是痛苦经验的结果），他们不会在经济衰退时期执政来管理资产阶级的的事务，也不会强迫工人阶级勒紧裤带的政府里充当人质。所以，不管共产党对1974年在欧洲出现的经济危机公开作了什么解释，他们开始显示一种迹象，即不急于要当部长。因此，在意大利和法国，人们再次提出了这个老问题，就是共产党是否真的想掌权。其次，西欧经济的削弱为苏联从处境困难的“资产阶级”政府那里获得让步（例如，有利的贸易安排和贷款）提供了机会。用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来替代这些政府，不过是以尴尬的附庸代替陷于困境的敌人罢了，这决不是稳妥的策略。而且此时正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力图巩固缓和的时候，这样做将严重影响超级大国在这一极为重要地区的均势。就莫斯科帮助制定共产党的政策而言，此时它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去抢夺部长职务。最后一点是，欧洲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减少了和平地、民主地把政权转到共产党——或其他任何人——手中的机会，因为它象过去一样，为断然反对共产主义和工会或任何一类反对派的独裁政权创造了条件。意大利在1973年和1974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阴谋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即便假定出现了有利的经济形势，共产党人在九个或多个国家中即将参加政府的想法，也纯属一种大胆的揣测。由于过高估计了共产党在独裁国家的力量，那里由于不搞选举，种种担心便被看作是统计资料。例如，美国方面人士在1974年选举前夕所作的估计，希腊共产党的选举支持者占百分之

十五,但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的广泛联盟仅获得百分之九点四五的选票和三百个议席中的八席。这些人士还估计:西班牙共产党得票将占百分之二十一,葡萄牙共产党占百分之二十三,但有关国家的共产党的审慎的领导人认为这种估计并不正确。关于共产党将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预测,仅仅是根据以前的选举数字推论出来的。下文表明西欧所有的共产党都面临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相矛盾的情况:它们看来越接近执政,到关键时刻,政权就离它们越远。最终,这种种预测都涉及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或激进派分子(既然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共产党能够单独获得多数选票)之间在选举中所结成的联盟的命运,因此,它们设想使那些基本上不稳定的联合稳固起来。1974年,法共与社会党人相互攻讦,说明这种设想大成问题,其中存在下面一种原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同一选区竞选,一方的进展总是在牺牲对方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样就促使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背叛。

不管怎么样,尽管有着种种限制,一个新的观点在欧洲出现了,其想法是,普遍接纳共产党人参加民主政府已再次成为可能的了(之所以说“再次”,那是因为战后共产党人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希腊、挪威、芬兰、丹麦和冰岛曾参加过政府)。从可能性具有实际意义这点来说,政治也就成为处理可能性的艺术。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件,在今后似乎可能的了,就改变了政治局面。一个党如果开始象征着国家今后可能出现的前途,那就改变了这个党的份量或“信用”,虽然过去人们觉得它连竞争一丁点大的权力也配不上。特别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突然被看作是可以担任部长的人材,这就改变了这些至今依然被排斥在外(或愿意把自己排斥在

外) 以及甚至受到迫害的党的地位和政治作用。一旦这样一个党获得了这种可能性, 就必然出现新的发牌情况, 在这之后所有其他政党也将发现它们手中有着新牌。1974年在西欧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政治势力再分配的情况, 即便其原因就象刚才所谈的那样还不是实在的。

本书之所以对发生此类情况的原因将不作说明, 其理由是充足的, 因为这不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就象人类事务中经常发生的那样, 偶然性起了主要作用。共产党人对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垮台或对推翻希腊军事统治, 甚至对佛朗哥政权威望的突然下降(这倒是反共的巴斯克人的杰作)都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是这些事件与共产党战略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进展的巧合, 才突然地(也许是短暂地, 因为人们必须强调: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仅处在可能性的范畴)使人对西欧共产党另眼相看。本书能够说明的是这种新眼光还是模模糊糊的, 与其说它使人昭昭, 还不如说它使人昏昏。换句话说, 本书主题将是: 分析对共产党的支持, 揭示这种支持是怎样地由不同成分组成, 易变和无法预言; 描绘共产党的组织机构, 强调说明存在着能够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三种独立的力量; 即, 党的官僚机构, 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人和苏联的权力。最后叙述共产党的政策, 表明政策怎样把强有力的社会批评同陈旧的、无条理的民粹主义混在一起。

这样的描述, 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 也许会引起一些人得出如下结论: 共产党要么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 要么它们在政府机关内只能象某一特别类型的社会党那样履行职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普遍坚持认为, 诉诸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党在西欧是根本没有前途的, 不管它们在发展中

世界可能会有多大魅力。但这不是下列章节要提出的结论。诚然，直到上次大战时共产党还一直在西欧宣传的那种暴力革命，现在早已被共产党领导人所屏弃了。这样做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怀念过去耻辱的内疚，这种内疚就象人们回想起年轻时所犯的许多错误时所感到的那样。而如果万一他们的诚意受到怀疑，却有这个使人非相信不可的事实，即他们党内充斥着以革命还不能放在议事日程上为条件而入党的党员。然而，人们的行动的后果要比意图重要。共产党行动的一个可能结果是，共产党人将发动某些事件，并且对此他们可以宣布概不负责。然而这些事件却又构成“革命的形势”，这种形势的结局是无法预料的。特别是对一个象共产党那样似乎打算一头扎进这种局势的政党来说，情况就更为如此。因为对它的支持是分散的，信奉的主义前后不连贯，盟友不可靠，跟苏联的关系又承担着义务。

或许，人们毋须在政治预言的问题上犯大吹牛皮的错误就可以说，虽然种种有关共产党的评论使得它们的前途无法预言，但是有一点是相当肯定的，即它们在今后的十年内比它们处于“国内流亡者”这一时期要来得重要。作为政治进程的参与者和作为政府部长权力的可能的竞争者，它们的支持者、组织结构、联盟、政策和对外联系直接涉及到欧洲各国的政治、西欧的统一和美国联盟——涉及的程度要比当它们完全是外部反对派时大得多。因而，需要使自己熟悉这些情况，而不是接受它们自己和它们的对手所描绘的关于共产党的画像。对那些对数字不耐烦的读者来说，本书前几章关于共产党的支持者和组织结构的考察，看起来似乎过于琐碎了，但是对此也无需表示歉意。对政党方面比较乏味的问题，即它们所宣

布的纲领之类感到兴趣的人,可以先读后面的章节。但是,在西欧今后若干年的政治斗争中,要精确地了解在多大程度上和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还是“铁板一块似的组织”,还是“苏联的工具”——更不要说是“新型的社会民主党”,前两章是有帮助的。研究这些问题,将会发现存在着一种和共产党在今后十年内在欧洲许多地方掌权同样现实的可能性,即由于社会支持的形式不同并与苏联建立了新型关系,运用列宁主义党的机器来实现一种从未设想过的目的,势将导致政治上的失败,这种失败可以成为闹剧,也可以成为悲剧。

尼·麦

1974年11月于巴黎

一、西欧共产主义表现的情况

本书是根据这样一个假设写的，即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实体——西欧共产主义，并将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共产党人本身至少公开地坚持说只有“国际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它已不复存在了。因为“国际共产主义”不仅按照中苏分裂的表现，而且按照下面论述的其他失策的表现已经四分五裂了。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大概更有可能要问：西欧共产主义，更不必说国际共产主义，是否有足够的统一性使人们能有系统地加以论述；确实，有关共产党的大多数论著都是叙述各国党的事务。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就象冰岛共产党在1974年5月前的情况那样，似乎与苏联在土耳其的秘密机构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葡萄牙共产党1974年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从后者变为前者的事实——以及它的施政方针和西欧那些业已参政或几乎要参政的较大共产党的政策之间的相似点——都说明有着内在的统一。尽管各党在规模上和在本国的重要性上截然不同，可是一个党的历史也可阐明另一个党的历史。把一些有关法共过去经历中有争议的问题与挪威共产党在相同时期所做的事情对照起来就更清楚了。莫里斯·迪韦尔热一直坚持认为，象芬兰那样一个古老和独立的民主国家中，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的事务是跟一些比它要大得多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事件相关联的。研究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强大的共产党

的学者们，由于他们研究工作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卢森堡共产党的任何情况都不屑一顾。本书则是根据另外一种观点撰述的。“西欧”这个概念从地理到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含糊的，以致人们无意夸大这个地区的各个共产党之间的类似之处，而不去注意它们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并不总是出现在人们期望它们出现的地方，这也是有充分根据的。

共产党党员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将达百分之九十四——出现在易北河和太平洋之间的十四个国家中（人类的三分之一），这些国家是由共产党所控制的。全世界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员中其余的百分之六，大约二百八十万男女共产党员属于世界上的六十五个共产党，其中四十八个共产党是非法的或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在1965年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际上已被消灭，唯一有一些实力的党是日本、印度、智利和西欧共产党。实质上西欧占了党员的大多数，有二百多万，分布在二十三个共产党组织内。这些共产党就其规模来说，从有一百五十多万党员的意大利党，到仅有几百人的爱尔兰党不等。虽然意大利和法国只占不到西欧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但是西欧的共产党员约有百分之九十属于这两个党组织。其余百分之十的党员虽属于小党，但这些小党在小国中却能代表重要的政治力量，如芬兰、冰岛和塞浦路斯，或者能够经常发挥其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就如在瑞典和挪威发生的情况那样；或者在那些他们现在还处于非法状态下活动的国家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潜力，就如在西班牙和土耳其那样。

西欧共产党党员为两百万，是这十年中最初几年的数字，在最近时期，数字大概就已大不相同了。比如说，在1930年，党员人数还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那时只有两个引人注目的

西欧共产党组织，一个是有十二万四千名党员的德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有三万八千多名党员的法国共产党，其他的党便是那些最大也不过有六千名党员的小党。而到了战后的最初几年，西欧共产党人数超过了四百万。党员人数变动这样大的原因将在以后加以讨论。

围绕着党员核心，出现了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现象，从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的辅助组织，如青年组织，到受党影响的经常程度不一的工会，最后还有共产主义最本质的表现——共产党选民。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选民多达整个选民的四分之一以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某些情况是难以估量的。就以党员人数来说，这个显然是简单不过的事实就不精确，因为共产党不象大多数其他政党那样，它们经常把党员人数看作是党的秘密。更糟的是，它们有时把党员数字当作党的宣传，因此提供的数字肯定都是夸大的。

甚至共产党的数字本身也已成了一个大约数字。现在，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称它们自己为“某某共产党”了。在它们使用另一个名字的时候，过去的名字“共产党”就会被极左派集团夺去，它们宣称它们忠于据说是为共产党所背叛的传统。这样的事情在西德和瑞典都发生了。当西德共产党人在1968年结束地下状态公开活动时，他们是作为一个新的符合宪法规定的政党——德国的共产党活动的，他们并没有正式解散非法的德国共产党，这后一个名称至少被三个极左组织所采用，因此西德就有一个德国的共产党和三个德国共产党。在瑞典，共产党在1967年改名为左翼党（共产党人），一个先前被称为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联盟的集团，1973年2月接过了瑞典共产党的名称。

另外,有些共产党近几年来分裂了,但分裂的双方也许都会坚持用那个正式的名称。如何判断它们当中谁是真正的共产党,意见是会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在比利时和希腊都发生了,在这两个国家有“外部的”和“内部的”共产党。在西班牙,两派不但都保持相同的名称,而且出版同样名称的相互对抗的报纸。作为一种局部的情况,某个共产党的大多数成员——它的领导人、党员和选民——可以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现在象这样的运动不止一个),然而在国内政治中还是继续代表共产主义在该国所意味着的一切(只是同莫斯科的关系除外)。这后一个明显的标志可能就给众叛亲离的毫无代表性的余党留着,丹麦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种种这些保留情况,西欧共产党目前的情况如下:

| 国 别 | 西欧共产党名称和缩写 | 党 员 人 数 |
|---------|-----------------------|-----------------|
| 意 大 利 | 意大利共产党(PCI) | 1,622,861 |
| 法 国 | 法国共产党(PCF) | 240,000—260,000 |
| 芬 兰 | 芬兰共产党(SKP) | 48,000 |
| 西 德 | 德国的共产党(DKP) | 39,344 |
| 英 国 | 英国共产党(CPGB) | 28,000 |
| 希 腊 | 希腊共产党(KKE) | 28,000 |
| 奥 地 利 | 奥地利共产党(KPO) | 25,000 |
| 西 班 牙 | 西班牙共产党(PCE) | 5,000—20,000 |
| 瑞 典 | 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 (VPK) | 15,000 |
| 比 利 时 | 比利时共产党(PCB) | 15,000 |
| 塞 浦 路 斯 |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 (AKEL) | 12,000 |
| 荷 兰 | 荷兰共产党(CPN) | 12,000 |
| 西 柏 林 | 西柏林统一社会党(SEW) | 8,000 |

(续表)

| 国 别 | 西欧共产党名称和缩写 | 党 员 人 数 |
|----------|---------------|-------------|
| 丹 麦 | 丹麦共产党(DanKP) | 7,000 |
| 瑞 士 | 瑞士劳动党(PST) | 3,000 |
| 挪 威 | 挪威共产党(NKP) | 2,000—5,000 |
| 葡 萄 牙 | 葡萄牙共产党(PCP) | 2,000—3,000 |
| 冰 岛 | 统一社会党(AB) | 2,000—2,500 |
| 土 耳 其 | 土耳其共产党(TKP) | 2,000 |
| 圣 马 力 诺 | 圣马力诺共产党(PCSM) | 1,000 |
| 卢 森 堡 | 卢森堡共产党(PCL) | 500—1,000 |
| 爱尔兰和北爱尔兰 | 爱尔兰共产党(CPI) | 300 |
| 马 耳 他 | 马耳他共产党(CPM) | 100 |

* 资料来源：党员数字是最近的。但葡萄牙共产党的党员数字是1974年4月前的数字。在此后几个月，葡萄牙共产党声称它的党员数字超过十万。美国国务院出版的《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实力》和《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每年都刊登新的数字或估计数字，同时可参阅F·费特耶所著《共产党和革命运动辞典》（巴黎，1971年）和W·贝尔纳等人所著《苏联，1973年》（慕尼黑，1974年）。通常有独立见解的估计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为三十三万到三十四万人，其中包括六万八千名“预备党员”（《东西方》，第523号，第6—7页）；上面所列的数字摘自1973年第76号的《团结报》。

在阐述党员数字的时候，不仅应该考虑到该国的人口，而且应该考虑当地参加任何类型政党的习惯。自从出现法西斯主义以来，意大利人参加政治组织是小心翼翼的，而法国人就从来不是这样。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两个人口相当、受共产主义影响也相当的国家里共产党的规模存在如此巨大差别的部分原因。事实上，如果法国共产党拥有它所声称的四十万名党员的话，它就会比法国所有其他政党加在一起还要大。相反，意大利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只不过同天主教民主党一样多。

自然，党员的正式数字对于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卷入程度，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之所以值得一提，仅仅是因为“持有党证的党员”这一说法被认为特别有意义，是同共产党有关系的。事实上，一张党证大概要贴十二个月的党费印花，其党费数额根据党证持有者的收入。这样一来，正式党员马上就有十三种不同的类别（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在估计党的实力时会有一些差异）。更不用说经常出席支部会议和履行党的其他义务的程度了。还有，虽然对共产党员对待他们义务的认真程度通常都是过高估计的，但无疑，一般说来他们还是比其他政党的党员要更多地投身于政治活动。这样，尽管党员数字必然只是个大概数字，但也提供了有关共产党的重要资料。

然而，这些数字并没有直接说明共产党在实现其目标方面的成功程度，因为在这点上，共产党和其他大多数政党不同——就是它并不总是想成为一个大党。（“名流”的政党也不想成为大党。）原先列宁主义对共产党规定原则是对小党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后来，对西欧政治形势的不同估计不断地促使共产党迅速发展党员。但是在发展时期过后就有可能要作出努力来减少党员以保证“质量”。举例说，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声称（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不精确的），它已经吸收了第一百万个党员之后，又通过莱昂·莫韦谈到还要再吸收几百万党员：“党员必须以百万来计算……，我们必须把党的队伍扩大，吸收更多更多的党员。”然而，1947年莫韦已经不得不承认，他的一些同志“在警惕性的借口下，客观上是限制了吸收党员的工作……（宁要）质量不求数量”。这样一些同志在一年后获得了支持，那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号召法国共产党限制吸收党员以提高效果：

“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降低党员的（政治）觉悟以及在某些方面损害党的质量的后果。”自那以后，法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1946年的顶峰不断下降，并一直继续到1953年。那年起，七年来党员人数第一次有了增加，但是几个月后，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奥古斯特·勒戈尔以推行机会主义和降低党的质量的罪名而遭到谴责，并被撤职。

因此，共产党党员人数的变化并不一定象党所重视的那样是衡量它命运的尺度，因为党员人数的增加不仅可以是有利的政治环境的结果，而且也可以是更为随便地故意吸收党员的做法的结果；反过来说，党员人数的下降也可以被看作是质量上的提高。不用说，伴随着吸收更多党员的做法，将是采取对党员有吸引力的那一类政策（参加选举，同其他党派合作），而精简党的决定却将带来更强硬和不那么受欢迎的政策（孤立，彻底变革论，暴力）。

这些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并没有同其他西欧共产党的关系那样密切，因为它当时的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在第二次大战结束返回意大利时决意把意大利共产党建设成既是斗争性强的列宁主义政党，又是群众性的党。在随后的几年中，其他各国共产党力图影响各种政治阵线组织和培养同情分子，而意大利共产党却吸收了它的很多政治阵线组织并发展它的同情分子入党。这就是为什么党员人数从1943年至1951年，从五、六千名增加到二百三十多万名的原因，如果把它的青年联盟计算在内，甚至达到二百六十万党员。陶里亚蒂关于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定义，从未遭到过否认，所以不能说以后失去成千上万党员，是由于慎重发展党员造成的。这就是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

党在影响的大小这一点上存在差别的另一种解释。

青年组织

慎重发展成员同共产党青年运动的规模特别有关。确实，一个政党从事青年运动这一事实就可能是它当前政策的一个标志。共产党从来都很少象这样对青年特别关心，它否认青年还有与本阶级不同的其他社会问题。除此之外，共产党象其他政党一样，难以控制“它们”那些背离正确方向的青年运动组织，不管这些组织是否会被其领导人称作托洛茨基主义的还是毛主义的，或者相反地，是意大利式的，也就是说相对地自由主义的。

意大利共产党在战后大发展时期并没有从事专门的青年运动，而是把青年吸收进党内的青年支部或甚至是不分年龄差别的支部。1949年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这一事实被解释为同冷战期间党的路线强硬化有关。在意识形态方面对青年党员进行特别训练，是求质不求量的要求的一部分。联盟1951年4月声称它拥有四十六万三千名会员，1954年仍然还有四十五万会员，但这并不表明共产主义在意大利有任何发展，因为当时党员总数已在下降。在1956年匈牙利暴动后，青年联盟的会员骤减，1966年下降到十五万人左右，两年以后只剩下七万人。这倒确实表明了共产主义在青年中间的倒退。这点在1968年变得十分清楚，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在左翼方面受到各种过激派组织的包围。当那场动乱平息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声称将吸收数以千计由于1968年的动乱而“搞政治”、但是很快就厌烦这些毫无纪律的过激派组织的青年人。这点无疑是真实的，但是所有有组织的政党都同样得到了好

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可能吸收了甚至更多的这些幻想破灭了的革命者。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国共产党在青年运动方面有过惊涛骇浪的经历，战后法共声称它的各种青年组织拥有九万三千名会员。但是党承认到1954年其成员总数已下降至四万人。由于这些组织的合并，党所控制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于1956年恢复活动。但党在1959年和1967年声称其成员只有五万名。这是共产主义势力衰落的反映，因为在那个时期，在战后人口激增浪潮中出生的孩子也到了可以参加这个运动的年龄，而在此期间法国的大学生增加了五倍。正如1963年与它本身的共产主义学生运动发生冲突一事所表明的那样，由于对其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属于正统更为关切，当时法共实际上并未作出任何努力以发展青年运动。因此当1968年5月和6月的事件造成了极左分子被认为是潜在的革命者这一局面时，法国共产党也由于青年人中的支持微不足道而搞得焦头烂额。更糟的是，法共由于不了解当时青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束手无策，不得不谴责朝气蓬勃的积极分子为“左翼法西斯分子”。

1968年以后，法共试图克服它怀疑青年人的传统习惯（尽管年青人易犯极左的幼稚病），并试图在青年人中增加它的听众。法共声称到1971年为止它已成功地吸引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参加它的青年运动。如果共产主义青年运动那时真的聚集了六万到六万五千名年青人，也不算多。那时在受大学教育的人中，光是工人的孩子就至少有六万人。象意共一样，法共无疑由于在1968年的动荡日子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政治纪律而得到好处，但是这些好处是否能继续下去却没有

保证，在从无政府主义的活动走向其他有纪律的政党的过程中，共产党尚处于第一阶段，这点已为如下事实所证明，即许多过激运动的领导人以前都是共产党人，特别是都是从事过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共产党人。

其他西欧共产党的青年运动，诸如可以成为忠于莫斯科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成员的青年运动，从 1968 年以来一直规模不大，并且到处都受到极左派青年组织的挑战，党内的左翼也受到极左派青年组织的包围，而且通常在会员人数上也不如极左派的青年组织。

工 会

西欧现时没有共产党的工会。列宁或者还有他的接班人，过去从来也没有打算要建立共产党的工会。因此现时就没有象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或其他的一些党的直属组织那样正式隶属于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而且当然，正如共产党的党员数字所表明的那样，不可能存在大部分会员是共产党员的有重大意义的工会组织。现时确实存在而且与列宁主义教导相一致的是共产党人渗透到(象白蚁那样渗入到)工会中去。这种渗透可以从共产党工厂支部在基层工会的活动一直发展到夺取工会领导中的关键性职务。此类现象是无法估计的。一则因为工会现象本身也只是在差错极大的情况下才估计得出(据推测，受共产党影响的最大的工会联合会有近百万会员)。二则因为这是涉及影响的问题，因而各人估计不同。

工会会员数字之所以只能被人大体上获悉，是有点原因的。象各个政党一样，会员数字也是含糊不清的：会员证上得有多少会费印花才算一个积极的会员呢？其次，工会一贯

夸大其会员数字，因为工会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规模同其他工会相比是大还是小，以及取决于雇主和政府当局对它们的“代表性”的判断。即使人们能够对那些共产党在其基层极为活跃的工会（如在英国和芬兰）或者那些多少可以正确地被描绘为是“共产党控制的”、“共产党掌握的”或“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如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规模作出估计，但是我们所估计的规模将仍然是一个疑问。在冷战的论战中，人们曾以为我们将对共产主义现象或者它的一个方面作出估计。如果一个工会联合会声称它有着三百四十万名会员，而且知道大部分担任职务的人是共产党员，人们认为这就意味着西欧共产党拥有三百四十万名支持者。事实上，除了一些孤立的（以及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是灾难性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共产党试图把他们所影响的工会当作政治炮灰，例如作为街头殴斗中或政治罢工中的队伍，关于“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的一举一动是否象共产党人，还是有疑问的。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要同共产党的种种联盟和影响联系起来讨论的问题，而不应以某些工会会员的数字来估计共产主义现象。

根据正统的观点来看，列宁主义学说要求那些业已在工会组织中取得决定性影响的共产党员做到的是：使这个工会从属于效忠莫斯科的国际工会运动。这个国际工会运动一度就是工会国际，1945年以后便一直是世界工会联合会。然而在1948年和1949年间，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从世界工会联合会中分裂出去，世界工联实际上也从西欧消失了。只有塞浦路斯、圣马力诺、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会联合会还属于这个组织；奥地利工会联合会的一个派别仍然还是世界工联的成员，虽然这个联合会本身属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因此,虽然世界工联在1969年声称,有一亿三千四百二十九万九千零五十名工人是它所属工会的会员,但只能说其中仅五百九十万名是在西欧的(大部分会员属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那些多少是虚构的工会)。五百九十万的数目,是把属于世界工联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会联合会显然夸大了的人数加起来得出来的;塞浦路斯、圣马力诺和奥地利的工会会员人数,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谈到的意大利工会组织,是意大利总工会。在意大利的两千万工人中,各工会声称参加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四十,或者说超过了七百万。有理由怀疑,积极参加工会活动的不会超过五百万。在这五百万人中,意大利总工会声称有三百四十万工人属于它的工会,但实际数字也许只有二百五十万。由于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估计可能拥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五十万会员,受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影响的意大利劳工联盟的会员可能在一百万左右。意大利总工会仍然是意大利最大的工会组织。意大利总工会的领导人广泛地受共产党员的影响,虽然他们在施加影响时必须同领导层中的社会党人协调一致。

在法国,是法国总工会。它在1970年声称拥有二百三十万会员,其中十分之一以上是退休工人。政府估计它的会员人数在一百三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法国工人参加工会。所以法国总工会在法国有组织的工人中的优势地位比意大利总工会更突出。但它也面临着其他工会组织日益增长的挑战,尤其是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的挑战。法国总工会所受到的共产党的影响比意大利总工会更为广泛。但它的领导人员不全是共产党人,它的会员当然也不全是,因

为即使所有的法国共产党人都是工会会员——事实上他们不是——他们也不会象法国总工会会员那样，每十个会员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1973年选举期间的民意测验表明，法国总工会会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会员没有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因此，就共产党对一个稳定的群众组织的影响来说，尽管法国总工会在西欧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它还是应该列为共产主义的盟友，而不应象在冷战的论战中那样列为共产主义的现象。

阵线组织

如果对不同程度上受共产党影响的许多“阵线组织”不加考虑，无论这些组织是共产党自己创建的还是共产党所“渗入”的各种团体，那么就不能充分估计共产主义现象。（“阵线”在这里是表面的意思。它是反对派称共产党人自称的“群众组织”的用语。与之相反，共产党则是从战斗的意义上使用“阵线”这个词的——譬如统一阵线、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这些阵线将在后面作为共产党的盟友来加以讨论。）了解共产党的“打进主义”和“阵线”的方法及限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阐明共产党沉溺于组织工作的情况，并且说明共产主义的某些近代史——同时注意到自以为对此类共产党影响有正确估量会导致荒唐的结论，这也是重要的。过去冷战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开列一份组织清单，其中有些组织是明显受共产党影响的，有些是被怀疑受共产党影响的；列入这种清单的组织很快就可多达数百个，他们的会员和支持者的数字就以亿万计了。但是这样做，就会使人们看不清应该加以估计的东西。假如有人设想他是在估计共产主义传播的情况或在描述一个阴谋的行动计划，那么他就会陷入一种大多数

(不是全体)共产党人所抱有的错觉。那种认为阵线组织推进了共产主义,以及这种组织的向前发展是可以估计的想法,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和麦卡锡主义分子的错误。

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对抗时期,共产党人竭尽全力促使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协会(甚至这些协会可能还是非政治性质的组织),偶尔通过一项决议或者偶尔发出一份贺电,内容包括赞成苏联的目的和谴责美国的目的,或者只是谴责美国的目的。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只能偶一为之,因为如果经常这样做因而共产党在这些组织中的统治地位变得明显的话,这样一个协会就会被认为失去了作为阵线的作用。关键是使那些表面上看来并非共产党的组织或者那些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占少数的组织,支持苏联的政策。这种大半是徒劳无益的行动,有时是以如下的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即悄悄地“接管”一个组织,或者至少是在主要职位上安插一些人,以便一旦时机成熟时进行接管。这种理论只有害了“组织迷”的共产党人和准备把那些一度或者有时卷入这类活动的组织都列入“共产党人”的反对派,才予以认真对待。许多对共产党影响情况的估计,就是建立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

尽管对共产党渗透的组织进行认真查究的活动已告结束,但是仍然提出一大批受共产党人“控制”——往往加上“在不同程度上”之类站不住脚的字样——的学生、农民、歌唱家、医生、预备役军官、战争造成的寡妇、演员、退伍军人和教师等组织的清单。这种清单必然是不完整的,并且不久就要过时。因为这些清单所指出的不是可以估计的或在发展中的趋势,而是共产党的“打进主义”的固有特征。正如研究这些组织的一位最勤奋的行家所说的:

目前存在着无数有关当今时事论题的委员会，如葡萄牙的一次大赦，希腊的民主，为伊朗的政治犯辩护和许多其他问题。确定这些委员会的精确数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出没无常，一下子纷纷出现了，一下子又消失了。

这种不稳定的原因就是苏联对外政策不断改变其要求，因为阵线和渗透的策略是适应苏联的对外政策需要，而不是为当地党的利益服务的。当然，推进那种对外政策也是当地党的利益之一，但是除非这个党一心企望（自1945年以来西欧没有一个党这样做过）依靠苏联的坦克来夺取政权，否则这只能是它们利益之一。阵线不仅没有由此促进它的其他利益，而且还正如托洛茨基分子和极左分子在指出“打进主义”的危险时所一贯警告的那样，事实上反而损害了这些利益。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在力图利用那些对其会员一无所知的组织时，他们本身就被利用了。这样说是指他们卷入了他们力图使之革命化的团体。没有任何一派能够“对一个团体撒下一个红色网”而又不被它吸收。为了力图使一切事物政治化，共产党人失去了他们很大一部分政治效能，并成了他们的左翼反对派所称的刻板化的政党。事实上，爱搞阴谋的共产党人所想象的象白蚁似地悄悄啃进组织中去所做的事情，以及麦卡锡主义分子担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从来不隐瞒受共产党控制的阵线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是由共产党人操纵的书记处管理的，或者是总部设在东欧的，但是它们力图成为巨大的群众组织。最有名的是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国际学生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抵抗战士

联合会。其中有些组织显然已成为庞大的组织：如妇女联合会在五十年代声称有一亿四千万拥护者；民主青年联合会在1955年有八千五百万会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前身组织在五十年代初为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征集了四亿签名者。这些数字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大多数会员和签名者在共产党国家里，因此其价值就无法证实了。然而，有据可查的是：一个声称在苏联有四百万会员的“世界教师联盟”，它的官方出版物却没有俄文版。另外，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个文件——维也纳呼吁书，1955年在中国有一亿人签名，可以想象，四年以后当北京和莫斯科发生争吵时，这一亿签名者大概没有一个是值得的。

这类组织在西欧各国是少数派。但毫无疑问，它们对其组织者来说是唯一有重大关系的部分。例如：妇女联合会在意大利有一百万拥护者，法国有一千四百万人在斯德哥尔摩呼吁书上签名。但是事实证明，它们并不比共产党集团那部分有多大的价值。所有这些趾高气扬的组织在几年内就由于在南斯拉夫、中国以及后来又在各种混乱问题上发生的相互攻讦的冲突而搞得四分五裂。它们受到敌对组织的挑战或者被当作反苏宣传的讲坛。它们把提抗议的垄断权丢给了当地的非共产党组织（例如在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中，共产党控制的和平运动在西欧黯然失色）。最后它们便销声匿迹了。共产党控制的阵线的巨大事业——有些人错误地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进展——不仅仅证明是象梦幻一样的东西，完全缺乏社会意义和政治素质，而且它们还给应该“控制”它们的地方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它们促使党内出现危机，而且反过来又破坏了这些阵线的声望。阵线的不稳定状态和它对共产党

政治活动的破坏性影响，与它们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各个时期的工具这一根源是分不开的。

阵线是在1921年统一阵线时期开始出现的，那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或者其他民主政党公开进行政治合作的时期，因此，力图在党正式与之合作的圈子内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就有意义了。同领导人的合作可以和诱使那些受其领导的人参加共产党的努力相结合。对本国党来说，阵线的主要职能——不管它对苏联对外政策抱什么目的——是作为吸收党员的基地。就是在二十年代统一阵线时期，维利·明岑贝格完善了阵线的组织，首先建立的是国际工人互救会，这一组织表面上看来是为饥饿的俄国人谋求粮食、衣服和药品，但实际上却是谋求对苏联政府的支持。在这个统一阵线时期的后期，奥托·库西宁于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局的一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阵线的理论。他说：

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不单是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而且还要建立其他组织，特别是同情我们的目标，并能帮助我们实现特定目的的群众组织。在某些国家中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组织，例如：国际红色救援会，国际工人互救会等等……除了这些组织外，我们需要若干多少是基础稳固的分支组织，以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利用……我们必须以共产党为中心建立由这些组织和类似的委员会组成的完整的系统，就是说较小的组织，它们实际上不是在我们党的呆板的领导下工作而是在我们党的影响下工作。

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党人耽溺于组织工作的情况（认为政治不是为了推行政策，而是为了组织各种委员会），另一方面这种理论至少使一贯的做法合乎情理了：象白蚁啃啮那样

渗入党与之合作的机构。但是这一理论到1928年就不再有道理了。那时共产国际放弃了统一阵线策略，而主张采取激烈的反对态度、孤立政策以及“阶级与阶级”的对抗。于是，对非共产党的组织（或者对共产党控制的、但共产党人不占多数的协会）暗中进行操纵，也许偶尔可以使其发表支持苏联对外政策的声明，但是这并不能促进地方党的其他利益。除非是进行一次真正的政变，不然政党无法从不自觉的支持中获得持久的利益。因此阵线组织在这个时期就黯然失色了。只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人民阵线时期开始以后，它才又恢复到共产党政策的首要地位。无论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观点看，还是从为地方共产党争取党员、选票和提高其威望的目的看，在西班牙内战和反纳粹斗争中阵线的效用达到了最高峰。在斯大林和希特勒合作时期，阵线再度黯然失色。但它在反对轴心国的共同战斗中以及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又有了巨大的发展。就在1945年，建立了世界工联、世界民主青联、国际学联和国际民主妇联，接着在1946年又成立了新闻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协会。

这一共产党与民主政党合作的时期，随着冷战的开始而告结束，阵线也就立刻陷入了困境。它们失掉了许多非共产党的支持者，不是共产党所控制的工会和青年组织在1948年和1949年即脱离了世界工联和青年联合会。阵线继续声称它们仍拥有庞大的会员，但是它们在西欧所实际拥有的部分只是力量微弱的残余组织，它们偶尔也许会给苏联政府发去一份表示赞助的电报，但那只能是使地方党的情况复杂化。这种复杂化是因为一个推行强硬路线，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党，不得不向阵线组织委派人员，而这种阵线组织又是资本

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而且还要求这些组织继续维持这种情况，以便它们对苏联表示的友好态度可以有某种重要意义。这样，这些被委派去的人员受到了各种相互矛盾的压力。他们不仅没有在其他民主组织中代表共产党，反而很快就有在共产党内代表这些民主组织的危险。此外，他们在阵线中所获得的支持似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权力基地，而这种基地有可能被用来反对党的领导，因此他们有搞阴谋的嫌疑。这一情况就是导致对安德烈·马尔蒂、夏尔·狄戎、马塞尔·塞尔万、洛朗·加桑诺瓦，最后是罗歇·加罗迪进行审讯的一系列法共党内危机的共同原因。

1954年党外人士用如下这些话来描述这种结构：

按照这种党的模式来进行联系和作出决定，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党的领导集团中以党的内部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一方和受党控制或影响的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为另一方之间的分裂……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员（也就是作为代表派往阵线组织的党员）……所依靠的那些人的愿望，常常与党的策略要求相冲突。在党组织和受它控制的组织之间存在着分歧。而在这一方面（也就是在阵线组织中）活动的党的领导人员有着一种权力基础，使得他们有可能对党内领导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由于这一方面（阵线组织）的领导人员经常被朝着发生冲突的方向牵着走，而且又比较容易找到出路，因此它比中央党的官员更容易背叛。

鉴于法共在阵线运动中的声望以及莫斯科对其领导的信任，它经常被要求为主要的国际阵线组织配备工作人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法共是受上述这些紧张状态危害最严重的党的原因，直到后来法共领导在把那些由于在阵线组织中工作而

受腐蚀的同僚开除出党或进行批判之后，承认了这些困难的存在，情况才有所改变。就在1960年，莫里斯·多列士曾说过：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可以最有害于群众组织的发展和行动。这些组织有很重要的作用要发挥。要求它们采纳共产党的一切口号就是否认它们的特性，就是缩小它们活动的可能性，就是阻碍它们的发展和严重破坏群众民主组织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讲，这是把先锋队和群众混为一谈，表面上是肯定而其实是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这就是当法共自相矛盾地试图利用阵线组织，同时又奉行一条“宗派”路线时，多列士接二连三的对手对他进行攻击的内容。到了多列士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和阵线组织已经由于这些危机而受到损害和削弱。这些阵线组织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很快就由于内部出了一个新的宗派——北京派而崩溃了。北京派试图利用这些俄国制造的阵线组织替中国的对外政策辩护。此时，西欧各国的党和莫斯科都同意让这些阵线组织消亡算了。前者除了偶然利用阵线作为吸收党员的基地以外从未得到过它的什么好处，而后者也改变了自己的对外政策，这一对外政策不可能由于与北京共同掌握阵线组织而得利。当苏联真正需要和平的时候，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性已大大减少。苏联也知道，和平是通过同华盛顿的谈判，而不是通过“和平运动”获得的。在西方经手这些运动的法共，听任和平运动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只不过是四十八个要求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法国组织中的一个而已。在要求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事业中，无论如何法共都是半心半意的，还不如其他左派政治力量。在西欧实际上没有解散什么阵线组织；倒是象意大利妇女阵线组织——

意大利妇女联合会一样，逐渐衰微了。意大利妇女联合会在五十年代曾夸耀有一百万会员，但十年以后会员人数下降至不到二十万。此外，意大利妇女联合会和其他意共阵线组织存在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在六十年代，有百分之七十的会员是集中在“红色地带”，即意大利中部地区，那里共产党掌握着市和地区政府的权力，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投共产党的票。“红色地带”现在尚存的那些意共的残缺不全的阵线组织现在起着另一种作用了，不是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也不是扩大意共的影响，而是搞社会一体化。其中，有些组织第一次在特定的地区内成了由对共产主义有共同好感而联合起来的运动员、家庭妇女或农民的善意的协会。这也就是说根本不是阵线组织了。至于法共，据说到1973年它只剩下了一个阵线组织——法国总工会。

当西方共产党恢复了与社会党和其他中左党派公开合作的政策时，它们本来有可能复兴阵线组织而又不使自己陷于斯大林时代的那种困境。然而，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并不认为替苏联的对外政策辩护是党的主要职责的新的权力中心，从而使这一切不可能实现了。这些共产党仍然乐意通过任何政治或非政治的社会团体来进行工作。这些团体也许会帮助他们吸收党员、争取选民。但这将是一种旨在促进本国党的事务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活动，虽然阵线偷偷地进行旨在替苏俄辩护的活动。这一点在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官员时就阵线组织的目的所发表的经典讲话中得到了阐明：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一个同情我们的人一般说来比十几个有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人更有价值；一个还不是党员的大学教授如果为苏联的利益而斗争，那他比一百个有党证的人更有价

值；一个为苏联辩护但还不是党员的作家和一个站在我们队伍外但替苏联的国际政策辩护的工会领袖比一千个党员更有价值。

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阵线组织的存在是为了维护苏联的政策，而不是为了以这种对地方共产党来说是事关紧要的唯一方式，即通过争取到党员来发展地方共产党。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在七十年代对后者比对季米特洛夫分配给阵线组织的任务更感兴趣，这点在以后将予以说明。这里重要的是证明，尽管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关于阵线组织都提供了天文数字般的统计资料，但阵线组织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现象规模的情况，有关它逐步发展的情况就更少了。这些组织中最大的组织是与苏联对外政策有关而不是与共产主义传播有关的昙花一现的组织。而关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这些组织却大概起了阻碍作用。

报 刊

列宁曾说过：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办报。在履行这一义务的时候，西欧共产党人提供了赖以衡量他们影响的尺码，或者说，如果近几年来由于报刊发行量的下降并没有使他们隐瞒事实的话，他们至少会这样做。战后年代的巨大发行量已直线下降。为数众多的共产党报纸纷纷停刊，幸存的一些报纸也困难重重，靠党员，或者靠其他活动，或者（象在瑞典和法国）靠地方政府，或者大概（象西柏林和奥地利）靠外国政府的津贴维持。如同最近报刊发行量的图表所显示的那样，十七个国家中还有共产党的日报。假定在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或者在那些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派别的国家中不可能有

日报，那么这一表格中唯一缺少的就是挪威了。挪威曾有过党的机关日报——《自由报》。战后初期，它的发行量曾达到十三万一千份。1967年改为周报，发行量为四千五百份。

| 出 版 地 点 | 报 刊 名 称 | 发行量(估计量) |
|---------|----------|----------|
| 罗马和米兰 | 《团结报》 | 350,000 |
| 罗 马 | 《国家晚报》 | 90,000 |
| 巴勒莫 | 《时报》 | 15,000 |
| 巴 黎 | 《人道报》 | 105,000① |
| 马 赛 | 《马赛日报》 | 120,000② |
| 里 尔 | 《自由报》 | 98,000② |
| 里摩日 | 《中央回声报》 | 62,000② |
| 赫尔辛基 | 《人民新闻》 | 43,000 |
| 杜塞尔多夫 | 《我们的时代》 | 40,000③ |
| 伦 敦 | 《晨星报》 | 50,000 |
| 吕勒欧(瑞典) | 《北极火焰报》 | 3,000 |
| 维也纳 | 《人民之声报》 | 40,000 |
| 尼科西亚 | 《黎明报》 | 15,000② |
| 阿姆斯特丹 | 《真理报》 | 17,000 |
| 哥本哈根 | 《国土与人民报》 | 6,000 |
| 西柏林 | 《真理报》 | 12,000 |
| 日内瓦 | 《工人之声报》 | 8,000 |
| 雷克雅未克 | 《人民意志报》 | 8,000 |
| 卢森堡 | 《卢森堡人民报》 | 2,000② |
| 布鲁塞尔 | 《红旗报》 | 10,000 |
| 里斯本 | 《前进报》 | —— |
| 雅 典 | 《黎明日报》 | —— |
| 雅 典 | 《解放报》 | —— |

① 反对派的估计，据1974年第90期《团结报》。

② 按照向广告公司公布的数字。

③ 1973年10月才改为日报，此数字是以前为周报时所公布的数字。

上述数字表明，战后几年来发行量明显下降。五十年代《工人日报》销售十二万五千份，《人民新闻》销售五万九千份，《人民之声报》超过四万份，《真理报》为二万五千份，《国土与人民报》一万六千份，《人民意志报》一万二千份，在斯德哥尔摩还有一家共产党日报——《新日报》，发行量为六万五千份。《团结报》在1949年曾达到四十八万八千份的最高发行量。尽管米兰、罗马、波伦亚、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已不出版共产党的或与其同盟者合办的日报，从而给意共中央党报造成了乘虚而入的缺口，但是，《团结报》的发行量在1953年却下降到四十三万五千份。1956年骤然下降到三十六万七千份，从那时起它便一蹶不振了。然而，总发行量勉强不到五十万份的这三家尚存的共产党日报占整个意大利日报发行量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此外，意大利共产党还出版各种各样周报，其中有些发行数字引人注目，如为妇女办的《我们妇女》就发行二十八万份。

战后最初几年，法国共产党在巴黎有两家日报，在地方各省有十五家日报。三十年后只剩下了四家，其中三家地方报都是巴黎的机关报《人道报》的孪生兄弟报纸。《人道报》在1936年的发行量已达五十万份，在1947年几乎达到一百万份的高峰。以后它的销售量逐步下降，到1968年降到了不足二十万份。此后数字就不再公布了。据党内反对派人士估计，1974年它的发行量是十万五千份。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共产党报纸不可避免地经受着其他发行量小的法国报纸所常见的困难。领导曾提出警告说，报纸也许不得不停止出版。在1948年至1964年间，《人道报》有能力资助同行的日报《解放报》，而在六十年代它本身却要由党内那份通俗的和政治味道

不那么浓的《星期日人道报》(尽管名字叫《星期日人道报》，却逢星期三出版)来资助。尽管兜售《星期日人道报》是党员最喜欢干的差事之一，可是它的销售量仍然由五十万份下降到三十五万份，此时，《人道报》本身的情况已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人道报》和巴黎另两家小报得到了法国政府财政上的资助。

除报纸以外，法国共产党还出版几种理论性的周报和月刊以及一些专门为儿童、妇女和农民出版远为成功得多的期刊。这一出版组织由两家图书出版公司、一个通讯社和几家商业性的印刷厂和发行部门组成。

除了这些公开报纸外，共产党还有专供内部发行的刊物——由支部和分部出版的新闻小报。这些小报大多数是用复写机复写的，但也有些是铅印的。有关这些刊物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关于这些刊物多少时间出版一次的统计数字还是零碎不全的。据法国共产党声称，除了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八百万份地区出版的小报外，一年中还出版一千万份支部新闻小报。党内有不到一半的支部从事出版新闻小报的工作，其他则搞大量的编写工作。

必须看到西欧共产党出版刊物数量和发行量的下降是以整个出版业，尤其是党派的政治性报纸的困难和随之而来的收缩为背景的，这些报纸与纯粹提供消息和消遣的报纸性质不同。党派的政治性报刊声誉下降，使得若干社会民主党丢掉了机关报，同时也严重挫伤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报纸在所有报纸中党派的政治色彩最浓，那就是说，这些报纸象任何党派的政治性报纸一样具有党派的偏见，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个问题，教条主义，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术语和老一套公

式，而且在这方面比大多数党派的政治性报纸更为严重。特别是这些刊物最愿意接受党内审查。当这样做需要试图对诸如苏联武装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等类引人注目的事件不声不吭时，那它读者的减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共产党报刊的衰落不仅告诉我们有关西欧共产主义所呈现的情况的广度，而且也告诉我们它的深度。阅读和出售党报是党员的首要职责。不仅如此，党员还不应阅读任何其他报纸。“必须对那些买其他报纸而不买共产党日报的党员加以怀疑。”对非共产党人士提供的消息故作不知，情愿满足于对共产党报纸的检查、满足于采取影射手段（也就是“秘密通讯”），这是斯大林时代西方共产党人的特征。而今天，两、三个共产党员中还不到一个订阅党报，但是几乎所有的党员都用其他出版刊物以及无线电电视作为对党报的补充。这些情况如同发行量的下降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现象的广度在收缩那样，告诉我们它的深度也在下降。

共产党选民

因为共产主义现象是公开的和不拘一格的，所以对它最精确的衡量是看共产党的候选人在选举中的表现。选民给共产党竞选国民议会议员（本书所谈的唯一类型的选举）的候选人投一票所赋予的重要意义，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以及甚至不同的人都很可能是大不相同的。然而，正如法国共和主义的名言（先于选举学上的一句格言）所说，“不管选票份量多少，选票总是选票。”也就是说，不管投票者的动机怎样，选票都是一张算一张的。对共产党选民动机的研究（或者更确

切地说，对共产党的投票与某些客观条件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探索)将等到我们叙述了有关共产党选民的严峻的事实以后再进行。

由于九个欧洲国家加入了有着遥远和模糊的邦联目标的欧洲共同体，人们也许可能对把那些国家中的共产党选票和共产党代表合在一起产生一定的和加以探索的兴趣。如果在1973年年底选举了一个由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和爱尔兰组成的国际性议会，每个国家都执行它自己目前的选举法(而不是象那些赞同直接选举一个欧洲议会的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所有国家都实行相同的比例代表制选举法)，以及如果选民的表现象他们在上次国内选举中的表现一样，那么他们选出的议会在二千九百八十七名代表中就有二百七十六名是共产党人，或者说占百分之九点二。如果议员们按政治信仰就坐的话，共产党议员集团将是议院中最小的一个集团之一。确实，只有议员大约只有五十名左右的极右派集团才会比共产党还小些。保守派集团多少要比共产党稍大一点；天主教民主党和中间派会大两倍；而社会民主党却将会是五倍。这一想象中的议会由一亿四千八百万张有效选票选出，其中占百分之十点三的一千五百二十万张选票是投给共产党候选人的。

我们从这一假设中再回到共产党候选人在国内选举中的表现，下列表格表明了最近的选举结果。

在以下这些数字中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选举结果的模式，因此必需对每个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甚至人们把近几年共产党选票的演变情况看作是所投的选票的百分比时，也没有出现什么选举结果的模式。共产党选票在有些国家有了

| 国 别 | 选 举 日 期 | 共产党选票 | 占选票百分比 | 赢得议席 | 总议席 |
|------|----------|-----------|--------|------|-----|
| 塞浦路斯 | 1970年7月 | 79,820 | 39.7 | 9 | 35 |
| 意大利 | 1972年5月 | 9,085,927 | 27.2 | 179 | 630 |
| 法国① | 1973年3月 | 5,156,619 | 21.2 | 73 | 490 |
| 芬兰② | 1972年1月 | 438,387 | 17.1 | 37 | 200 |
| 冰岛③ | 1974年6月 | 20,922 | 18.1 | 11 | 60 |
| 卢森堡 | 1968年12月 | 402,610 | 15.5 | 6 | 56 |
| 希腊④ | 1974年11月 | 464,331 | 9.4 | 8 | 300 |
| 瑞典 | 1973年9月 | 274,929 | 5.3 | 19 | 350 |
| 荷兰 | 1972年11月 | 329,973 | 4.5 | 7 | 150 |
| 丹麦 | 1973年12月 | 110,809 | 3.6 | 6 | 179 |
| 比利时 | 1974年3月 | 169,668 | 3.2 | 4 | 212 |
| 瑞士 | 1971年10月 | 50,831 | 2.7 | 5 | 200 |
| 西柏林 | 1971年3月 | 33,930 | 2.3 | 0 | 11 |
| 奥地利 | 1971年10月 | 62,000 | 1.3 | 0 | 183 |
| 挪威⑤ | 1969年9月 | 22,494 | 1 | 0 | 150 |
| 西德 | 1972年11月 | 114,000 | 0.3 | 0 | 496 |
| 英国 | 1974年3月 | 32,741 | 0.1 | 0 | 635 |
| 爱尔兰 | 1973年2月 | 466 | 0.04 | 0 | 144 |

① 第一轮的选票;在第二轮选举后再分派议席。

② 芬兰人民民主同盟的选举结果。

③ 人民联盟的选举结果。

④ 共产党“统一左派”组织的选举结果。

⑤ 挪威共产党在1973年9月是社会党选举联盟的一部分,该联盟获得二十四万二千张选票(占11.2%),十六个议席,其中有一席是共产党的。

增加,在一些国家则减少了,还有在一些国家选票则保持稳定。为了作出最有限的概括,人们需要把这些国家分为五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一) 一类国家是,共产党虽然合法,但不力争竞选。

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共产党,又名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

步党。它自1941年以来与执政党——爱国阵线协同进行竞选。虽然它在1960年的希腊族人的选民中获得百分之四十二的选票，而且十年后也获得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的选票，但它在先前那次选举中只得了五席（总议席为三十五席），在后一次大选中得九席。如果它在1970年竞争所有的席位，它原会是塞浦路斯议会中最大的一个集团。但是它在一个种族上分裂的国家中是一个完全由希腊族组成的党，并且在莫斯科反对这个国家同希腊合并时又是个亲苏派，这种微妙的地位使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只好按兵不动。

（二）有些国家共产党得到的选票如此之少，以致于几乎不论多怪的竞选候选人都一样，所以选票的各种变化难以解释。

英国：英国共产党自从1950年以来在下议院就没有代表了。它所获得的那一小部分选票似乎是根据公众对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情绪而波动，例如，1966年至1970年的选举期间，发生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类的事件。

| | 英国共产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 议员总数 |
|----------|---------|------|-----|------|
| 1945年7月 | 102,780 | 0.4 | 2 | 640 |
| 1950年2月 | 91,815 | 0.3 | — | 625 |
| 1951年10月 | 26,640 | 0.08 | — | 625 |
| 1955年5月 | 33,144 | 0.1 | — | 630 |
| 1959年10月 | 30,896 | 0.1 | — | 630 |
| 1964年10月 | 45,086 | 0.2 | — | 630 |
| 1966年11月 | 62,112 | 0.2 | — | 630 |
| 1970年6月 | 38,431 | 0.1 | — | 630 |
| 1974年3月 | 32,741 | 0.1 | — | 635 |

英国共产党的失败是普遍的(在1964年所有三十六个共产党候选人都输了),而且失败一直在发展:1970年赢得的选票比1922年还要少,1922年英国共产党获得了五万二千张选票。

瑞士:瑞士的情况相反,公众对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想法大体同英国差不多。但瑞士劳动党却赢得了更多的选民。可是没有提高它在有效选票中所占不大的百分比。

| | 瑞士劳动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总数为二百) |
|----------|---------|-----|----------------|
| 1947年10月 | 49,353 | 5.1 | 7 |
| 1951年10月 | 25,659 | 2.7 | 5 |
| 1955年10月 | 25,060 | 2.6 | 4 |
| 1959年10月 | 26,346 | 2.7 | 3 |
| 1963年10月 | 21,088 | 2.2 | 4 |
| 1967年10月 | 23,208 | 2.9 | 5 |
| 1971年10月 | 50,831 | 2.7 | 5 |

比利时:虽然比利时共产党的选民现在已大大少于战后头几年,但在近十年中没有减少。

| | 比共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总数为二百十二) |
|----------|---------|-----|------------------|
| 1961年3月 | 164,000 | 3.1 | 5 |
| 1965年5月 | 236,333 | 4.6 | 6 |
| 1968年3月 | 170,627 | 3.3 | 5 |
| 1971年11月 | 164,195 | 3.1 | 5 |
| 1974年3月 | 169,668 | 3.2 | 4 |

西柏林:在1946年10月举行的全柏林选举中,当地的共产党在西柏林赢得了二十八万五千四百七十五张选票,占西

部选民的百分之十三点七。1948年12月和1950年12月它抵制了西部地方的选举。在这之后共产党虽然参加了选举，但从未在西柏林的参议院中赢得议席。

| | 西柏林统一社会党选票 | 百分比 |
|----------|------------|-----|
| 1954年12月 | 41,375 | 2.7 |
| 1958年12月 | 31,572 | 1.9 |
| 1963年2月 | 20,929 | 1.4 |
| 1967年3月 | 29,925 | 2 |
| 1971年3月 | 33,930 | 2.3 |

(三) 有些国家共产党选票虽少,但都显然地表明增长的趋势。

荷兰: 荷兰共产党是一个被当作政治上的卑贱者的小组,它拒绝同其他共产党合作,然而它在选举中却取得了似乎是意义重大的进展。

| | 荷兰共产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总数为一百五十) |
|----------|---------|-----|------------------|
| 1959年3月 | 144,542 | 2.4 | 3 |
| 1963年5月 | 173,457 | 2.8 | 4 |
| 1967年2月 | 248,000 | 3.6 | 5 |
| 1971年4月 | 246,299 | 3.9 | 6 |
| 1972年11月 | 329,973 | 4.5 | 7 |

卢森堡: 小小的卢森堡共产党所一直取得的进展使它成了在全国选举中赢得了百分之十五以上的选票的六个共产党之一。在工业地区的一些市镇中, 卢森堡共产党还赢得了百分比高达百分之二十八的选票。

| | 卢森堡共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总数为五十六) |
|----------|---------|------|-----------------|
| 1959年1月 | 220,425 | 9.1 | 3 |
| 1964年6月 | 330,909 | 12.5 | 5 |
| 1968年12月 | 402,610 | 15.5 | 6 |

丹麦：丹麦共产党在解放后的第一次选举中赢得了八分之一的选票后，其影响一直下降，直到1966年以后才开始恢复。

| | 丹麦共产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 议员总数 |
|----------|---------|------|-----|------|
| 1945年10月 | 255,236 | 12.5 | 18 | 149 |
| 1947年10月 | 141,094 | 6.8 | 9 | 150 |
| 1950年9月 | 94,523 | 4.6 | 7 | 151 |
| 1953年4月 | 98,940 | 4.8 | 7 | 151 |
| 1953年9月 | 93,824 | 4.3 | 8 | 179 |
| 1957年5月 | 72,315 | 3.1 | 6 | 179 |
| 1960年11月 | 27,298 | 1.1 | — | |
| 1964年9月 | 32,390 | 1.3 | — | |
| 1966年11月 | 21,536 | 0.8 | — | |
| 1968年1月 | 29,706 | 1 | — | |
| 1971年9月 | 39,564 | 1.4 | — | |
| 1973年12月 | 110,809 | 3.6 | 6 | 179 |

(四) 有些国家共产党选票曾有一度是不可忽视的，但如今已急剧下降。

西德：德国共产党在1949年还能够西德的选举中赢得一百三十六万二千张选票(百分之五点七五)，使它在波恩的议会中获得十五个席位。四十年代后期，德国共产党在一些

地区选举中赢得的选票超过百分之十。到1955年的联邦议院选举时，它占的选票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二（六万零六千张选票），甚至在它被以违反宪法为名宣布为非法以前，它就已丢失了在波恩充当议员的权利。在1969年9月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从秘密状态再次转入公开活动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十九万七千张选票，占百分之零点六。在1972年11月的选举中，德国的共产党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竞选，同时又推荐选民在某些地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次选举中它的选票减至十五万票，占百分之零点三。

奥地利：奥地利共产党象德国共产党一样，它在五十年代所代表的选举势力除了今天势力最强大的六个共产党外，比任何其他共产党都强大，但以后就开始衰落了。它的四个议员在1969年被击败后，就一直没有议员。

| | 奥地利共产党选票 | 百分比 |
|----------|----------|-----|
| 1962年11月 | 135,482 | 3 |
| 1966年2月 | 19,000 | 0.4 |
| 1970年3月 | 47,000 | 1 |
| 1971年10月 | 62,000 | 1.3 |

挪威：挪威共产党战后曾获得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选举结果，自那以后选民票数就一直不断地下降；直到1973年，它作为一个联盟即社会主义选举联盟的一员，参加了竞选而获得意外的成就。

| | 挪威共产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总数为一百五十) |
|----------|---------|------|------------------|
| 1945年10月 | 176,535 | 11.8 | 11 |
| 1949年10月 | 102,722 | 5.8 | — |
| 1953年10月 | 90,422 | 5.1 | 3 |
| 1957年10月 | 60,060 | 3.3 | 1 |
| 1961年9月 | 53,678 | 2.9 | — |
| 1965年9月 | 27,996 | 1.4 | — |
| 1969年9月 | 21,517 | 1 | — |

1973年9月,社会主义选举联盟得二十四万二千四百票,占百分之十一点二,同时在议会的一百五十五个席位中得十六个席位,其中一个席位由挪威共产党主席所得。

瑞典:在瑞典,共产党的选民票数在长期下降以后,出现了稳定,并且这一情况要比其他国家出现得更早。

| | 瑞典共产党/ 瑞典左翼党 共产党人选 | 百分比 | 议员数 | 议员总数 |
|---------|--------------------------|------|-----|------|
| 1944年9月 | 318,466 | 10.5 | 15 | 230 |
| 1948年9月 | 244,826 | 6.3 | 8 | 230 |
| 1952年9月 | 194,016 | 4.3 | 5 | 230 |
| 1956年9月 | 194,016 | 5 | 6 | 231 |
| 1958年6月 | 129,319 | 3.4 | 5 | 231 |
| 1960年9月 | 190,560 | 4.5 | 5 | 232 |
| 1964年9月 | 221,746 | 5.2 | 8 | 233 |
| 1968年9月 | 145,172 | 3 | 3 | 233 |
| 1970年9月 | 236,653 | 4.8 | 17 | 350 |
| 1973年9月 | 274,929 | 5.3 | 19 | 350 |

(五) 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如果不是最大的竞选力量,也始终是最大的竞选力量之一。

冰岛：从1946年到1956年，冰岛共产党单独竞选，其后参加人民联盟竞选，他们始终守住了自己的地盘，尽管六十年代出现了亲华派的背叛。

| | 冰岛共产党/统一社会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 议员总数 |
|----------|---------------|------|-----|------|
| 1946年6月 | 13,049 | 19.5 | 10 | 52 |
| 1949年10月 | 14,077 | 19.5 | 9 | 52 |
| 1953年6月 | 12,422 | 16.1 | 7 | 52 |
| 1956年6月 | 15,859 | 19.5 | 8 | 52 |
| 1959年6月 | 12,929 | 15.3 | 7 | 52 |
| 1959年10月 | 13,621 | 16 | 10 | 60 |
| 1963年6月 | 14,274 | 16 | 9 | 60 |
| 1967年6月 | 13,404 | 13.9 | 10 | 60 |
| 1971年6月 | 18,055 | 17.1 | 10 | 60 |
| 1974年6月 | 20,922 | 18.1 | 11 | 60 |

芬兰：共产党控制的芬兰人民民主同盟这一选举机器，在1970年受到挫折以前，一直掌握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芬兰选民。

| | 芬兰共产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总数为二百) |
|---------|---------|------|----------------|
| 1945年3月 | 398,618 | 23.5 | 49 |
| 1948年7月 | 375,820 | 20 | 38 |
| 1951年7月 | 391,362 | 21.5 | 43 |
| 1954年3月 | 433,528 | 21.6 | 43 |
| 1958年7月 | 450,506 | 23.2 | 50 |
| 1962年2月 | 507,124 | 22 | 47 |
| 1966年3月 | 502,713 | 21.2 | 41 |
| 1970年3月 | 420,894 | 16.6 | 36 |
| 1972年3月 | 438,387 | 17 | 37 |

法国：法国共产党在第三共和国时只参加四次立法选举，1936年的成绩最好，选票占百分之十五点三。然而，战后它成为法国最大的一个政党，声称获得了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

| | 法国共产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 议员总数 |
|----------|-----------|------|-----|------|
| 1945年10月 | 5,005,336 | 26 | 161 | 586 |
| 1946年6月 | 5,199,111 | 26.1 | 153 | 586 |
| 1946年11月 | 5,489,288 | 28.6 | 169 | 621 |
| 1951年6月 | 4,910,547 | 25.6 | 99 | 627 |
| 1956年1月 | 5,532,631 | 25.7 | 144 | 596 |
| 1958年11月 | 3,882,204 | 18.9 | 10 | 465 |
| 1962年11月 | 3,992,431 | 21.7 | 41 | 485 |
| 1967年3月 | 5,039,032 | 22.5 | 73 | 485 |
| 1968年6月 | 4,435,357 | 20 | 34 | 485 |
| 1973年3月 | 5,026,217 | 21.2 | 73 | 490 |

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在法西斯当政以前仅仅参加了一次选举，即1921年的那次选举，得票占有效选票百分之四点六。法西斯垮台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得到五分之一选民的支持，以后它所获选票一直有所进展。

| | 意大利共产党选票 | 百分比 | 议员数 | 议员总数 |
|---------|-----------|------|-----|------|
| 1946年6月 | 4,356,686 | 19 | 104 | 556 |
| 1953年6月 | 6,120,809 | 22.6 | 143 | 590 |
| 1958年5月 | 6,704,454 | 22.7 | 140 | 596 |
| 1963年4月 | 7,763,854 | 25.3 | 166 | 630 |
| 1968年5月 | 8,557,404 | 26.9 | 177 | 630 |
| 1972年5月 | 9,085,927 | 27.2 | 179 | 630 |

共产党选民是如何变化的

由于西方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要信奉苏联这个样板，同时由于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公开的组织关系，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它的选民多少是由西方对这个样板和这个运动的想法来决定的。当西欧人对苏联怀有好感或对它的红军十分钦佩时，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就显得顺利。但是如果在选举前苏联采取了一些不得人心的行动——炫耀坦克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党候选人就会处境不利。事实上不管其根据如何，这种推测恰恰正是在西欧竞选运动期间，由共产党的对手所制造的，他们感到把共产党人与不受欢迎的苏联政策等同起来大有好处。居伊·摩勒曾大喊大叫说：“他们既不在左面也不在右面，他们是在东面！”因为西欧选举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反共以外就没有有什么其他内容；如果这些论点在选举中是有效的話，那么，人们就会希望在选举的结果中，看到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但是选举的统计数字并没有反映这一点。

的确，在西欧，共产主义是在红军取得节节胜利以后才第一次获得了大量的选民，在此以前西方民主派人士和苏联共产党人之间结成的联盟已有数年，当时，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一些不准确的概念在西方普遍流行（事实上是官方宣传的）。从那时起，人们很容易发现，由于对苏联某种行为的反感而造成选民骤减的情况。瑞典1968年9月的选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次大选是在华沙条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数星期后举行的。瑞典左翼党——共产党竭尽全力表明自己与这次入侵无关。它是瑞典第一个起来谴责这种行为的党派。它的谴责比西方任何其他共产党都更为猛烈。党的主席C. H. 赫

尔曼森指责这一侵略为“可耻”的行为，同时敦促本国政府召回驻莫斯科大使，以示抗议。他还把苏联的行动同美国在越南的行径相比。当时美国在越南的行径在瑞典舆论中特别令人厌恶。派遣部队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华沙条约各国政府对他的回答是把他叫作“发狂的叛徒”、“小资产阶级分子”等等。尽管如此，瑞典共产党选民还是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一情况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和有决定性的影响。

类似上述情况的另一个例子涉及西柏林共产党人。1958年12月，赫鲁晓夫11月发出柏林最后通牒以后数星期，西柏林举行选举，西柏林统一社会党的选票减少了四分之一。1963年2月，举行了建立柏林墙以后的第一次选举，西柏林统一社会党获得选票很少，不到它八年前所得选票的一半。

然而，即使是这些突出的例子，那些表格表明，瑞典和西柏林共产党人在短期内就出色地恢复了选举中的有利地位。一般来讲，西欧人在苏联一系列行动在西方受到严厉谴责以后的1972年—1973年投给共产党的票要比1945年—1946年外交友好时代投的票更多。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奥地利、丹麦、瑞士、意大利、法国、瑞典、冰岛、卢森堡和西柏林的共产党人获得的选票比以往要多。意大利共产党每次选举的选票都是稳步上升的，这一情况也不说明意大利人投共产党票或多或少是取决于他们对苏联的想法。芬兰共产党选民从1945年到1960年一直是稳定的，但这给人深刻印象的稳定情况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在法国，人民对苏联1956年镇压布达佩斯起义的行为的反应极为强烈，然而，此事对法国共产党选举的影响甚微，为时亦暂。民意测验表明，在这次事件后的数星期内，共产党选民在投票时出现的某种犹豫，但过了四

个月后就连这一点迹象也没有了。1957年局部的和地区的选举表明，“法国共产党似乎并没有由于这个灾难而受到多大损失”。

不仅如此，有的地方，共产党选民似乎由于这种“灾难”反而增多了。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不久，一个积极赞同这一行动的共产党，即卢森堡共产党，面临了大选。它的选票比以前增加大约四分之一，得票占整个选票的百分之十五点五，成了那个大公国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整个1969年的各次市议会选举中，它继续取得重大的进展，从而表明了大选的成绩并不是偶然事件。各地的共产党和莫斯科都立刻把谴责入侵的瑞典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失败与坚决支持入侵的卢森堡共产党的胜利加以对比。这一事实造成了西方共产党领导人如下的论点软弱无力：他们声称，不管他们真正的想法如何，为了保持他们在选举中的地位，他们不得不谴责入侵。

西欧共产党选民明显的无动于衷并不表明苏联的行动没有影响西方共产主义，但是如果我们首先注意选举结果，那就错了。奇怪的是，在苏联行动与西方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相矛盾的时候，不是共产党选民，而是共产党的党员产生了惊慌和反感。受到严重影响的正是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和党的团结，而不是它从选民那里赢得选票的能力。选民对外交事务，包括共产主义世界的事务毕竟没有知识分子和党的积极分子那样感兴趣。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事件，既敏感而又不稳的正是共产党人，相反共产党的选民却是比较稳定的。诸如非斯大林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以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损坏和分裂了西方共产党，而选民却经常对这些事件漠然置之。在发生这

种情况的时候,有时党内反苏派企图迅速来一次选举测验,但却被彻底地清洗了。只有当分裂发展到使得一个党分成相互敌对的两派的程度,并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对共产党的选票产生有害影响,如下面一些事例所表明的那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一名法共的知识分子党员的打击,就象“使人震惊的冲击……,我激动得发疯一样,我的思路向三个方面奔驰:愤怒、希望和开始自我反省。”大多数法国共产党的选民却把种种论争看作是遥远的历史和理论问题而不予理睬。不久以后发生的匈牙利起义,使法共陆续失掉许多党员,法共在十年中一共失掉了一半以上党员,但它控制的选民却没有减少。1956年发生的种种骚乱引起法共内部发生反对党的领导的情况,并持续了数年,但却并未影响选举。与此相反,丹麦共产党由于在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等问题上的争论而引起了分裂,分裂在1957年一年中不断恶化,1958年发展到了顶点,党的领导人阿克萨尔·拉森被开除出党,他带走了大多数党员。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丹麦共产党才在选举中遭到失败,成了在议会中没有议员的残余组织。荷兰共产党有着同样的经历。尽管荷兰人对镇压匈牙利起义的反应极为强烈(在阿姆斯特丹的骚乱多少有点过分地被人称做“反共的恐怖”),然而,荷兰共产党在以后的选举中仍然取得很好的成绩。不过在1958年,由于保罗·德·格罗特和“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党分裂了,这使得它丧失了将近一半的选举支持者。

匈牙利的暴乱使荷兰共产党失去了许多党员,使《真理报》失去许多读者,但几乎没有怎么影响它在以后的选举中的支持者。清洗“右派”倒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虽然它几乎没有损失

多少党员和读者，但却失去了几乎一半的选民。对于许多左翼选民来说，一个对外国负有重大义务的党显然没有由于不和而搞得四分五裂的党那么令人讨厌。

1968年8月发生的事件在西方引起的反响也同样如此。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选民的反响是暧昧不明的，但关于入侵布拉格问题的争论使得西班牙共产党分裂为两派，促使法共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起来造反（包括莫里斯·多列士的寡妇，长期以来一直充任党的母后的让内特·维美徐辞去中央政治局的职务）。它还加剧了意共内部环绕“宣言”这一问题而引起的反抗浪潮并使之发展到非常剧烈的地步。但这类纷争在选民中没有引起一点反响。当“宣言”的拥护者在1972年到投票站投票时，他们全被击败了。唯有奥地利共产党，由于它内部分裂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以致造成许多党员被开除和许多领导辞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一次选举中失败了，它失去了一半的选民和在维也纳市议会中最后剩下的代表。

问题并不是象某些悲观的反对者在五十年代所想象的那样，欧洲共产党选民是永久稳定不变的（然而，在象法国和芬兰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选民很可能比其他国家的选民来得稳定）。更确切的说，问题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些外部事件对共产党选民的影响没有对党本身的影响那么严重。尽管如此，共产党选民的确也是常有变化的。在经过了似乎是毫无变化的若干年以后，他们也可能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选民有自己的不同于共产党变化规律的变化规律。众所周知的一种说法是：投共产党票的许多人并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他们对共产党员所津津乐道的一些事情毫无兴趣，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通常参加非共产主义的运动，而这种运动很有可能遭

到共产党人的指责。

虽然冰岛共产党由于中苏争端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它是谴责这件事的）而内部混乱不堪，但是它还是设法减少它在1967年选举中的损失。随后，在“鳕鱼战”的时期席卷整个冰岛的反西方民族主义的浪潮，给冰岛共产党带来了好处。尽管冰岛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拒绝承认莫斯科或北京的权威，只同罗马尼亚和其他北欧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在选举中，它同国内最坚定的反对派观点一致，共同反对那些不同意冰岛扩大捕鱼权利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它和持不同政见的“左翼自由派”一起，在1971年的选举中获得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和四分之一的议席。于是它参加了联合政府，成了在西欧执政的唯一共产党。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的代表担任了渔业和工业部以及卫生和社会安全部的部长。这样，一个被由于牵涉到共产党人但并不牵涉到大多数选民的纠纷而搞得混乱不堪的共产党，由于它在与共产主义虽毫无关系，但对选民却有极大兴趣的问题上的立场，而赢得了选举胜利和担任了公职。

更为常见的是，共产党人经常由于这样一些舆论运动而受到损害，就象法共由于1958年的戴高乐主义浪潮而遭受到的损害那样。1951年曾出现过将发生这种灾难的预兆。当时共产党人失去的选票有一部分给法兰西人民联盟，当时的戴高乐派拿去了。这种预兆被忽视了，他们仍然坚持极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使许多党员心烦意乱，然而一旦戴高乐的人民联盟失利，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却是同它选举上的东山再起相容的。在1958年初，戴高乐重新上台以前很久举行的民意测验，就表明这种迹象，共产党在选举中东山再起是建

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即法国人投共产党票的理由并没有在法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策中体现出来。这点，在六月份戴高乐重新上台后，就变得很清楚了，当时那些十年来一直投共产党票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一的选民抛弃了法共候选人。被法国国内舆论十年来视为“异体”的那个表面上一直稳定而不变的选民，同其他部分选民一样，在深受其影响的舆论运动面前，突然土崩瓦解了。（应该说清楚，戴高乐主义不但伤害了共产党人，而且伤害了第四共和国的其他一切政党。）我们的图表只是表明了立法选举的结果，它并没有说明这种选举上的损失在第五共和国后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而当时共产党仍然遭到选民的唾弃。按照选举名单上选民的百分比（我们的图表指的是所投选票的百分比），法共选民减少到同它在1936年所拥有的选民差不多，这样它在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中所得到的选民也就全部丧失了。后来，共产党在选举中曾有过起色，但在1968年5月和6月，法国舆论的第二次浪潮（对此，法共再一次同其他政党一样毫无准备）表明，这种好转是脆弱的，党丧失了百分之十二的选民。因而再一次证明，一个在政治论争和某些认真严肃的意图中被认为是受世界共产主义命运支配的政党，在选举中可以安然度过种种动摇其基础的共产主义危机，然而却可能由于冲击所有本国政党的国内问题而受到严重影响。具体地说，法共之所以失去了它的很大一部分选民，不是因为多列士在非斯大林化时代仍然是个斯大林主义分子，或者是因为它为苏联的坦克共产主义辩解，而是因为它没有一项政策足以解决第四共和国宪法上的问题，或是非殖民化所遇到的困难，或是（在1968年）经济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一点上，它和

其他法国政党极为相似，这个“异体”参与和卷入国内政治生活的程度，比它自己所了解的要更为紧密。

这种情况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芬兰共产党除了在1962年和1966年所遭受的较为微小的损失外（这些损失本来应该是起到警告作用的），它在1970年的选举中又遭到与法共类似的损失。这样，情况也是一样，其原因正是芬兰共产党和苏联势力范围的关系，虽然在芬兰的情况下，这些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密切到导致芬兰共产党内部从1969年起就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其原因是芬兰共产党无法处理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后果。由于芬兰共产党从1966年到1971年参加了执政的联合阵线，处理这类后果就是它的直接责任。芬共的选民中有一部分是稳有把握的，总是投他们的票的，这些人对共产主义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至一无所知，但这部分选民终于抛弃了共产党候选人，而转向从农民党分裂出来的一个新的人民运动。芬兰共产党1970年失败的主要受益者，是维克科·文讷莫领导的农村人民党，这个党是富有煽动性的激进派别，它一下子就宣称拥有百分之十的选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芬兰共产党在芬兰人民民主联盟的选举机构内部控制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三的选民，但是由于它参与超出它自己所了解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它的选民下降到只占百分之十六到十七，而在此期间它把时间都花在关于苏联政策是非曲直的内讷上。

说共产党员比共产党选民更难以理解党的政策的曲折变化，就是说选民对意识形态问题不感兴趣或者说不象共产党那样敏感，姑且不谈选民中由于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而引起的变化问题。但是如果选民在意识形态方面不那么敏感，

那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党的意识形态对选举的成败是有关的。这一点人们都持否定态度，表面上似乎颇有道理。共产党在什么程度上使自己的政策适应选举结果，也就是说在什么程度上它们象其他民主政党那样，那还需要预先对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中心以及制定政策的强制程度进行一番研究。这些问题我们下面还将加以研究。但是必须指出，虽然共产党不象其他西方政党，比如说美国的共和党人或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完全顺着选举——但是它们的确也经常调整它们的政治目标。只要选举的成功导致入党人数的增加，或相反选举的失败也就会引起党内人数的减少，党就不能不这样去做。不管在意识形态上有着什么样的种种约束，一个不得不吸收大批新成员的政党是易于改变其种种政策的。一个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领导人势必会遇到党内在意识形态方面日益强烈的反对。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法共在戴高乐主义使其在选举中遭到挫败以后，决定采取它自1956年以来一直拒绝采取的非斯大林化方针，因为它的选举失败同采取非斯大林化方针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功所形成的对照太鲜明了。对选举情况的敏感性愈来愈成为西欧共产主义的特点，尽管列宁主义政党的结构对这种敏感性加以种种的限制。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将予以说明。这一进程已发展得够远了，这种进展被认为是统一和参与的进程，因为共产主义现象在选举方面的规模再也不被看作是首先取决于西方共产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了。

二、谁是共产党人？

在探讨谁是共产党人和谁投共产党人的票之前，人们必然注意到，他们从来也没有一再地碰到同一个共产党。从二十年代起，法国共产党就被称为“筛子党”，即筛子般的党，这意味着它的党员经常在变动，新党员刚吸收进来不久又丢掉了。这种现象被称为“波动”，以后在所有的共产党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人们曾经普遍作过努力来制止这种现象，包括徒劳地试图证明，某些大党通过克服波动现象正在使它们的党员稳定下来。西欧共产党长期不稳定的现象之所以重要，因为如果今年构成党员的人不是二年前构成党员的那些人，更不是四年前的那些人，那么这就表明，共产主义是少数左派所经历的阶段。它不是许多欧洲人能够作为精神归宿的党。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某些政党，特别是与共产主义从其中兴起的党——西欧社会党形成了一个对照。社会党是稳固的组织；加入这个组织被认为是终身的选择；它们以资历作为晋升的基础；它们是社会主义保险计划、友好团体和诸如此类事业的稳定中心。而共产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由于大多数共产党不公布确切的党员人数，要确切地说明其党员的变动情况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对它们细加分类了。然而众所周知，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其党员变动率是很高的，就象所有非法的政治活动的变动情况那样。有些大党提

供了有关其党员数字的某些情报，因此对它们的党员变动率作出比较精确的猜测还是可能的。例如，法国共产党宣布，1968年它发了四十五万四千零五张党证（虽然实际上可能只有一半被接受和支付了党费），1972年它发了四十五万四千六百四十张党证。由此可见，四年中党员的增加数几乎是零。然而，法国共产党宣布，它在1969年吸收了四万四千名新党员，1970年吸收了四万五千名，1971年三万名，1972年四万八千名，总共吸收了十六万七千名。四年中有十六万七千人参加党，但退党的人数也差不多。假如法国共产党目前确有三十四万名党员（见上一章^①），那么大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党员在四年中已经变换过了（在当代法国的一个年龄不大的党内，党员的死亡率大概是一个为人们所忽视的因素）。如果现在的党员实际人数是二十五万左右（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么在这四年中就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党员变换（波动）过了。对一个政治党派来说，这种不稳定的程度是异乎寻常的。

如果从法国共产党历史中更为长远的一个时期来看，那就消除了1968年的骚动对刚才所研究的那个阶段的影响。根据法国共产党的统计数字，在从1959年至1972年的十四年中，党所吸收的新党员超过五十三万五千名，但它的党员总人数只增加了二万五千名。由于每年退党的人数如此之多，为了保持党的实力，于是它每年吸收三万八千二百多名新党员。新吸收的党员相当于党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还是百分之十七，那就取决于如何估计党员人数了。

从数学上看，情况可能是，每年退党的人就是那些上一年

^① 第一章中的数字为240,000—260,000，现此处作340,000，原文如此。
——译者

(或同一年，几星期和几个月以前)才加入的人。一个党如果一下子就使那么多新党员感到失望或者就把他们排挤掉，那它就象法国共产党一样，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吹嘘它的拥护者在不断增加，但是，它至少可以声称说，它是在稳定它的党员并减少党员的波动；大约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党员将不会变动，而是要在党内呆很长一段时期。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党员的平均年龄将会升高。这恰恰就是瑞典、挪威、奥地利和西柏林共产党所发生的事情，它们的党员都是上了年纪的了。这些党解决了人员波动的问题——同时它们却也不再是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了。然而法共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它宣布，它的党员的平均年龄在1973年和1954年是一样的，它又说法共是法国最年轻的党。如果波动率是高的（四年内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六的党员退党），而平均年龄又一直是低的，那末，情况必然是大多数党员是最近才吸收的，但他们不久就会退党。此外，很可能有少数人长期留在党内而没有被抛弃。

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警察的镇压和工作岗位上受到迫害或歧视等都是原因，新党员一旦接受交给他们的任务从而表明自己是共产党人，就会感到继续这样下去是危险的和不愉快的。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的情况确实如此，特别在西班牙和以前的希腊，那里，警察经常搞垮共产党组织。一个更为普遍的原因大概是，即便一个共产党员的任务不是非法的或危险的，但可也太艰巨了。一个活跃的支部会要求它的成员每周牺牲下班后的几个晚上以及星期天上午的时间用来开会、访问新党员、筹集经费和兜售报纸。一个劳动者之所以参加党，是因为他的劳动条件使他十分劳累，他感到他受剥削；或者一名学生或一名知识分子，他参加党主要是为了获得

一张“党证”，这些人就会感到上述的负担使他受不了，因此就让党籍丢掉算了，保持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身份，这种身份可以在投票和捐献时表现出来，不必费太大的劲。然而，也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其经常的程度也一样，就是要求共产党人做的工作之所以会使人敬谢不敏，不是因为工作劳累，而是因为劳而无功。一个为了参加“世界革命”而参加党的新党员不久就会发现，唠唠叨叨地动员党员每月交“党费”、出售那种连他们自己也很少有人喜欢看的报纸，或是参加支部讨论，而讨论的结果总是赞同上级党组织发下来的决议等等，全都是些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活动。一名满腔热忱参加共产党的人，希望能够推动无产阶级自治和工人主宰社会的事业，但在入党不久后，就感到自己参加的是一个相当刻板和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热衷于通过人所熟知的选举方法在政府内掌权，并为苏联对外政策进行某种游说。象这样的党员，很可能在一两年后就要退党。

这样，虽然某些党的党员波动情况可能由于党在“过渡人群”中大量吸收党员而加剧（“过渡人群”，指的是青年、学生、新移民、失业者或者是从事象建筑业那样流动性很大的那些行业的工人，他们当中没有人长期地干这些工作），但是基本的和最普遍的原因是，党使新党员的期望落空了。由于是党激起了人们的这些期望——对此资产阶级或法西斯政府在政治宣传中使用了共产主义怪物的字眼是具有某种影响的，因此波动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革命词藻和它们的行动保守之间的不一致或者说就是它的政治上的无能（对革命者来说，这二者是一回事）。

波动的结果是使共产党同其他政党有了区别。在西欧所

有国家中，参加过共产党的人远远比共产党人要多。那些曾退党或者由于厌倦而让党籍自动丧失的人也许扩大了共产党的选民力量。因此，尽管波动对党来说似乎是个不利因素，但它却经常地大量增加共产党的同情分子、选票和财政支持（学生和自由职业者有时由于为了他们曾不愿在党内工作感到内疚而捐献大量的经费）。同时，期望的落空也造成了过去曾入过党的人进行反共这一特别现象，这是在西欧社会中人所共知的厌恶政治情绪的一种最恶毒的形式。那些把共产主义看作“失灵的神祇”和那些一开始就能设想出一个政治神祇的人，容易成为毫无同情心的批评者。这种人在民主国家里是众所周知的，而在西班牙和希腊也并不陌生。在希腊，代表军人政权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的组织者之一，就是一名前共产党人。

波动的另一个后果是：它促使（虽然并不是改变的原因）共产党突然改变其一贯采用的政策。在策略上作这种突然的调整曾经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所规定的标准之一。一个比其他党更快地变动它的党员的政党是不会有“记忆力”的。它的党员会同意做、说和相信同党内不久前说的、做的和相信的完全相反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是那时候的党员。先前的党员也许就是因为路线的改变而退党，而新党员也许就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入党的。虽然这并没有回答领导集团为什么和怎么样改变政策的问题，但是它却说明领导集团可以任意奉行一系列的相互冲突的各种政策。

这些评论在七十年代没有在西欧共产主义开头五十年那么有力，因为今天共产党所走的道路不象以前那样曲折。因此，它们不那么需要党员朝三暮四。然而，由于波动仍然是共

产党的一个永恒的特色，因而重要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恰恰是因为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是把共产主义历史记在心头的——要记住大多数共产党人对那个历史了解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年轻，而且又新入党（并且马上就会退党）。到五十年代末，当时大多数西欧共产党人在党内很少听到或者听不到关于斯大林的事情。在六十年代初，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赫鲁晓夫的报告（特别是在法共内部，法共从未出版过这个报告，也从未承认它的真实性）。到1968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关于匈牙利的事件，所以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感到吃惊；在法国，他们除了戴高乐政权外，不知道其他任何政权。更普遍和更重要的是，到1973年，大多数西欧共产党人是在共产党（新近）和社会民主党进行合作的阶段中参加党的。据他们所见，他们所参加的那个党难得使用（如果曾经使用过的话）象“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措辞，而就他们所见，这个党奉行的是同其他西方政党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的“选举主义”。这一点涉及到有关共产党政策意义的许多争论。持敌对态度的评论家或者就是那些对党的历史很了解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党“确实”仍然象过去一样，是个革命党；而对党持比较同情态度的观察家或者就是那些对党目前的章程很熟悉的学者则回答说，党“确实”就象要它的新党员所做的那样——其中并不包括革命。

地 区

可以大致了解谁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方法是看他们住在什么地区。在一些西欧国家中，共产党人是从界线分明的某些地区或团体中吸收来的。不要认为这类情况古怪而不予重

视,而要对它作更为仔细的观察,以了解它是否反映了有关成为共产党人的不同方法的某些情况;对显然不按地区吸收党员的国家来说,这些情况就不那么明显。在塞浦路斯,共产党只在希腊族中吸收党员。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没有土耳其族的党员,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也没有自己的共产党。在瑞士,共产党的百分之七十一的选票(同党员的比例相类似),以及五名共产党的国民议会议员都是来自通行法语的各州,虽然操法语的只占瑞士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操德语的各州人口超过百分之七十,但是党员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提契诺和格里松斯两个州中,共产党人也很少,他们获得的选票占百分之四。少数操德语的瑞士共产党来自两个大工业区——苏黎世和巴塞尔。而共产党构成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则在日内瓦。比利时也有类似的情况,百分之八十的比利时共产党人是操法语的瓦龙人。所有的共产党议员也是瓦龙人。瓦龙共产党人集中在这个王国南部老的工业和矿业地区;在不多的佛拉芒共产党人中,安特卫普码头工人占了最大的比例。人们从这三种情况中感觉到,都市化和工业化(特别是在老的重工业地区)之类的经济因素同种族、宗教或语言造成的紧张关系交织在一起。

其他地方性的例子似乎完全属于经济性质。西德共产党主要在鲁尔、特别是在象卡斯特罗普-劳克塞尔和博特罗普这样的城市和老的矿业和重工业地区发展党员。卢森堡共产党从城市居民和在该公国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南部地区吸收党员。荷兰共产党人过去通常集中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这些大港口城市和该王国西部的其他工业中心;现在,按照该党所说,那些地方的党员人数并无增加,而其他地方则增加了。在

丹麦，丹麦共产党和从它分裂出去的社会主义人民党绝大部分集中在哥本哈根，在日德兰和各岛屿的党员要少得多。英国共产党人主要分布在伦敦、格拉斯哥和南威尔士。

芬兰、挪威和瑞典的情况则不同，那里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共产党势力地区，因而导致学者们谈论两种共产主义。存在着同上述国家类似的工业城市共产主义，但也存在着“落后的边远地区共产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芬兰，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芬兰共产党的支持者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人口稀少、与世隔绝和经济落后的东北部。那里居民通常都是些小农户，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经常到离家很远的森林中参加诸如伐木那样的季节工作。这就分裂了劳动市场，造成职业缺乏保障，用阿拉特的话来说，叫做“到处求职无门”，这种局面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投票的时候抱激进态度。例如，参加选举的人百分率颇高，整个居民常游行到投票站，其意图显然是提出抗议。农民的中央党和共产党竞相争夺这些选票；虽然在1917年之前北部和东部就有了社会民主党，但现在它在那里的势力是极端的虚弱。那些地区复兴宗教的情况近年来很突出，虽然投共产党票的人本身并不信教。战后，由于经济上的发展以及这些遥远地区极度与世隔绝状态的改变，实际上是加剧了不满情绪，经济上的缺乏保障和社会上的不稳定以一种新形式表现出来。只要芬兰共产党人被人同政府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在芬兰共产党自1948年以来的十八年在野期间，共产党选票看上去还是从这种局面中得到好处。这种类型的选票被认为是非意识形态的，就是指的不是由于在思想上信奉一般的社会主义或是特别信奉共产主义。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显然来自与之对立的农民党，他说过：

在北部有许多共产党支持者，当我同他们交谈时，我发现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他们投共产党的票，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改变都大概会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同样，甚至在边远地带也有证据表明，在共产党选票和1917年前的社会主义传统之间存在一种联系。

与边远地区共产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在芬兰工业化的南部和西部看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不仅表现在投票方面（参加选举的人的比例在这里实际上是比较低的）而且还表现在其他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方面。支持芬兰共产主义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这些地区。这种支持与失业或无保障和低收入以及工业的类型并没有什么相互联系，因为人们可以看到，有些地区社会和经济特征相类似，而共产党并不拥有大量的选票。通常的情况是，这些地区大概会投社会民主党的票，这才是重要的相互联系。这就是说，“工业共产主义”甚至比边远地区共产主义更为明显地是从社会民主党准备了几十年的土壤中产生的。如果边远地区的共产党人是在抗议他们目前的处境，那么工业城市的共产党人就大概似乎是在坚持所继承下来的抗议态度，继承芬兰工业化开始时所形成的传统，即便他们在民意测验中也承认，他们目前不存在这样去做的经济动力。从遥远的北部往外移居是工业持续发展的一个特征，这些移民自然也增加了共产党在南部的选票。

这两种类型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在挪威则不那么明显，但是，那里存在着共产党获得支持的两个不同的地区。位于遥远的北方的芬马克与芬兰的边远地区相邻，与苏联有一

条共同的边界。实际上,该地区确实是苏联红军解放的,因此,共产党在1945年获得的大量选票——共产党人赢得了全体选民中百分之二十三的选票——是当时在整个西欧司空见惯的“红军共产主义”的例证。当挪威南部的共产党选票所占的比例已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时,芬马克共产党的选票仍保持较高的比例(1949年占百分之十六点五;1953年占百分之十八;1961年占百分之十四点六)。芬马克是唯一的正统共产主义的省份,抵制从挪共分裂出去的社会主义人民党的民族激进主义。挪威共产主义的另一个、但是没有上面那个那样忠诚的堡垒,是赫特马克这个落后的省份,那里林业是最主要的工业。与这两个地区形成对照的是南部和西部比较富裕的地区,那里,共产党在战后的选票记录一贯是很好的(1945年在卑尔根获得了百分之二十点五的选票,在奥斯陆获得百分之十六点五的选票),但是在这之后,共产主义大大失势。这些地方现在是在意识形态上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中间党派和宗教及戒酒运动的堡垒。共产主义站得住脚的地方是过去有着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地区,那里的经济主要是制造业、矿业、特别是那些只从事单一工业工厂的城镇。例如,在瀑布附近建立的冶炼厂,工人们依赖某一个资本家企业,朝不保夕的感觉也许是强烈的。因此,在挪威,差别不是在农业共产主义和工业共产主义之间(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共产党选票和不包括林业在内的固定农业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已为人所否定),而是在常以伐木为其主要工业的遥远的和经济上不稳定的地区的共产主义同很久以来就熟悉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业的地区的共产主义之间。

在瑞典,支持共产党的两种类型不但是选举方面的事实,

而且还逐渐具有了政治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同1970年前后的危机时期党内的政治分裂相一致的。一方面，共产党在瑞典社会中传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占优势的部分，例如在码头工人、造船工人、印刷工人、海员以及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瑞典中部的建筑工人中获得支持。这些人是一个富裕社会里工资较优厚的工人，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一直坚持反对派的传统，在同一地区中的农场工人、捕鱼工人甚至还有食品工业工人和纺织工人几乎是不懂得这些的。另一方面，存在着瑞典北部、特别是北博顿省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在遥远的居民区，以及在林业工人和矿工中间出现。第一种类型的共产主义正如西欧所有的共产主义一样，显然是从社会主义运动中兴起的，而对第二种类型的“北博顿共产主义”，人们认为需要作一番特别的解释。这一省份相对的贫穷和偏僻以及它对伐木和基律纳铁矿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宗教复兴主义的历史和芬兰移民（往往是芬兰共产党人），这些移民都是从最先为人们注意到的“边远地区共产主义”的地区移居过来的。当地盛行的苦行赎罪和忏悔的拉埃斯塔迪安主义宗教现象同“非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奇怪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可以实行这两种主义或者是从这种主义转到那种主义。这些地区有许多人操芬兰语。在1918年的芬兰内战和1930年前后的农民-法西斯主义拉普运动（这次运动导致在芬兰北部出现反共恐怖）以后，有大批共产党难民涌入，从而扩大了这一居民集团。今天，北博顿共产主义在共产党人在伐木业中组织的工会中有坚实的基础，它对瑞典共产主义硕果仅存的报纸《北极火焰报》很有影响。这家报纸反对瑞典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同时北博顿还出现了坚

持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好斗分子，他们反对党的领导人赫尔曼逊所推行的改良主义。

然而，人们不应当太刻板地把这个边远地区的北博顿共产主义与瑞典南部的共产主义相对比。北博顿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是受社会党人影响的一个中心，而《北极火焰报》在1906年是作为社会党的报纸出版的。这个地区的激进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首先表现出它的无政府工联主义倾向，正是这一倾向最初在1918年，后来又在二十年代末传到了共产党中。不是这个瑞典“移民居住区”特殊的经济条件凭空导致共产主义，但是这种经济条件加上涌进来的芬兰共产党人，却可说明，那里的社会党人为什么接二连三地产生了无政府工联主义、共产主义和坚持不断的斯大林主义。

在法国和意大利更为普遍广泛的共产主义现象中是否也存在这种要素或成分呢？乍看起来似乎不存在，当共产主义战后在北欧赢得很大比例的选民时，它们也并不存在。上面叙述的两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只是处在低潮时才暴露出来的暗礁。当共产主义发展到可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的时候，它可以遮没那些堡垒，但它们将仍然是共产主义力量的中心，是它取得领导和鼓舞的源泉。因此有人说：

在这方面，意大利也许是最可以与芬兰相比较的国家。工业化的北部和落后的南部地区似乎促成了对共产党的支持的类似模式……意大利南方，保护平民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劳动力从意大利南部流动到北部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突变，都类似芬兰东北部的情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传统在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地区都是存在的。

至于法国，也有人提出过关于共产主义的两种类型的说

法。意大利中部的农民和法国马西夫中部地区的农民，都是抗议者和反教权主义者，属于同样类型的共产党选民；米兰和巴黎郊区的工人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看来这些类比太笼统和太简单。共产党在法国中部地区扎根的地方是以前社会党人、而在这之前又是激进主义分子所控制的地区；意大利的红色地带自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占绝对优势，而在法西斯主义时期以前是社会党人占绝对优势，并且本世纪开始以前是共同合作和工联主义的重要基地。因而，实际上是以前的社会党传统（这才是北欧“工业共产主义”的真正特色）而不是与工业的任何联系，实际上这一传统在意大利和法国中部的“农民共产主义”地区更为古老和明显。也许错误就在于在欧洲南部寻找边远落后地区共产主义，而那里就根本没有边远落后地区。有些地区工业不太发达，但是没有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所达不到的地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在铁路、邮政、煤气和电力部门的工人和雇员以及教育和建筑行业当中势力特别强大，这就有助于共产党在全国统一范围内发展势力，这同在欧洲北部看到的两重性大不相同。确实，就拥有地区分布最广的基地而言，法共在全国所有的政党中是最具全国性的党派；而意共的基地在意大利只有天主教民主党的基地才能与之相匹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党没有实力较为雄厚的堡垒以及由于偶尔进展不大而显得脆弱的地区，而是意味着，不经过大量细致的调查就说明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在各个地区截然不同这一点，那将是困难的。

即使确实有这种情况：即在共产党的某些势力强大的地区，例如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尼阿，该地的人们有着根本不同的

历史和特性,因而使他们的共产主义具有一种与其他(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人的共产主义不同的概念,人们也必须注意到,他们的特殊历史和特性首先是把他们引向共和主义、反教权主义、合作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相当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这个地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和解放时期的情况,那份政治遗产后来才落到意大利共产党手中。因而,诸如地理形势、经济情况或地方心理学等非政治性的东西,在任何地方都从属于具体的政治和组织因素,所以共产主义的现象将显示出某种一致性和连续性;而关于共产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假设,是否承认这一点的。把这个理论运用到法国,人们顶多只能承认,很可能有一些农村地区在传统上信奉当地的最左派的政党。在几代人以前这意味着激进主义,一代人以前意味着社会主义,今天则意味着共产主义,但这种共产主义从理论上讲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然而,如果过分地把它与城市工人中的被认为是革命的和意识形态类型的共产主义对立起来,也是不妥的。

年 龄

正象我在别的章节里所说明的那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期间,共产党一般地比当时的社会党年轻。事实上,刘易斯·福伊尔就是拿这一事实来阐明他的如下论点,即革命运动如果不是基于一代人之间的冲突的话,那也是与它有联系的。不管这一论点的价值如何,福伊尔有一点是对的,即他进一步补充说明,在六十年代,共产党人被比他们年轻的左翼党派所取代。因为共产党已上了年纪了。它们从来就没有对年轻人给予很大的注意,而且确实从来就没

有争取过他们。共产党是有理论，有纪律，有经验的，而且据说 是以跟年龄无关的阶级为基础的党。它们只要吸收一些青年 党员（这是它们经常为此自夸的），这些青年党员经过了为 一个积极分子所必需的长期训练以后，就足以取代退休的老党 员。这和党的平均年龄逐渐上升是一致的。由于平均年龄上 升，党无法理解六十年代欧洲青年的反抗，更不要说预见 了。

这种年龄上升的过程在那些政治上衰落的党里是异常迅 速的。自 1964 年以来，挪共党员的平均年龄一直是在五十五 岁到六十岁之间。1968 年，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奥地利党员年 龄超过了六十岁。1967 年年底，西柏林统一社会党报道说，该 党党员有百分之八十一超过了四十岁，百分之七十一超过了 五十岁。非法的德共成了很老的党，1966 年在二十个党员中 仅有一个党员年龄是在三十岁以下。瑞典共产党没有公布数 字，但它抱怨说，它的党所以年纪大是因为年轻人跑到极左分 子那里去了。年龄上升现象发生在行将灭亡的党内；青年人 不再参加党了，而老年人则由于根深蒂固的信念才继续留在 党内。这个过程在日益削弱的党的大区内也可看到，如果情 况不是那样的话，大区是不会走下坡路的。这样，1966 年科雷 兹大区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党员超过了四十岁。在那个时期，整 个法共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党员也在同样的年龄范围内。

甚至象法共这样庞大又富有生气的党，竟然有百分之五 十七的党员超过了四十岁，只有百分之九点四的党员在二十 五岁以下。这就表明，法共也变老了。特别是目前这个组织 是置于一座年龄的金字塔上，而法国人口战后已经变得年轻 了。同样，芬兰共产党也老了；1968 年党员的平均年龄是四十 九岁。青年的造反显示了党变老的危险，因为青年极力地大

量酝酿了各种反共的极左运动。为此，共产党力图争取青年党员并在党内大力提拔他们。法共在1972年声称，它已扭转了党变老的进程并已回到1954年的年龄水平。德共以合法身分出现的时候，其党员已须发皆白了；它在1972年声称，它的党员“几乎有一半”不到四十岁。1973年这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七十。

判断共产党争取青年人的成就还为时过早，但是，席卷整个欧洲的极左分子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人感到党的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或还未成熟。当然，宣布参加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平均年龄下降并不表明党的年轻，这是靠以精心挑选年轻的党员来给代表团装门面的办法使它看上去比较年轻的一种努力。（由于争取青年人的运动同时也是满足妇女解放运动要求的一种努力，为代表大会装门面的手法使代表大会出现十几岁的小姑娘，这一情况使上级领导更容易控制代表大会，而不用担心出现有见识的政治讨论。）

有迹象表明，党员对一些人抵制迅速吸收青年人的做法表示反对，法共的一些支部也因采取抵制青年的态度而遭到谴责。乔治·马歇抱怨说，法共阻碍提拔党内的青年人，于是老年的领导人都纷纷引退。意大利共产党从1968年起同样更新了它的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换去了在政府立法机关中的三代元老，虽然这意味着要牺牲一些英雄人物。法国共产党在1973年效仿这种做法。这些行动必然被看作是修饰外表，除非得到证明说，这类行动有助于更新继续由年过五十的寡头政治集团统治的、年纪越来越大的党。

现在谈谈关于共产党选民的年龄，显然，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选民都是比较年轻的。“1962年，(法国)共产党选

民和统一社会党选民中年轻的最多，年老的最少。1966年，比较年轻的选民都是最强烈地倾向于选举共产党的一些人。”然而，在写这些话时，共产党选民也在变老的趋势还不能清楚地看出来，在后来就看得出来了。1973年，二十岁至三十四岁这一类人仅占法国共产党选民的百分之三十，而1952年则占百分之四十，超过六十岁的选民在1952年占百分之四，而在1973年占了百分之二十三，共产党选民再也不是法国最年轻的选民了。以统一社会党(极左派)的名称正式联合在一起的小党有百分之八十的选民年龄不到五十岁，而共产党不到五十岁的选民只占百分之六十四。看一下种种年龄范围在选举中的分类，而不是看看选民的年龄分类，人们就可以看出，1973年法共所得到的二十一岁至三十四岁这一类人的选票，比社会党或右翼政党要少，占百分比的二十二，后者各占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三十二。三十五岁至四十九岁以及五十岁至六十四岁这类人的选票，共产党所得的和社会党差不多(分别占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超过六十五岁的人的选票，法共得的要比社会党少。总之，法共在选举中的支持者是年轻的但不是最年轻的，而且可能比整个人口老得要更快。

由于投票是秘密的，所以关于法共选民年龄的那些估计是根据民意测验得来的。就意共选民来说，我们有更为可靠的计算标准。意大利人在二十一岁就可以投众议员的票，但必须满二十五岁才能投参议员的票。因此在1972年选举中，投众议院候选人的票比投参议院候选人的票多三百二十万。意共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选举联盟，在前一次选举中多得了一百十六万八千张选票。因此，在三百二十万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的人中有一百二十万人投共产党的票，或

者说占百分之三十七以上，而投共产党票的整个选民只占百分之二十七。在这次选举中，还看到极左派集团彻底完蛋了；得票几乎还不到百分之一。这两个事实无疑是相互有关的：极左派在选举中的失败说明投意共选票的青年人很多，而法共在年轻选民中的成绩平平，则同它的左翼的竞争者取得略好一点的选举成绩是相一致的。

性 别

共产党就其党员、选民和政策来说，主要是男子党。就党员的性别来看，可能欧洲所有的政党都是男子党，而从当代争取女权运动的观点看，它们的政策也说明它们是男子党。在所有的政党中，共产党的男子党味道特别浓。保守的选民一般说来主要是女性。在共产党的选民中，男子所占的比例大得惊人。如果人们心中记着共产主义根源于工人阶级运动，而这一运动对现在被称之为妇女解放领域内的事，通常都是保守或者漠不关心的，那就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惊讶了。然而，这样的事实是发生在今天宣传女权运动的时候，它常常被当作令人惊讶甚至是丑恶可耻的事，因为它表明，一个被人认为是起先锋作用的政治运动，竟是虚伪和反动的。首先，在这个问题或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没有理由以先锋的标准来判断共产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某些资产阶级的先锋组织同欧洲共产党结盟是由于暂时的误会。自从大战结束以来，不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或者道德方面，共产党都不是创新者。期望它们会自发地接受这些领域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新概念是违背以前对它们的看法的。特别是人们不能期望它们在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会同意采取新的态度。关于

妇女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倾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是资本家为了增加劳动力从而降低劳动价格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以避孕或流产来节制生育所以被认为合乎需要,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限制生产大量人口所需要的商品;实行性生活自由,是为了把人们的精力从政治工作转移到不会困扰资产阶级的方向,等等。

然而,在所有这些课题上,共产党近年来一直在发生演变,一直在力图放下一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男子汉的那种道貌岸然的架子。它们这样做很有可能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选举的需要。说得干脆一点,只是在妇女有了选举权的时候(在法国那仅是战后的事),共产党才开始对她们发生兴趣。由于共产党放弃其他一些它所关心的事转而关心选举主义,妇女就越来越令人感兴趣了。正如它们对青年人态度的改变一样,它们在与妇女特别有关的一些问题上的政策和做法的演变是缓慢而又勉强的——跟在创新者后面爬行——迄今主要还只是表面上做做文章,例如挑选更多的妇女到中央委员会或派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去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正如争取青年人的做法一样,这些变化是否会在共产党最关心的方面,也就是说在选举中给党带来好处,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法共女党员百分比的增长情况如下:

| | | | |
|-------|------|-------|------|
| 1946年 | 11.1 | 1966年 | 25.5 |
| 1954年 | 20.2 | 1972年 | 30 |
| 1959年 | 21.9 | | |

* 资料来源:克里热尔:《法国共产党人》(1970年),第30页;《世界报》1973年2月23日和1974年3月10日和11日。

大多数女党员均在城市。当四个党员中只有一个是女党

员的时候，巴黎大区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女党员。甚至在共产党的根子扎得早而又牢的乡村地区以及在妇女本身也投共产党票的时候，妇女们也是直截了当地把党员的资格留给男子的。如果这些百分率似乎是低的话，那就必须记住，它比法国其他政党还要高，即使在战前这些百分比还微不足道的时候，它也一贯地比其他政党高。在其他政党对女权问题还完全漠不关心的时候，法共就赞成男女同工同酬和妇女参政，并且提名妇女参加竞选（非法地而且徒劳地）。另一方面，人们不能从党所公布的百分比得出结论认为它正吸引着更多的妇女。人们大概需要了解党员的绝对数字，但并不了解。情况可能仅仅不过是，妇女离开一个日益衰落的党的速度比较慢。

意共在 1971 年年底报告说，它的女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在女权主义是一支富有战斗性的政治力量的国家瑞典，瑞典共产党在 1972 年仅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女党员，但它仍然拒绝考虑建立一个妇女组织。党的书记建议设立临时照看婴孩的服务站，以便增加妇女在党内的活动。其他党没有提供有关女党员的情况，它们也许更没有什么东西好夸耀了。

如果女党员虽然为数众多但都沉默寡言，消极，大多都不参加男子操纵的党的活动，那么党应该设立临时照看婴儿的服务站的建议，就使人想到这些百分比数字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女党员之所以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党员，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一贯的政策是要求男子鼓励他们的妻子参加党，因为这样就使得男子不会由于为党的工作花费许多时间而严重破坏他的婚姻。这就意味着，许多女“党员”实际上是党员的妻子，她们在党内的政治作用等于零。这样，由于丈夫在

党内被提拔，他的妻子也就可能随其丈夫上升到统治集团中，在领导人一贯是通过指派和裙带关系产生的党内，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很容易的。于是，1967年，法共中央委员会的九名女委员中有七名是嫁给或曾经嫁给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的。维美徐·多列士在她丈夫出国和生病期间，在法国共产党内获得了最高权力，这种做法就具有了君主政治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共产党内通过自己的努力爬上去的妇女一直是寥寥无几的。当然，在所有的党组织中，女代表的比例总是比女党员要低，而根据一位女观察家的看法，比整个社会上占有负责职位的妇女还要低。妇女在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作用甚至更为渺小。虽然在一个比例代表制国家中操纵候选人名单的产生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意共议会党团中的女议员人数一直在下降。西班牙共产党虽然一直吹捧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为“热情之花”，使她成为党的主席，但正象其总书记所承认的那样，它一直是以传统的西班牙方式极力反对女权的。

最近在努力扭转这种趋势，首先是从最容易着手的地方开始，这就是装饰党的代表大会，这是需要过细地在幕后安排的事情。法国共产党自夸说在1972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女代表就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十二年中上升了百分之十二。对比之下，那年出席瑞典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女代表则不到百分之十。在举行1973年大选时，法共提出的女候选人比其他任何党派都要多（八十三名），但是大多数是候补的，这也就是说，她们是位居次席的候选人，只有在当选议员死了以后她们才能获得席位。

同时，如民意测验所估计的那样，法国共产党选民中的男子选民可能一直在有所减少。

法国共产党选民中妇女的百分比

| | | | |
|------------|----|-------|----|
| 1948—1949年 | 38 | 1965年 | 39 |
| 1952年 | 39 | 1966年 | 37 |
| 1962年 | 35 | 1973年 | 42 |

1973年法国人口中有百分之五十二是妇女。因此，由于法共选民中有百分之四十二是妇女，它在国内仍然拥有显然是男性占优势的拥护者。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且不谈妇女对共产党一般政策所特有的反映（例如，妇女通常不大同情那些谈论革命或答应从事相当规模的社会改革的党），共产党对首先涉及到妇女的一些改革一直是敌视的，或者是冷淡的。它们鄙视那种认为妇女可能会具有那些不能归入阶级一类的问题的观点。针对支持计划生育的“小资产阶级”的煽动，它们宣布“反对反动的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我们要为母权而斗争”——这口号是J·多列士和维美徐于1956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的题目。他们用那些老生常谈的、煽动性的、有时是虚伪的论点来为家庭和婚姻辩护，谴责恋爱自由、性生活自由、避孕和流产。在离婚已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问题的地方，例如象意大利，共产党让原则问题从属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也就是从属于避免保守派和世俗政党发生明显分裂的愿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可能难以看清它在选举上的有利条件在哪里。

在采取这些态度的同时，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道德说教，如谴责猥亵、同性恋爱、男女杂交以及丧失社会地位的人的堕落。人们对性问题上的非传统观点被看作为资本主义堕落的征候而不予重视。于是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贝林格说：

我们不赞成执拗的人或是清教徒的社会，但同样也不赞成这样的社会，在那里任何事情都可以干，那里流行这样的论调：每一种本能都应让其放任自流，而不是合理地予以控制。这些自由派理论是假文化的毒品，它们象买来吸的麻醉毒品那样是有害的，它们助长混乱和犯罪，同时是瓦解、拆散和破坏任何一种真正的人类以及家庭关系的资本主义的产物。

随着共产党受到自由意志论者和妇女解放主义者的攻击，这种态度变得越来越成为时代性的错误。1972年，在法共讨论妇女作用的一次会议上，正当雅克·杜克洛在讲台上呱啦呱啦地反对“搞同性恋爱的革命者”的时候，会议由于妇女解放和性生活自由鼓吹者的相互斗殴而中断。在比较风平浪静的时候，法共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家庭的伟大卫道士”，这个卫道士以“资本主义”作为替罪羊来保护真正的压迫者——男子（不管他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以期望社会主义会解放妇女这一尚未解决的问题为依据而毫不考虑妇女的特殊情况。在离婚和流产问题上持慎重态度的意大利共产党妇女联盟，遭到妇女解放主义者的攻击，她们怂恿许多妇女脱离这个组织，而去加入与之敌对的组织。

这种外部的批评在促使改革方面，也许没有如下情况有效：由于世俗组织（包括右翼和其他党派在内）的主动行动，避孕、流产、性教育和离婚在法国和意大利已成为选举中的问题，后来又成为立法的问题。一旦政治上略占优势，或更准确地说，万一由于采取了不合适的立场就会冒在政治上失势的风险，共产党就赶忙跟在它们预先没有料想到的创新者的后面奔跑。法国共产党提出了一项有关流产的立法，可是这项立法从法律上讲十分含糊不清，因而等于是没有提出什么法律，

它急切地敦促改革 1920 年的避孕法，而它在战前或战后处于多数党地位和参加执政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项法律有什么缺点。法共议员拒绝对有关性教育的法律投票，而法共书记自己则宁可对离婚和通奸问题稳妥地持以含糊不清的观点。总之，共产党一直是对道德革命感到不舒服的旁观者，它们适应道德革命的努力是否会成功，现在还不能肯定，因为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普通党员反对那些热中于选举得失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新态度。可以肯定，无论是努力对道德问题予以新的关注还是坚持陈旧的社会理论，共产党从中获得的好处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共产党的精神分析学家所发现的，“色情社会”必要的前奏是对垄断企业权力的限制。

宗 教

假定马克思主义有明确的哲学倾向，人们也许可以认为，共产党人是绝不信宗教的。一些共产党的选民也证明是如此。在芬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属于芬兰路德派教会，对宗教采取冷淡和否定态度的人支持人民民主联盟（共产党控制的选举联盟）的，是宗教徒的七倍……人民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中对宗教采取冷淡和否定态度的人是非社会主义政党中的五倍。人民民主联盟中的宗教徒不到非社会主义政党中的一半。就宗教情况来说，社会民主党选民更接近的是非社会主义分子而不是人民民主党人。

在芬兰，有神论宗教选票与共产党选票之间相互否定的关系，在工人中最为明显，因此，参加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加强了不信仰宗教的态度，注意到这点是很有意思的。

法国的情况与此相仿，百分之八十五的法国人是受过洗

礼的天主教徒。接连几次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共产党选民中不信教和(或)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1966年占百分之七十七，1967年占百分之七十八，1972年占百分之七十一；对在政治信仰方面与共产党最相近的社会党人来说，比率只不过停留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根据1966年和1967年的民意测验，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共产党选民偶尔也参加一些宗教仪式，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社会党人和三分之二的其他各类选民参加宗教仪式。然而，1973年的调查表明：有百分之二十八的法国共产党选民有时偶尔去教堂做礼拜，这情况也许说明，这里有某些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共产党选民仍然是最不信教和最主张无神论的。的确，在与宗教没有联系的法国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也投共产党票(百分之二十六的人投社会党票)。虔诚的天主教徒投共产党票的只有百分之二(投社会党票的有百分之十三)。在法国也象在芬兰一样，在宗教问题上共产党人是不同于从社会党人到戴高乐派的其他选民的。除非得到证实，人们大概会不大愿意承认意大利(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西班牙)情况也是如此。有些国家大概是向另一情况过渡的标志，在塞浦路斯，大多数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党员信仰东正教，这一情况为共产党人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正如在天主教国家中只有少数信徒投共产党人的票一样，参加共产党的人甚至就更少了。这些人作为例外被大肆宣扬。意共让人们知道，贝林格夫人参加弥撒。《星期日人道报》(1971年5月12日至5月18日)报道了一名妇女的情况，她常参加七点钟的弥撒，然后到街上去出售共产党周刊。罗歇·加罗迪说，他过去在马赛也是常常参加了福音派新教会的集

会后去卖党报。德国共产党发展了五十名左右福音派新教会牧师，主要是在黑森这个地方。芬兰共产党人指望从神学院学生和赫尔辛基牧师中发展党员。这种情况无疑是古怪的，但同样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得更经常，因为用加罗迪的话来说，教会与共产党已经“从咒骂到了对话”。象其他将在理智上引起混乱的事例一样，这种对话造成了无数热情洋溢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最初对种种组织之间的冲突有可能进行“哲学上调解”抱怀疑态度的人，现在只拘泥于论述它的外部的和纯粹是选举方面的问题。

西欧共产党很早以前——在三十年代就已放弃了好斗的反宗教运动（这种运动现在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国家中仍可看到），这一情况为对话创造了条件。不管共产党向基督教徒靠拢会有怎样的选举结果，西欧各国共产党在默认宗教问题上的记录是如此清楚地确定下来（与苏联世界经常发生的向教会夺权的斗争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以至必须把它看作是适应多元的西方社会条件的一部分努力。另外，在经过对梵蒂冈政治进行尖刻的，但可能是合法的批判的阶段以后，意共转而采取了反对反教权主义的态度，这使世俗政党感到极为失望，它们经常怀疑它与梵蒂冈勾结。芬兰共产党也学会了在党和宗教都控制着那里的人口的地区，慎重地处理各宗教派别。法国共产党还没有能够从默认信仰的多样性，过渡到反对反教权主义，乔治·马歇关于教会学校的失言，就表明了这点。

1972年8月马歇在给一位牧师的信中作了如下一个推论：接受公共基金的教会学校的国有化（这是在共产党—社会党联合纲领中提出的）在与公立学校不能驻有牧师的规定

(自1866年以来这一直是法国法律的一项原则)一起加以考虑的时候,就意味着一旦这些教会学校被接管,所有的牧师都将被解职。他利用这个机会来扩大这一争论,他坚持说,政教分离的原则意味着,“任何一个教会成员都不可以在政府中任职,不仅是公共教育部门如此”。“任何教会成员”这句话显然是说得过分了,以至马歇不得不很快就退一步,转而承认,共产党—社会党的政府甚至会允许牧师担任公职,要是他们不在那儿作为“献身于教会的代表”行使其职责的话。关于公职人员非宗教化问题的争论是相当乏味的,而法国共产党人仍然是时下流行的反教权主义的牺牲品。与这一情况对照来看,上述的诡辩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问题并不在于牧师能否成为邮递员或他们当了邮递员的话又将“代表”谁。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向他们指出下面一点以前,他们没看到:在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把牧师从公立学校中弄走是一回事,而在全部学校由于国有化而都成为公立学校的时候,把他们全部解雇又是一回事。马歇无意中引起的争论,给共产党人一个机会,以重申他们拒绝把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任何理论作为正式的信仰,他们从而与东欧共产党有着明显的不同。马歇说:“人们对我们说:‘这将是新鲜的!这不是他们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迄今所作的事情!’一点不错,是不同的。”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皮埃尔·朱坎补充说:“国家将没有什么信仰,也不宣传任何非宗教的学说。说得更概括一点,它对哲学上的任何事情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然而,他们在辩论期间的混乱状态与宣布放弃信仰(密特朗发觉放弃信仰“只有一半的可能性”)表明,在与教会及其学校(有百分之十七以上的法国儿童

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关系这个范围比较狭窄的问题上,法国共产党人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理论。

其他迹象表明,他们对基督教徒的态度是举棋不定的。他们在讨好信仰基督教的选民的同时,还要继续巴结非宗教运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思想一致这一点上也好,或是在意识形态上与天主教妥协也好,都是没有什么借口好找的。但是他们宁可与传统的天主教徒而不愿与左翼的天主教徒打交道,这就暴露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培养能够支配选票的和有影响的领导人,而不是探讨同最接近他们的基督教徒进行合作的条件。

这就说明了党的专职哲学家罗歇·加罗迪在这个领域遭到失败的原因。多年来他一直在负责对付天主教的诱惑力,并且似乎取得了若干成绩。但是,加罗迪由于真诚地在试图寻找愿意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基督教徒,结果与他打交道的是教会中仅仅代表中间势力的左翼天主教徒。党意识到,一个答应在选举竞赛中持中立态度的高级教士能够给共产党候选人带来比左翼天主教徒的几百张选票更多的选票,因此它宁可同“更有代表性”的天主教徒打交道了。更糟的是,党把左翼天主教徒看成是宗教团体内部的颠覆和捣乱的势力,因此它情愿与在保守的主教领导下团结的集团打交道。正如左翼天主教徒所看到的,这是反映东欧共产党政府态度的一面镜子。这些政府宁愿同梵蒂冈达成默契以及宁愿提名严格按照宗教崇拜仪式主持宗教团体的保守的主教,而不愿容忍进步的天主教徒,因为这些教徒也许会吁请梵蒂冈主教会议讨论基督教负有的社会和政治使命。在罗歇·加罗迪被开除出党以后,党对宗教又恢复了过去那种不那么感情用事和更为小

心谨慎的态度，而且实际上纯粹是选举主义者的态度。在这一方面，法共的路线又一次与其他党的路线相同。此外，在加罗迪被开除之后，他透露说，尽管几十年来他一直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活动着，他始终是个宗教神秘主义者，这时候，他的关于共产党—基督教合作的观念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意义，因为看来它是来自个人的信念而不是党的教义。

虽然事态的这种发展使法国进步的天主教徒感到失望，值得注意的是，加罗迪给他们提供的“哲学上”的妥协在理智上是值得怀疑的。而党能够采取的、不会给党的性质留下什么印记的立场，也不会仅仅是选举主义者的立场。这就是说，没有什么策略方针（无论它怎样地深思熟虑），可以在年复一年的接连不断的选举运动中加以运用，最终既不会危害一个政党，又不会使它陷入一种无法轻易摆脱的关系，在一旦赢得政权的时候还要使它不受某些特殊的政策和联盟的约束。从咄咄逼人的反宗教无神论（无神论仍然是俄国共产主义的标志，并损坏了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的形象），发展到习惯于容许有多种多样的信仰，并经常否认东欧这一样板，这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西欧共产党近代史的其他方面发现的事态发展。当然，这不是说会缓和党和作为机构的教会（例如作为学校的管理人和财产的所有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尽管共产党人说他们现在业已适应这种多元的社会。

社会阶级

关于共产党党员和选民的社会阶级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西欧各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是不够明确的。它们本身在理论上有一个预想的模式，即它们本身就是非常独特的阶

级政党。它们偶尔也承认，它们在事实上并不符合这种描述（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符合如下的一种惯例，即从不承认共产主义在现时有什么过失，只是承认过去有过过失但现在正在纠正，共产党说它们的阶级构成曾经是不完善的，但是现在正在改进）。为了力图看到事实的真相，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要跟着共产党人陷进他们的圈子里去，从而卷入了关于“阶级”的没完没了的混乱争论中，这也是共产党论战的特点。虽然阶级的概念被普遍运用，而且不仅仅是被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而已，但是它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把一碗水端平的分类，根本不能指望它适应政治的动态。例如，人们如何划分党的长任官员的阶级成分？这些官员曾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但是现在已当了几十年的职业政治家；如何划分学生，或者家庭主妇，或者退职人员，或者知识分子，或者靠土地生活的农民，或者共产党经营的企业中的行政人员以及或者诸如工业中日益庞大的技术阶层这些“脑力劳动者”的成分呢？这些并不是偶然的事例。属于这些集团的人占许多西欧共产党党员的半数以上。不管根据哪一种把社会划分为各个阶级的理论，要把他们加以分类也是困难的，而把他们硬塞进那种其主要的区分就是无产者和资本家的这一偏狭的和过时的阶级分类，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种困难还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无论在东欧共产党国家或西欧共产党内，政治权力都是被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活动的集团所掌握。工人阶级的定义是马克思在一个世纪前研究西欧各国社会时所拟定的，因此在把它应用于现代西欧各国社会，或者更不必说运用到诸如俄国这样的非工业化社会时，它已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就毫不令人奇怪了。所以必

须用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理论来加以补充。这些别扭的种类不符合如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划分，人们否认这些种类是独立存在的，而且把他们降低到无产阶级同盟者的地位——即便他们还没有看到，他们应该成为其同盟者。

这就使得那些以工人的名义进行活动的集团能够适应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非常不相同的情况。但是当然也有过这种时候，社会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距离太大，因此这种花招不起作用了。共产党的一个变种以另一个阶级，即农民的名义来证明它的权力是正当的，但那是毛主义，同欧洲无关。在欧洲，相反是力图重新给工人阶级下定义，特别是要提高其“同盟者”的政治地位，甚至到了给他们以领导作用而使工人成为他们的同盟者的程度。共产党人提出这些新定义并不是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而是为了使政权从以无产阶级名义进行活动的共产党人手中转到另外一些有着不同目的和用不同的同盟者来取得权力的共产党人手里的做法合理化。这就是1968年在布拉格以及与此同时在西欧共产党内部关于工人阶级的性质及其与技术人员的关系的理论争论的政治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新概念的人，由于苏联的干涉，被迫退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生活，他们在西欧党内的支持者有的被开除，如加罗迪，有的被迫屈服于传统主义者。因此，作为样板的西方共产党关于阶级关系的正式理论仍然是：党主要是由工人组成，它的领导成员中工人的绝对优势甚至比过去还要强大，它在政治上得到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当它由于参加联盟而成为全国性的、包含有各阶级的政党时，总是要把联盟的领导权置于工人阶级手中。这种坚持认为要由

工人阶级领导的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在马克思所预见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马克思心目中的工人阶级实质上是私人所有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产业体力劳动者。共产党逐步扩大了这一概念的范围，以便包括各种复杂的成分，但是并没有放弃马克思所讲的那个特定的集团所特有的历史重要性。共产党仍然赞同列宁的话：“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工人和总的说来工厂工人，工业工人——能够领导整个劳动大众和受剥削的群众。”

事实上，正象他们由于抱怨而经常坦白承认的那样，在他们的队伍和上层中工人太少了，因此共产党并不符合那种模式。小党显然不符合这种标准，但是大党和比较成功的党也是如此。在当代民主社会中没有哪个党能够在狭窄的工人阶级基础上发展大量党员和具有广泛的选举吸引力。更糟的是，这种基础正在缩小，因此，坚持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共产党就逆社会发展的潮流。例如，在法国，每两个参加生产劳动的新工人就要配上五个拿薪水的非工人。其结果是法国工人阶级在1954年到1971年期间虽然净增了百分之十四，但是，它在有工作能力的人口中的比例缩小了。这一发展已为欧洲各社会党所承认，这些党把它们选举命运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即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无产阶级人数日益缩减，并不妨碍左派的选票（在欧洲甚至还可能增加选票），尽管它们使那类选票不那么是阶级的反映，不那么如共产党人所指的那样无产阶级化。

各共产党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程度是互不相同的。法共的态度是最教条地无产阶级化，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工联主义是法国的坚实的传统，其历史比法国共产党本身还要长。马

克思不得不与反映在蒲鲁东身上的这种倾向作斗争，列宁则对在索雷尔身上的这种反映加以嘲笑，而法共却以自己的态度来为这种倾向现身说法，并在法国工人中对它表示尊重。与此相反，意共比较主张阶级混合，更倾向于获得群众，也就是大多数人，而不是这些人中的产业工人的支持。英国共产党把《工人日报》改为《晨星报》，恰好是由于它看到，一个纯粹是无产阶级的机构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地位。西欧各国共产党在力图适应这一情况时，受到苏联党的阻碍。该党是欧洲各国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和支持的源泉之一，它以工人的名义行使权力。事实上，正当苏联工人阶级由于经济的现代化而把阵地丢给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时候，苏共吹嘘说，无产阶级对苏联社会的控制日益巩固。只要苏联党坚持那种意识形态，西方党就不愿抛弃它们的无产阶级偏见。

在分析各党的阶级关系时，我们必须依次研究它们的党员、领导和选民，因为每一类的阶级出身都可能完全不同。

党员：《再生》周刊(1972年11月3日)提供的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成分的比例可以与对意大利另一个大党——天主教民主党党员所作的类似的分析(《探讨》，1973年3月26日)相比较。

| | 意大利共产党 | 天主教民主党 |
|--------------|--------|--------|
| 农 业 | 17.6 | 15.2 |
| 产 业 工 人 | 39.5 | 16.6 |
| 中 产 阶 级 | 13.11 | 32.2 |
| 退 职 人 员 | 14.9 | 7 |
| 家 庭 妇 女 | 11.6 | 25 |

意大利共产党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党员是产业工人，自

战争结束以来情况确实一直如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党的规模大大缩小，而意大利发生了人口大规模地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现象；所以工人中共产党党员的比例显著下降。在五十年代初期，意大利每五名产业工人中就有一名是意共党员，而在七十年代，每十二名意大利产业工人中才有一名意共党员。由于意大利农场工人的人数下降，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也减少了，不过在那些党在地方的权力可能对党员有用的地区，也就是说红色地带，农场工人被佃农所取代。把产业工人、剩下的农场工人和这两类人的妻子以及领养老金者一起计算在内，占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但是家庭主妇和领养老金者在党员总数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从整个选民看，这也是正常的），这倒是一个一度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党的引人注目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改变它的性质。

意共保住了手工业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对它的忠诚（这一阶级的党员占百分之六），但是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它并未能设法吸引住那些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而日益增多的雇员、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这样，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成为工业经济这一情况并没有给意大利共产党象给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党那样带来什么好处。在它能够从新工业的雇员和杂务工中发展党员的地方，它只能够希望吸引工人，但它没有吸引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所以它未能在工业化的北部取得进展，而战后初期在那里，它拥有占总数百分之四十的党员，但是现在只占百分之二十八，党的工作重心没有转到贫穷的南方，而是转到繁荣的、但不那么工业化的中部地区。那个地区的党员现在占其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而在战后占百分之四十二。

加利总结说：

今天的意共已不象战后初期那样是产业工人和农场工人的党了。与其说是工厂工人的党，不如说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党（家庭妇女、领养老金者等等）。它力量的中心既不在这个国家工业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地区，也不在最贫穷和最落后的地区。它根本没有作为一个工人和穷人的党来发展。它既没有在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并取得进展的地区，又没有在战后才开始工业化的地区获得发展。……意共力量最强大的地方不是工人占了人口大多数或者贫穷最普遍的地方，而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过去最强大以及由于党在当地拥有权力，它成了社会一体化的党的地方。

一个政党作为社会一体化或参与社会活动的工具的吸引力，在意大利北部富裕的工业地区是比较小的。那里由于社会生活接近新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意大利共产党，而且所有其他政党的党员数字都下降了。与此相反，意共在波河和特韦雷河之间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却颇有势力，在那里扎下了根，并且还有所发展，这是引人注目的。还应该注意的，它在同一地区又从妇女和老人中发展了党员，把那里从前的阵线组织转变为具有相同利益的市民的真正的协会。

意共与意大利其他任何政党相比，当然是更无产阶级化的党，但是其无产阶级化的程度不足以使它成为这个阶级独一无二的或者甚至是特许的代理人，也不能说它的主要职责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凡是在党的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它根本不起什么阶级的作用，它吸引人参加党是因为它提供地位、确保工作、分配地方权力，并且提供地区一级社会生活的许多组织。

我们对于较小的西欧共产党党员社会出身的材料了解不多，由于它的多种多样而迷惑不解；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以前关于“西方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其信徒的多变和不稳定”这一判断。卢森堡共产党的党员和其领导一样都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土耳其共产党则完全不无产阶级化，但却吸引着学生和知识分子。据信葡共的三分之一是工人，六分之一是农民。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时期是中产阶级的党，现在据说工人阶级占压倒多数（虽然它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地区不一定是强大的）。这是因为西班牙共产党在六十年代对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渗透（这件事比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更使佛朗哥政权担心），业已证明是经不起极左分子的竞争的。由于学生脱党了，工人阶级在这个分裂的党内占了多数。相反，瑞典共产党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巩固的工人阶级政党，却吸引了并至今还拥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党员。芬兰共产党主要是由低工资的产业工人和贫穷的农村居民组成的。英国共产党象大多数小党一样，是工业中富有战斗精神的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大杂烩。中产阶级党员在战后增加得很快。西德共产党也同样如此。德国共产党声称它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党员是工厂工人，百分之二十八是职员（百分之十五）、技术人员（百分之六）和学生（百分之七），剩下的百分之三十七是家庭妇女（党员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妇女）、农民、退职人员和专业工作者。根据老党员的观点，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和脑力劳动者的大量涌入党内，威胁着德国共产主义的工联主义传统。

1966年，法国共产党由于急于要表现出尽可能的无产阶级化，它对党员作了一次分类，但是其方法使得人们难以把它与意大利和德国共产党的统计数字相比较。

其分类如下：

| | 百分比 |
|---------|-------|
| 工人 | 60.1 |
| 职员 | 18.57 |
| 农民 | 6.56 |
| 知识分子 | 9.0 |
| 店主和手工业者 | 5.77 |

女党员在那时占四分之一多一点，其中一半是家庭妇女，她们的成分显然是按照她们丈夫的职业。退休人员和党的雇员（这类人数以千计，因此在党员总数中占了相当显著的比例）则以他们过去担任过的职业来分类。总起来算，大约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党员不在经济部门中工作。假如我们把党所提供的比例降低三分之一，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共象意共一样，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党员是劳动男子和妇女。这样，法共的压倒多数就可算是无产阶级了，但应理解为这意味着它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党，而在二十年代，它却主要是工人组成的党。把在工作单位组织的支部与在居民区组织的支部相比，就会发现前者的数字在下降，也就可以看清这个问题。对于各个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在理论上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因为列宁主义的一个格言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把自己最强大的力量放在工作单位的支部，而不是放在居住区支部，因为那是民主政党的特征。1926年，法共有一半的支部确实是在工作单位建立的。到了1970年，尽管一再提出忠告并进行各种努力和运动来为工作单位支部宣传，这类支部却只占百分之二十六了。这种下降反映出，有许多妇女、领养老金者、知识分子和独立中产阶级分子参加了党，而他们却不能在

工作单位把自己组织起来。

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法共的农民党员人数一直在减少，然而党在工业区未能象在其他地方那样补充新党员。对这种矛盾现象的解释可能是：法共的力量是在遍及全国的公共经济部门。法共党员中私营企业工人（包括过去是私营企业工人或与之结婚的）的比例，看来一直固定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但在公共服务事业和国有化企业中的比例，不管是工人、职员、教师还是技术人员都从 1954 年的百分之十四点五上升到 1966 年的百分之三十点七。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这样做仅仅是考虑到党自身的眼前利益——为什么法共是对公共部门工作条件时刻予以关注的卫道士和主张进一步国有化的热忱的改革家。总之，法共接触的仅仅是工人阶级很小的一部分，它显然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组成的党，比法国任何一个政党更为无产阶级化。

领导：从理论上讲，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属于党的代表大会。然而，由于代表大会是装装样子的，共产党精心挑选出来的代表的社会出身，除了告诉我们党希望它所具有的面貌以外，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明显是无产阶级化的，至少根据党的说法是如此。譬如，法共代表大会有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的工人——不是工人阶级家庭的成员，而是真正的工人。1964年，参加法共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冶金工人。他们精确地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工人的定义——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的工业中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在1971年德国共产党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百分之六十八的代表是工人。这个比例高于在整个人口或共产党整个党员中的比例。这样，代表大会就显示了要以

工人阶级面貌出现的相当明确的决心。我们所看到的公务员是党员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是故意压低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名额。假如这看起来似乎意味着这样一个危险，即党的最高级的集会大概也许会采取特有的工人阶级立场，那么，人们必须回忆到，代表大会是以另一种方式装样子的：它的常任官员和党所控制的各种机构中的常任雇员（尽管他们可能被描写成工人）占了与会代表相当大的一个部分。这样，代表大会这种组成的目的就是：（甲）制造某种形象，（乙）同时，确保通过由常任领导人员所提出的动议；因此对他们的社会出身作一番精心的分析实在是徒劳无益的。

至于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管理党的常任官员，人们必须把小党同那些大党和富党区别开来。诸如英国、瑞典或西德共产党这样的小党，其官员的社会成分，人们无从分析。这些党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不自然的联盟，领导的职责主要是使这两翼保持平衡，以便使它提出的政策获得支持。他们的职业（在不同社会出身的人中从事脑力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工作）的实际性质使他们能够采取这种无阶级性的姿态。

大党的情况乍看一下大不相同，事实上也许可能一度也确是大不相同，但奇怪的是其结果却惊人地相似。这因为不管党的官员的出身如何，在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内获得一官半职是公认的提高社会地位的阶梯。这是工人在那些社团组织中发迹的途径之一。当然，别的且不说，这也是避免碌碌无闻和无产阶级生存无保障的一条途径：参加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能够提供物质保障，使之在漫长的生涯中能步步高升，在社会的芸芸众生中获得威信或者甚至名声和荣誉以及取得成就之感。在这样的组织中呆上十几年以后，一个官员在

人们记忆中是否是工人这一点，同他现在的职业是否使他与工人阶级保持接触（常常是否定的）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在此意义上，这类官员在选拔和提升诸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具有相当不同社会背景的党的官员方面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对了，如果他们适合参加抱成一团的班子，能够保证党与之打交道的各种各样社会集团接受党的政策。

这些进入了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中产阶级目前在社会上也吃得开，但是，在目前欧洲所有的政党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在社会上平步青云的手段。但共产党以及社会党（其程度较轻），它们对工人的提升也有所不同。右的和中间的党派，尽管它们可以象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或戴高乐主义那样，似乎可以有理地声称，它们是以各阶级混合作为基础的，但是也没有在他们基础上提拔许多工人。中产阶级成员在统治集团里从最低层一直到上层都占优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确实是无产阶级的，因为它们提拔工人而别的党派则不这样干——但是，这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解释，因为我们用阶级这个名字描绘的是从一个阶级通向另一个阶级的渠道。我们是在描绘社会可变性的一种形式，把它看作是静止的那样。不要把它说得太好，理想的工人政党的工人领导人的形象并不包括由已经成为职业官僚的工人以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员所管理的党。“不这样又怎样来管理一个大党呢？”这一反对意见就是承认，同上层分子这个概念的运用比起来，在政治中运用阶级分析是有局限的。

假如除各个政党外，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尽管向工人展现出一幅平步青云、无限前程的前景，但仍然象其他党派一样，主要是提拔中产阶级人士——在它们这种情况下就

是资产阶级激进派。这样，当那些被提拔的工人进入党的上层，即进入中央委员会或者经过选举担任公职时，他们发现他们在数量上不及中产阶级的政治家。然而，那时候，他们离开工人的工作已经许多年了，这种情况不可能使他们不安。据估计，五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进入中央委员会或议会的人员中只有百分之二的人那时还仍是从事非党工作的拿薪水的雇员。这同天主教民主党的情况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在上层政治家中，有百分之零点四是拿薪水的雇员。这些共产党人在他们爬到顶层的漫长历程中，几乎不大可能注意到，虽然工资劳动者占党员总数的大约百分之六十，基层的积极分子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工资劳动者（相比之下，百分之四十五是中产阶级，而这个比例已经是按低水平算的了），或者在省的党组织一级，中产阶级占据了百分之六十五的官职，给原曾当过工人的人只留下百分之三十八的职位。或者在共产党的市议员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五是曾经当过工人的，或者最后在被选进意大利议会的共产党议员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点九原曾当过工人。一般说来，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人们记忆中原曾当过工人的，其处境要稍微好一点。他们在数量上与其他出身的政治家相比是一与二之比，而在议会中是一与三之比。但是在议会的趋势也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在不断减少。这样一个党从它的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身上就可以很容易地认出自己的面目。贝林格是社会党一个律师的儿子，是撒丁地主中一个豪门世家的子弟，他在二十一岁时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一年之后便开始了他在党的官僚机构中从未间断的生涯。

法国共产党由于继承了法国工联主义的传统，几乎不会

挑选这类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作为领导人。它的一些领导人(多列士、杜克洛、马歇、瓦尔德克·罗歇和乔治·塞居伊)在踏上由党和工会官僚机构所提供的在社会上步步高升的阶梯之前,都有过短暂的工人生活经历。法共所提供的这类阶梯,在法国所有的政党中是最好的,这样,党就可以指出,它送到议会中去作代表的原曾当过工人的人,同执政党派出的公司经理一样多。尽管戴高乐主义分子和与其结盟的独立共和党无疑在选举中获得许多工人阶级的支持,然而它们在议会中却没有一个原曾当过工人的人。尽管如此,当这些过去当过工人的人到达法共的最高层时,他们发现其他出身的一些人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们。1973年研究法共的两名学者为此挑出三十二名“地位高”的和有意当官的党员,并就其中的二十六人提供其职业背景,这些人中有十一人曾作过工人,而十三人一直是或者曾经是教师、技术员、职员或专业人员,有两人是工会官员。在这些做过工的人中,仅五人曾在资本家的企业中干过活;其他六人则曾在国有化的企业或公共事业中工作。这两部分人在数量上都为八名教师所超过。

由于法律规定,共产党代表的社会出身是人所熟知的。安尼·克里热尔曾经指出,从1924年至1966年,塞纳河地区的共产党候选人发生了由教师大量取代工人的变动。而且这种变动自那时以来一直在继续,并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在1962年当选的四十一名法共议员中,曾做过工人的议员还不到一半(更确切些说,是十八人),而教师、技术员和专业人员却有十二名。在1973年当选的七十三名共产党议员中,二十七名曾是工人,而教师、技术员和专业人员却有三十名。虽然工人的比例仍然相当大,而且比其他任何政党中的工人议员的比例

都要大,但是事实仍然是,法国共产党所提拔的工人还是比其他社会出身的人为少。

议会代表的问题之所以饶有兴味,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共产党内,议员的职务并不象在大多数其他政党内那样高贵,在其他政党内这往往是最高的职位。共产党议员在他当选的那天,就得把他签过字的辞职书交给党,这样他就可以任意被撤换;他把他的议会薪水交给了党,取回党允许他得的那部分;而且他要根据党的指示,恪守纪律地进行投票。如果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够要求得到那些从不竞选公职的政治局成员所享有的威望,这还意味着党可以提名任何人作为候选人。共产党不需要杰出的群众领袖、博学的律师或伟大的辩论家,因此如果它高兴的话,它就可以排斥任何人,而只提名工人作为候选人。在意大利以及有几年在法国,选民是按比例代表制投票的,党的候选人名单由选举产生,而不管候选人个人的才干如何。因此,意共和法共仍然只提拔少数过去当过工人的人充当议会代表,这一事实就证明,在党的上层党员中,当过工人的太少了,以致它不能不这样做。党在其上层中已为其他阶级,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接管。

很清楚,自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法国问题的一项决议以来,处在那种境地的一个党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项决议说:

为了使党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特性,为了把那些将党仅看作是通向议会的过道的人拒之于自己队伍之外……必须订出如下一条不容违反的规定,即党为竞选而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至少必须有十分之九的人是仍在车间、工厂或矿区工作的共产党工人和农民;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应严格限制,只能占十分

之一。

选民：

西欧共产主义在选举中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整个选民，倒不如说主要取决于分布在各地的社会党人。共产主义一直是左派内部的事务。从丹麦到意大利，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选区，那里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左派的选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但是在这方面，左派选票的内部却出现了共产党选票广泛波动的情况。共产党人赢得选票时，他们是从社会党人那里赢得了这些选票；而当选票出现波动时，社会党人又收回了自己的选票。属于中间派和右派的资产阶级政党，则在袖手旁观，基本上无所损失。在共产主义未能争取到大量拥护者的地方，它仅仅对社会党来说是件选举中的麻烦事。而在共产主义取得巨大胜利的地方，它充其量也不过是占据了在 1919 年就已落在第二国际各党手中的地盘。这就意味着，共产党的选票主要并不是同象阶级之类的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联，而是与存在着社会党选民这一前提的政治情况相互关联。

这后者并不是一种阶级反映的现象。在西欧，议会社会主义一贯是一种同情劳工事业的自由党人的事务，是中产阶级政治家和工人阶级政治家的一种合作，这些工人阶级政治家从未能够赢得整个工人阶级的选票，选票的很大一部分给右派拿去了，最少的那部分常常是给了极右派，他们一贯是从别的阶级那里赢得可观的支持的。由于共产主义是这类选民的内部事务，它的阶级关系就比它关于自己的理想所表示的要更为复杂。而这种阶级关系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是大不相同的。

意共选民和天主教民主党选民的社会成分的百分比如下：

| | 意大利共产党 | 天主教民主党 |
|-------------|--------|--------|
| 上层资产阶级 | 0 | 1.6 |
| 靠薪水生活的小资产阶级 | 12.1 | 14.4 |
| 独立的小资产阶级 | 25.3 | 36.0 |
| 工资劳动者 | 60.6 | 44.8 |
| 其他 | 2.0 | 3.2 |

* 资料来源：《再生》周刊(意大利共产党出版)，1972年11月3日；《探讨》(天主教民主党出版)，1973年3月29日。

天主教民主党的选票比共产党选票多，因此这个天主教的政党所吸引的工资劳动者的绝对数就比共产党多了。其他政党(主要是两个社会党)也声称拥有许多工资劳动者。因此，即便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在工资劳动者中获得的选票也是少数。尽管如此，它仍在吹嘘，同所有党派相比，它的工人阶级选民最多。

加利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研究政党的选票与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选票，他发现与下面的因素有着意义重大的、无可怀疑的关系：积极的共产党党员和组织的存在、受共产党影响的工会机构——意大利总工会的存在、《团结报》的发行以及过去几年中社会党的投票历史。此外，他还说明，共产党选票显然同收入有关：在不太贫穷、电视机最为普遍的地方，人们多投共产党的票。同教育的关系乍看起来是古怪的：文盲同共产党选票有联系，而小学以上的教育界，情况也是如此。最后一点是，同把人分在第一、第二和第

三经济部门却毫不相干^①。

前四种相互关系,从统计上看也是最重要的相互关系,清楚地证实,这是一种由政治决定的现象,而不是阶级或经济情况的直接反映。共产党组织是社会党组织在历史上的分支。意大利总工会就是一个共产党—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团结报》这一名称指的是与各左派政党的关系,社会党投票的历史就是共产主义的传统背景。虽然意大利的穷苦人民投天主教民主党和极右派的票,但共产党赢得了左翼工人选民中工资最低者的选票,这种做法就好象他们从根本上侵犯了社会党选民似的。他们得到了文化程度最低的工人文盲的选票,但是读过小学的人不投他们的票,因为在意大利,小学主要为修女所控制,所以他们投天主教政党的票,然而,一旦度过了小学,一旦受到了电视所传播的有教育意义和非宗教的影响,左派选票就又增加了,共产党的选票也随之增加。工业化的程度没有什么影响。在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地区,天主教民主党获得农民的选票,而意大利共产党则获得农业工人和佃农的选票。在工业地区,意大利共产党获得许多工人的选票,但是,天主教政党得到了有专业技术的工人、技术员和职员选票。如果第三经济部门活动占支配地位的话,那么,意大利共产党获得的是低工资雇员的选票,天主教民主党获得的是高工资雇员的选票。因此,经济发展的程度对选票没有什么直接影响,而是通过上述收入、教育和社会党的经历间接地发挥影响。牵涉到“阶级”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个阶级不是在共产党论战中那么粗糙地划分的阶级,也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

^① 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第一经济部门指原料生产活动,第二经济部门指加工生产活动,第三经济部门指服务性行业、自由职业者等。——译者

论中引出来的关于产业工人阶级的精确概念。

从特定的角度而不是从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直接关系侵犯社会党选民的类似情况在芬兰也是存在的。芬兰人民民主联盟的选票主要来自工资劳动者，占百分之七十六，不比社会民主党选票（占百分之七十四）多多少。此外，投社会民主党票的工人是投共产党票的工人的两倍半，投右派票的工人是投共产党票的工人的一倍半。百分之四十九的工资劳动者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百分之二十投共产党的票；百分之三十投农民党和右派政党的票。投共产党票的那部分工人是那些比较穷、文化程度较低和就业较少有保障的工人。当共产党选票增多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就下降，1945年和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反过来也是一样，如1948年和1966年。在瑞典，共产党选票似乎也是同经济因素没有关系，传统上受社会党控制的地区的一些产业工人投共产党票，而其他人则不这样。其原因显然常常是由于1917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裂这一历史。不管怎样，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的选民来自中等收入的人日益增多。

法国共产党的选民是由历史原因确定的，而不是直接的阶级现象。选民集中在具有悠久的共和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地区，共产党人在那里又使自己成为业已有几代历史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的左派竞争者。由于这种集中，在它的选民中工人阶级的比例就比其他党都高，但也只占工人的少数，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七之间，全视选举情况而定。

根据民意测验，从户主的职业来看，法国人口与共产党选民和其他选民在1973年选举期间的百分比如下：

| | 职业 | 法国共产党 | 统一社会党 和左翼党 | 社会党 | 戴高乐分子及其联盟 | 右翼党 |
|-----------|-----|-------|---------------|-----|-----------|-----|
| 从事农业者 | 12 | 4 | 2 | 5 | 13 | 17 |
| 独立企业者 | 7 | 5 | 4 | 6 | 8 | 8 |
| 行政官员、专业人员 | 15 | 3 | 24 | 7 | 13 | 21 |
| 职员和低级管理人员 | 17 | 15 | 40 | 21 | 16 | 18 |
| 工人 | 32 | 52 | 22 | 35 | 22 | 14 |
| 无职业者 | 17 | 21 | 8 | 26 | 28 | 22 |
| 总计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工人在法国共产党选民中的比例自大战以来也许一直是上升的，这符合下述事实，即法国共产党选民在选票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与此同时，法国人口中的工人部分也减少了。（法国工人数字业已增加，但其中有两百万是不能参加投票的移民。）下列图表反映了自大战以来共产党选民的分类情况，它说明了在共产党选民中，工人比例在上升，但是必须注意到，连续地举行的民意测验从来没有完全一样过。例如，在早些时候的民意测验中，把农业工人归入“农业”，但现在却放到“工人”一档去了。

| | 1948年 | 1952年 | 1958年 | 1962年 | 1965年 | 1966年 | 1967年 | 1972年 | 1973年 |
|--------|-------|-------|-------|-------|-------|-------|-------|-------|-------|
| 从事农业者 | 22 | 13 | 6 | 5 | 8 | 9 | 9 | 2 | 4 |
| 独立企业者 | 6 | 9 | 11 | 6 | 7 | 9 | 8 | 7 | 8 |
| 行政官员 | | | | | | | | | |
| 专业人员 | 13 | 13 | 20 | 13 | 17 | 21 | 15 | 15 | 15 |
| 职员 | | | | | | | | | |
| 公务员 | 37 | 38 | 43 | 51 | 51 | 46 | 49 | 52 | 52 |
| 低级管理人员 | | | | | | | | | |
| 工人 | 22 | 27 | 17 | 25 | 17 | 16 | 19 | 24 | 21 |
| 无职业者 | | | | | | | | | |

这个表格的主要之点是，虽然不管哪一年投共产党票的人中，产业工人不到一半，但是如果人们把农业工人和职员也包括进去的话，那么就占共产党选民的三分之二了。然而，在人们从以上情况作出“法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结论之前，必须看到投共产党票的工人和职员占什么比例。

共产党(和戴高乐派)所得选票的百分比

| | 1967 年 | 1969 年 | 1973 年 |
|-------|--------|--------|--------|
| 工 人 | 31(30) | 23(32) | 37(21) |
| 职 员 等 | 18(35) | 17(35) | 17(38) |

这样，共产党获得职员所投选票的五分之一不到和获得法国工人所投选票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戴高乐派这样一个右派政党能够得到与共产党一样多或更多的工人选票，而被共产党称之为右派或资产阶级的政党所得的选票加起来通常是要多得多，如在1969年的总统选举中，它们所获的工人选票，等于共产党的三倍。

这是对法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这一说法的重大保留，这种说法(同布尔什维克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說法一个样)错误地描述这一真实的情况，即法国共产党的选民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虽然如此，它一半以上的选票还是来自非城市无产阶级。阶级显然是牵涉到的，但阶级只是说明了事情的一半。

研究法国共产党选票和各种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就会注意到，法国共产党选票与参加工会组织的程度无关。共产党选票在工人很少参加工会的地方可能很多，而在很多工人加入工会的地方可能很少。甚至，如同上面所提到的，在法国总

工会中也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工会会员不投共产党的票。法国共产党的选票不是来自最穷的法国人，它的选票随着工人阶级工资刻度表的上升而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下降了。至于教育，看来小学教育使非工人投右派的票，工人投左派的票（在法国实际上没有文盲），但是工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往往就不那么投左派的票了。不论是什么社会阶级，右派政党和社会党从每一个教育阶层所获得的选票比例大致相等。而法国共产党在1973年得到了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中百分之二十七的选票，受过技校训练的人中百分之十八的选票，受过中等学校教育的人中百分之十五的选票，受过高等学校教育的人中百分之七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的选票同工业化没有直接关系。确实，它的为数不多的农民选民，其减少的程度甚至比整个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还要快。共产党在工人中的选票的增长同工厂的规模有关。但是，党在乡村、城镇和城市人口稠密区所得的选票同全国的平均数大致相等。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经济部门之间的差别。1973年，法国共产党获得了公共部门中百分之三十三的工资劳动者的选票，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多，而在私人部门中只获得了百分之二十七的选票，比右派政党所得的选票少。法国共产党依靠公共部门（国家机构和国有化企业）获得选民、党员和领导人员，这种情况被称之为它的“公务员化”。

对法国共产党是阶级的政党这一说法的另一个保留看法是：如民意测验所泄露的那样，共产党选民的观点无疑是左派的观点，但是无论是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还是法国共产党的纲领，都不是阶级的观点。法国共产党选民并不需要

革命、也不相信党需要革命。他们中有十分之九的人热衷于遗产和财产；一半人为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辩护，说这是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甚至反对国有化。这些事实表明，共产党选民是其他左派选民的延续，这也符合这一理论：即共产党已经赢得了过去第二国际政党的一部分选举基地。就是共产党在那一选举基地以外获得了进展的地方，那些进展也是一瞬即逝的。

新阶级

如果西欧共产主义真是西欧社会主义内部的一种政治变种，人们可能会感到，当社会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导致出现新阶级时，共产主义可能被解除对这些新阶级进行渗透的武装。这些新阶级将成为一切党派竞争的对象。共产党如果在新阶级中缺乏社会主义的基础，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它是“它们的党”，它也并不是特别能够吸引它们的。西欧在1950年后的经济发展导致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来自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的大量移民工人这类准无产阶级，以及技术员和脑力劳动者阶级。从瑞典到意大利，共产党都未能渗透到这些社会集团中去。的确，共产党只要办得到，它便漠视第一个阶级，同时否认第二个阶级的存在。这种对重大的社会变化视而不见的态度导致共产主义影响的停滞，接着又出现1968年和以后在政治上的严重失败。这反过来又从内部动摇了党，在一派危机和政治异端的气氛中，党开始全力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毫无结果的它们与这些阶级的关系问题，先前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给它们提供进入这些阶级的通行证。

这个新的准无产阶级，只要法律允许它进行任何政治活

动,就很容易受当地极左分子的影响。的确,如果法律不给予这些作为外国人的低工资工人以任何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权利,如果工会漠视他们,如果工友们由于种族主义的原因歧视他们,如果所有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由于他们是非选民而屏弃他们,那么这些准无产阶级就提供了毛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当代的工业社会里所能够期望的唯一稳固的社会基础,接着就会发生未经工会许可的自发罢工和暴力行动,比如在瑞典、法国和意大利的汽车工厂里所发生的,这些活动使共产党大为吃惊。共产党人为控制这些运动而作的努力导致同极左派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些极左派在另一个新阶级—脑力劳动者(和那部分人的学徒,即学生)中同样也获得了意外的胜利,不过,在1968年骚动后的低潮时期,其他许多政党也都是如此。法国共产党尴尬地发现,它在这一阶级中获得的支持少得可怜,为了招徕顾客,举个例说,它在1969年建立了一个吸收“工程师、技术员、干部和中等阶层”的新的法国总工会,专门为这一阶级创办了一份期刊《现实》(不久即停刊),同时维护有利于这个阶级而不利于受极左派影响的工会所主张的平均主义的工资差别。这些措施中没有哪一项措施能成功地使党从这一新阶级中发展党员或者选民,因为共产党给它的是从属的地位,类似先前给予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农民和店主的地位,而不是那些认为技术结构业已在这个新的工业国家心脏中取代劳动和资本的人所说的中心作用。

受过专业训练的电子技术、实验室研究、电子数据分析、化学和精密机械方面的专家被真诚地邀请参加共产党,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党将仍然由过去做过工人的人和受过

法律和教学训练的中等阶级人士支配，他们将继续以老式的体力劳动者的名义行事。这种拒绝在党内提拔这些在经济方面新型的代理人（尽管这些人反对资本主义，赞成集体化以及在意识形态上赞成冶金工人和矿工，即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做法赶跑了那些本来也许乐意属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党”的人们。为了说明它们的态度是正确的，共产党起先否认体力劳动者数字绝对下降和脑力劳动者数字迅速增长这一统计上的证据。当它们承认后者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时，它们所给予这些脑力劳动者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工人阶级”的“联盟”的地位，也就是非资产阶级集团自列宁时代以来在策略方面的运用中所一直使用的那种机会。

当可以看出这个新阶级可能拒绝这种从属地位，并且如果它参加共产党或者与共产党合作，它就要在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方面享有发言权时，党内便出现了反对派。意大利的宣言集团和法国的罗歇·加罗迪向他们的党建议，党应该使这个由技术人员组成的新阶级享有多少是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平等的地位，承认他们是“新的历史集团”的成员。这个建议由于如下的论点而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起来了，即这些技术人员正“处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从而可以预料将能够被接受为是工人阶级的名誉成员，在拟定党的战略时可以获得比象农民那样的老“盟友”更多的发言权。这建议被党的领导人拒绝了，宣言集团和加罗迪都被开除出党。乔治·马歇明确地阐述了“新的历史集团”这种提法由于不正确而不予考虑的理由：

这种提法表明，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现在，一方面它完全不符合事实，而且在长时期内也不会

符合，另一方面它使得人们把工人阶级同杂七杂八的群众混在一起，并使人怀疑工人阶级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它的先锋作用。

同这一辩论同时进行的还有许多有关阶级的假社会学推理以及旨在维护(或相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概念的深奥的烦琐哲学。我们不需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因为且不谈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如何贫乏,我们看到,共产党并不是阶级的党。由于它代表工人阶级的少数并从其他阶级获得至少一半的支持,他们很可以象加罗迪和宣言集团所竭力主张的那样,适应西方社会的阶级构造的变化。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是由于政治的而不是由于社会学的情况,即共产党(如同在苏俄那样)是由不同社会出身的官僚控制的,他们以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名义行事,不愿意把权力让给乞灵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抢班夺权的人。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共产党对技术知识分子这个新阶级的态度,是它对待接受“另一种文化”的知识分子,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之有着长期交往的人道主义者和艺术家的一贯态度的继续。共产党一贯欢迎这种人,尤其是如果他们的盛名给党带来某种威望的话,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即知识分子必须服从体现在党的领导中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果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出身的那个阶级(通常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阶层的所有要求,甘当从属于工人阶级的“盟友”,他们甚至能够期望被提升到工人阶级的最高职位。“知识分子在党内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有地位,即他们甚至比其他激进分子更真诚地接受党领导人

的绝对领导,按照规定,党的领导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化身。”坚持要求知识分子“更真诚地”屈从,反映了政治家(也仅仅是共产党政治家)不信任那些曾想把党变成一个辩论俱乐部或空谈场所(如同政治家们所不耐烦地说的那样)、也就是说想继续做知识分子的人们。

尽管有这些苛刻条件,共产党还是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且往往还是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把这一情况归之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愿意在卑贱的工人面前卑躬屈膝的变态愿望。可能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理由,以使他们成为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些设想,以此来说明为什么对西欧社会、与美国的联盟、投资(被称作利润)的分配以及如象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共产主义传播最广的国家中总的社会生活提出严厉批评。但是如果智力的运用意味着关心言行一致、公开批评以及随意询问,那可能就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由来继续作一名共产党人了,因为这一切在党内是得不到的。因此,由于存在参加的理由而不存在呆在党内的理由,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的波动情况就很严重,甚至比工人还要严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能够为了“体验生活”而参加政党,这一点使得波动情况进一步加剧了。

在讨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吸引力时,人们必须区分在不同国家中极不相同的情况。一名意大利知识分子参加声称是代表整个可供选择的文化的大运动是一回事,而一名英国知识分子参加一个弱小和见异思迁的派别又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如果有足够的英国(以及今天还有瑞典和西德)知识分子参加了共产党,从而使知识分子在数量上相等于或甚至超过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的话。但是仍然不应该认为大

小党之间的这些差别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如同这样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即他们感到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从病理学上讲是“不正常”的，而加入共产党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则表现得几乎是正常的。（让—保罗·萨特盛气凌人地说：“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我就会加入共产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标准之间的差别在大党中可能和小党中一样大，而知识分子的活动和党的工作之间的鸿沟在大党中则肯定和小党中一样宽。更重要的是，官僚领导以工人的名义来维持知识分子的屈从态度所采取的手段确实是如出一辙，因此，这种经验最终也是颇为相似的。

共产主义对实行议会政治的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和对民主政体尚不巩固或者根本还没有建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倒是有明显区别的。这里分界线的一方是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另一方是北欧和西欧共产党（不管是大党还是小党），如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战后以来，对意大利共产党人以及甚至更为明显的是，对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党可能看上去是赢得民主和民权的工具。寄此希望而入党的知识分子，当他发现共产党不是这种工具的时候，就离开了共产党。相反，法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参加党，其目的常常恰恰就是为了显示他对民主和民权的藐视，他嘲笑民主和民权徒具形式和抽象空洞。当他把吸引他参加共产党的杰出人物论和“经济主义”与合于习俗的民主加以对比而发现了这种民主的价值时，他就离开了共产党。

这种差别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地中海各国共产党，包括意大利共产党也包括处于地下的希腊和西班牙共产党，比采取咄咄逼人的工联主义态度的法国共产党更

为成功地吸引了知识分子，并且给了知识分子以更多的活动余地。但是所有这些明显的差别在六十年代都被极左主义的浪潮淹没了。这一浪潮把大学中知识分子对西班牙党的支持一扫而光，其轻而易举的程度就如同它使瑞典左派一下子就卷进奇特的幻想之中，例如崇拜毛泽东的神奇的眼力。意大利共产党的宣言反对派基本上是个知识分子运动，它之所以攻击党恰恰是因为党与议会民主妥协。

列宁和斯大林都拒绝给予知识分子以任何独立的政治作用，由于机械地重复他们的经典观点，因而共产党对1968年5月份和6月份在巴黎达到高潮的世界范围的事件大吃一惊。这些事件表明，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正是独立的政治作用并且辱骂否定他们这种作用的“斯大林主义的恶棍”，科恩·本迪就是这样称呼法国共产党的。法国共产党本能的反应是强调它的工联主义态度，并且使受它控制的工人阶级分子不参加学生的示威活动。这种做法引起了党内的反对，但这种反对却得到苏俄的支持。1968年至1970年期间，《真理报》上的一些文章认为，最近的事件实际上为西方党创造了通过与知识分子的联盟来扩大它们的社会基础的“历史性的机会”。当然，苏联的理论家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必须维护的，但他们补充说，这点通过接受知识分子正在“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是容易做到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是作为同工人和农民平行的“其他社会集团”，而今它已开始被专门放在共产党试图吸引的被剥削者一类之中。

毛主义在西欧的衰落，部分原因是中国政策的变化，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类过分的行动很快就使得自己筋疲力尽了。这种情况使共产党人感到宽慰，但事实上并没有减少他们与

知识分子之间的麻烦。其他极左势力，特别是死灰复燃的托洛茨基主义，在此期间巩固了它们的地位，这就使得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是，莫斯科对知识分子的新路线要求各共产党对西方知识分子作出让步，而这又牵涉到要同莫斯科保持距离。为了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会”，赢得日益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西方共产党就必须在文学、艺术、甚至在讨论中采取与苏联政策截然不同的立场。

为此，它们匆匆放弃日丹诺夫主义，也就是放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正统的斯大林主义的名义对艺术和思想的专制统治——它是随着非斯大林化而开始放弃的。在贯彻日丹诺夫主义方面，意大利共产党从没有象法国共产党那样积极，法国共产党有它自己的日丹诺夫——洛朗·加桑诺瓦。法国共产党直到1964年才承认，党的领导在艺术、科学和哲学（但不包括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的问题上必须保持中立。这些让步体现在1966年的阿尔让特伊宣言中，这一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以后几年中一直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自由宪章。值得注意的是，阿拉贡于1966年实际上利用这种自由在《人道报》上抗议对辛雅夫斯基和丹尼尔这两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谴责。西班牙共产党也抨击那一谴责，不仅是以知识分子代言人的身分，而且还以它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身分作出这一抨击。

就是这种产生于西欧的共产主义但却独立于莫斯科的运动，从1968年起即不断向前发展。对西方共产党来说，苏联对索尔仁尼琴的审查和迫害以及1968年8月份以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的镇压给他们提供了向莫斯科表明争取知识分子

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机会。意大利共产党在这两个问题上就象阿拉贡的《法国来信》那样，同样是直言不讳的，但他们几乎都遭到莫斯科和东欧的谴责。确实，莫斯科通过禁止在苏联集团中出版《法国来信》以及迫使法共于1972年10月收回出版该书所必要的经费，使之被迫停止出版。但是这反而使法共（这次是由马歇出面）更有必要指责审查制度，为索尔仁尼琴辩护，并详细说明西方共产党人并没有从东方看到任何“文化方面的样板”，他们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自由的看法同在苏联行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正确了解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新路线，不能不回到西方党在早先缓和审查制度只是为了在政治气候改变时恢复它们的强硬路线。此外，对批评的权利仍然有种种限制，如压制《法国来信》以及拒不把隐晦其词地归之于苏联世界的“缺点”明说出来，其实就是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粗暴无情的迫害。最后，即便西方共产党人势必对事实更为了解，但是也不可能在非共产党人之前，斥责苏联的镇压暴行。只有在其他人谴责镇压事件以后，西方共产党才会说：“我也谴责嘛”——但是即便是这时，也不会对《萨米兹达特》进行谴责。尽管还有这些限制，不承认共产党现在以具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色彩的对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西方共产党对待绘画和建筑的态度变化特别重要，尤其是总的来说已不再反对形式主义和现代派的东西，因为这并不是明天就可以改变的“观点”，而是反映在党的建筑物、义卖市场、展览会和出版物上的实际做法。在要求政治和思想方面实行自由主义的同时，“爱好”的改变和容许进行艺术的试验已是不容置疑的现实了。

虽然,由于这些原因,知识分子在西方共产党内的处境要比以前来得舒服,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共产党吸引着并保持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党的态度的诚意是有怀疑的;而自从共产党失去了对资本主义批评的垄断权后,左翼的其他派别又一直同它进行着竞争;随着共产党变得更为自由化和更象其他政党,共产主义对知识分子的魅力也在减弱。这并不是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它将会变得很象其他政党,除非它修订一贯向受过教育的非工人所提出的基本约法。约法的内容是:共产党知识分子获得可以批评和分析西方社会的有利地位,而作为报酬的是,保证不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禁止探讨的三个主要问题是:一、苏联集团内部的情况,二、本国党领导的政治策略,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效力和对体力劳动和低级工业的推崇。

这三个问题并不是随意被选定,认为特别有意义的。它们涉及到西方共产党的权力和合法性的三个来源。正如下一章分析党的结构时所表明的那样,构成党的支柱的是:苏联的支持、党的官僚机构和工人阶级一部分。当知识分子赢得讨论这三个禁加探讨的问题的权利时,他们就会在党内拥有稳定的地位。在这方面,正如我们原来在关于传统的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应高于有技术的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辩论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仍然在为赢得讨论第三个问题的权利而斗争。然而他们还丝毫也没有赢得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权利。各国党的官僚人员在政治智慧方面仍然无容置疑,这就是说,它们仍然是列宁主义的党,党的领导垄断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利,而知识分子不容许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罪行,而是局限于要求上级来“澄清”这些问题。至于第一

个禁加讨论的问题，情况是多变的。首先，党的官僚人员，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和机会主义，本身也在试图重新规定它与苏联权力中心的关系，这样，它就容许知识分子对苏联世界进行某种讨论和提出询问，这在以前一直是禁止过问的。其次，西方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好几代以来所共有的关于苏联的秘密理论正在瓦解。由于他们把在党内的许多时间用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扼要地回顾它的一些原则。

当每一个人关切地了解到集中营、奴隶劳动、清洗、用欺骗手段进行审讯，灭绝种族的屠杀和斯大林主义时代（以及斯大林主义时代以后）的其他恶梦时，如果要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继续留在党内，甚至为党辩护，只要求他佯作不了解和不读资本主义的报纸，不相信非党员所提供的消息，那是不够的。其他党员可以不闻不问，但知识分子则不能。因为他们是了解的。不过他们同意在关于“被包围的堡垒”这个半秘密理论的基础上为共产主义辩护。所有这些恐怖都是资本主义包围，法西斯威胁，后来是冷战所引起的。必须了解，而且把这些事件与往事联系，也越来越容易了解，这就是：斯大林的暴政在许多方面是对明显的外来威胁的自卫性反应，而这些威胁据认为正危害着一个由于数世纪的压迫使人民愿意求助于独裁方法的国家维护其不稳固的新政体。这样来看就可以得出一个说得过去的论证。当然用这种解释说明许多问题，还必须从如下事实出发：苏联领导从1917年到如今一直是从有战争危险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局势，认为是一场敌对的双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实例。那就是说，他们首先是确信，他们处于一个“被包围的堡垒”之中，然后是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围攻者，并宣布国内处于战时紧急状态。

但是，从苏联历史的角度对斯大林主义作的这种辩解，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也不能为西方共产主义辩解。即使你相信它的每一句话，但是你最多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即你应该参加一个亲苏的友好协会或者采取象赛勒斯·伊顿或者阿曼德·哈默这些美国资本家，或者象夏尔·戴高乐这些欧洲将军的态度。你永远也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你应该参加共产党，除非你心目中有第二个秘密理论。在着手探讨那个理论之前，仔细研究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错误结论是值得的，那些知识分子把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解释为是由于苏俄社会和政治的客观条件，但是他们也为西方的斯大林主义辩解，而西方却不存在这种客观条件。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谴责斯大林主义，但是却给它贴上“个人迷信”这个可笑的标签来回避讨论其原因时，这种不合逻辑的说法就变得公开了。随后，西方共产党人异口同声地解释说，这等于回避探索真正的原因。陶里亚蒂、法共政治局和英共政治委员会一致认为：不从苏联社会中找出产生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原因，而是归之于个人的过错加以掩饰，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上是不老实的。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处境并不比赫鲁晓夫好过些，因为不管找到什么样的“社会原因”，那都是俄国的，而不是意大利的，法国的或英国的，因此也不能解释意大利、法国或英国的斯大林主义（不同于非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同情）。换句话说，一个西方人也许很可能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清洗红军和卫星国政府，是因为他以似乎有理的理由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一场迫在眉睫的突袭。这种看法是不可能合乎情理地使得西方人去参加本国的共产党的，因为该党根本否认有过这种清洗，但它在自己的队伍里确是搞过类似的

清洗、审讯和政治迫害。

西方人不会这样做，除非他也认为共产主义传播到文明的西方(为此暂时从苏联获得帮助也许是必要的)最终可能使共产主义解脱俄国，或者斯拉夫或者东欧的缺点。这就是使得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留在共产党内的秘密理论。对一个西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思想是完全可敬的，因为它来源于列宁。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以后不久，不仅曾估计而且还希望在比俄国先进的欧洲国家里将会马上发生类似的革命，那时，落后的俄国必将失去领导世界共产主义的地位。不管在1918年—1919年的动荡日子里这种希望有什么基础(此时建立第三国际恰恰是为了使这种基础具有内容)，但是当社会主义只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和苏维埃政权获得巩固的时候，这种希望就毫无基础了。为了维持苏维埃政权以便有朝一日它能成为其他地方更为先进、更为文明(因此也就反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的保护者，而同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秘密警察进行了合作，这种愚蠢的做法从中国和南斯拉夫到西班牙等国家都有表现。这种幻想最近的受害者是1948年的捷克共产党人。这些人认为，布拉格的政变终于导致共产主义在一个先进的、有文化的、工业化的欧洲社会获得政权，而在这种社会里，落后的俄国共产主义的恶梦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些捷克共产党人遭到陷害的时候，指挥审问他们的贝利亚的秘密警察就在那里帮助他们纠正这种错觉。

这并没有妨碍法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这里决不会发生的“纯粹是俄国的现象”而不予理睬。由于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企图与苏联政权保持距离，这个秘密理论就公开了。1972年恩里科·贝林格在

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共产主义现在承认，在东方遭遇到的“困难”，只是加强了“欧洲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也就是西方共产党的责任。他解释说，那种责任就是表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这部分地方可能是什么样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总有一天会把落后的俄国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的想法，使许多知识分子留在党内。由于秘密理论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主张，它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偷偷传播的秘密理论的魅力，而且在西方党现在和将来掌权（这还是有怀疑的）的时候依赖苏联政权的程度进行探究以后，就势必面对可能对它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

政治心理

在考察了共产主义与地区、年龄、性别、宗教、阶级和职业之间的关系以后，如果觉得仍然看不出谁是共产党人，那末，在关于政治心理的研究中，将也不会找到这个答案。大概没有人想要坚持认为，西欧几百万共产党选民是具有某种特殊心理类型的人，但是有人曾经作过努力来说明，共产党人是具有某种特殊心理类型的人。某些冷战文件极力渲染这些题目：共产党迎合了那些神经上持敌意态度的人的需要，或者“对那些无法摆脱这些令人痛苦的困境和混乱的人，共产党使他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自我形象”等等。且不谈这类文件没有对其他政党进行对比研究（诸如这样的研究，它也许表明，参加任何政党的任何个人都为他的“自我形象”而干了一些工作），它完全是建立在共产主义是古怪的东西这样的偏见基础上的。

没有什么理由要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分析共产主义或者

从心理学上解释人们如何成为共产党人或研究只是局限于对某些类型的人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西欧共产党人并不是病态的或是不正常的(即便从统计学上讲,在许多地区情况也不是如此)。如果西欧共产党人在党内的工作助长了某种正常的人的弱点,诸如毫不宽容和党派性,那它也增强了众所周知的人的美德,如英雄主义、自我牺牲、谨慎行事和献身精神。欧洲的共产党在独裁统治下提供了并且现在仍然在提供参与史诗般运动的机会,这种运动的规模遍及各大陆和几代人。共产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可以信任的理由”,并谴责现实的犯罪和不义行为。有同样多的和更多的话可以用来反对这种观点,但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如下的事实:当男男女女估量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决定往往不是根据个人的性格或心理上的弱点作出的。恰恰相反,至少在法国,参加共产党的决定是一个严肃的青年工人的标志,他正安顿下来,参加了标志成年的礼仪,表示在从乡村移居城市后要适应城市的情况,并且具有了男子气概和无产阶级的尊严。除此之外,显然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原因,由于这些原因,或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心情,人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参加共产党,而对这些原因的研究目前可能相当缺乏资料。

如果这里有什么奇怪的现象的话,倒是参加哪一个政党的问题,注意这一点也许会更有帮助。毕竟,只有少数欧洲人才具有如下的信念:通过担任委员会委员、通过决议、走访、卖报和乞讨选票来促进一项事业。而这些人则被其余的人看作是迷恋政治的牺牲品。当今,共产主义突出的地方就是它那种迷恋政治的最极端的形式。它是所有政党中政治性最强的党,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委员会最多,通过的决议最多等

等，而且还因为它把每件事都归纳为政治。共产党的路线可以广泛到包括每个可以想得到的问题。的确，如果共产党的纲领没有包括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如妇女、青年和犹太人等问题是经常被提到的）。西蒙娜·韦伊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纯粹的政治”。

因此，如果有人坚持要对共产党人作出心理上的描绘，那么想象一个任何肤色的政治积极分子就足够了：他全神贯注于起草决议、计算选票和派系斗争的劲头已达到了发狂的地步。除了他所支持的政策之外，共产党人就没有其他特殊的东西。因而，这个或那个党的“典型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就容易只告诉我们那个共产党想让世界了解的那种理想党员的类型，或者是那类最容易得到提拔（提拔到顶端，特别是那种被提拔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党的工作者的党员，因为他和党的自我形象是相符合的。实际上，一定存在着许多种类的典型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象成功地吸引了好几万甚至几十万党员的任何政党一样，给人们提供了可以发挥的种种作用和各种不同程度的支持。

换句话说，成为共产党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首先是明显的一种方式；人们可以好歹不同地做一名共产党人。其次，人们可以以不同的心绪成为共产党人，诸如由于本国的种种问题和不满，作为政治上的一种选择；由于在人们的环境中，这是随俗的事，作为一种“存在的”选择；还有因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作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最后，在党内有各种不同的作用可供选择，人们根据自己的才能，但是也随着党的策略发生变化，按照党的指示来进行选择。

其他政党也有这些情况，但仍然要注意共产主义的某些

特点。大致说来,各个政党都要有一个积极分子的核心,周围围着一层一层不同的人,最外面的是同情分子。就共产党来说,党员大部分时间,也许是绝大部分时间用来试图说服其他共产党人向中心靠拢:变得更为积极、更有“阶级觉悟”,参加支部会议,发展更多的新党员,出售更多刊物和持续不断地缴纳党费。当然,这些努力大部分是无效的。因为除了在象抵抗运动时期的情况之外,在平常时期,大多数人拒绝接受共产党人所特有的那种迷恋政治的程度。因此,所有共产党的共同牢骚是: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党员参加支部会议,而参加支部会议被认为是一个党员的基本条件。至于积极分子的活动和捐款,牢骚是:“都是一些老面孔”。经常鼓动党员政治化的做法使党内生活具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行轻浮的气氛。意大利共产党推行的政策的目的是吸收它的同情分子,通过向几十万选民发党证的方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然后就不断地向这些人唠唠叨叨,要他们在党内表现得更积极一点。

叙述一下成为共产党人的各种不同心绪是有用的,因为它指出了大家熟悉的各种“典型的共产党人”的类型。传统的雅各宾派地区是由于政治的心绪,红色地带的工人是由于存在的心绪,学生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心绪。不能毫无遗漏地把这些心绪一一列举出来;也无法衡量它们的流行程度,而且它们也是重叠的。因此,不管心绪如何地富有暗示意义,它也归入企图把政治选择变为个人性格特征的努力一类。

与此相反的是,人们倒可以精确地描述党要求党员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富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且是根据它的政治行动的作用分配的。角色包括(或者,我们将看到,过

去经常包括):职业革命家、群众领袖、工人鼓动家、阴谋家、民众保护人、民主战士等等。不持同情态度的局外人用心理学上的名词来描绘他们,而且经常是以挖苦的语调,如“虚无主义的”、“圣徒”、“历史文化无情的破坏者”、“新的、有人道的社会的催生婆”、“斗志旺盛的守纪律的战士”、“哲学家—神学家”、“善于讲解、解释问题的老师”。实际上,这些并不是他们的心绪状态而是党的领导在一系列历史情况下所决定的党的路线。然而,有一个心理上的要点要加以注意,这就是,共产主义在西方党中间过去经常是奇特的,因为它根据列宁主义关于策略灵活性的理论,经常突然改变政策。这些变化在党员看来是出其不意地从这个角色转变为另一个角色,例如从阴谋家的角色转变为社会民主派的角色。这种反复无常或者随心所欲证明,从心理学上讲它是许多党员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就出现了波动的现象,但它却给其他少数人提供了大权独揽这种使人神往的幻想和从无法摆脱的负担中迅速恢复过来的快慰。

自从列宁最初为他这一新型的政党提出全副本领以来,所要求作出的反复无常的程度和提供的角色的数目都已经大为减少。列宁的《怎么办?》中提到的职业革命家的角色,在西欧民主国家,或者甚至在所有的独裁政治国家中,已不再有用。西班牙共产党人正如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需要同天主教徒和许多右翼分子合作,而土耳其共产党人也正如法国共产党人在戴高乐统治时期一样,需要客观地同统治政权合作。早在斯大林时代,严密组织起来的一支军队中有纪律的骑兵这一角色,已使各种各样的列宁主义者角色黯然失色。然而,在今天,那角色已为西欧共产党人所否定,说它是“中国式

的”。相反，现在是议会民主派、工联主义者和党的组织工作者显得突出了。其原因将在叙述党的政策时加以说明，但与对党员的性格的考虑无关。

只要个人性格支配(或者还不只是支配)种种政治上的党派所属关系，政党的党员就形成某种性格。任何一个政党内的活动就形成为党派性，而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是这样，因为它的政治性特别强。共产党还形成其他一些性格。但在描写这些性格之前，有必要强调，人们不是说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如此(更不是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的原因)。首先，人们必须记住波动的现象：大多数人在共产党内的时间太短了，以致没有在这些方面受到影响。下述个人性格和思想习惯是党在那些长期呆在党内的党员和特别是那些在党内不断得到提升的党员身上所培养和发扬的性格。

敌情观念：一切政党都培养识别特殊的敌手的能力。不管敌人以什么伪装出现，都可以把他鉴别出来，并带着仇恨和蔑视予以穷追猛打。在这一过程中，党给党员提供了发泄好斗和猜疑情绪的体面的场所。极右派和共产党培养这种对敌人的辨别力的劲头特别大。这就促使残酷、不宽恕和报复这一习惯成了共产党的特征。例如，在抵抗运动期间，法国共产党就是唯一的不顾戴高乐明确和合理的指示而赞成把德国人处死的一个政党；而在解放的时候，它又毫不妥协地搜查通敌分子，其坚定性超过了所有其他政党。这些战时的不良倾向在长期的和平阶段也一直保持着，因为对共产党人来说，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平，因此军事上的敌情观念，还仍然是合理的。“敌人就象撒旦，总是给人带来最严重的威胁，但也总是被征服和被消灭。”对诸如帝国主义、大西洋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

类千变万化的敌人充满敌意的文章占了共产党著作的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特别强调要在非党人士可能不会想到也存在这类敌人的地方“揭露”他们。“喔！狗杂种”确实已经成了每一件事情的日常答案，成了通行语，从头到尾，无所不包。对别人所完成或没有完成的任何任务，总是不可避免地以“喔，狗杂种”来加以评论，判断和嘲笑。

警惕叛徒：政党需要培育一种集体精神，其表现就是党性和忠于党的观念，因此，对背叛者就十分嫌恶。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莫斯科和布拉格审讯就是例证，不过，西方共产党内也存在这种情况。那些公开退党或被开除出党的人要遭到报复和污蔑；如果他们胆敢打破沉默，在报纸或无线电和电视中发表讲话，或者只不过是被别人所提及，这种报复也就往往要加倍。如果这个人有点名气，“资产阶级”报纸肯定要就此做文章，法国共产党开除狄戎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于是，这个叛徒的罪名就确定无疑了。党内每一个人象害怕麻疯病人那样害怕这个叛徒，人们甚至连对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必须回避。如果这种态度确实已在缓和，法国共产党员就可以冒险同离开党的人谈话，这将是党的道德观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西方各个共产党近年来一直没有利用对叛徒的另一个职能——谴责背叛的领导人来掩盖党的路线的改变。党的纯洁性和绝对正确性可以用如下辩护手段来维护，即表明党的错误是警方特务或法西斯主义渗透到领导阶层中所造成的偏差，法国共产党的巴尔贝—塞洛尔事件和狄戎事件就是这样。但是由于党员都有档案，对叛徒疑神疑鬼的心理状态就一直在起作用，这导致了党员相互进行监视，每人都认为对方是潜在的叛徒。这些档案根据布尔什维克的

传统,只包括无情的批评,而且是以对他经常进行的细心观察为基础的,这样做所依据的原则是:“开始受到怀疑的人已不再是忠诚的党员”。因此,微不足道的错误也有潜在的重大意义。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地反对警惕性高的、不犯错误的党,但是这也加剧了犯罪的感觉,这种感觉导致共产党人当着其他共产党人的面受审时的精神崩溃,这一情况在西方党内同在布拉格一样严重。

合适的谎言,不合适的真相:把军事思想运用于政治的方法来自列宁。列宁说过:“哲学是用其他方法进行的政治。”因此,就可以有真相政治,就可以有需要以战术谎言来加以辩解的战略真相。自然,共产党人并没有创造做好事时讲谎言的观念(基督教教会长期以来一直运用这种谎言观念),但是由于他们把每一件事情都政治化,然后又把政治看作是同无所不在的敌人进行的军事战斗,他们就推广了把事实从属于其他更为重要的考虑的做法。存在着一个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在同凶恶的敌人进行着斗争,又受到它自己的叛徒的危害:你说的任何话也许都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它。你说的是否是真话这点无关紧要,因为有一大堆渺小的真情使资本主义的巨大谎言到处流传,有着渺小的谎言就可以帮助共产主义的巨大真理推广。因此,事实就变得从属于这样一种考虑,即人们“绝不要让敌人舒服”,“绝不要使比扬古感到沮丧”(比扬古是巴黎郊区的工人聚居区),“绝不要在客观上成为”某某的“帮凶”,“绝不要上‘那种’挑衅的当”。当赫鲁晓夫1956年的报告证实,斯大林实际上犯了西方共产党人一直予以否认的罪行时,有些共产党还坚持说,他们做错事也是对的。

秘密联络：许多集团，从家族开始，都有其秘密、暗示和暗语，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所谓秘密联络。由于西方党最早的样板是在沙皇压迫下进行活动的非法的革命政党，它的这些特点就比有着民主历史的国家中的政党更为明显。保密、行话、奉若神灵的术语、故意的无知和暗喻都是共产党人密切契合的形式。有理由可以认为，随着共产主义计划在西欧看上去越来越没有什么道理，这些特点就更为明显。这样，保密和无知就充当了使党与性质不同的环境相隔绝的屏障。保密在芬兰党内是明显的，但在据说是更为公开的意大利党内，这也是一种习惯。意大利共产党在1959年以前一直没有透露陶里亚蒂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而他的辞职也保密了十八个月。保密不仅仅是对局外人而言，对党员也是保密的。关于党的情况是政治局的财产，因此就不是所有党员的财产。

这种缺乏情况交流的状况由于运用行话而加剧了。虽然看上去似乎令人奇怪，共产党人在他们自己当中确实也运用他们在同敌人谈话时所用的行话。同一个党内的共产党员用这种方式进行交谈，各党用这种方法交流情况。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生活在标语口号的世界里，在这一世界中，语言是与世隔绝的、如疯似狂的（譬如说，每一件事情都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征候），因而最终也是提供不出什么情报的。这种行话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经常重复一些奉若神明的语言：如“垄断企业”（这指的是相互竞争的企业），或者“群众”（这指的是共产党小团体），或者“西欧工人阶级”（这指的是共产党）。这些神明般的话起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普及化和使马克思主义词汇学带上感情的色采，不过也有人暗示，这里也运用了巴甫洛夫的

“条件反射”。如果人们回想起斯大林时代如何突出地过高估价巴甫洛夫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唯物主义心理学,而弗洛伊德是唯心主义的心理学),这一暗示就不是荒诞的了,鉴于在共产党进行审讯时也是有意识地运用巴甫洛夫的技术,那就尤其如此了。

共产党人的意见交往由于运用含沙射影的暗喻而进一步复杂化。既不指名道姓,也不说明政策,连哪一个党也不指明,遭到指责的人是无从知晓的,或者是用了据认为观点与其相同的别人的名字(例如,中国人被称作阿尔巴尼亚人)。这种作法就可能导致共产党人之间出现虚假的协议,然而却是真正的分歧,因为虽然在所有集团中暗喻的作用是把懂这种诀窍的人同不懂的局外人区分开来,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了,以致有时他们相互之间也互不了解。举例说,十几年来共产党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中苏分裂,然而对这个问题,总是如荷兰党所说,“抽象和空洞地”予以讨论,以致谁也不懂。这一坦率的供认出自保罗·德·格罗特(最老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之一)的党之口,那是令人吃惊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荷兰共产党去攻击某个神秘的“现代修正主义”,而又不指明是指莫斯科。丹麦和意大利共产党人也承认,他们不了解中苏分裂的情况。其他党则出现了混乱的迹象。

凭籍非共产党的情报来源可以弥补保密、行话和暗喻所造成的危害,但是故意不了解局外人所说的事情,则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必然感到无法再不了解每一个人都了解的有关其党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情况,这样,他们的假装不知就可能被看作是故意自欺欺

人。但是有许多其他共产党人，尤其是工人和积极分子，不愿意阅读资本主义报纸关于 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或者 1968 年对布拉格的镇压的报道。由于党的报纸不报道这些事情，或者报道得很少，他们仍然一无所知。配合这种无知的是共产党内没有横的联系。如果这个大区同另一个大区而不是同中央领导打交道，或者如果这个支部的党员与其他支部的党员来往，就会被指责为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或者甚至是反党的活动。依靠垂直联系加深了这种无知，维护了秘密联络。关于秘密联络，问题在于这种方法远远没有正常的联络有效。因此，由于刚才所说的所有这些理由，共产党是政治上的重量级拳击手，行动缓慢，反应迟钝。就党的新路线所作的秘密决议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传到党的最底层，此时，新路线打算对付的选举或政治危机早已过去。西方的共产党领导人现在承认，假如他们的党作为西方政治的参与者，而不是作为完全的反对者，他们必须增加党队伍内的思想交流。

黄金时代：对革命的信念，就象黄金时代将会到来一样常常被歪曲为是共产党的一种谬见，因此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一态度在西方共产党人中已大大改变了。斯大林主义是共产党内政治魔术的最后一次折磨。上面提及的共产党精神分析学家相信，征用垄断企业就会造成色情社会，这种人在今天就是怪人了。然而，如果人们估量共产党纲领的实际精华，也就是使业已“混合”的经济有更多的工业国有化，据说国有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人们必然怀疑，是对政治魔术的一种爱好在起着作用。

个人崇拜：雅克·福韦说：“崇敬是共产党人的一种激情”，的确，党表现出非常喜欢个人崇拜，喜欢膜拜英雄，喜欢

“个人迷信”。作为一种精神病症，人们也许了解，斯大林或毛对西方人（特别是对崇拜权力的知识分子）有多大魅力，但是对象莫里斯·多列士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这样的根本没有领袖所具备的超凡魅力的人也一味奉承，那就难以理解了。这个问题将在下面叙述党魁的职责时予以探讨。这里只需要注意到，党在培养这种感情，即党就是家和藏身之地，你无法逃离这个家和藏身之地而又不会变成孤儿，党充满了手足之情，这种情谊不需要你脱离你真正的家，而是包含了你的家，是个大家庭，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对父亲的尊崇是理所当然的。除了对象热情之花（西班牙党的书记，后为党主席，她居住在莫斯科的时间是如此长久，以致后来被叫做领养老金者^①）这样的女领袖的母亲式的崇拜外，还有对领袖的妻子的崇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个典型，它在提到诸如种族灭绝这类较轻的罪行之前提到了斯大林对列宁妻子的粗暴态度。这种作法也传到了法国共产党，侮辱让内特·维美徐的行为在党内是一种罪行。近年来诸如此类的尊崇的程度已有所缓和，但是在共产党的事务中还是经常出现，因而人们不愿得出结论认为个人崇拜已消声匿迹。

没有同志情谊的同志：共产党人虽然相互称呼为“同志”和“你”，曾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常常抱怨说，党内没有同志情谊，没有友谊，只有表面上的亲热，而这种亲热还伴随着政治上的相互监视。即便是内兄弟或亲兄弟之间的友谊也被怀疑为是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这也加快了党使新党员感到失望的速度。有些人是抱着寻找友谊的希望参加党的。不管他们

^① 指伊巴露丽。“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与“领养老金者”（La Pensionaria）两词，在西班牙语中只有一个音节有细微的差别。——译者

寻求的是在城市生活常常是困难的处境中单纯的人类温暖，还是通过社会主义可以获得的人类兄弟情谊这一范围比较广阔的概念，共产党通常都使这些人感到失望。相互监视的气氛，档案的准备（据说准备档案是为了帮助挑选可以提拔的积极分子）以及把人类的每一种关系都使之政治化的做法，都排斥了同志情谊。

三、共产党内的组织机构和权力

1920年，第三国际为接纳各国共产党加入这个组织制定了二十一条条件，其中一条规定各国共产党必须采纳列宁所创建的党的组织机构体制。这种组织机构的主要特征是：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并具有铁一般的纪律，这种纪律通过复杂的等级一直贯到基层组织的党员。西欧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种严格的列宁主义组织结构。但是，纪律、中央集权和严格的命令对于少数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者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些人认为这样的组织机构有助于克服欧洲社会主义的一些弱点：易闹分裂，宗派斗争以及同其他党派搞无原则的妥协。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仍然用这些理由来为列宁主义的组织机构作辩护，特别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性、团结和坚韧性最差的那些地方，即意大利和法国。所以，对于共产党纪律之所以过分和严酷，必须经常从那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者极其缺乏统一性、组织性和原则性这个背景来加以考虑。就是在反对那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在左派中间得到了发展。组织和组织机构是共产党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尽管陶里亚蒂否认党的组织机构是共产党比社会民主党唯一优越的地方，但是每当象加罗迪、欧内斯特·菲舍尔等共产党人表示反对党的组织和组织机构时，他的回答是严厉的：“我们党全部历史的特点，就是在组织问题上同

社会民主党习惯势力的残余作坚决的斗争。”

实际上，认为只有团结统一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生活的变革，这种概念纯属偏见，就象过去基督教新教信念无纪律的多元化反抗天主教的静止统一性同样是偏见一样。社会民主主义在混乱、争执、宗派活动和机会主义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中，给西欧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相比之下，列宁主义机器没有起什么作用，它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学者们常问：除了列宁主义者自己的梦想和他们的对手的诽谤以外，它给西方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把列宁主义模式的绝对集中的和有纪律的组织机构说成只不过是西方党内的一种表面文章，那未免言之过甚。但是这种机构一再被危机所动摇和被无纪律的浪潮所破坏。再者，共产党人对于党的组织机构的教条主义的迷恋，已经使他们钻进了组织问题的牛角尖中，这种情况同社会党人的无纪律一样，对提高党的政治效力是个很大的障碍。

上述看法为概要介绍正式的党组织机构作一个开场白。这个开场白向大家表明无须把共产党的组织机构看得太认真。因为第一，正式的组织机构掩盖了共产党内力量的真正动力，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论述。第二，磐石般的团结的神话难以掩盖党内存在着各种思潮和宗派以及在佯称一致同意的背后存在着权力斗争和意见冲突的现实。

意大利共产党可以指着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奴隶般的党员向青年们夸耀它的斯巴达式的民主，但在它的党内生活中，势必反映出那种多元化社会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立场和利益的特点。而近十年来，在这个多元化社会中又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益增多的纷争。

对于党的组织机构的迷恋，结果形成了我们在共产党的阵线组织和在共产主义心理学中所看到的政治顽症的另一种症状，这就是维多里尼所称的“共产主义文化中政治过于饱和的现象”的一部分。关于党组织的行政管理问题比之于“意识形态”，即关于政治的伦理实质问题要占优先地位。一个臃肿、复杂，迟钝冷漠的组织机构终于造成党在政治上的瘫痪。当不同政见的思潮在党内发生冲突时，真正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就成了那种在两者之间谋求保持中立的官僚主义分子，以便保存这种列宁主义的工具能在遥远的某一天达到它的目的，但是，那一天是永远也不会到来的。1962年德格里·埃斯波斯蒂在谈到意大利共产党内发生的这样一次意见冲突时说：

陶里亚蒂站在那两种不同的立场之间，持怀疑态度的陶里亚蒂不支持任何一方。对他说来，真正重要的是党的磐石般的团结，他个人的独裁主义的控制和严格地维护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必须在党内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委员会里实行专政。问题在于要有一个严格的组织机构，这种机构能使党在其政治战术需要采取更为灵活和明朗的态度时，保持它的革命潜力不受损害。……陶里亚蒂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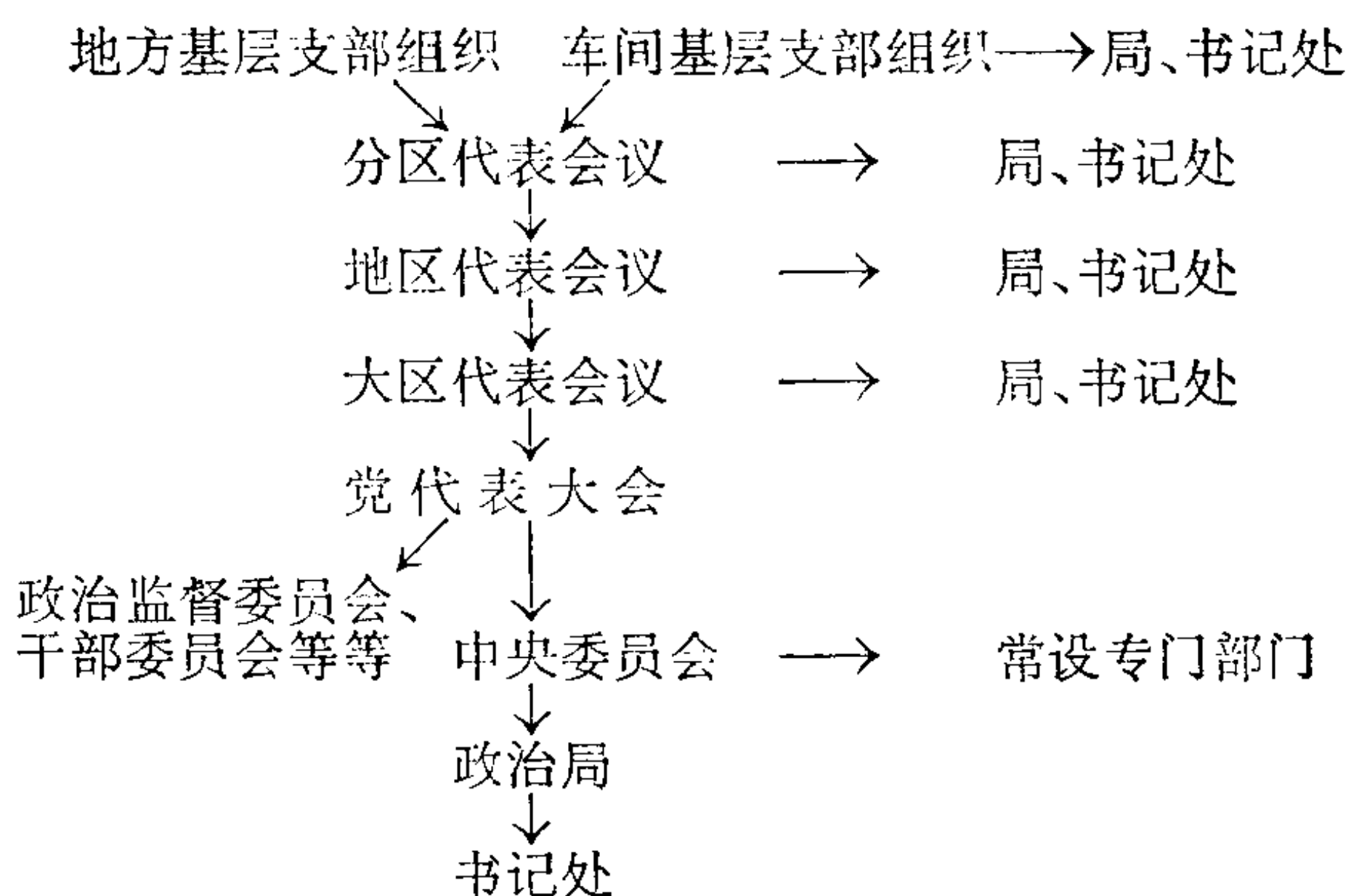
政治本能的过分膨胀，就会导致人们忽视政治宗旨。欧洲的历史在外边无声无息地流逝着，革命组织，即党的机构的管理工作却成了特权者的占有物。官僚主义的机构变为自治的组织，其最终目的即政党却变为一个十足的空架子和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某个新的组织或者一个新的委员会里，都能看到它们对每一个政治问题的解答，但是，它们的作用并不是讨论问题和一些可能实行的方针，而是执行命令。斯大林的

下述观点是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所在，他说：“统治不是写决议，发布命令；统治是要掌握这些指示的执行。”多列士引用了斯大林说的话，他说：“一旦政治路线确定之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包括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成败命运。”人们也许会认为决定成败的因素在于政策的性质，在于它是否恰当或受人拥护。但是，对于共产党说来，组织问题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政治问题。党的政策不经过讨论或者修改便公开了，留给政治家们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组织工作，即说服人们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所以“当党遭受挫折时，往往就机械地归咎于组织工作上的缺陷，而不归咎于政治上的错误。于是这些缺陷就成了强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题材。”修正主义者的鼻祖伯恩斯坦曾经说过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共产党人是头号修正主义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党就是一切，而革命是没有的。

正式的组织机构

一个规模庞大的共产党的正式组织机构已在组织机构图中表明；一个较小的党则具有较少的相当于地区和大区的中层组织。后者的组织划分通常是和国家的行政区或选举区相符合的。理论上是每一级选举上一级的组织。而事实上，要了解组织机构图的最好方法是把上述的选举次序颠倒一下，并且把“选举”改为“由上级指派”去理解（除了吸收新党员以外）。如果各级组织都能真正的选举上一级组织，那样就可说是民主了。但是共产党实施民主集中制，这意味着各级组织的代表都是由上一级组织提名指定的。有权提名或者指派的这一级组织就派人参加举行“选举”的下级组织的会议，而这些

人就可保证他们所要的人能够当选。这种情况甚至同样适用于定期举行会议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党的代表大会和常设中央委员会，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下文中对这两个机构同其他中层机构一起加以讨论的原因。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基层支部组织的作用；再看看挑选和训练中层组织代表的方法；然后看看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政治局和书记处。最后我们必须看一看在组织机构图中没有列出的三个机构，即党的秘密机关，党的头子和财政机构。



基层支部组织

最早的法国共产党员被称为“基层成员”。他们巧妙地组成的基层支部组织打击了社会党人。在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基层支部组织是共产党肌体中的基础成分，因为它既是培养党员干部的工具，也是党的领导借以指导和鼓动党员的工具。建立车间基层支部组织的目的特别是为了使共产党同那些按地区建立组织的旧的社会主义政党有所区别。车间基层支

部组织将体现和保持新的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且会成为同另一股活跃在车间的势力——职工会进行斗争的工具。

事实证明这种基层支部组织是难以适应西欧的土壤的，特别是车间的基层支部组织。在新资本主义使人眼花缭乱的情况面前，车间基层支部组织已呈现出萎蔫的迹象。各国共产党宣称拥有成千上万个基层支部组织，但其中的大部分组织徒具虚名，更多的基层支部组织只不过偶尔开一次会，而把大量的工作丢给少数的积极分子去干。不过，这样的基层支部组织还是起着列宁所期望的作用。并且共产党是以此组成的。没有这样的基层支部组织，那就不会有共产党。如果这些基层支部组织失去它们独特的性质，成为同西方其他政党非常相似的政党，那么基层支部组织的衰退将标志这种演变的开始。

一个基层支部组织最少由三个人组成，通常当它的人数超过三十人时，就要分成两个支部。不过，在法共党内有六十人的基层支部，意共党内一个基层支部组织有一百个甚至更多的成员。基层组织一年选举一次支委会、书记处和其他干部，由这些少数积极分子参加大部分会议并进行日常工作。基层支部组织的职责是定期地召开会议，贯彻上面下达的各项指示，特别是开展党的运动，印刷一种油印的基层报纸，在当地推销党的机关报，吸收新党员，批评落后的党员，筹集经费（他们除了向大区的组织上交规定的数额外，可以留下全部余款作为他们自己的管理费用），并且讨论党的事务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一个共产党员如没有得到他所在基层支部组织的同意，在其他任何地方不能讨论这些问题（甚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党内其他场合也不能讨论这些问题）。基层支

部组织一直是开展一切辩论的场所。有时他们邀请党外人士来向支部会议做报告,不过通常他们的活动是不公开的,至于他们密谋策划的活动就更是如此。

讨论的水平在各处是各不相同的(在各个时期也不相同,这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一阵积极的一阵冷淡的浪潮),但是如果你认为共产党只是表决机器,这些基层支部组织的成员不过是一些唯命是从的傀儡,那你就错了。恰恰相反,在有些基层支部组织的会议上能展开坦率的意见交锋和批评党的决议,这种激烈的辩论往往持续到凌晨。他们在辩论时并不回避一些敏感的题目,如中苏分裂,或者苏联侵捷事件。至少,在“资产阶级报刊”已经讨论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就不回避讨论这些问题了。在七十年代,在法共和意共的基层支部组织里,一般性政治讨论的自由显著地增加了。由于各个基层支部组织之间实际上缺乏联系,领导上对于那些讨论也不必感到任何不安,同时,在通过用上级指派代表的办法去仔细地贯彻上级的意图的情况下,那些危险的思想也就不大可能传播开来,一份反对派的报刊指出,即使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基层支部党员能够坦率地反对法共的政策,党的领导仍然会声称它得到党员一致的支持,而不怕有人提出质问。不过,要是基层的讨论出现了普遍的反对意见,那么人们就比较有理由指望党的领导作出回答。

在选举期间,在党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时;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或开会期间;在党遭受到党内危机的震动时,基层支部组织的活动就大大地增加。但是基层支部组织所付出的大部分精力、热忱以及社会活动能力是花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上,而这些也只是为了使组织本身的活动能够进行下去。只有当

党员们对他们日常行政事务，吸收新党员和筹集经费等工作的最新情况有所了解的时候，他们才会停下工作问道：下面该怎么办？正是在这种时刻，上级才下达指示，以指导基层支部组织的政治工作。不过，如果基层支部组织愿意的话，它还是可以自由地选择它的议题的。通常他们很快又重新陷于行政事务之中，并回到征集人们在党证上签名之类的工作。意大利的基层支部组织有时大部分由年轻人组成，因此喜欢开展吸收妇女党员的活动。同意大利社会运动中的那帮“法西斯分子”的争吵，同新秩序派或者一些同样性质的右派集团的争吵成了基层支部组织另一种经常性的事务。

为了努力使列宁主义的基层支部组织能适合于西方社会，各国共产党曾进行了反复的实验。意共有妇女的基层支部组织，意共，还有西柏林统一社会党都试图搞青年基层支部组织，但是意共的妇女基层支部组织变成了闲聊俱乐部（正如瑞典党的基层支部组织被称为“啤酒俱乐部”一样），青年基层支部组织则有成为党内之党的危险。因此这两种基层支部组织都被解散了。作为法共争取在1973年达到两万个基层支部组织（1972年12月有一万九千五百十八个基层支部组织，其中五千三百七十六个是工厂的基层支部组织，八千九百十七个是地区基层支部组织，五千二百二十五个是乡村基层支部组织）的运动的一个措施，党决定基层支部组织可以按居住区（即住房管理机关划分的街区）在机关、学校、大学里设置。在庞大的意大利共产党里已经接近消失的工厂基层组织，现又重新大力组织起来，这不是仅仅出于上述的列宁主义教义的原因。小小的德共就有四百零八个基层支部组织，它们出版每月印数五十万份的几种基层报纸。党把基层支部组织看作是同拥

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取得“基层一级的团结”的一条渠道，也就是说，它们是政治竞争的工具。法共在 1968 年后试图成倍地增加它在工厂的基层支部组织（1961 年有三千八百个，至 1971 年底，有五千二百个），并使它们活跃起来，这是为了应付极左分子以及后来应付社会党人在影响工人方面的挑战。工厂的基层支部组织的工作还包括要密切注意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的活动。在工厂的车间里，即使是隶属于法国总工会或意大利总工会的一些工会组织，也远远不是共产党所能控制的，所以各国共产党认为在车间里安上他们自己的耳目是非常有用的。关于号召增加基层支部组织并恢复它们活动这类事情，在党的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因此，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当前的那种意义上的活动会取得比过去更多的成功。

对一个有着电视机、度周末假期者、小汽车，以及用类似的方式度过余暇的社会来说，党的基层组织正在变得日益不相适应。同样，它也不适应于一个较少政治义务的时代，甚至对共产党人也是不适应的。有必要回顾一下，这种衰退是从一个高峰下降的：以往共产党人经常把他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从事党的工作，而如果他们现在大大减少花在这方面的时间，他们仍然比其他西方政党的成员要更为积极。现在的事实是大多数人不再那么积极了。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只有百分之十的党员出席分区召开的会议，芬兰共产党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党员参加基层支部的活动，在法国共产党党员中参加基层支部活动的也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马歇承认，1973 年法国共产党有些基层支部组织一个月开一两次会议，但实际上许多基层支部组织一年只开一次会来选出能在其余的时间中去指挥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基层支部组织的报纸有时一年

仅出现一次。

各国共产党已勉强地适应这种形势。在六十年代，瑞典共产党公开降低了基层支部工作的地位，现在大多数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成员的组织关系不属于基层支部组织，而是属于高一级的组织，即地方组织或分区组织。法共已经从党章中取消了关于基层支部组织必需开展有战斗性的活动的规定(党员个人活动除外)，意共实际上已经使它的基层支部组织消失了(意共基层支部组织最多时达到五万七千个，现在仅留下“几千”个，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在活动了)。现在这个党是按分区组织起来的。每一个区有一千多名党员，并且每两个月只开一次会。掌管这种组织的是少数几个人，可能是七、八个积极分子，他们一个月开几次会。显然，这就是从设有基层支部组织的列宁主义政党变为设有选区组织的普通政党的一种过渡，也就是把在斗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变成了以选举主义作为基础的党。在听到说有一个分区的一百六十多名党员中只有十到二十名是在积极活动的时候，阿耳多·纳托利在这个分区党组织的一次会上大声疾呼：

这样一个党是否符合列宁主义的党的观念呢？按照党章规定，在巴耳杜伊诺分区有一百四十名同志不能算党员，因为他们并没有在一个基层组织中积极参与活动。这种情况在罗马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而且在全党内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许多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已经不存在了。

纳托利看到，鉴于党员数字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列宁主义所理解的那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增长，这种情况对意大利共产党的选举成功问题就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今天，党的真正有组织的力量是非常微小的，而且我们正在目

睹一个连续衰退的过程。意大利已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但在党内却没有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今天，曾经在十五年前存在的那种同群众的直接联系已大为削弱，这种联系几乎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能看到。我们所强调的是代表公众舆论的党的特点，而一个具有战斗力与斗争精神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我们已经削弱了。

在西班牙，基层组织也许被人们认为象在沙俄时代一样，是非常适合于秘密活动的需要的。1960年左右，西班牙共产党修改了党章，取消了关于新党员必需隶属于一个基层支部组织的规定。这一修改被认为是吸引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党的做法。然而在农村也是这样，在那里西班牙共产主义的力量很薄弱，因为那里缺乏社会主义土壤让它生长，基层支部组织被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组成的松松垮垮的团体所取代。这些团体的成员就象其他农民一样，分散在西班牙农村集市的附近，无所用心，在他们的周围也仅仅是一些同情者。

奥古斯特·勒戈尔曾经预见到这样的发展，他作为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在这类问题上受到法共内部的指责。他们推行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成为他在1953年垮台的原因。勒戈尔原来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矿工，在西班牙内战以及抵抗运动中表现出颇有组织能力，在1942年被雅克·杜克洛选派到领导岗位上。在解放时他当上了朗斯市市长、议员，共产党参加政府后，他又当上了煤矿部长。1950年某一天，莫里斯·多列士告诉他，打算要他担任党的组织书记；数月后，党中央批准了“选”他为组织书记的决定。他在这个棘手的岗位上干了四年。当他知道了他将被撤职时，他显得很不在乎，就象当年听到他被任命为组织书记时一样。在以一种不适当的

不肯悔改的方式进行了自我批判之后，他离开了党，并且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他用他以前担任党内工作时所得到的全部根据，指责围绕在多列士和他的妻子身边操纵法国共产党的一小撮官僚集团。他后来的活动使他从社会主义政党转向右翼反共产主义方面去了（在一次社会党的会议上，他被一个共产党突击队员狠狠地揍了一顿）。

在勒戈尔被撵走时（此事发生在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垮台后不久，勒戈尔可能同贝利亚有秘密联系），堆在他头上的罪名之一就是日丹诺夫主义。确实，勒戈尔从来不会由于自己的无知而妨碍他按照党的路线去要求画家和作家，其他领导也是这样做的，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在勒戈尔被撵走后，他们还继续这样做。莫里斯·多列士煞有介事地暗示，他的心腹和宠儿勒戈尔曾利用其担任组织书记，掌握着党的机构的职权，绕过政治局和书记处，“企图在我未死之前，就把我干掉”。不过这个直言不讳的一纸指控是以一封信为依据的。这封信是1951年以不寻常的个人名义（即“党的书记奥古斯特·勒戈尔致各基层支部组织的书记和司库的一封信”）发到各基层支部的。信中谈到了那些不参加基层支部组织会议和不及时认捐党的基金的信徒们，信中说：

政治指导员的职务是由一些具有最高度政治觉悟的基层支部组织成员担任的，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应是为那些不定期参加基层支部组织会议或根本不参加会议的人作出保证〔按字面上说，就是作这些人的教父〕。这些政治指导员有义务到这些成员的家里访问，让他们知道最新的消息，同他们一起讨论，并且劝他们来参加会议。这样做时态度要耐心，不能粗暴，论点要有人情味和政治性。

政治局和书记处同意了 this 建议，因此中央委员会和大多数大区书记自然也同意了。勒戈尔即将垮台时，这个计划就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了，说它是重数量而不重质量，把党分裂成积极活动的少数人和无所事事的大多数人这两部分人——这就是要瓦解基层支部的组织机构，使党象其他任何一个西方政党一样，变成由选举人和向上爬的人组成的混合物。多烈士说：“勒戈尔甚至曾经建议去掉‘基层支部组织’这个词，并且从党章中取消党员在一个基层支部组织积极地起作用的义务。”

在一个受过斯大林主义诡谲术训练的党魁的多疑的眼光中，一支在组织书记指挥下的政治指导员大军是会起来造反的。但是勒戈尔能满有理由地回答，一个共产党不可能指望去吸收“几百万”西方人，同时又坚持要他们在一个列宁主义的基层支部组织里积极地进行斗争。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一样，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以后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包括曾赞成开除勒戈尔的人，在党章中实现了这一改革，即那些信徒们可以不必在基层支部组织内积极斗争。他们实际上恢复了政治活动家与挂名党员之间的差别。这些挂名党员（按照反对派的说法）是“不必参加党的活动和会议的，他们在家里接受‘指导员’的访问，由‘指导员’把其他成员的工作告诉他们，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收集一些象征性的捐款。”对法国共产党来说，这种说法可能是言过其实。但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说，却并非如此。西班牙共产党的女党员可免除参加一切富于战斗性的活动。瑞典共产党在六十年代试行了勒戈尔体系的“二级党员”或“支援性”党员（这是正式称呼）之后，发觉这种做法并不能促进党员人数的增加，反而破坏了基

层支部组织。西欧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的基础经受腐蚀的情况就是如此。

党员积极分子和专职干部

在基层党组织上一级是比较健全的。这一级是党员积极分子的水准，这种人在基层支部组织内是少数。我们在更高级的机构中可以看到，这些人成了多数。再往上看，这些人逐渐渗入到专职干部或机关工作人员这一阶层中去了。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富有战斗性。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早已安于这样的情况，即只有少数党员能够发挥影响，也就是说，能起一点作用，履行一些党指定给他们的责任。这些男男女女是党的核心部分，他们把基层支部的群众同党的领导中枢联系起来。斯大林把他们象征性地看作是党魁的工具，称他们是“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路线作为他们自己的路线并准备去实现它的人……；没有这样一些人，正确的路线就有停留在纸上的危险。”他们是党的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向上愈接近顶层，这种稳定的成分就特别明显。在那里，富有战斗性的人多半是专职干部，是在党内支薪的人，或是在党指定的其他机构中工作和支薪的人。他们的稳定性既出于能够保证他们升官的政治信念，同时还由于不愿失去他们在政治上层中的惬意工作，即在经济的第三部门中工作。

要想算一下党员积极分子在党内的比例是会遇到困难，因为各党都想夸大富有战斗性的党员的人数，而缩小专职干部的人数。例如，1972年恩里科·贝林格说：

……现在是到了丢掉那种关于可怕的共产党机构要控制全党

的说法的时候了。事实是在一百五十万党员中，我们只有几百个同志献身于党的专职工作。意大利任何别的大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都不象我们党的那么少。我们党的力量真正是由几十万、几百万人自愿作出的巨大的而且往往是英勇的牺牲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专职干部只有“几百名”，而党内积极分子却有几十万、几百万。法国共产党（在1961年）并非十分夸大地宣布，它有十万名有战斗性的党员。而在1972年宣称有专职干部五百五十名，其中包括五十名议员。比法共小得多的芬兰共产党比较老实一点地承认有四百八十名专职干部。党外的观察家认为，贝林格所说有几十万和几百万个党内积极分子这个数字应该削减到八万，而法共所说的专职干部五百五十名这个数字则应增加到一万四千名。

当然，这种巨大的差距表明，人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字眼的，而要看出其中的原由也是容易的。“积极分子”这个词是各国共产党非常随便地讨好别人的一个称号。这样也可以表明在它们后面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专职干部”（或者更糟的称“机关工作人员”）这个词儿在工人们听来是很不顺耳的。这意味着一个人增加工人们的负担，脱离生产岗位去干轻松的工作。低级的基层组织成员由于承担了出售党内小册子的任务而神气十足，他们成了“负责党内文化工作的战士”，因此容易夸大第一种人的数字。既然较大的共产党有可能合法或非法地把自己的成员安插在其他单位内支薪，那么缩小第二种人的数字也是好办的。

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内有百分之十五的党员积极分子这一估计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在1951年作出这个估

计数并不荒谬，因为当时是一个热情地承担政治义务的时期。加利认为意共的富有战斗性的党员人数在动荡的五十年代从未超过百分之八，而这个比例到 1966 年下降到百分之五。既然当时意共的规模已经缩小，富有战斗性的党员人数势必从二十万下降到八万或九万。当法共声称它有十万名以上党员积极分子时，从它获得这个数字（三万名基层支部干部、二万五千名分区干部、三千三百名大区干部……一千四百名市长、二万一千名市议员、一百五十名一般顾问……群众组织中的几万名党员……）的方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统计有大量的重复，因为一个人可以担任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这样的职位。确实，这种多方面的活动是共产党积极分子的特征，而且可能是对专职干部的一种规定，即尽可能地把许多工作集中在少数绝对可靠的积极分子身上，这是共产党的深思熟虑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便于控制从基层通向上级领导的一切交流渠道。

随着党员积极分子人数经过这样的更正后减少下来，其数字就接近了专职干部的人数，而专职干部的人数经过更正后肯定会增加的，但其数字最终却很难估计得准确，因为各党虚报的可能性极大。算得紧一点，法共有一万四千名专职干部，其中不仅包括几百名根据社会保障宣言被党雇来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数千名受党所指派和在党所规定的条件下，在为数众多的党所经营的各机构中的供职人员；这些机构有商业机构、报馆、出版公司、几十个工会分会和党的阵线组织，还有党所主办的从假日之家到小卖部之类的社会工作机构，以及许许多多党所管辖的市政机构。这些机构的雇员并不是每个人都主要是为党工作的。从共产党所管辖的市政府领取

薪水的市政府的汽车司机每天到党的总部去为头头们四处开车，他也仍然算是在为党做有益的工作。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包括那些经过党的默许而担任资方职务的人，也必须作为党的专职工作人员而计算在内。在意大利的“红区”，这些人的数字达到好几千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职干部中的一个阶层，他们是计算在别的薪金帐上的：共产党议员和其他选举机构的成员，他们所担任的公职是拿全薪的。当贝林格谈到专职雇员只有“少数几百个同志”的时候，显然是没有想到这些人，因为他曾经讲过党有一百七十七名国民议会议员和几百人在参议院、地区和地方的机构中工作。然而就一位共产党的议员或市长来说，在他被推选为代表之前，必须是党的鼓动者和富有战斗性的党员。他是受党的委托而当选的，如果任期满了而未能继续当选，他也能得到另一个全日制的工作。这种做法在其他政党内是罕见的。任何一个党都没有这样一种自成体系的规模。共产党的议员卸任时，他们能够为党做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能够向党提供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一切有利条件，就象他们把官薪转交给党一样。

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会有一个政党在选出自己的干部时会象它期望于全国大选那样地富有民主精神。我们也不能希望一个政党应该或者能够以这种民主方式发挥它的作用。一个政党进行工作既要代表一系列特定的利益，同时也必须代表对于公众利益的独特看法。用民主选举的方法是定期调整各党之间相互竞争的一种办法，但它并不能搞清某

种特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特殊概念是怎样形成和促进的。这后一种情况存在于某个特定政党的主流传统中，是一些非正规的和不成文倾向。对于党内不民主或者压制作风的种种抱怨，意味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对党的一般传统抱狭隘态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更多的民主”，也就是意味着要恢复非正式的合作状态。这种要求并不是说今后解决一切事情都须通过表决，或者说党的每个代表都必须通过真正的选举。假如党在那种意义上民主化了，那么它们就会大大丧失其政策的独特性，恰恰相反，它们强调一些独特的观点和集中力量支持意见及利益共同之点。

在观察共产党怎样挑选干部之前，有必要说一下这些老生常谈的事，因为共产党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选举只不过是一出精心模拟的滑稽剧而已，而他们的政策却仍然是由一种无情的狭隘的社会主义传统的观点来决定的。选举只是装装样子罢了。选拔干部也是由上级用简单的指定人员的办法决定的。但是现在要判断共产党内部有没有民主还不是时候，因为尚未谈到专门涉及共产党的事情，不过，我们在下面就要谈到共产党如何对待党内的倾向、派别及其趋势等问题。

选拔提升对象的工作由上一级组织根据党员的履历档案（最近的情况也细心地记在上面）和基层支部组织的定期汇报材料来做的。阿耳多·加罗斯契毫不夸大地说：“（意大利）共产党的个人档案制度比军队的更加复杂，更现代化。”官方制订的提升标准是忠实、主动、守纪律和认真负责；同时，被选拔的对象还必须具有领会当前的党的路线及适应其中的任何变化的才能，此外，还必须与党的当前形象相一致。当某个基层支部组织、某个分区或者任何其他一级的组织必须选出其干部

和去参加上级党的会议的代表的時候，上级组织就把一份符合这些要求的人的名单发到这些组织中去。这些组织通常是不能选择候选人的，虽然近几年来，两个比较大的党已经准许给予一些选择权和同意举行秘密投票。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那份短短的名单上的名字必须得到更高一级的组织的批准以后才能到达基层，而更高一级的组织委派或指示积极分子去影响表决，实际上就是参加表决。所以绝不会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

如果这种制度完全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话，那么一直到中央也不会有出乎预料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就会被那些通过各级组织上升的饱经锻炼的积极分子所统治，这些人大多数也许出身于工人阶级。实际上，指派的做法变得更加明目张胆，谁越是更多地走捷径，谁就更接近顶层。总书记总是有办法把他的亲信带进领导层中，而不需要什么长期的逐级提升。当某个亲信青云直上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就随之而高升。马塞尔·塞尔万和洛朗·加桑诺瓦及其妻子，由于得宠于莫里斯·多列士，很快便得到提升，后来又因为多列士的关系，几乎很快地失宠了。乔治·马歇带了一帮同乡好友进入了最高层，其中一些人没有经过政治局就直接进入了书记处。这种扶摇直上地提升的关键就是“选”进中央委员会的这一步。接纳专家、技术人员和报界人士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提供了一条途径，使得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人（通常是中产阶级出身）可以越过那些老资格的领导人而名列前茅。

每个政党常常设有向党员灌输其信仰的各种课程，有些政党已把这些课程规定为骨干分子的必修课。但象共产党那样作为一种制度来做的却并不多。1958年以来一直当权的

戴高乐的党也只是到 1973 年才创办它的干部学校的。所以，就强调教育、训练和改变世界观的角度来说，把共产党同宗教界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加以比较，虽然过头一点，但也不是很不恰当。比较小的共产党，财力不够，就依靠它的国际联系去实施，较大的共产党则动用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去向各级党员（从基层支部组织的新入党的积极分子到党报编辑和竞选运动的主管人）进行灌输。不过，为了免得人们去附和所谓共产党是一个凶暴的教会式的讲堂或者是政党中的一所军事学院这种无稽之谈，必须指出两件事：第一，除了阅读规定必读的四、五本小册子以外，只有少数党员，也许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员接受过系统性的教育；第二，由于大批“学员”退学，所以这些努力的很大部分是白费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那种做法一点不象学校教育，而完全是生硬的灌输，用死记的方法去学习那些象是已经弄得较易消化的食品一样的口号，而这些口号有许多是和西欧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即使对那些没有退学的人来说，这种做法也是徒劳无益的。那些甘心接受这种灌输的人，获得了坚定的信念，以致能顶得住相当大的震动而不动摇。

训练共产党骨干分子的政策起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那时的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核心，以便能在不适宜共产党生长的西欧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党”。在西方开办学校是为了培训布尔什维克，例如，在巴黎郊区博比尼就有一所这样的学校，而设在莫斯科的国际列宁主义学校则安排一年甚至两年半的课程。一些著名的共产主义者诸如法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丹麦共产党的阿克萨尔·拉森都是从苏联学校里出来的。语言上的困难往往

使这些学校受到影响，后来，苏联及东德所进行的训练似乎和西欧各共产党所追求的民族主义形象有点格格不入了。因此，以后就比较着重于各国当地的学校。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瑞典还常常在苏联和东德设立自己的学校，瑞典人提供教员，东道国则提供物质上的便利。但以后当瑞典共产党寻求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时候，这些学校被关闭了。相反，德国的共产党除了它自己的学校以外，还继续使用东德的学校。西德共产党为基层组织的新党员开办的周末学校就设在下萨克森和莱茵兰-法尔茨的森林中的平房和假日俱乐部中。要是他们在“学习”上有进步，便可以去上埃森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学校或乌柏塔尔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学校。然后，担任专职工作的积极分子就可以送到东德来比锡的弗朗茨·梅林学院，或者柏林-比斯多夫的附属学院学习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最后，高级干部可到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社会科学院，或者到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高等学校学习。西德共产党在强调学习方面学究味特别浓厚（它把1972年规定为党的学习年）。可是，所有的党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法国共产党学校里所通用的有些传授基础知识的小册子可被看作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宣传。各党在政治上的不断失败以及党的学说与西方现实之间的差距表明，对比较高层干部的“训练”质量没有得到改进。

中层组织

既然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花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攀登中层组织的阶梯或在其中活动，那么，在他们看来，这些中层组织当然就是党的重要机构了。然而，这些中层组织只是起传播

党的政治上的信息的附属作用，即向下传达党的路线方针，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向上汇报基层组织的情况（包括全国的一般情况）。从法国共产党1964年章程第五款（d）中可以看出，这些中层组织是无足轻重的东西。该条款规定：“上级各级组织的决定对下级各级组织是有约束力的。”那就是说，权力是完全集中的。

因此，比细节（法国共产党有二千五百个分区组织，每个分区平均由八个基层支部组成，雇用总数达两万五千名的分区领导人，发行四百个分区报刊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层组织的数字和活动情况是根据一个不变的原则而有所不同的：各级组织的每个单位必须保持在便于管理的规模之内，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在一个便于操纵或调遣的规模之内。为此，党毫不踌躇地设立或废除新的中层组织，这类组织包括诸如可以管理分区、但没有向上选举的权力的市镇委员会，或者介于分区和大区之间的拥有不同权限的地区性组织，以及如巴黎这种重要地区的大区组织的联合会等。这样，党组织根据它的规模和输送积极分子的数量扩展或缩小其机构，以便使其联络渠道能经常地在上级组织的牢固的控制之下。一个负责七个基层组织的分区书记也许不得不在每周花七个晚上去参加一些基层支部组织的会议，但这总比基层支部组织太大以致操纵不了要好些。

各级组织，特别是大区委员会的选举，都要在其上级组织的监督下进行，不仅它的局、书记处或与干部、财政、宣传等方面有关的法定委员会，还有数量不等的一些专门联系工会、农民、妇女、文化或当时当地的政治事务的非正式的或专门的委员会也得这样做。财力最雄厚的组织是大区联合组织和大

区委员会。这种组织意共有一百零三个，法共有九十七个，它们同国家行政区的划分大致相符合。由于这些组织也往往是选举区，这就产生了大区偏离中央的危险。它也可能象别的政党的选举机构那样去提出它自己的知名人士作为候选人来参加选举。这种倾向在共产党内受到了抵制，它们会把一个由中央委员会选定的候选人“丢到”一个大区组织的知名人士的头上。被推选的候选人按规定是由中央委员会挑选的（候选人并对中央负责），虽然事前可能与大区组织磋商过。近年来，意共的大区组织迫切要求更多的自治权，以便一般地与意大利政府机构权力下放的情况相适应。在有关纯粹地区性的事务上，他们已经取得了某些独立，这一点在“红区”尤其显著，而他们的倡议有时也得到了中央的采纳，例如，由于在巴里的大区组织所创办的“学生民主联合会”办得如此成功，以致意共决定推广这些组织。

瑞典的大区联合组织或者党的地区性组织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在1967年，它赢得了任命专职干部并发给他们薪金以及推选候选人的权利，当然有时候中央对决定候选人仍有发言权。在瑞典，不但国家而且市政府也发津贴给政党，因此瑞典左翼党的大区一级组织自己掌握一笔津贴费，它占经费来源达百分之九十，这样就增加了它的独立性。相反，在1973年，法共领导派了十五个鼓动员去控制那些省范围内的大区组织（这同法国政府委派特级官员和负有特殊使命的行政监察主任多少有点相象），这样就增加了由选举产生的大区组织对中央的从属性。

中央委员会名义上是党的议会。它先由大会选举，然后依次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即政治局及其内阁，即书记处。选举

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塞满了一些领导人，其中的大多数人往往是党的雇员。

为了防止事前操纵党的代表大会，1967年瑞典左翼党规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不是由某个大区组织所委派，在大会上就没有表决权。大会选举无论是以鼓掌通过的方式还是以所谓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都要按照领导预先准备的名单来选，通常是不允许选择的。这样，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就成了另一个中层组织了。中央委员会是党内最大的机构，并且表现出共产党的独特的“人事变动”：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可以变动其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成员。党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一，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大致在一百人上下，芬兰和瑞典共产党则在四十五人左右。这个数字包括非经推选就提拔上来的专门人员以及一些秘密党员，这些秘密党员可能是现役军官或高级政府官员（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是保密的），也可能是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明显的如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前殖民地的兄弟党的代表或者是那些在有争议的地区的流亡者和外国侨民的工人中设立联合会的兄弟党的代表）。

中央委员会每年秘密地开一至十次会议，为期一至三天，根据政治局安排的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对这些议事日程很少有什么争论，而对领导所作的决定也难得表示异议。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党中央委员会成为反对政治局决议的上级法院，而西欧共产党中还没有几个具有苏联的这种经验。意见一致仍然在西方共产党中占主导地位。确实，意共中央委员会在1969年审问反对共产党《宣言》的异端者时，曾经有过真正的争论，而且很快就公布了审讯记录。同样，罗歇·加罗迪直到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之前，也经常在中委员会上提

出反对意见。1973年马歇提出要在法共中央委员会中提倡辩论，他的建议仿佛成了什么新鲜事一样。总之，中央委员会是一个盖橡皮图章的议会，在领导的决定被完全通过以前，它是被用来评论、丰富和批准这些决定的机构。似乎为了表现他们的顺从，当在欧洲旅行需要护照时，西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往往不得不把他们的护照存放在书记处。在没有得到批准以前，他们不能出国或发表著作。

比利时和西班牙共产党的省一级分支机构也属于中层组织这一类。这级机构只不过是傀儡，但是，作为对于无法消除的民族分歧的让步，它们表明了共产党可以牺牲列宁主义学说的原则而同周围环境妥协至何等程度。1971年3月，那个从1966年以来已搞了两个民族分支机构的比利时共产党，效法比利时其他政党的榜样，正式分裂为佛拉芒人和瓦龙人两派；布鲁塞尔的党组织改组为一个联合大区组织委员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都按语言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并且决定，任何一级组织的动议都必须由两派的多数通过。掌握实权的书记处仍然保持其统一，但即使这样，对它的选举也必需征得两派的同意。然而，由于党内的人数比例是五个瓦龙人对一个佛拉芒人，而所有五个代表都是瓦龙人，佛拉芒人那一派组织实际上就成了中层组织。

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分别在加塔洛尼亚、巴斯克地区和加里西亚建立了这样的傀儡组织（它们分别是加塔洛尼亚社会党、乌兹卡提共产党和加里西亚共产党）。虽然它们是模仿西班牙共产党建立的，尽管它们有时受到平等的待遇——例如，在1971年12月当西共同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关系时，圣地亚哥·卡里略也带了它们的代表一起前往北京——但是，它们

只是西共的唯命是从的工具。加里西亚共产党和巴斯克共产党自己承认是这样，而卡塔兰社会党也只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他们的领导人是由西班牙共产党任命的。它们的建立是为了消除各省对于西班牙共产党的中央集权主义的猜疑，和为了同当地的左翼反对派进行斗争。在巴斯克地区，左翼反对派对共产党特别具有危险性。

另一方面，1971年成立的布列塔尼共产党并不是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反对派。法国共产党在它的民族主义主张方面是同雅各宾党人一样的。虽然，它对诸如在阿尔萨斯和摩泽尔设置德语课程这些问题上同意作出微小的让步，但它明确反对布列塔尼分裂主义。重新统一起来的爱尔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分成两个部分，分别代表厄尔斯特和爱尔兰共和国，但是，它们赞成重新统一祖国。英国共产党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设立了“地区分支组织”，但是，它是主张权力集中的。

大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最高权力机关的名称和人数各国不同，甚至由于时间不同而不同（因为列宁主义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一般来说，小党由四十名左右的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大党由一百到二百名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它们均由九到二十人组成政治局（有政治局，主席团，执行委员会等不同名称）和由三到七人组成书记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选举了一个三十四人的理事会。它通过政治局和书记处行使职权。书记处可能是党的书记处，也可能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也可能是由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联合组成。书记处书记一

一般都是政治局委员，其中有一名位居首位，就是总书记。选举担任这些职务的人的方式是由那些即将离职的官员提出名单，然后照单批准。因此，这事实上是采用指派的方法。总书记、书记处与政治局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时常变动，但是，一般规律是较小的机构权力却较大。如果总书记的地位特别突出，这就成了党内独裁，即人们所谓“个人崇拜”。如果书记处特别突出，这就是集体领导。如果是政治局统治，这就是党内寡头政治。以上这些形式目前都存在，但各地的趋势是突出总书记地位的这种形式。任何时候权力总是极端集中的，这是共产国际一再鼓励的一种倾向性。它认为，为了避免回到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政治上缺乏效能的状态，这样做是必要的。共产国际希望看到权力集中于这一级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的影响在这一级最能起作用。人们往往有一种确实的感觉：即苏联政权的秘密代表过去是，可能至今仍然是某些西欧共产党的政治局成员。

表面上，政治局是党的管理机构。只有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局正式隶属于理事会。政治局每星期开一次会并由它召集中央委员会。它规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并向会议提出报告。报告总是毫无例外地得到通过。在1956年以后非斯大林化时期，政治局有摆脱书记处的控制而掌握实权的趋向。这个较大的机构商讨大事这个情况标志着同个人崇拜或者说同总书记统治的倾向的决裂。从那时到现在，钟摆又摆回来了。荷兰共产党在1967年取消了书记处，而1972年它又恢复了书记处。在所有西欧共产党中，兼任书记处书记的少数政治局委员都恢复了他们的突出地位。目前，法共由书记处来确定政治局的议事日程。组成书记处的那些书记事实上相当

于国家的部长,每个人负责一个具体的领域:如宣传、行政管理、知识分子工作等等。在秘密活动的党里,出于需要,书记处的权力是绝对的。在所有这些党内,书记处实际上垄断了一切关于党的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如果它没有垄断作出决定的权力的话,也有着垄断公布这些决定的权力。勒戈尔举出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些事例,说明那时书记处向政治局委员们封锁重大的事情。但是,随后勒戈尔和马尔蒂还举出同一时期里的一些事例,说明甚至书记处的书记也被封锁消息,因为全部完整的权力也不是在书记处手中。这项权力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是由总书记,即党的头子个人所专有的。

我们谈到了共产党组织机构图中的最上层,但这并不是说总书记有绝对的权力。他掌握着广泛的权力和获得情报的特别途径。但是,他必须同少数官僚寡头分享这些权力。为了看清楚这些官僚寡头是谁,我们不能再从金字塔的正面去观察,因为他们可能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他们躲在金字塔的暗处进行秘密的或者至少不那么公开的工作。在我们对党魁所起的作用加以研究以后,将回过头来再谈这方面的事情。

总书记

1906年,当托洛茨基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时,他曾说过:列宁的方法导致这样的结果:首先党的组织取代了整个党,然后,中央委员会取代了党的组织,最后,一个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

我们把某些总书记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如果这个党在政

府里执政,那么就是他在国家中的地位)说成是独裁,这种用词并不过分。说得稳当一些,我们可以说,在所有这些共产党内,总书记都设法维护他们特别突出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基础在于他所特有的获得情报的途径,也在于各国所有共产党共有的一种独特的倾向,即把想象中的完美的共产党人的品质统统加在一位理想化的人物或传奇式的英雄身上。新上任的总书记有一段时间虽同意集体统治,但老资格的总书记则表现出一种似乎是个人说了算的习惯,他的决定至少不是在同党内的有关机构正式磋商后作出的。

1944年陶里亚蒂重返意大利时,他作出决定,取消关于意共拒绝同国王合作的政策,而赞成参加政府工作,这使他的重返意大利变得引人注目了。直到他去世前一直保持着这种做法。他在苏联一所疗养院去世前五个月,他把党的大权象处理私人财产一样,秘密地转让给了路易吉·隆哥。1964年3月19日,他给隆哥的一封信里说,由于他的健康情况和“其他一些考虑”(也许指的是他担心争夺接班人位置的斗争)使他有必要交出实权,但是他要求人们把这件事保密半年至一年。在此期间,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管理委员会任命隆哥暂代他的职务。他甚至就此事起草了一份公报,向中央委员会(它是负责“选举”书记处的)宣告这个消息。事实上,陶里亚蒂恢复了健康,仍行使大权一直到他去世,但是他指定的接班人那时已接受了权力。而他在陶里亚蒂死了一年以后却又公布了这封秘密委任信件,犯了一个错误。隆哥或许希望利用这封信来支持他新取得的权威。但是,把应由选举产生的最高职位予以秘密转让这件事,就贬低了意共自封为非斯大林化的民主政党的声望。

多列士同样有这种习惯，即早上在他的住宅里与党的官僚机构的一些亲信的干部磋商之后，就私下作出决定。然后，当他下午走进党的办公室的时候，就把它当作现成的东西提交书记处。1952年，作出的一项成问题的决定是清洗书记处的一位书记（这是在审问马尔蒂—狄戎时期），这件事不但不能让被指控的人知道，连书记处的另一位成员勒戈尔也不让知道。还有，1950年多列士因病住进苏联医院的时候，他没有通知政治局就把摄政大权交给他的妻子让内特·维美徐，而且，他已经把她拉进政治局了。她作为一个既有机会接近莫斯科多列士的床边，又有机会接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人，她就获得了一个大党的党魁所特有的关于国内外情报的垄断权。她离法在俄国期间，法国共产党就不能作出决定或者摇摆不定。对于至少从1944年以来就已经以“莫里斯·多列士的党”闻名，甚至以“莫里斯·多列士的私产”闻名的一个党来讲，这是毫不足奇的。不是党的总部而是多列士的越来越豪华的住宅，成了党的权威的真正所在地。甚至当他居住在离巴黎五十公里以外的巴赞维尔时，政治局也要到那里去开会。因此，当多列士接近寿终正寝时，他同样把权力移交给了他所挑选的接班人瓦尔德克·罗歇。但罗歇患了中风丧失了工作能力，这就使多列士无法转让总书记的职务。尽管如此，法国共产党仍旧无须进行陌生地选举新领袖的工作。隐蔽的权力机关——它的某些监视人坐镇在莫斯科——已把乔治·马歇强加给法共了。

在那些较小的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内，我们也看得到这种君主制的习惯做法。从1932年到1958年，阿克萨尔·拉森是丹麦党的十足的斯大林主义的总书记。在这段时期里，他取

得了极大的权力,以致当根据莫斯科命令撤销他的职务时,他脱离了党并带领着该党的大多数党员和支持他的选民另组一个新党。在瑞典,关于使党先现代化,然后重新列宁主义化的一些决议是由它的主席也就是总书记C·H·赫尔曼森决定的。在实行这些大胆的、困难的和最终未能取得成功的活动中,赫尔曼森遇到了唯一的一次严重挑战,这是在1968年他的前任即前党主席希尔丁·哈格堡发出纠正党的路线的号召的时候。多年来,荷兰共产党一直是它的头子保罗·德格罗唯命是从的工具。他最强烈地否定“个人崇拜”的风气盛行于除俄国外的其他国家,他是持这种见解的西方领导人之一。事实上,他对非斯大林化分子赫鲁晓夫怀有极大的仇恨,这种仇恨加上一些理性的政治考虑,使得他把荷兰共产党就象他的私产一样带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他年迈的时候,德格罗把领导工作交给了亨克·霍克斯特拉,但他仍然是政治局的“名誉委员”和荷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定调子的主要发言人。

大家知道,有许多政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党中,对资格老的领导人是很尊敬的。因而,这种尊敬必然会从给予他们这样一些荣誉上体现出来,例如把西班牙共产党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意大利共产党的路易吉·隆哥、法国共产党的瓦尔德克·罗歇(在他中风以后)和德国共产党的库特·巴赫曼晋升到特设的“主席”职位上。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然而那种由列宁首创、其后又为斯大林变本加厉地推行的个人崇拜的做法,竟被模仿来对西欧共产党的那些平庸而又缺乏魅力的党魁搞个人崇拜,这种情况就不那么正常了。除了陶里亚蒂一度被吹捧为“最好的人”之外,尽管对陶里亚蒂的个人

崇拜是令人作呕的，是歪曲意共党史和陶里亚蒂在意共历史上的作用的，但这种个人崇拜还没有超越西欧政治惯例的范围。意共在其感情用事和不符合事实的文献中，把它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册封为圣徒，而陶里亚蒂则总是扮演着圣徒般的安东尼奥的朋友和门徒的角色。

西班牙共产党对它的领袖何塞·迪亚斯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不加鉴别的吹捧的风气更为放肆。在斯大林时代，它赋予伊巴露丽的某些称号就象是最令人作呕的类似对圣母玛利亚的过分崇拜。1956年，当赫鲁晓夫谴责个人崇拜时，西班牙共产党直率地承认它犯有同样的错误。然而，据说这个表态是在违反以“谦虚”闻名的这些被吹捧对象的意志后作出的。可是，老习惯不久又恢复了。1968年以后，这个党分裂为分别由卡里略和利斯特尔领导的两派，在它们的相互攻击中，都十分强调这两个人实行专制的程度。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八次党代会的会议记录汇编中，令人注意的是，几乎每个人在他发言的开始和结尾都要象宗教仪式中的祈祷一样千篇一律地说上一句赞扬“圣地亚哥·卡里略同志”的话，并且，几乎每个发言人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都要借重于卡里略的权威。

法共是对斯大林以及对它自己党魁的个人崇拜方面走得最远的一个党，至今仍否认曾奉行过个人崇拜，并且至今还没有公布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个人崇拜的报告。多列士从1930年至他1964年去世这段时期担任法共总书记，他发动人们对他自己的崇拜是在1937年。当时他叫一个雇用文人为他撰写自传《人民的儿子》。后来，这就成了每个法共党员必须学习的一本标准教材。对多列士“这个法国第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吹捧，在战后发展到了荒唐的程度。这也许是因为有必要把

他当过逃兵和在莫斯科度过战争时期这一事实掩饰过去。到1953年，十足狂热的、神乎其神的阿谀之词，已经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为了免得使我的这些话让人听起来似乎太过火，可以用几段引文来加以说明。1953年，全国党的会议在多列士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向他致敬的信中说：

从盖维里厄的这个讲台上发出的数以百计的问候，使您的形象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您在讲解时镇定沉着的手势，……您的出现使我们大家有了信心。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您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这里的数百个人此时此刻都认识到：是您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意义，给我们党带来了伟大的作风，等等、等等。

在党的诗人阿拉贡为这种狂热崇拜所写的大量委婉动人的诗篇中，人们会记起他为了欢迎多列士于1953年从俄国回来时所写的诗《他要回来了》或《共产党人》上他的某些文章段落，例如他声称法国工人阶级

塑造了一个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比处于封建的浪漫主义时期的罗兰^①高大，也比在巴士底狱的废墟上崛起的拿破仑高大，它的力量、智慧和这个新型的阶级的命运都体现在一个人，一个新型的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莫里斯·多列士的身上。

看来不可思议的是，象贝林格和马歇这样平庸的官僚主义分子竟也会成为类似的个人崇拜的对象，的确，如果苏联模式的集体领导形式能为他们所推崇，这种情况是不大会发生的。如果勃列日涅夫或者某一个接班人打算提出要居于特别

^① 让·马里·罗兰(Jean Marie Roland, 1734—1793)，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吉伦特派首领之一。——译者

突出的地位的要求，他就会在西方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发现乐于模仿他的人。因为这些人的个人“形象”一直不断在修饰之中，以便随时向公众展出。举一个例子，1973年1月12日的《人道报》在一篇关于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中，为乔治·马歇刊登了六张大幅照片。在党发表了官方声明的同时，他还发表了自己对一些政治问题的声明，他提交给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则充斥了别人奉承他有先见之明的谄媚之辞。

对个人歌功颂德是官僚政治内部的一种怪现象，官僚政治可以产生“大伙计”（著名的公仆），而产生不出英雄。共产党的总书记不是，也不可能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个人风格或者个人独立性的任何表现会使他们丧失做这种工作的资格。他们必须是“典型的”、普通的、平庸的，最好要有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姿态。他们不是激烈的革命者，他们是组织者、委员会委员和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喜欢在组织中勾心斗角，有诡辩欺诈的才能，象官僚那样具有冷酷而有限的野心，因为他们所能取得的最高职位总是从属于比其更高的、外国的或隐蔽的权威。贝林格在意共内的绰号是“铁打的懒汉”。形容他整日无所事事，只是坐着开会。每天在没完没了的各种委员会会议上坐得最久的就是总书记，这正是想当这个职务的人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这样的人居然会得到人们的歌颂，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是怎么了不起的人，却使我们能了解一些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另一种通过上级指派来造就官僚的办法（即把普通人提升到最高职位，然后对他们加以歌颂）就是教皇的继承制。这不是要同天主教或任何其他宗教运动相比较，而是要同罗马教皇这一特定的体制相比较。我作这样的比较是想要说明以下的问题。

共产党要尝试做到的是，要把想象中的美妙的未来对人们进行训导和把人们对革命的憧憬纳入轨道。它强调理论和社会主义的“科学”，强调适当的程序、等级制度和纪律，它搞的那套虚假的选举和代表大会，它对左派和越轨行动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它为什么要把一个强大的造反运动和对乌托邦的高度幻想——这种幻想已在早年西欧的工人阶级中造成流血的悲剧——制度化、合理化和官僚主义化。现在当一些官僚政治机构企图组织合理的活动——如执行法律或创造财富——的时候，尽管他们有那么多缺点，它们从下到上，一直到最高一级都仍然是合理的。但是，一个谋求克服没有秩序的现象，和谋求实现乌托邦和济世救民事业的官僚政治机构，甚至在它一开始工作时，就必然运转失灵。这就是说，即使它设法把那些它要与之斗争的异端邪说、路线偏差以及不耐烦情绪的流露统统克服了，它还是要在最高一级失败的。在那一级，在对已成为党魁的那个平庸的职业革命家的崇拜中会骤然出现根本不合情理的现象。那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也许是真诚地谦逊的，但他发觉自己已成为维科所称的史诗般的英雄，他被赋予了预兆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的一切想象中的美德，并掌握了实现黄金时代的魔术。就是这样，使得一些玩世不恭的教皇被封为圣者，而象斯大林、多列士和陶里亚蒂这样的人就受到数百万欧洲人的衷心爱戴和崇敬。

秘密机构

既然是秘密机构，顾名思义，人们对于金字塔的那个看不到的背面，就了解得很少，因而本节内容也必然极为简短。不过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总书记是按照党的一些机构的意图

行事的，这些机构或是非正式的，或是很少人知道的，或是由秘密官员组成的，或是完全秘密的。如果他不按照它们的意志行事，他就会被停职甚至遭废黜。阿克萨尔·拉森就象赫鲁晓夫一样，在1958年被一批势力强大的反对派在丹麦党的中央委员会上策划的投票表决中所废黜。瑞典共产党的赫尔曼森在1972年也不得不在接近党的最高领导的新斯大林主义反对派的命令下，接受了一条新的党的路线。甚至受到吹捧的多列士，据说也由于法国共产党内部的执拗的反对，而不得不在1960年放弃他的本愿，对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不予支持，他本来把他们看作是反对赫鲁晓夫的真正斯大林主义者。

这种反对派不是来自下级机构（因为总书记能够操纵它），而是来自党的机构的其他部分。党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同时还选举象“政治监察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这样一些机构，它们秘密地活动，行使着巨大的权力。政治监察委员会特别重要。政治监察委员会是列宁创始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裁决机构。它设立在党的执行机构之外，并独立于党的执行机构。在这里可以解决共产党人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并能不流血地恢复纪律。实际上，西欧共产党的政治监察委员会已经发展成为监督整个党（甚至包括书记处在内）的监督人。它还掌握着类似共产主义国家内的秘密警察的某些权力。

其他各种中央级的委员会和中央部门拟就决议并保证其贯彻，它们分工负责各个领域，如经济、对外关系、宣传、青年等等。这种机构的活动十分审慎，所以人们通常不知道它们的成员情况。我们应该特别提一下中央干部委员会和意识形态监督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分别监督党的组织和知识分子

工作。所有这些机构也和正式机构一样，它们的有些秘密成员分布在政府、军队、各种阵线组织(象伯努瓦·法戎，在法共公开承认他同多列士和杜克洛同属统治法国共产党的三人小组成员之前，已领导了法国总工会许多年)或者甚至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里。因此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人们只知道其头衔仅是中央委员会普通委员的人，很可能他还是寡头统治集团的成员。就是这个非正式寡头集团，而不是正式选举出来的党的统治集团，才是我们在下文中要讲的西欧共产党的本国官僚机构。

共产党还有一个化身，即一个孪生的秘密党，这一向是臭名昭著的事。至少，这个做法是在共产国际 1920 年条款中规定的加入该组织的基本要求之一。从那以后，共产党既是一个政党又是一个阴谋集团，这就成了它所具有的魅力的一部分。除了乏味的政治以外，它还提供了地下活动的浪漫气息。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但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并利用事前准备好的指挥所进行活动。自然，我们没有什么证据，但是迹象表明，如果西方共产党真要玩弄这种花招，它们并不是怎么高明的。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看出在民主国家中存在着秘密的党。当在 1948 年 7 月份陶里亚蒂成了谋杀对象时，意大利共产党能立即做到把意大利从中部切成两半，并能孤立某些城市。内政部长马里奥·塞尔巴说这不仅仅是自发性的示威活动的结果，而且也是早就存在着的秘密民兵的一次行动。不过，主要的一点是，在罗马政府采取坚定的态度之后，他们的行动很快就停止了。罢工取消了，秘密组织看来打退堂鼓了。

在党处于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秘密基地的情况下，它很少

有所作为。墨索里尼在 1926 年轻易地把意共几乎一网打尽，意共在国内的残余经常地遭到法西斯警察的铲除，以致意共认为他们太危险而放弃了他们。希特勒也同样顺利地消灭了德国共产党，到 1936 年已基本扫除了德共的所有痕迹。1921 年至 1944 年在党处于非法的时期，尽管芬共享有接近苏联庇护所这个有利条件，芬兰的保安警察在对付芬共时，还是占了上风。法共领导人在 1939 年是这样容易地被捕，以致一位历史学家说，“使人惊讶的是，一个以非法活动为其第二天性的党对于从事秘密活动竟然会这样毫无准备。”在德国占领下的各国共产党的表现，那是另一回事，这是作为合法的非法活动的例子，也就是毛所说的“如鱼得水”的情况，这对其他非共产党的抵抗组织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共产党再次表现出不适应秘密活动。警方有把握能在六个月左右破获任何地下组织，而共产党却提不出比其他反政府力量更多的反抗政府的办法。

由于共产党是明显地模仿 1903 年布尔什维克党在沙皇压迫下建立的秘密组织而创建的，我们应该可以指望他们模仿得很好。而且，我们应该可以指望，在它们被迫转入秘密活动的时候，它们对作为财政靠山的莫斯科会表现出绝对的服从，它会表现出在地下活动困难条件下锻炼出来的良好的团结，并且最终倾向于极端革命的政策。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秘密的共产党达到了这种要求。芬兰共产党在“壁垒背后的共产党人”的控制下从事秘密活动长达二十余年以后，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冒了出来。它立即选择和平的、温和的政策，使它的极左分子削弱为不起作用的少数派。有一些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比合法的共产党如法共更敢于反抗莫斯科。它们都分

裂了，或是被比它们更加革命的左翼打败了。它们都提出一些温和的、非暴力的政策。它们都经常地被警察所摧毁。

这里我们谈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腊、西德的共产党，它们对莫斯科的看法各不相同。土耳其的党只能算是苏联的代理人。葡萄牙共产党也是忠于莫斯科的，它还赞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除了德国的共产党以外，葡共是唯一的一个西欧共产党，在致兄弟党的贺电中使用“苏联的领导作用”这样的词句。德国共产党，即非法的西德共产党，它依附于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象土耳其和葡萄牙的共产党依附于莫斯科一样。事实上，它是由一些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个中央机构中任职的人主持的，它从那个东部共和国领取金钱和宣传品。它按照它的主子的命令行事。与此相反，西班牙共产党成了第一个公然对抗苏联、明确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不要苏联援助的地下党。希腊“国内的”共产党也同苏联分道扬镳了，它不仅痛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还谴责苏联同雅典军人政权恢复友好关系。西班牙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都从罗马尼亚获得同情和支持。

在团结方面，西班牙党和希腊党都已分裂为两派，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秘密活动的条件问题上有分歧。土耳其党动辄闹分裂，差不多就象知识分子的辩论俱乐部。这些党大多数都已在左派中受到了挫折。地下的德国共产党以及后来它的合法的继承者德国的共产党遭到毛派的反对。这种反对是如此致命和有效，以致人们怀疑它得到波恩的援助。土耳其共产党被极左派的游击队诽谤为通敌者。西班牙共产党被一个马列主义的派别和“巴斯克自由万岁”运动鄙视为修正主义者。希腊共产党内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攻击莫斯科的“宗

派主义分子”和国内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葡萄牙共产党面临着一个马列主义的党和以阿尔及尔为基地的“革命纵队”的激烈竞争。1970年它被总部设在阿尔及尔的“解放阵线”所开除，葡萄牙共产党被极左派谴责为“社会法西斯”，被托派谴责为鼓吹与阶级敌人合作的党。

这些党受到挫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地下党拥护革命的政策。西班牙党鼓吹同除开军事独裁者佛朗哥以外的任何人合作，连陆军和教会也不例外。它为自己过去的“左倾主义”而忏悔。土耳其共产党并不反对安卡拉的一个接一个的极权统治，而且表现得象第三世界共产党一样，一方面支持莫斯科所容忍的独裁政权，另一方面则同可能有利于美国的民主势力进行斗争。德国共产党在1956年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确实鼓吹过以革命手段推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是，在整个地下活动时期中，它所提出的政策却是温和的，并且它还一再提出要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主张。地下的希腊共产党赞成同其他左派和民主力量合作。在1973年流产的竞选运动中，葡萄牙共产党同进步的天主教徒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主张在一个联合阵线的政府中合作共事，葡共是爱国主义者和与敌手合作者。在1974年独裁政府垮台后葡共参加了军政府。它在一个鼓吹民族团结、劳工和平、慎重的非殖民化，以及继续作为北约组织成员的政府内有两名部长。不可避免的是反对派就在它的左翼中大为发展，而葡萄牙共产党则同政府合作镇压反对派。

最后，这些职业革命者都被警察几乎是定期地予以兜捕。或许他们真的比别的反法西斯力量更经得住压迫，但这一点很难肯定。他们装做经得起压迫有许多好处，正象极权主义

的政府把他们说成是反对派中唯一的有组织的势力也有许多好处一样。事实上，希腊共产党人看来是虚弱的和分裂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常常被捕，以致有人说，在各个不同时期，党的实力有一大部分是在布尔戈斯监狱里。卡里略承认在西班牙农村搞秘密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他还以恍然大悟的口气补充说，西班牙共产党人讲话象小媳妇似的。在西班牙国家内共产党的情况很不稳定，因此党的力量是无法估计的。非法的德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遭到西德警察摧毁，在必要时甚至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被捕惩办的党员每年数以万计，只是靠了易北河彼岸的特别庇护所才使党的生命得以维持，直到它重新取得了德国的共产党的合法外衣。

当葡萄牙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它最善于逃避逮捕。但是它从来未能取得足够稳定的基地来培养它的积极分子，用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他们，或长期地保留住它的领导。当葡萄牙总理卡埃塔诺博士在1973年说葡萄牙共产党在国内是最有组织的一个反对派的时候，他大概是按照极权主义的习惯办事，即把所有的反对派都描绘成共产党人。葡萄牙共产党在1974年从地下转为公开的时候仅仅只有二千到三千党员，但在获得自由的第一个月里它自称已吸收了一万名党员。从那时起，它给人一种印象，即它是最有组织的政党。它的办法是，不仅举行给人深刻印象的群众大会，整顿其队伍的纪律，而且积极地使党员打入内阁各部、各市政府、企业机关以及工会。如果西班牙共产党在有利的条件下，由地下活动转入公开，一个类似的初战胜利也很可能在等待着它。要估计土耳其共产党的人数是不可能的。真的共产党员都是一些不反对政府的非无产阶级的苏联代理人，因此他们一般是不受

政府干扰的，但是政府残酷镇压的不仅有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组织，而且还有被官方称之为共产党的土耳其工人党。实际上，土耳其工人党是为共产党人反对的。然而在土耳其，共产党这个词简直成了骂人的字眼。一个足球裁判员由于被一个不服从他的裁判的运动员称他是共产党人，就把这件事提交给足球协会，结果足球协会严厉地处罚了那个运动员。一般来说共产党人意指“渣滓”，是“把妻子与人分享的人”。在西班牙，“共产党”一词可以具有粗俗、不可靠、不老实这样一些不同的含义。因此党的地下活动者也不过博得了一个“隐身人”，即魔鬼的名声而已。

经费来源

当代的政治活动无论在工作量方面还是在联络工具方面，都耗费了巨大的资力，然而，这种活动却是在经济过程的范围之外进行的。因而，当代政治活动是有依赖性的，它不能维持本身的活动，而必须依靠别人，必须依靠各种类型的生产性的活动。因此许多政党会被它们的对手揭露出肮脏、丢脸或作出妥协让步而换得经费来源的真相，这也可以从一切民主国家里打着各种旗号的党派里经常发生的种种丑闻中得到佐证。从这种意义上讲，没有一个党可以表明他们的资金是不肮脏的。因为即使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个人的认捐，人们总还会怀疑这些捐献怎么会是自愿，或者怎么会如此地无私？认捐者是谁（许多人是匿名的）？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因此，在这方面受到攻击的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得不揭示出全部的经费来源的话，它也不必担心。因为只要任何其他政党也这样做，情况也必相同。共产党的财源在对手中已引起特

别的注意,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已经透露了全部的财源。而他们所提供的情况却从来没有被人加以承认。

为什么共产党的经费来源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其中有两个原因:右翼的对手认为,来自苏联的经费可以证实西方的共产主义是依赖于“莫斯科黄金”的,即依赖于外援的;既然它是一种舶来品或者甚至是一种反民族的产物,因此,没有这些外援,它就不能生存。左翼的对手,包括许多仍在党内的人认为,即使原来积累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以及是为了党的利益而进行的合理的投资,也会构成资本主义的行为,这与无产阶级的党的道德是格格不入的。第一种批评实际上告诉我们:人们必然会注意到,其他的西欧政党和工会(不去讲整个政府)在本世纪内还是在秘密地接受甚至是依赖于外国的财政援助。并非只是共产党在接受莫斯科黄金;自二次大战以来,那种财政援助主要是来自美国。苏联的财政援助也伸进了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左翼。欧洲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和反共工会受到了美国政府资金的援助,这些援助或者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或者是由美国工会提供的。法国共产党在巴黎的苏联银行开有帐户,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党阿尔及利亚支部在法美银行里也有它的帐户。尽管乌鸦笑猪黑,共产党人一直对于指责他们依赖东欧的基金这些说法特别恼火。他们认为这些谴责的破坏性很大,因此他们也对左翼敌对分子很快作出了相应的反击。事实上,在左翼分子的政治论战中,关于外援的恶毒攻击是家常便饭。各国共产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一批人经常问,党是从哪里搞到活动经费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暗示,亲苏的利斯特派正在接受莫斯科黄金。多列士说,他的亲华派对手在1967年从某方面得到“大量的钱”。马歇则干脆

说他的敌人正在接受“北京黄金”。通常来说，煞有介事的吹嘘往往使人难于置信。例如马歇说，“罗纳河口省许多极小的团体在银行的帐户里有存款将近一亿旧法朗”。反共的诽谤从来是不顾后果的。就在那时，法国中部地区——维埃尔宗的共产党市长曾宣称，托洛茨基左翼分子乘了“共产党直升飞机”和“装有炮弹的独木舟”袭击了他的地区。看来这种政治中伤的材料无论对于任何一方总是有限的。

第二种批评是关于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经营资本主义商业的问题，这主要来自从前的共产党员。其他的人也许会欢迎这样的事实，因为它表明了过去的革命者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论怎样，这些指责来自一些对商业懂得很少的人。因此，首先，他们喜欢低估谋取利润的困难；其二，他们喜欢低估经过查帐人和税收官员检查的利润转化成捉摸不定的政治用途的困难。凡是有共产党影响的地方，西欧各国政府的警惕性是极高的。有人还进一步声称：这样的商业活动使共产党在国家里成了最富有的政党（或者甚至使法国共产党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党”），这种说法似乎与共产党报刊明显的经济困难的情况是完全不一致的。

有些共产党提出了他们的预算方案，但这些方案没有资料价值，因为收入方面的主要项目来自匿名者的赠送和捐献；而支出方面则由于一些党员骨干分子的工资在别处支付而缩小了数字。但是，有些资金来源是能够详细说明的。

莫斯科的黄金 不仅反对派认为，而且前共产党人也认为它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在这样一个守口如瓶的党里，甚至连党内高级官员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可靠的情报。有情况表明，只有总书记和一个不知名的、但是有实权的中央委员会委

员知道法共的实际情况。因而简直没有理由去接受外界人士的各种猜测，例如说意共百分之三十四的收入来自东欧，特别是由于把这个数字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更使人难以置信。那些小的党，诸如英国党、西柏林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的共产党，明显地过着超出它们收入的生活。这些党主要依赖于苏联的援助，也许这是事实。应该提到的一个重要情况是，苏联的援助无需都表现在银行汇票上。党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的下院议员可以不花钱地在东欧度假。同时东欧各党组织订阅了西欧共产党的各种杂志和报纸，其数量之大，足以使西欧共产党有利可图。但是就在批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式的“正常化”以后，《法兰西文学》便失去了东欧的这些“读者”，因而不得不停刊。

党员认捐额 党员的认捐数目是容易核实的，但是我们业已看到很多党对于它的党员的认捐数目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法共谈到它1971年所得的认捐总额是一千八百万法郎。对此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既可以解释成法共二十一万七千名党员的认捐数很大，也可以说它的四十五万八千名党员的认捐数很少。这是靠不住的统计。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没有一个共产党是靠正常的认捐额收入来维持的。

捐款 各党派宣称捐款是最大的独一无二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是在特定的募捐运动（如为竞选、新设领导机关、办报纸等所搞的募捐活动）中，在党及联盟举办的许多招待会上募集起来的。募捐在党的基层组织中是经常搞的。一般总是希望那些较富有的党员能慷慨解囊。在为支持法共的《人道报》、意共的《团结报》和荷共的《真理报》等而举行盛大招待会的场合下，更是如此。每年五一节铃兰花的销售使法共有一百

万法郎的收入。然而，捐款的大部分是匿名者，大笔捐款的捐赠者常是匿名的，因而资金的来源是模糊不清的，最终可能来自东欧。

政府 西欧各国政府给予共产党的津贴费大概不亚于莫斯科，至少对较大的党是这样。意大利、瑞典和挪威的共产党同其他在议会享有代表权的政党一样直接领取政府的补助，瑞典和法国的共产党报刊和一些其他的舆论刊物也一起得到政府的补助。（1967年瑞典党从一家资本家银行——斯德哥尔摩的恩斯基尔达银行筹得一笔贷款，这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事例。）然而，在一切有共产党议员的国家里，政府都补贴那些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议员须将他们的议会薪金上交给党中央的财库，他们则从中只领取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对于高级官员来说，他们的薪金还附加有特别津贴，例如住房、餐厅、宴会、交通和警卫员等项目，这些金额累计起来可能还多于议会的薪金。这就意味着政府通过议员的薪金在贴补共产党。在国会中的共产党议员代表团庞大的情况下，这笔补助的数字是宝贵的。例如1971年由此提供给法共达七百万法郎，1970年提供给意共达十一亿里拉。类似这样的津贴费还来自共产党的常任市长和地方议员的薪金。政府还由于把共产党的常任官员列入工资名单和使用政府官员搞了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而被骗去了一些钱。共产党管理的市政府雇佣党的人员，优待党所拥有的商业和提供活动场所等。此外，虽尚无证据，但仍可以断言，他们还把公共资金转用于党的事业。

商业事业 意共否认从庞大的红色地带的合作广播公司中提取资金，但是，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和芬兰共产党都经营着商业。它们经营着大量的印刷业、出版业、广告公司和轮船

公司。(在法共党代表大会上供应过的博若莱斯红葡萄酒被酒业同人称之为“顾客欢迎的名牌”。)共产党最好的商业买卖是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再加上它们所经营的这个特定地区的旅行社，在这些行业中，它们享有了长期的实际上的垄断权利。这些商业既能使它们获得合法的利润，它们还能够从那些热衷于和东方贸易的西欧商人身上汲取大量的捐款。这些做法还便于他们掩饰领取莫斯科政治基金的真相。东西方贸易的解禁削弱了那种垄断，但是法共的商业分支机构如国际农业公司仍旧能够从1972年至1973年间东欧购买西欧粮食的交易中，赚得一笔巨大的佣金。这些共产党的商业自然也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法共的一个出版社甚至采取法律手段以保护某作家所著的一书的版权，因此人以“警方间谍”的罪名后来被该党开除。然而，没有听说任何一个欧洲共产党曾象美国共产党那样，到证券交易所去搞股票卖空，以证实它的资本主义危机即将来临的预言。共产党坚持经营较稳定的贸易，诸如供应共产党管辖下的数千个市政单位的所需物资。法共有一些咨询公司，它们就市政府的采购问题、缔结合同问题，以及同共产党所控制的商行或同那些愿意支付佣金的私人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易的途径等问题，向共产党市长提供建议。这种做法在法国各个政党中是普通的事，它并不是共产党的什么发明创造。这在共产党的资金筹措方面也不算什么。在本世纪开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制定出这些财政上的措施了。共产党把细致和讲究方式方法的作风运用到他们的资金管理上，这就比那些粗心大意地使用寄生收入的党派，要显得高明些。

清洗、审讯、不同政见

对于西欧共产党来说，即使要维持列宁主义正式机构的外表形象也是很困难的。的确，象 1969 年 12 月在罗马发生的共产党内向领导造反之类的骚乱，这对共产党来说是罕见的事情。那时，罗马各分区的共产党人获悉一些党员因持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出党的消息，他们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就达到了顶峰。一支几百个共产党员的队伍向党的大区总部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占领了房宇，并用扩音器辱骂领导人，企图破坏正在进行中的大区会议。

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由于拒绝接受列宁主义的模式而在党内形成了一些秘密的、固执的反对派，他们一再地活动，试图使其种种“倾向”在党内合法化。由于受到审讯和公开与秘密清洗的干扰，他们的这些活动有时发展到了同党的中央当局直接对抗的程度，并提出了要有“更多的党内民主”的要求。这些内部反对派的政治色彩往往是模糊的，如果把他们看作民主派、社会民主派，或者是比现任领导较少独裁主义的人，那可能是天真的看法。

确实，《团结报》是二次大战后法共内部的第一份反对派的报纸。它在 1952 年 10 月创刊时，就采取了一条极端革命的路线。1952 年 5 月在巴黎街头发生几起反对北约组织及其司令李奇微将军的骚乱以后，法共退而采取更为温和的“人民阵线”的路线，《团结报》里持不同政见的人说，这意味着“放弃革命”。1956 年，赫鲁晓夫报告在共产党内散布不安情绪时，《团结报》攻击党的领导拒绝非斯大林化。正如我们将要在下面论述的，这仅仅是一种在支持革命和支持非斯大林化两者之

间的明显的矛盾。1956年后期发生的镇压布达佩斯暴乱的事件后，党内出现了另一份反对派的报刊——《火星报》。它攻击领导既是宗派主义的又是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的读者达到八千名以后，就与一份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对派报纸合并了。但是这种合刊只是在1957年以后，才零零星星地出现过。《团结报》仍然办得很成功，1973年《团结报》创刊二十一周年时，它宣称已拥有一万五千名读者。该报编辑还出版了非正式的党史，他们向党员揭示了操纵着党的“马歇集团”的很重要的材料，其中指责他们对莫斯科的过分屈从、缺乏党内民主，以及向社会民主派进行妥协等。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真正革命的共产党人，然而他们拒绝与之脱离的这个政党却已落入了“宗派机会主义者”的手中。

法国共产党领导认为这些党内持不同政见的人不起作用和不同程度地接受政府或托洛茨基分子的资助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可以察觉，他们仅仅是以某些借口被开除的，而这些人也从来没有受到过审讯。共产党正式审讯的任务并不是压制那一种不同政见，只要这种不同政见不是企图通过控制党组织来撵走现任领导，只要不是系统地反对列宁主义的中央集权原则。诸如此类的事件——一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暴动企图，或者一次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挑战——已足够来一次清洗和甚至进行一次例行的审讯。可是，对那些事原无进行审讯的必要；从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一次审讯只能引起其他的作用，甚至根本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也可能要奉国外之命进行审讯。

意大利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党内从没有搞过莫斯科式的审讯，但是在法共党内曾搞过许多次。1931年法共党内的

第一次审讯，即对书记处成员亨利·巴布和皮埃尔·塞勒二人的审讯，使用的方法是从莫斯科进口的。那次审讯是由马尔蒂在莫斯科做准备工作，共产国际书记马努伊尔斯基则在巴黎作准备工作。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清洗，也就是对前述的马尔蒂和狄戎二人的清洗，是与芬兰、西德和挪威共产党内的清洗同时进行的，而且它同东欧共产党内的审讯有直接联系。直到1969年以后，人们才理解到这些事件的意义，原来这些审判和清洗是同苏联对西欧共产党的影响程度有关，而并非出于各国发生的事件本身的需要，当然也不是出于什么要消除被压制的忧虑这一类的心理上的需要。

当时，在五十年代，清洗的受害者对他们眼前的遭遇很不理解。他们从起诉者那里也没有得到启发，因为起诉者的控告往往是荒谬的，例如指控被告是警方密探、间谍或阴谋分子。所以他们就抓住下述种种说法作为解释：例如他们被迫充当了某项失败的、已放弃的政策（如1952年激烈反对北约组织的政策）的替罪羊，或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者因为他们参加过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打过仗，或者是因为他们在那场理应把胜利全部归功于红军的“斯大林主义者抵抗运动”中起了过分突出的作用。然而另一些根据上述理由原来可能受到迫害的人，却逍遥自在，有的人甚至在检举中起了主导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会变成合适的牺牲品，但是寻求牺牲品的根由却不在国内。

根由就在莫斯科。1948年6月，铁托因为对斯大林没有唯命是从，而且离经叛道，走上了“民族共产主义”的邪路而受到谴责。随即，斯大林还下令清洗东欧其他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于是，几乎每个党员都可能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

遭到清洗，以此来表示对斯大林的完全服从。这类审讯从一个党蔓延到另一个党，也蔓延到西欧的一些共产党内——这一事实可用以证明所谓西欧共产党的统治与东欧情况有所“不同”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审讯蔓延开来有两个理由。对被专横地选中的牺牲品进行荒谬指控的做法之一，是咬定他与外国共产党人有勾结，因为他们有类似的经历：例如说他们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或抵抗运动中，曾在虚构的某反苏机构中干过事，而这就成了有必要在其他共产党内进行清洗的理由。其二是，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看到进行一次清洗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就会赶紧提出另外一些人作为牺牲品，以免贝利亚的使者会搞到他们自己头上来。

在谴责铁托的四个月中，哥穆尔卡被解除了波兰党的总书记职务，1949年又被开除出党，1953年对他进行了审讯。1949年5月，匈牙利外交部长拉吉克在布达佩斯被捕，同年9月被判处死刑。12月科斯托夫在索非亚被枪决。与此同时，捷克党内开始了大逮捕，在1952年12月谴责斯兰斯基时达到了高潮。这股清洗的浪潮也向东扩展，然而重要的是它在1949年至1952年间也伸展到了西方，这种清洗要么是贝利亚（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直接唆使的，要么就是依样画葫芦地搞的。塞尔万（他后来也遭到了清洗）就在谈到对拉吉克的审讯时说：“要是以为敌人对法国党就不会有类似的渗透的企图，那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于是，西德共产党（当时还是合法的，并且它事实上代表参加地方一级的西德政府）放弃了它的“走德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承认苏联的全面霸权，并且在党内进行了清洗，到1950年3月把它的副主席库尔特·米勒也清洗掉了。芬兰

党从1948年至1951年实际上开除了十分之一的党员，还吹嘘这一清洗使他们的党思想上纯洁了，力量增强了。在挪威，党的总书记佩德·弗因博特恩在1949年10月被解除了职务，他的追随者们在次年遭到清洗。抗击纳粹占领军的英雄弗因博特恩变成了一个“前盖世太保代理人”。一个共产党的议员补充道：“如果我们掌权的话，这种人将受到我们刑事警察的审问，并有可能被判处绞刑。”在平静的奥斯陆，当武装的共产党员占领办公室和侵入住宅时，共产党人公开地相互以谋杀相威胁，还互相指控对方图谋行刺。奇怪的是，象马尔蒂和狄戎一样，弗因博特恩在受到排挤后的好多年里仍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

1950年4月，法共已把中央委员会中几十个抵抗运动战士清洗出去了，但1952年最后几个月在布拉格进行的一系列审讯，就使得巴黎的审讯看上去更加是恰当的了。被选中的牺牲者有两名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安德烈·马尔蒂（就在1949年3月多列士曾经说过：“安德烈·马尔蒂就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荣誉。”），他是前共产国际的书记，在西班牙、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干过革命；另一个是夏尔·狄戎，他参加过苏联1919年的黑海兵变事件^①，在西班牙内战中打过仗，在纳粹德国占领时期是游击队领导人，后来还担任过部长。这些著名的前共产党人的功绩远不能使他们免于成为荒唐的控告的对象，而只能用来向斯大林表明法国共产党对他忠诚的程度。亚伯拉罕毕竟牺牲了他的儿子。^②

^① 黑海兵变事件，指1919年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时，法国水兵在敖德萨的起义。——译者

^② 典出《旧约全书》。——译者

在莫斯科式的审讯中，这些人被指控为搞宗派活动，搞极“左”，反苏和其他种种不端行为。1952年12月马尔蒂被开除出党，据说因为他象个昏头转向的人一样对审讯提出了抗议和进行了反扑（虽然很不中用）。而已经不出头露面的狄戎仅仅只被解除了领导职务。直到1969年，狄戎读了伦敦出版的刊物《见证》，终于明白了事件的真相以及他的事件同东欧各国共产党内的审讯之间的联系。尔后，他便攻击法共的领导并且被开除出党。

关于此事的大量文件一直想从对被控告者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身攻击中寻求解释，但最后，除了东欧之外，其他地方是找不到这种解释的。在东欧，由斯大林或贝利亚指定牺牲者，而在西欧共产党中，领导人在他们自己被选作必要和适当的审讯的反面角色之前，他们尚有一定的机动余地，可在党内灵活地找个替罪羊充数。进行这类审讯的目的不是要弄清事实，辨明是非，而纯粹是要表明该党服从莫斯科以及公开放弃“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审讯时的基本调子是：“反对苏维埃主义就是反对共产主义”。据杜克洛在1972年回忆，虽然此后在法共中再也没有类似的公开审讯了，不过这个原则仍旧保持着。这个原则及其在纪律制裁方面的应用，就足以使人们对所谓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不同的，或“比较好”的（即指反苏的）类型这种推测，产生怀疑了。总之，一般认为，在面对敌人的情况下，列宁主义的组织结构经过清洗以后更加坚强了。至于任何特殊的清洗事件，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无须多问了。

在西欧共产党中发生过的最厉害的一次左派造反中，列宁主义的理论显然得到了确认，持不同政见者围绕《宣言》这

一文件向意共的列宁主义组织提出了挑战。意共对付这一挑战的办法是，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一次公平的和正式的审讯，然后把他们开除出党。在1972年5月的下一届意大利大选中，正如意共所预计的那样，造反者已被消灭，而党也有所得益。

这个《宣言》运动使1968年的工人罢工、学生闹事，以及同年早些时候对侵捷事件的反应等问题上涌现出来的人们对意共领导人的不满情绪，汇集到一起了。1969年2月在波伦亚召开的意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得比较自由，大会建议把始终标志着意大利共产主义的种种思潮合法化，以对抗列宁主义的戒律，这使《宣言》运动受到了鼓舞。《宣言》的造反者中包括一些议员和一名《团结报》的前任编辑，他们指责意共对莫斯科过分顺从和革命性差。这个《宣言》派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又是改良主义者。它反对“宗派机会主义”，宣传要回复到那种自发的、无纪律的极左主义去，这种极左主义，根据他们的理解，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的榜样。他们认为，这样的政策将能把1968年动乱中涌现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力量吸引到意共来，并且能够使党重新具备革命抱负。

在他们的审讯中，党的显要人物并不想否认意共的领导人是指派而不是选举的，以及党内繁复的中层组织起了使他们和基层党员脱离的作用。那种列宁主义的组织结构受到意共中所谓的左派领袖皮特罗·英格拉奥极为有效的维护，《宣言》派造反者也许曾非常期望他会赞同他们对党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倒退行动的抨击。英格拉奥承认在意大利社会上存在着新的反对力量，但他认为这些反对派需要用列宁主义的纪律来加以约束，因为他们关于在苏维埃代表会议中实行

自治的浪漫主义思想，忽视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严峻事实，还因为他们低估了资产阶级社会对变革的反抗能力。其后意共把党内造反者开除出去，这也许颇能博得莫斯科的欢心，因为意共当时正想缓和因侵捷事件而引起的与苏共之间的不和，而造反者则号召在苏联进行一次新的革命。路易吉·隆哥曾许诺再也不开除党员，但是《宣言》派却攻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

除了《宣言》派那种异端之外，在大多数西方政党中常见的种种思潮也一直存在于西欧共产党内，它们同列宁主义的理论无论如何是不相符合的。从投票表决表现出的分歧来判断，西德共产党或瑞士共产党内并非是团结一致的。荷共由于“修正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分裂了。然而，芬兰共产党内不团结的情况最严重。这个素来享有西欧共产党中最列宁主义化的名声的党，最后也分裂成为两个党，它们都有各自的报刊和各自的选举策略。分歧是从1956年关于非斯大林化问题上开始的，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而引起的争论使分歧加深了。接着，丹麦共产党和瑞典共产党的非列宁主义化的做法吸引了芬兰共产党内的更为自由主义的人们，激励了他们用自己同芬兰人民民主联盟选举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一起工作的经验，以及在政府里同社会党人一起工作的经验，来反对党内信奉斯大林主义的同事。（在野十八年后，芬兰共产党于1966年至1971年为联合政府成员。）1968年布拉格结束了派别之间的不和。

芬兰共产党内的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或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派由泰斯托·西尼萨洛领导，约占党的力量四分之一到三分之

一。更为自由主义的一派由阿恩·萨里南领导，占党的力量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他们之间的争吵造成了芬兰人民民主联盟内的紧张气氛，造成了选民支持的削弱，还妨碍了共产党重新参加联合政府。（1971年，由于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坚持，该党退出了联合政府。）这种争论波及到芬兰工会，在工会选举时两派各自提出竞选人达到了大唱对台戏的程度。争论的实质是关于党的纪律和忠于莫斯科的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它。

苏联对芬兰内政的公然干涉是明目张胆的（赫尔辛基有位苏联大使因严重地干预芬兰内政而被召回）。但是这对弥合芬兰党内的分裂无济于事，更不要说确保新斯大林主义派获得优势了。自从炮制出“芬兰化”这个词来表示苏联在国外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后，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国外巨大支持的芬兰共产党从未能够单独地执政过，而且在他们内部，占上风的并不是最亲苏的共产党人。但芬兰化在其他方面是起作用的。

意共尽管要想成为一个“新型的党”，但仍与意大利所有政党一样，经常地发生内讧。除了《宣言》造反派外，意共暗中分为两派已经有十年了。书记处成员乔治·阿门多拉和吉安卡洛·帕杰塔曾建议承认党内有“多数派和少数派”，承认从1961年开始党内有了不同的“倾向”（但不是“派别”）等事实；但因陶里亚蒂坚持认为这种建议违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而作罢论。到1969年于波伦亚召开的意共代表大会上，这些倾向的存在已经公开化，因此也就不再掩盖了。

意共最重要的派别有与阿门多拉联合的所谓右派，以及以英格拉奥为中心的左派，而贝林格的“自治论者”抱中立态

度，搞官僚政治的妥协。阿门多拉派喜欢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合作，一起来努力改革意大利的社会。他们害怕左-中派（社会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成功的合作将会孤立共产党。同时意共想同苏联领导保持最友好的关系，为此它准备压低党内对苏联侵捷行动批评的调子，并推迟实行意共党内的民主化。这些意见都得到“红区”的共产党员的坚决支持。这些共产党人在一些省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一些市级的政权机构中舒适地当着官。

相比之下，英格拉奥的左派倒能非常直率地批评苏联共产党。他们反对阿门多拉的合作态度和改良主义的建议，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民主党人的偏向。他们希望对意大利左派中的极端革命派和最高纲领派的力量加以引导，并把党外新的持不同政见者吸引到意共中来。他们决心努力实现党内民主的要求，虽然在这方面《宣言》造反派干得比他们强，而最后在他们遭到排斥时双方合作起来了。英格拉奥左派不屑与社会党领导人联盟，却宁愿谋求与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基层组织的左派分子合作。

上述这些思潮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畅流无阻的。阿门多拉的思想最终可能导向真正的修正主义，即一种对苏俄亲善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英格拉奥的思想自然会走向口头革命派和新托洛茨基主义。对于贝林格派的官僚们来说，在一系列易变的，含糊的妥协中，有必要也很容易把这些支离破碎的、半心半意的思想倾向调和起来。由于意共根本不再扮演一个列宁主义党的角色，它也就没有什么迫切的必要性去解决这些“矛盾”了。相反，在选举时这对于同时吸引各种追随者倒是颇为有利的。改良派和最高纲领派的二元论和欧洲社会主义

一样陈旧；共产党象 1914 年以前的社会党一样从不得罪这一方或那一方。只要意共远未能得到官职，只要它满足于在选举时打破那使它仍得不到官职的最高的票额，意共就能在允许党内两派神经质的分歧公开化的情况下，仍旧保住它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赢得的势力地盘。

如果这些不团结的例子打破了共产党“磐石般团结”的神话，那末它们也就不能用来支持关于列宁主义党进步的自由化的其他神话了。西欧党的非列宁主义化并不是长期的趋势。持不同意见的左派对他们的领导人同社会民主党妥协不满，提出了在党内发扬“更大的民主”的要求。这是西欧共产党内斯大林主义者所唱的反调。党的官僚捍卫着列宁主义的严肃性，表现出热切地希望继续与莫斯科保持友好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又与社会党人联盟以便在本国谋求一官半职。另一方面，左派则要求有“更多的民主”，他们拒绝那种和西方民主主义合二为一的做法，他们也看不起社会党的领袖。在他们看来党的“自由化”并不是意味着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化”，而是党的激进化。总之，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非常爱好与改良主义者搞联盟；要求“更多的党内民主”的呼声则来自左派革命者。

芬兰共产党分裂的情况是个例外，它的自由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不象斯大林主义者那么明显的亲苏，例如，他们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发人深思的是，莫斯科长时间地克制着，没有谴责自由主义者，却谴责斯大林主义者分裂芬兰党，并在 1969 年命令他们回到党内去。它阻止他们正式成立一个对立的共产党组织。苏联的大量干预让自由主义者在党内维持着不稳定的控制，同时，显然也从不打算使斯大林主义

者能够取得使党回到内阁中去的胜利。斯大林主义者的活动,对莫斯科来说,即使不觉得讨厌,那末也不如在芬兰政府中有个改良主义的共产党来得重要。只是到了1974年年中,当长达十年的分裂已使芬兰党在政治上陷于无能的境地时,莫斯科才抛弃了中立的巧妙伪装。它站在斯大林主义者少数派一边,坚决主张在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之前或者重新回到联合政府去之前必须恢复党内团结。

列宁主义组织内的批评家们经常要求:一、通过基层组织与分区组织的横的联系来削弱垂直的组织结构;二、选拔提升对象应采取秘密投票,而不是由上级指定或命令;三、建立轮流担任领导的制度,以缩小党内专职官员的作用。这种建议在理论上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但是攻击在职领导“独裁”的舆论,导致了共产党内各种思想狭隘的派别的兴起。多列士是以“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张,不做哑口无言的稻草人”这样的口号开始了他那作为党魁的漫长的生涯的。厄尔·白劳德因为实行独裁而受到美国共产党内斯大林主义者的攻击。芬兰的斯大林主义者在1969年指责了官僚集中制的“自由主义者”。恰恰在1968年圣地亚哥·卡里略批评了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西班牙共产党内受苏联支持的利斯特派就突然发现他在西共党内是搞“独裁”的。

谴责官僚集中制的暴虐是共产党内进行论战的一个经常的特色,这种谴责甚至是最最专制的列宁主义者发起的。即,大多数共产党员认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机构的有些地方是令人不满的,但是只有在策略上是适宜的时候才能对其进行批评。如果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不但要求采取冒险的、极左的政策,而且不屑于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那么人们就一定

会怀疑他们是在推行一种极权主义的和偏执的新形式。而如果发现这些少数派在其队伍内部搞秘密的和宗派的活动（如《宣言》派那种情况），那么这种怀疑就被证实了。

如果说列宁主义政党机构内部提出的自由化的要求是策略性的，那么领导被迫一次次对此作出的让步，也是策略性的了。如果把这种让步串连起来而得出象马歇所说的，法共是“一个自由的党”、甚至是法国“最民主的党”之类的结论，那是错误的。罗歇·加罗迪在被开除之前被允许在法共的一次大会上发言，并在会上宣读了一篇演说词——这篇演说词后来在布拉格被查禁；又如允许皮埃尔·戴克斯在党的一个刊物上回答对他的思想的批判，这件事揭示了由于法共同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上的合作以及“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种事情的浓厚兴趣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气候；但它却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当乔治·马歇在党内巩固其统治时，由上级指定人选的做法，在这个党内是有增无已的。

西欧共产党内存在着迫切要求放宽列宁主义的纪律的势力，但是也有相反的势力。控制党组织的那些人知道，如果使党组织民主化，他们就可能有失去莫斯科支持的危险，同时也没有任何把握可以在新的选举中得到支持或发展新的党员。民主社会主义者毕竟已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组成了政党，而共产主义运动总是力图把自己同它区别开来。因此，列宁主义政党的纪律和它那磐石般的团结的神话确实是一种有利条件。数百万直接了解党是如何真正工作的西欧人留在党内——无论是长期的或短期的——因为他们宁愿服从那种专制的或者是异国的纪律，而不愿要那些愚昧的、漠不关心的或冒险的人们的民主投票。

一个共产党的非列宁主义化运动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已从瑞典共产党1962年以来的发展历史中体现了出来。他们把那一年本国竞选中遭到的失败，归咎于党同命令建造柏林墙的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为了断绝党与莫斯科的关系以及使党组织民主化，党内进行了长期而隐蔽的斗争。“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的这场斗争，在1964年已由C·H·赫尔曼森所领导的“现代主义者”取得胜利而告终。此后，该党便成为爱国的党，它简直不把莫斯科放在眼里，它还抛弃了很多列宁主义组织的东西。党的名称改掉了，把共产党改为左翼党——共产党人；基层支部组织的地位被降低了；繁重的党的工作被取消了；基层支部组织从民主集中制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党内官僚的权力被削弱了，而各种派别也就必然被容许存在。传统主义者断言那些在1967年新党章中正式规定下来的这些措施，将把党变为一个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极左分子起先断定，这种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

但事实上，却发生了一些相反的情况。共产党吸引了那种六十年代末期在欧洲迅速繁殖起来的极左分子。正当其他一些列宁主义政党对这些处于襁褓时期的极左分子进行斗争时，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却去拉拢他们，而且有一段时期还对他们的一个报刊给予实际上的津贴。结果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本身就成了激进派，而不是变成社会民主派。明显地左转成了它1969年代表大会的标志。这次会议大肆谩骂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并且大讲特讲口头革命的一套。从1972年代表大会可以看出，取代“现代主义者”而成为党的核心的这些左派，已经巩固其在党内的统治地位。那些害怕他们的党落到修正主义者手里的北博顿省的斯大林主义者，发

现他们自己正在与那些被他们称为“毛泽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以及鼓吹内讧的人们进行着斗争。他们在执行党的纪律和效忠莫斯科的同时，退而维护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以及维护和平取得政权的议会道路。甚至那些曾经盗用过“共产党”这块老招牌的极左分子也承认，激进的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变左了，并在青年中——没有详细说明这就是北博顿省的斯大林主义者所看到的，是指富裕的南方的一些中产阶级青年——正在有新的发展。非列宁主义化和继而产生的激进化的整个演变过程尚未结束。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正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过渡阶段，它在鼓吹革命的同时，支持着一个社会党人执政的政府并且做到在某种程度上和莫斯科言归于好。

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动态

一个西欧共产党，除了它正式的或固定的机构之外，能动地存在于三种性质不同的力量的稳定平衡之中；这三种力量即苏联势力、本国党内的官僚集团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其中的每种成份都是复杂的，并且都各有其内在的矛盾。每种力量无论在力量、选举、代表性、合法性、资金或号召力方面，都是同其他两种力量互相依存的。他们之间的变换不定的关系说明了西欧共产党的发展情况。

第一，苏联势力，这是反共分子和许多前共产党人所承认的唯一力量。他们认为，西欧各国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莫斯科，本国的党的官员只是些傀儡，而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是不爱国的或者是误入歧途的工人。虽然，这些党主要是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服务的，但是这里所谈到的那种苏联势力并不是指那

个相对地无能的莫斯科外交部，而是指苏联共产党。就苏联国家的一个机构来说(区别于党的机构)，确实干涉西欧共产党事务的部门通常是指苏联的秘密警察部门。因为“莫斯科”本身是错综复杂和不统一，以致某个西欧共产党会抱怨说，它不得不遵照贝利亚的命令进行一场审判，而这却是和它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宣传相抵触的(在这里，秘密警察局正在妨碍苏联的外交政策)；又比如赞成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则将有碍于它对北约组织的批评(在这里，苏联共产党又可能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绊脚石)。

第二种力量是本国党内的官僚集团，它也同样是不统一的。我们看到它已丢弃了它的“磐石般的团结”的主张，但它对于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机构的依恋这一点则是一致的。它的力量的根子主要是扎在这种机构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它被人们称为“官僚集团”，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最近西方共产党从革命组织蜕变为国家形式的机构时出现。另外，在党的机构之外，它在那些长期由共产党所管辖的市政机关、地区当局，以及许多由党控制的商业企业和阵线组织，也有它的基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黎的郊区和意大利的红区。

第三种力量，是由深深迷恋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神话的那部分工人所组成的。这是西欧工人中的少数派(西欧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倾向于保守派政党或者社会民主政党支持的新资本主义)，甚至也是那些投共产党票的人们中间的少数人。它在党员中也只占一小部分，在法共党员中可能只占五分之一，它是代表党的较下级的专职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一个阶层。此外，它还代表那部分工人，他们把共产党当作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理想的救星，他们虽然不是固定的积极分子，却能够

干预党的生活。这个爱好斯大林主义式共产主义的集团，不仅仅为本国党的官僚集团提供它生存所必需的选票、金钱和影响等，而且也为证明苏联统治阶级本身的正统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苏联统治阶级以西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名义，对苏联实行亚洲式的、现代化的专制统治，因此它迫切需要——正如它需要金钱和武器一样——西方资本主义内部那些真正无产阶级的少数派和潜在的革命的少数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如果这一小部分人背叛它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或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或者取消它对那些有莫斯科后台的共产党的支持，那么苏联的统治阶级将会面临一种缺少正统性的局面；而在俄国，这种正统性是具有革命的含意的。到了那时，本国的党内官僚就会发现，莫斯科对他们的支持已变成一种致命的负担。一旦工人们不再相信苏联的乌托邦，本国的党就会象西德共产党或支离破碎的丹麦的党那样，成为一个苏联的代理机构。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开始几十年中，这三派力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即本国的党没有自己的政治宗旨，它只是西方无产阶级乌托邦主义派和苏联的势力汇合的地方。在这样的党中，“莫斯科的眼睛”是通过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来统治的；而当其国际主义的面具被撕下时，就通过传达斯大林本人的决定来进行统治。不过，当这个党显示出它并不仅仅是苏联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且为那些信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西方工人所信托时，那么它就仍能取得本国政治上的某些联系了。苏联通过一帮革命党人对西欧共产党进行的干预，如果没有工人欢迎这种干预（把它当作来自剥夺了占有者的人们的嘱咐那样予以欢迎），那么也是没有用的（犹如中国依靠“毛主义

者”去干涉欧洲，在未来一代人中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西欧各国的党由于找到了力量、选票、金钱和威望的源泉，它们在信仰乌托邦主义的工人和苏联之外就获得了自己的势力。这种情况在大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大党一般是由一个宣传组织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然后再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一个尽管是离执政还非常遥远的政党，但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却代表了一种可能的远景。此外，甚至连那些现在仍然是比较小的党也适得其所；他们找到了一条能在本国发生影响的途径，因而供养着一个小小的党内官僚集团。在这个时刻，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机构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开始抱有自己的政治雄心。虽然如此，它还不能够自立，因为它不能没有苏联的援助，也不能不要亲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对它的效忠。但是，它能成为三种势力中的一种，而在以前它只是两种势力会合的场所而已。它谋求摆脱那些援助的想法已遭到了苏联和部分工人的反对。就是这种稳定的平衡构成了西欧各共产党的现状的特点，也就是这种稳定的平衡既说明了它们之所以脆弱的原因，也说明了它们为什么仍有活力。

就在寻求互相帮助以摆脱苏联和乌托邦派工人的控制而取得更大程度的独立的过程中，这些党实行了多中心主义。中苏的争吵使西欧共产党有可能与莫斯科进行谈判，而不是受其操纵，因为他们的支持——以及他们的工人支持者对苏共正统性的承认——对于苏联的统治阶级在其与另一个共产党大国抗衡时是极其需要的。这种争吵是他们争取少许独立性的机会。但是他们一般不关心这种争吵的实质。伴随着中苏争吵一起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党的分裂和长

期不和等现象，并不是由于中苏争吵而产生的，而且也不涉及同类的政治争端。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西欧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成员看出，现在和他们打交道的是削弱了的苏联势力，它已经降格以求地同西欧共产党谈判以寻求外交上的支持。而西欧党的领导人在那种形势下所寻求的独立则是官僚机构的，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这种独立不是某种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而是从使用现有的列宁主义政党机器，以实现其自身目标的欲望中产生出来的。

特别是，他们在和苏联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同时，还在努力争取斯大林主义工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也没有对社会民主党人作出让步。他们的非卫星化并不是搞民主主义化，也不是要促使他们同西方的议会民主结成一体。相反，这些官僚政客试图保存列宁主义组织机构的严格性，他们把那些既不受莫斯科支配，又不流于自由化的党，诸如中国、阿尔巴尼亚和特别是罗马尼亚的党作为他们模仿的榜样。如果把这种独立自主的“民族共产主义”的党误解为提倡自由化、反对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敌人，那就太天真了。在抚慰本国工人阶级中那些最最保守的分子（他们还梦想在西欧会来一个 1917 年式的革命）的同时，西欧共产党仍然保持着那种列宁主义式的由上级指派官员的权力。

这种在西欧共产党内出现的倾向，由于各种原因，而被苏联式的党所反对。首先，它带来不便，因为这种倾向与使那些党成为维护苏联对外政策的代理机构的做法是矛盾的。比如，当法国共产党怀有自己的政治的（特别是入阁的）雄心时，它在 1965 年总统竞选中，决定支持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反对夏尔·戴高乐，而苏联却宁愿要戴高乐留在爱丽舍

官。同样地，后来由于莫斯科希望维利·勃兰特总理继续执政，它可以通过要求其信徒在 1972 年的选举中投票支持几个月来一直被它咒骂为叛徒的社会民主党，来使西德共产党——它只是莫斯科的一个代理机构——处于政治上自取灭亡的地位。法共还不肯堕落到这种地步。勃列日涅夫也只好对法共目光短浅地“把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事实表示遗憾而已。但这仅仅是不便而已，其他倒没有什么。西欧共产党尽管能够起议会院外活动集团和街头示威者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影响西欧政府的唯一工具。它们并不打算在西欧进行一次革命，因为这样做既是向苏联提出了一项额外的保卫义务，也是对苏联统治阶级的威望提出了真正革命性的挑战。

西欧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对于苏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不便，而是一种威胁。它们抨击苏联的国内政策以及它与其他共产党的关系，从而对苏联统治阶级的革命正统性抱有怀疑。对莫斯科来说，幸运的是，西欧共产党的那种挑战还得有所节制，因为它们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还要继续依靠苏联的力量和威望，而且也受到它们本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对于构成共产党核心的那一部分西欧工人来说，莫斯科仍然是革命神话的化身。因而，反苏就是反共，而坚定的亲苏是区分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信仰那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呆板、单调、枯燥无味的教条的标志。他们的存在为苏联共产党提供了武器，它威胁要撵走本国党的领导或者建立一个忠于莫斯科的对立的共产党，以制止本国共产党内的独立自主的微弱愿望。

党的领导阶层就是在这些暗礁之间，掌握航船向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向着利用这个终身党魁制的列宁主义政党组

织为自身服务的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并不是什么“民族共产主义”，第一，因为没有一个西欧共产党打算建立一种超过苏联要求它去做的共产主义；第二，所谓走各国自己的道路去实现共产主义的辩论只是个幌子，或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做法而已。

卡尔·马克思曾经告诫第一国际，他预见到的革命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走的道路不会是完全雷同的（那时他在荷兰，刚刚访问过英国，因此他能想到的国家之间的差异程度不会是很大的）。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通过各国自己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列宁首先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而且它大大地越出了马克思所预想的差异范围。每个西欧共产党的领袖可以在不同时期宣称自己曾说过：苏联的道路并不是对他的国家所开放的唯一道路。例如，自1946年秋天以来，瑞典共产党就一直在谈论“瑞典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德国共产党从1945年6月开始在一份文件中谈到“德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份文件是在莫斯科印就，并由从1933年以来一直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些德国共产党员带到柏林来的。显然，这个“民族共产主义”是苏联的意见。事情并不是这样，陶里亚蒂在1956年说“苏联的样板不能也不应再强加于人了”；但是，多列士为了制造混乱，说他记起了——他把时间记错了十年——他曾在1946年说过，“每个国家的道路必然与苏联的道路有所差异”。

由于人人都这么说，那么，如果脱离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谁都说不准这是一种陈词滥调还是一种反抗苏联权势的迹象。当斯大林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1948年6月谴责说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

偏向”的时候，铁托是为之辩护的；而 1955 年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作安抚性的访问时又承认铁托做得对。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明确的，它意味着苏联的势力在外国共产党内是遭到抵制的。然而 1968 年以后，当西欧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同意苏联在 1968 年后使捷克党的局势“正常化”的措施（苏联此举已导致胡萨克上台，他是否定走本国道路的），同时又主张西欧不走苏联的道路时，这句话已失去了全部力量，而再次成为对陈腐的民族差别论的胆小的回声了。

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关于他们有权走本国自己的道路的大多数主张是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折中行动。因此，他们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意共书记处因而在 1961 年 11 月也承认，在这种讨论中，“基本问题关系到（意大利）共产党所必须享受的自治权”。然后，它好象对自己的坦率感到吃惊似的，又补充说：“没有谁曾试图干涉……我们党的自治权”，接下去又坚决声明：“意大利共产党的完全和有效的自治同它与苏联的团结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以转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要求自治的暗示，对一般共产党人来说也是难于理解的，除非他们在自治问题上了解本国党与莫斯科的关系状况。不然只有当某个西欧共产党走得太远时，这种自治的要求才表现得十分明显了。

奥地利共产党政治局的一名委员在一份由党内某些著名人士办的杂志上这样写道：“苏联党和政府进行统治的模式……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模式，甚至对苏联本身来说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当时西欧一个共产党就直接地攻击苏联统治者的正统性。当意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号召东欧起来革命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建立一个

左派的革命的代替组织”，以便通过一种“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力量在新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集团，去推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并取而代之”的时候，当他们向一份“资产阶级”杂志吐露说，“有不少意共领导人和我们一样，把苏联领导人看作是一帮强盗，但如果这样说就会造成严重的外交上的麻烦”时，这样，他们就已经走得太远了，尽管他们拙劣地申辩说，“我们的意思表达得太糟了”。即使完全没有这一类的造反行动，在西欧共产党内的苏联势力本身已感觉到了要求自治的动荡局势。这种局势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作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开始的，随着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废黜而加剧，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达到了最高峰。

斯大林是行使那种权力而真正没有受到挑战的最后一个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已感觉到他不得不向西欧共产党的官员作出说明，这些官员是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之后以及匈牙利事件以后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到了1960年，当赫鲁晓夫显然企图利用塞尔万—加桑诺瓦宗派集团去搞掉多列士，从而使法共对莫斯科的旨意更加驯服的时候，他却发现在那年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个党的会议上，他实际上不得不去收买多列士的支持以反对中国，其代价就是听任塞尔万和加桑诺瓦被清除掉。轮到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他们也不得不就他们没有按照一定的规程废黜“赫先生”的问题，向西欧作出说明。这一事件比之压制匈牙利的事件更使那些党的领导人晕头转向。正当勃列日涅夫谋求对外国党充分地行使苏联的权力的时候，世界上仍然效忠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却不到半数。勃列日涅夫显然以为莫斯科的权力至少在西欧共产党中是至高无

上的，因为当杜布切克说这些西欧党将支持他时，勃列日涅夫曾经暴跳如雷，叫嚷说：“谁要是敢这样做，我们有权把他们贬低到小集团的地位！”他开始验证他的这种权力，并获得了如下各种不同的后果。

一度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而且是苏联人民内务部（秘密警察）的驯顺代理处的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对废黜赫鲁晓夫表示了不满。1968年，它公开支持杜布切克；它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政权当作一个样板，而且正在向它未来的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推荐这个样板。因而1968年9月，西共中央委员会谴责华沙条约国家侵捷，并把亲苏的少数派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次年，西共在莫斯科七十五个党的会议上采取攻击性的敌对立场。于是莫斯科鼓动西共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当时由恩里克·利斯特将军负责组织），组成了一个对立的共产党。这些少数派获得了一定的实力，因为它把百分之十至十五的西共党员拉了过来，其中不仅有在东欧的流亡者，还有在西班牙的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在法国的侨民。在波兰和捷克新政府的支持下，反对党在莫斯科开会，并用《工人世界》这同一个名称出版党报，花了很多钱，猛烈（虽然无疑地是虚假的）抨击圣地亚哥·卡里略的僵硬的列宁主义统治。卡里略的党在物质上得到罗马尼亚的支援，在道义上得到意共的支持，而更为体贴的是法共的援助。在中苏争端中，它轻率地采取站在北京一边的立场，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却宁愿陷入孤立的境地中，这是一种标榜“自治”和在刺耳的国际主义掩盖之下的孤立。到了1973年，它宣称已征服了为苏联支持的持不同意见者。它的事例是有启发性的，它说明一个小党即使一度因屈从于莫斯科而臭名昭著，并

且处于佛朗哥独裁统治下自身难保的恶劣境地中，居然能够在同侪中蔑视苏联的权力。它所捍卫的一种独立自主政策，谋求同非共产主义力量在改良主义政纲基础上的联盟，仍然保持其严格的列宁主义组织。同时，它还在希腊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中鼓励类似的政治倾向。

奥地利党，即奥共同样选择侵捷事件作为它公开要求独立的机会。苏联的侵略行径立即遭到奥地利共产党政治局、接着是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对莫斯科的这种挑战是很严重的，因为奥地利共产党虽然是个小党，但它在老的奥匈帝国中是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的，特别是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东德这些国家中。但是，对奥共来说，进行那样的挑战是必要的，因为它关于同非共产党人合作的政策的可信性取决于布拉格的杜布切克政权的存亡。莫斯科策划通过亲苏的工人来击败那种挑战。处于高位的积极分子——其中许多人都是违章选拔出来的，并且大多数都早已上了年纪，他们由苏联和东德公开地给予金钱、出版物和人员的支持，终于在1969年1月举行的党代会上取得了控制地位。随后的两年中，这些亲苏的多数派做到了使三个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弗朗茨·马雷克）开除出政治局，使八十七名中央委员中的二十七名（其中包括党的首要的知识分子埃内斯特·菲舍尔）辞职、免职或遭到开除。青年组织被解散了，而由一个亲苏的残余组织取而代之，但实际上已经没有青年留在党内了。奥共党员人数由三万五千骤降到一万五千，党员平均年龄猛升到将近六十岁，并且它的最近的一次代表选举也失败了。关于谴责苏联侵略捷克的动议被取消了（这是西欧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改变立场的唯一事例），这象征着党的两个权力中心——苏联的

势力和老布尔什维克工人——清除了第三方，即曾经要求独立自主的党的领导人。

生存于军事独裁之下的希腊共产党，从1967年起谋求维护其对莫斯科的独立。当莫斯科为有利于苏联在地中海的海军政策而开始培养雅典的军官时，与希腊共产党发生了不和。（当莫斯科重新与马德里打交道时，苏联对外政策与西班牙反法西斯政党之间类似的冲突也激怒了西班牙共产党。）捷克事件对此种不和又似火上加油。在1968年爆发的党争中，莫斯科支持了在东欧的希腊流亡者，他们为数有好几万，现在已组成了“国外的”对立的党。1972年底以前该党一直由科吕因尼斯领导，后由卡里劳斯·福罗腊克斯领导（该党得到法共承认）。“国内的”希腊共产党则由安东尼奥斯·布里拉基斯领导，它得到罗马尼亚的援助和意大利共产党及西班牙共产党的承认。“国内”党虽然反苏，但是非但得不到米基斯·特奥多腊基斯的同情，也得不到其他共产党人的支持，那些人在1972年在希腊建立了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第三个共产党。据说莫斯科曾帮助那些军官追捕“国内”党的成员，而他们的就擒也真是意想不到地容易，就象派去支持他们的罗马尼亚间谍被捕一样容易。莫斯科在1973年改变了策略，企图使两派和解，但收效极微。

利用在莫斯科训练过的积极分子进行类似的直接干涉或官僚主义的干涉，这种情况非但见之于东欧共产党中，而且也见之于芬兰、叙利亚以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之中。各国共产党人——除了迄今为止的法共以外——都认为，对于各国党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个一直存在的问题。1960年，路易吉·隆哥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说中讲到（该演说在两年后才发

表),为了尊重各党的独立自主,“每个党都必须约束和命令自己的党员在普通党员和其他党的组织中不得进行任何派别活动”。为了表示他指的是哪一个党,隆哥在同一天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坚决要求“某个党以拉宗派去颠覆兄弟党的活动”必须停止。荷兰党甚至在十二年以后仍抱怨“(别的党)支持个人或集团以攻击正常选举出来的有资格的领导人”,抱怨“敌人的干涉”(这恰恰是对现代修正主义即对莫斯科的抨击)。确实,荷苏友好协会正被用作亲苏的持不同政见分子聚会的地方,它并且向所有党员供应一份得到苏联资助的月刊,这份月刊上充斥着对荷兰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荷共决定不参加国际共产党会议,也不邀请外国党来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自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解散以后,国际共产党会议一直是最老的权力中心——莫斯科——对西欧共产党进行直接的、官僚主义的干涉的场合。

凡是干涉无效的地方,莫斯科可以求助于一个党内忠诚的基础核心力量(即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去反对甚至是最大的党的领导人。无数相信乌托邦的工人的出现使人确信,由于1917年苏联出现了一个工人的天堂,使得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在西欧移植共产党成为必要的事情。在其幻想不断破灭的五十年以后,他们能够继续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党坚持对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教诲(他们是这些党的权力基础)。但是现在,当西欧各党企图独立于莫斯科时,这说明莫斯科所创造出来的工具都有转而反对它的危险了。在波伦亚,意共最大的大区党组织在六十年代开始象意大利其他政党的官僚政客那样行事,例如封官许愿、贪污腐化、与资本家交朋友、乘轻型快速双座汽车、过着象当地暴发户那种奢侈生

活等等，于是按苏联式联谊会形式组织起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工人们（例如波伦亚的电车工人的组织）便起来反抗，并且重新宣扬最高纲领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两者甚至在1917年以前就已成为艾米利亚地区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了。又如，在1968年意大利共产党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在意大利全国各地的类似的组织就在苏联的煽动下起来攻击意共领导人。有人在意大利工人中散发传单，揭发“腐败的”意共领导，谴责他们的改良主义的议会斗争策略，并且重提他们过去所做的种种“没有骨气的事情”。据认为，这些传单都是从苏联和波兰大使馆发出来的。同时，众所周知，这些使馆的外交人员还煽动意共基层的积极分子；东欧的电台在广播中谴责意共的路线。一些为苏联反击意共批评的行动辩护的杂志也突然在意大利出现（例如意大利文版的《苏联》杂志）。扰乱人心的谣言不胫而走，说什么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这个党得到一部分党员工人的支持，是由斯大林主义者诸如埃多阿多·奥诺夫里奥、安布罗季奥·多尼尼和皮特罗·塞奇伊等人领导的。对于苏联的这种颠覆活动（在意共党内被称为“不同意见的争论”），意共从来不敢回击，尽管他们大胆地同苏联在波兰和东德的代理人争吵过。贝林格吁请其斯大林主义的广大党员最终放弃他们对于“苏联现实所持的乌托邦的观点”。但是贝林格未能说服他们，因为他还不肯直言不讳地指出：莫斯科并不要求各国共产党努力实现革命工人的美好愿望，而只要求他们在意大利的政治制度的范围内工作，以便更有效地维护苏联的外交政策。在1968年至1969年的骚乱中，落在极左派头上的任务是，努力使工人们明白：他们迷信十月革命神话的唯一结果不过是给苏联的寡头政治罩

上一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并且使莫斯科有办法去制止意共党内的任何独立自主的行动。面对着苏联搞的动摇党的基础的活动，意共领导人把批评苏联行为的调子降低了，并且把党的国内政策来了个急剧的向左转：即同意工人们那些使得意大利陷入1969年经济危机的要求，以便力争重新取得基层中斯大林主义分子的信任。

在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中，大概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完全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条件，笃信苏联十月革命的神话，或者至少宁愿为远方的苏联的不公平现象进行辩解，而不愿忍受当地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状况。但这些人足以构成一支正在丧失战斗性、却又不愿放弃无产阶级特权的党的骨干队伍。当然，这些人在政治上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他们不仅受到俄国人的奉承，还得到了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各色各样极左派的恭维。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即非无产阶级的、搞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的魅力毫不动心。在六十年代，中国对西欧党进行过无数次干涉；但在亲华的持不同政见分子被开除以后，中国的干涉就停止了。他们仅仅在比利时共产党内，仍保住了该党三分之一的党员跟着他们走。经过这些挫折，中国似乎意识到要确保对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不是去通过无产阶级基层的毛派分子，而是要通过本国的共产党的官僚集团，要通过象罗马尼亚那样独立于莫斯科的党来进行控制。在西欧共产党的官僚看来，北京可以提供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前景。这个共产国际将由主张自治的各国党的官僚集团组成。在中国的庇护下，他们可以免受苏联的干涉，并且以中国的超级革命学说为借口，他们可以撇开无产阶

级这个基础。以农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亚洲共产党的提议，对于具有工人阶级神话的西欧共产党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而在罗马尼亚的发起下，他们的提议被演变为多中心主义之后，才得到了一些成功。

陶里亚蒂在1956年第一次提出多中心主义时，他的见解是遭到忽视或反对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他国家共产党不明白陶里亚蒂讲的多中心在两种不同情况中指的是哪一种：是指各国党按地区组成集团呢，还是指各党各自为政？法国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以为他指的是第一种，因此加以反对。陶里亚蒂不得不答复说他指的不是搞地区性集团，但他承认这种想法早有人提出过，甚至已在西欧共产党中试行，尽管这并非出于他的建议。隔了仅仅几年之后，一直到六十年代末这段时期里，在搞地区性集团这个意义上的多中心主义，成了那些力争从苏联势力范围中独立出来而寻求互相支持的共产党为保卫自己而作出的一种反应，因为它们反抗苏联的话，就有可能不仅失掉物质援助和声望，而且会失掉无产阶级核心力量对它们的信任。到了上述这段时期，那些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树立起利用列宁主义的组织机构来为自己目的服务的雄心，他们知道苏联不会反对与苏联外交政策一致的非革命的政治活动，并且知道充满幻想的工人非常习惯于宗派性的亲苏辞藻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种混合做法。唯一的困难是，西欧各共产党有效的政治行动需要得到左派民主力量的合作，但它们反对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并要求共产党盟友同苏联政策分道扬镳。多中心主义似乎成了解决这种尴尬困境的良策。

但这种困境是难以摆脱的，因为苏联和西欧共产党对正

统性的要求是相互冲突的。相互承认正统性，或者说相互认可各自的意识形态，一直是象提供物质援助一样的重要，而且这总是双方面的问题。苏联统治者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它意识形态的赞同，就象西欧共产党也需要“剥夺了剥夺者”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威望一样。但是一旦两个党开始执行两条不同的路线时，各自的正统性必然会形成，是否赞同对方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必然会受到检验。它的办法就是签署可以各自做出根本不同解释的联合公报，而且不理或压制对方的抗议。此外，苏联报刊引用西欧共产党报章和文件上的话时（这种引用一直是用来证明苏共对其人民的统治是正确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给西欧共产党打气的重要方法，就象好学生的家庭作业总会被在课堂上读出来给大家听听一样），往往经过刻意挑选，有的甚至加以歪曲捏造。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些精心炮制的过程了。

1973年3月，勃列日涅夫和贝林格在莫斯科举行了近五年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并发表了一份内容涉及从外交上解决由于苏联侵捷而引起的两党分裂的联合公报。意共同意不去提及（也就是中止）它在苏联对捷政策问题上的反对态度；苏联共产党则同意明确表态让每个共产党拥有自主权。在这笔交易里，贝林格还同意支持苏联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政策，勃列日涅夫则投桃报李，称誉他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然而，《真理报》在发表这份公报时，删掉了关于各党有权自主的部分，并且通过对措词的精心选择，使人们看起来以为意大利共产党对1969年会议那个赞同侵捷行动的结论在会后还是拥护的。《团结报》立即向苏联“要求”进行会谈，在会谈中，贝林格指出了《真理报》发表联合公报时断章取义和省略删节的

错误。塔斯社迅速报道了这次会谈，但又省略了贝林格纠正《真理报》错误的这部分内容。但是后来，《团结报》也略不报道如下消息：贝林格在莫斯科赞同勃列日涅夫关于欧洲一体化观点的当天，贝林格的同僚阿门多拉在科隆就欧洲一体化问题为另一种合乎某些西欧社会党人胃口而使莫斯科反感的观点辩护。

很多共产党有类似的经历。1968年，《真理报》刊登了芬兰共产党的一个地方组织赞同对捷克入侵的决议，而撇开不顾该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谴责这种入侵的正式决议。法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在1972年签署的共同纲领，莫斯科未予发表；当《真理报》刊登这个纲领的摘要时，没有提到纲领中关于“可以从一个国家照搬到另一个国家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绝对不存在的”这个论断。作为回报，参加1972年9月法共代表大会的一个苏联代表也被要求在发言前重拟他的发言稿。当时，法国总统行将出访勃列日涅夫，而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法共的政治抱负之间的冲突不幸是很明显的。《人道报》把勃列日涅夫的发言中赞美蓬皮杜的话统统删去。苏联报刊就用删掉马歇讲话稿中所有抨击蓬皮杜的句子的办法来对付。更坏的是，苏联报刊利用西欧共产党报刊的社论来回答人们对苏联国内不公正现象的意见；而且当西欧共产党开始谨慎地触及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事件的时候，苏联报刊也开始歪曲经过它精心挑选的引文。例如，塔斯社国际部发表的对索尔仁尼琴著作《古拉格群岛》的谴责文章，1974年西欧共产党的报纸把它登载出来时，只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没有加以评论。但它们立即被苏联国内报纸所转引，仿佛这些文章原先就是西欧共产党报纸自己撰写的一样。苏共中央政治局曾

长时间地争论应当把哪一种勋章授予阿拉贡，这也是关于正统性问题在思想交流中发生危机的一个迹象。阿拉贡是法国斯大林主义者在文学界的光荣。他曾把捷克局势正常化批评为“精神上的危机”。在交流思想见解时删改和捏造的可能性是这样大，以致某国共产党人在另一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现在都须在会前提交审阅。如果他们不把发言稿修改得适合他们东道主的胃口，发言权就将被取消。1968年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波共党代会以及1971年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参加捷共党代会碰到的情况就是这样。1972年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只允许俄国和北越在讲台上发言，发言的内容大概也是经过事先审查的。其他党的代表团只得递送书面的贺词，而捷克共产党的贺词在《团结报》上发表出来时还被加了一个批判性的评论。事实上，有些党现在拒绝派遣或接待这样的代表团。法国共产党发出通知说，它将不邀请任何外国共产党来参加它的1974年的代表大会（甚至也不邀请莫斯科的代表团）。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西欧共产党认为，如果苏联的正统地位得不到承认或者由于过多的让步而不得不放弃的话，可以想见，多中心就可取代苏联（一个中心），而居正统地位。那就是说，与同一地区的志趣相投的共产党干部合作，将为脱离苏联监护的尝试提供一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保证。这种思想在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化中就得到了发展。那次论战的主要问题是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即它在所有其他共产党中作为三个权力中心之一的传统作用问题。其余一些争论点都是由此派生或者是为此打掩护的。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宗派主义”的争论就是

关于苏联和中国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在其他党内搞宗派活动的问题。“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分别是苏联和中国对其他党进行干涉的标记。

多中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将可以根除苏中两方面的影响，并且可以利用共产党地区性集团来回击这样一种指责，即所谓一个党若奉行多中心主义，就会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堕落到民族主义的一党利己主义中去，而根据列宁的观点，这导致了1914年第二国际的解体。罗马尼亚共产党已经利用政权（特别是行刑队）清除了党内少数亲苏分子。罗共是积极鼓励推行多中心主义的。从1969年起，它同意大利、法国、芬兰、比利时、瑞典、希腊（“国内的”）、挪威、瑞士、英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还有日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相互访问。1972年5月，罗马尼亚人甚至设法获得了小心翼翼地闭关自守的冰岛共产党的邀请。通常在这些会谈以后要发表一个公报，在公报中，罗马尼亚人及其对话者都要赞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立自主、多样性和忍耐性”。如果去布加勒斯特的访问者愿意把话讲得更加明确一些，公报里就会表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中心”或“一体化”的观念，并谴责外国（就是指苏联）对其他党的干涉。1971年9月，当卡里略在布加勒斯特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承认”了（用“承认”这个字眼，仿佛是国与国的关系一样）中国共产党，紧接着还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这种做法就使得对苏联的这些谴责的意义更为明白了。

西欧共产党受到了布加勒斯特的鼓舞（例如在希腊人和西班牙人的本国根据地遭到威胁的情况下，罗马尼亚人甚至给予援助），因而自1969年起，它们相互之间的访问比以往任

什么时候更加频繁。它们的地区性的秘密会议次数也增加了：1959年在罗马、1965年在布鲁塞尔、1966年在维也纳、1970年和1971年在巴黎、1971年在伦敦都开过会；还有1973年在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巴黎、罗马和杜塞尔多夫举行过一系列磋商，为1974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作了准备。接着，在里昂和罗马就一些特别问题召开了地区性会议。所有的西欧共产党，从塞浦路斯共产党到芬兰共产党，甚至还有荷兰共产党，都参加了最重要的一些会议，但是土耳其共产党则有时缺席，而冰岛共产党则经常缺席。当时，这些会议不是欧洲共同体内政治一体化的总过程的一个方面，因为与会者还有共同体以外的共产党以及对一体化抱敌对态度的共产党，例如其中有中立国家的共产党。事实上，共产党也十分谨慎小心，尽力不使人觉得欧洲共同体内的九个共产党（以前是六个）之间具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些会议的目的也不是要在欧洲范围内取得政治上的效果。为此，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可能就得同西德的以及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打交道（实际上已有所接触），而不同无足轻重的西德和英国共产党进行磋商。当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去参加小小的德国（西德）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和瑞士劳动党的会议时（例如马歇在1973年和1974年曾去参加这类会议），他不是去谋求欧洲的统一或与左派的合作的，而是去谋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合法地位的。

西欧共产党地区性会议的组织者没有忽略向那些完全依赖于苏联（或东德）支持的党发出邀请，诸如葡萄牙、西德及西柏林的一些共产党。而且地区性会议也会赞成苏联的某些政策，例如赞成俄国人在1973年于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会议上所提出的欧洲合作的设想。但是他们不会赞成举行或者至少是

筹备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例如象莫斯科为了通过干涉第三党的事务去同中国进行较量而竭力主张召开的那种世界性会议。多中心主义——在拉丁美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要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表明：公然反抗苏联霸权的本国的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自从1917年以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标志的无产阶级世界大同的思想。

但这种策略不是一定成功的。第一，在有德国和葡萄牙的共产党这样一些苏联代理人出席的会议上，苏联势力的影响并不是不存在的。第二，至少有一些西欧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认识到了，所谓“地区性的国际主义”，在某些政治抱负狭隘的党的干部那里不过是空洞的词藻而已。党的干部说“团结只能寓于多样性，必须尊重各党的独立、尊重各党有制订自己国内外政策的权利以及尊重各党对每个问题上所持的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只有在上述的基础上，团结才是可能的”。西欧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认为，这种“团结”就象1914年以前第二国际的情况一样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

四、西欧共产党人与 新资本主义的民主

我们已经对制定共产党政策的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官僚们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在再来看看那些政策对于西欧新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以及欧洲的团结和防务各方面有些什么关系。后面一部分，我们将看看西欧共产党人想借以推进这些政策的那些政治联盟。

经济政策

由于西欧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和列宁许多年以前作出的关于经济的假设，要他们说明二十世纪后期的经济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强调了生产的一个因素——劳动力的作用，而以牺牲生产的其他因素，即资本、企业以及（当今最重要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为代价。这不仅导致了我們已看到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无产阶级偏见，而且还妨碍共产党人对经济的理解。列宁主义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处在帝国主义垂死挣扎中的远见，也不大会有助于这种理解，尽管其原意并不是要这样做。更确切地说，这种远见是用来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或者是作为一则神话，是一份带有宗教启示性质的预言书，没有任何事实可以同它辩驳，而它却可以列举许许多多例证对

之加以阐明。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内在的矛盾而正在走向灭亡这一概念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他们是这么看问题的：假如经济扩展，资本越过国境，那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罪恶勾结；而如果在经济上存在着困难，存在着冲突，以及存在着有民族主义的要求贸易保护的势力时，那就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一旦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已到了最后的危急关头，就很容易找到实例来阐明这种“危机”，即便这种危急关头十年又十年地持续下去。法共政治局说，金汇兑本位的垮台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方面；身为共产党人的市长们说，市郊犯罪案的增多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方面；国家电台的腐败、无法解决的谋杀案件、商业界的贪污行为以及任何其他丑闻，同样也都是危机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正是1972年12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主题）。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显然不是经济上的分析，而是西欧共产党人的一套花言巧语。这种理论可以搬出长长的铿锵动听的句子来，这种句子一开头就是：“危机正达新的高度”，而其内容则是罗列一些毫无联系的现象，诸如雷诺汽车厂的工人发生骚动，中学生反对服兵役，大学生怨声载道等等。这种理论并不是对经济的分析，因为它可以年复一年地在任何时候引用，可以应用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既可适用于葡萄牙，也可适用于瑞典。瑞典的确从未有过帝国统治，社会党人的统治在那里已有三十年了，但尽管如此，根据这种观点，瑞典还是成了“帝国主义者”，成了“世界上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如果瑞士和法国的共产党人承认瑞士是一种避免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特殊情况”的话，这种特殊情况也只是一种由于剥削移民劳动力所产生的暂时现象。

在他们看来，作经济上的分析是多余的，因此无须对某一经济政策加以合理化说明。政策是阶级的行动，因此，凡目前统治阶级所干的一切都要受到谴责，而凡是以工人阶级名义所做的一切，都应得到赞同。一个政府在达到它的阶级利益方面，决不会疏忽大意、碌碌无能、懵懂无知或者使人遗憾的，而总是非常老练的。这样，西欧共产党人就不需要预先设计他们的政策，因为他们所制定的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政策。这种对现实的回避就会导致机会主义。当西欧共产党人在战后参加政府或成为多数时，他们就跟政府合作，共同参加经济重建工作。多列士反对罢工，号召提高生产；意大利共产党热衷于重建工作；芬兰共产党赞成用武力制止罢工，或强制罢工者为政府工作。但是当西欧共产党人转入反对党的地位时，他们就恢复了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即所谓资本主义总是要走向永久的停滞，它不能促进技术上的发展，也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云云。意大利共产党也具有这种观点，但在面临意大利经济发展时，又把这种观点抛弃了。到1956年时，陶利亚蒂还讥笑法国共产党人死抱住这种观点不放。1955年，法国战后重建已经完成，一个长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开始了，但就在那个时候，法国共产党的确还是把资本主义导致“绝对贫困化”的观点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法国共产党人在整个这段经济繁荣时期，仍一直坚持认为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低于1938年，甚至比1911年还低；欧洲工人吃得比十八世纪还糟。假如法国人购买小型摩托，那只是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工作地方太远了；如果他们买汽车，也只是因为地下铁道的车票太贵了。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共产党人对经济现实是漠不关心的。二十年以后，贫困化的教条还是没有被决然抛弃，而是继续用

同样的诡辩来为其辩护：假如工人买住房，那就表明房租太贵了。但当新左派在六十年代恰恰正是攻击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所谓的“过剩”和浪费，而获得成功的时候，那么“绝对贫困化”这个十九世纪的教条业已表明它只是对政治上不满分子的一种过了时的动员口号。

西欧经济的进展太显著了，无法予以否认。为了说明这种经济进展的原因，西欧共产党人借助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理论。这个理论是列宁于 1917 年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还没被想象出来以前所提出来的，1960 年莫斯科八十一个党会议的决议，使这个理论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理论指出，资本的集中已经导致垄断资本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经济统治，这种经济统治控制了国家，使国家机构变成为仅仅是一种执行任务的代理机构。他们对垄断资本家小集团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进行剥削，连殖民国家也包括在内。这种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的结合，似乎隐约地是指人们已看到的、强大得足以完成战后欧洲巨大变化的那些力量。但要对这些变化进行详细叙述，不能不使人们对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神话表示怀疑。这种舆论活动毫不关心经济上的分析，也不在证实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方面下功夫，而只是满足于把它作为一种口号来利用，甚至还把它缩写为 SMC^①，好象要避免人们企图对它进行思考似的。“垄断”这个标签被用于所有的大公司，不管这些公司控制市场的能力如何。种种有关国家甚至对最大的公司也能施加影响的意见都一概遭到否定。如果公司之间进行竞争，那就表明 SMC 的“矛盾”，

^① SMC 即英语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的缩写。——译者

如果不竞争呢？则又证明了“垄断”。这样的分析太肤浅了，很明显，西欧共产党人感兴趣的是：尽快说明这一理论在政治上的含义。

这种含义是指：无产阶级和资本家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史诗中的主角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人民”为一方，而另一方则是人数极少、象阴影似的、不露面的垄断资本家——这类垄断资本家，赫尔曼森指出，在瑞典有十五家；在芬兰有二十家；而据挪威共产党人说，在挪威有九十家。而在其余的居民人口中，所有政治上的界限就象所有经济上的界限一样，都是模糊不清的。谁都可以自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阵线组织。这种阵线的目的是要“孤立垄断资本家”，把他们置于平民主义者的愤怒谴责之下。国家与资本相结合所形成的“一体化结构”曾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但是随着西欧共产党人政治野心的增长，他们又认为可以从内部来攻破这种结构了：这就是选举阵线的领导者担任部长职务，以便利用国家的权力来没收垄断资本家的财产。正如列宁所说的，对于垄断资本家除了剥夺他们的财产外，就别无其他了；因此，改良主义的建议都可置之不理。

更确切些说，改革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但同战术是有关联的。贝林格说，提出改革是为了争取同盟者，这些同盟者还必须加以“激进化”，意思是让他们并入共产党统治下的“历史性集团”的势力范围。克里格尔虽已表明，法国共产党是怎样经常反对经济改革的，但一旦改革的意见得到通过，他们又企图控制实施这些改革的机构（诸如国有化企事业、基层委员会、社会治安等各方面的机构），或者以清除各项改革中的“阶级合作”性质为借口，来改变改革方案原先的意图。然后，把

自己打扮成真正维护“工人阶级所得利益”的保护者。

这样，西欧共产党人的经济政策就成了专制主义的政策，保守主义的政策。除非共产党的部长们使主要工业国有化，否则这种经济政策对制度不会带来任何影响。除国有化以外的一切形式，都是阶级合作或者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某种形式。SMC（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集团，如果要在其内部再加以划分，譬如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利益是不一致的，那就大概是想要组织一个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的“神圣联盟”。

建立在这些前提下的经济政策，是为了吸引各种政治上的不满者而设想出来的。因此，西欧共产党就成了“不满者的联盟”。在对垄断资本家进行大规模的最后剥夺以前，西欧共产党以同样的态度欢迎相互之间最不能相容的追随者（消费者与店主，地主与佃户），因为在他们看来除了垄断资本家同全体居民之间的根本的经济差别以外，其他各种人的经济差别都是无关紧要的。法国共产党不仅支持工人、雇佣劳动和各种领养老金的人所奋斗的目标，而且也支持下列各种人所奋斗的目标，如：渔民、专业足球运动员、快艇驾驶员、有残疾的儿童、小业主、汽车驾驶员、滑稽演员、来自殖民地的难民、纳税过重的经理、工程师、技术员、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甚至还有小走私贩。正如戈里在谈及意大利共产党时所说的，一个老是抱怨一切的政党，将会吸引所有怀有某种抱怨情绪的人。政治学家严肃地把收罗各种各样的追随者称之为行使“群众领袖”的职责。然而，从古罗马人到马克思，群众领袖一直被人们理解为是为某些特定利益集团讲话的。对于平民主义与现代共产主义来说，唯一的判断标准是：他们的所得利益

必须是“小”的。

西欧共产党保护小地主、小资本家、小股东这一点引起了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是否也会同样保护小高尔夫球员和小垄断资本家呢？所有西欧共产党都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区别这一理论，而在他们认为是对选举合适的时候，就会去保护除了封建垄断资本以外的任何形式的企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既然西欧共产党人也保护遗产继承权和土地私有权，这样，他们就受到了许多具有共同利害的集团的欢迎，譬如象美国的反对华尔街的平民主义组织，法国的布德热主义，意大利的卡伦克阵线，芬兰的贝科·贝南莫党，以及任何主张从被人模糊地勾画出来的“大企业”和“金融巨头”中间去探究社会弊病的运动。

西欧共产党人提出短期经济措施，鼓励消费；而他们提出来的结构上的改革则是搞国有化。马歇曾经讲过，资本的过于集中是当前制度的主要特征。西欧共产党人关于减少或免除对日常消费品的间接税，关于控制价格并增加工资，以及关于创建费用很大的新的社会公益机构等诸方面的建议，确实会阻止更多的资本形成，这一点他们是深信不疑的。假使有人反对说这种措施也会引起通货膨胀，那么马歇就会回击，说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是“目前国家所宣布的税收的四至七倍”，因此，只要没收垄断资本就足以供给增长了了的消费了。

法共在1934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的人民阵线内部，反对国有化，这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共产党人已赞成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了。因为意大利政府继承了法西斯主义的国有化，意大利共产党就能满足于要求糖和药物生产的立即社会主义化；而瑞典左翼

党则要求接管药物和建筑材料的生产部门、保险公司以及军事装备；德国的共产党还要加上接管银行、报刊和有关文化领域的工业。法国共产党所列举的准备实行国有化的项目（这种国有化被认为是该党经济纲领中的轴心）将包括法国全部生产投资领域的一半。虽然法共所列举的这些项目由于社会党人的坚决要求而在1972年的共同纲领中有所缩减，但由于法共允许工人可以要求对他们的企业加以接管，所以实际上共产党的国有化是无止境的。

政府既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西欧的经济，我们就很难看出进一步的国有化将如何来扩大其本身的社会影响。至少意大利共产党人已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过于臃肿而又非常松散的公有企、事业是不够的。况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单纯地把更多的财产转变为尊重私人资本的国家所有，也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然而，西欧共产党人之所以迷恋国有化恐怕与其说作为经济政策来考虑，还不如说是从选举得失来考虑的。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了：有多少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有当他们在政府机关担任工作后才对经济过程有所了解；又有多少共产党员和选举人是在公共企、事业里工作的。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设法扩大它认为对自己非常适宜的周围环境，这是很自然的。国有化企、事业是共产党势力的基地，而西欧共产党也仅仅为了这一点才希望增加国有化企、事业。当党内极左分子首先在诸如国营雷诺汽车厂这类共产党的“世袭领地”攻击共产党的势力和威望时，他们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然而，国有化在年轻的左派势力看来就象贫困化一样，是一种过时的概念，他们对工人管理更感兴趣。工联主义的奢望在六十年代复活，反映了对国家所有制幻想的破灭，不论这

种国家所有制采取的是我们在苏联所看到的那种大规模的令人感到压抑的形式，还是西欧所熟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向公有制的过渡并没有带来解放，年轻的社会党人正在寻找一种没有奴役的集体主义制度。西欧共产党东山再起以后，强烈反对这些乌托邦式的方案，就象在五十年代痛斥南斯拉夫人的异端那样。可是一旦当党的工人基地中对于这种方案表现出有些赞同时，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减弱了他们对这种方案的反对。赫尔曼森承认苏联的国有化过于集中，过于强制，他还用不具体指明的方式断定，西方的国有化同工人管理将是一致的。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南斯拉夫式的试验用于公有企、事业方面将是可行的。就连曾严厉地谴责工人管理是一种空想的法国共产党，看到它的对手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因鼓吹工人管理而获得了广大支持者时，也声称发现了工人管理有其很大的吸引力。要说这种让步是否仅仅是口头上的，现在还过早。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做法类似于共产党人匆忙地倒向当时流行的思想，诸如赞成五十年代的民主方案或是赞同1968年以后的自由意志论和提高“生活质量”等主张。一个已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就象其他西欧政党一样，总是企图扩大国家的权力，拒绝向工人们交出即使最小的经济权力。人们这样想大概是不无道理的吧。

从西欧共产党人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暧昧态度来看，他们在国家控制和工人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徬徨可能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近在1956年，陶里亚蒂还在狂热地谈论“苏联的合作化所取得的伟大的、实际上是最伟大的成就”，但到了1961年，多列士却坚持主张在共产主义的法国将不仿照苏联的样板。今天，没有一个西欧共产党再推荐农业合作化了，因为苏

联这个先例的失败和它所表现出的不人道之处，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又没有人愿意仅限于提“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而是立即加了补充：共产党政权“鼓励”以建立农业合作社来作为朝着“社会主义农业的高级形式”发展的一个阶段。至于如果农民拒绝参加合作社则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却没有说。这样，在这里就不存在任何超越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地方了，因为斯大林也是要“争取”小农自愿加入农业合作社。紧接着在苏联出现了恐怖与饥荒，但这只是小农不愿意参加合作化的结果。

较上述更为暧昧的态度贯串于共产党的整个经济政策。列宁所说的“我们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实现的要求”就暗示了这一点。这是一句格言，每当有人表示反对，说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建议都是不切实际的，或是带有破坏性的时候，西欧共产党人就想起了这句格言。他们在那时就指出，他们就是要准备使自己的要求起到动乱的作用，因为共产党就是意图破坏资本主义的经济。当然，只要共产党的任何一项具体政策看来是切实可行的（他们有些政策是切实可行的），那末他们就不提上述这一点了。对于这方面，在此简要的评论中，我们并没有因为不赞成共产党的经济政策而把它忽视。在西欧共产党人指出法国和意大利经济上所存在着的无数难以解决的非正义和不平等的现象时，他们常常提出也许很可能行之有效的带补救性的建议。甚至连他们所咒骂的“利润”（“利润”这个词容易使人误解，因为在把它另行命名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盈余”后，共产党对于这个同一样的东西就表示赞同了），也常常是针对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不民主的方面，以及那些在经济上最带有危险性的特征，即公司董事长这些受委派的金融寡头利用其占有的利润进行再投资。然而，要同这么一

个政党商讨经济政策是不可能的，这个政党拒绝使任何判断政策的标准固定下来，并且坚持在选择其政策时可作任意选择，既可以是能让人接受的，又可以是起破坏作用的。一个时而是改良主义的时而又是革命的政党，实际上对经济政策可以不作合理的考虑，但是它收罗各种政治上的不满分子所带来的后果却是避免不了的——这些人推出了他们的要求和激起了心头的希望，而这些希望和要求又是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不能使之满足的。当然，每个民主党派都要收罗自己的支持者，但西欧共产党人是通过把自己装扮成既是稳定制度下的“群众领袖”，又是推翻这种制度的革命者来吸引最具有乌托邦思想又最不能同现存社会制度和谐共存的那部分人的。

共产党人与议会民主

西欧共产党对议会制度的政策可以从它在议会中的表现这个可靠的证据来作判断，至少在那里，共产党人的活动可以说是自由的。可是他们并不总是如此。尽管新的德国的共产党从1971年起在西德已可以合法地活动，但在某些地区，共产党员还是不能进入政府机构，不能担任公职（甚至不能担任教师）。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宣称在五十年代曾遭受过非法的迫害，尽管有些是由于他们自己采取了暴力行动而招致的。在法国，共产党人坚持认为，他们参加议会和地方政府受到了不利于他们的不公平的选举法的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希腊、丹麦、挪威、芬兰以及冰岛，共产党人不但参加了议会，实际上还参加了政府，而在冷战期间，他们就不仅被排斥于政府和执政的多数派之外，而且还不能经常参加一些

机构的活动，尽管他们通过选举已在这些机构中担任了职务。然而，有时他们也拒绝参加任何活动。到了冷战末期，这种被排斥和拒不参加的情况减少了，在芬兰和冰岛，共产党人一度又担任了公职；在挪威和瑞典，共产党人又被列入执政的多数派范围之内；在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里，共产党人也重新正式参加了议会工作（而且还参加了西欧各国政府和工会的工作）。

西欧共产党十分热忱地重新从事这些工作，这当然就使有关共产党的微观社会以及反对精神文化的种种理论变得过时了。冷战期间，有人煞有介事地断言共产党在西欧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彻头彻尾的亚文化团体，形成了一种故意要摆脱“资产阶级”社会那一套的生活方式、企图设想出一种除了秘密警察以外什么都俱全的、经过缩小了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模型。（意大利人将这种设想称之为“预想”。）其实，现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有过这样一种设想了。就在本世纪初，当共产党的亚文化团体在威廉的社会中消失后，索雷尔就设想用暴力和“割裂”（使自身同任何方面断绝关系）来维护这种无产阶级反主流文化的独创性。这种见解若不是来自列宁，就是来自西方的列宁主义者。葛兰西曾经说过：“党是明天的工人国家的模型。”

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一再磨练自己与社会隔离的能力，也由于他们在冷战期间遭受政治压力时，有转而保全自己的能力，才导致了他们这种微观社会的理论。但恰恰就在那个时候，由于列宁主义者（以及相当一部分非索雷尔派）实行“攻心主义”，实行如白蚁般地钻进内部去蛀空的政策（例如种种阵线组织在西方“投下了一个赤色的罗网”），共产党人的微观社

会受到了损害。共产党人在暗中对于他们想要摆脱的社会施加了影响,但随着微观社会的销声匿迹,他们的这种努力就必然告终。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以暴力的形式出现的,就象西班牙共产党人试图渗透进佛朗哥的产业工会组织、而被揭露时所出现的那种情况;上述情况的发生,也可能是以和平的方式出现的,就象西欧共产党人受到社会、政府部门、自治区、商业界和议会(这是西欧共产党人想要“蛀空”的对象)毒害和腐蚀后出现的那种情况。西欧共产党人在公开转向议会道路时,他们还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政党爱国精神,但由于他们已经放弃了与世隔绝的微观社会的幻想,西欧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世俗的团体”了。

西欧共产党人的这种转变反映在这么一些细节上,譬如:他们正式表示不赞成在共产党人之间随随便便地使用“你”来称呼,也不赞成使用紧握拳头的敬礼。西欧共产党人的这种转变也可以通过以下各个方面看到,如:他们将其宣传技巧加以现代化了;他们把某些争论的问题告诉对手;他们在竞选运动中使用电子计算机并为竞选作广告;他们也使用“明星制度”和“政治交易”来使人们接受其领导人和正在宣传的主题;他们还把每年一度的盛大招待会(譬如由法国的《人道报》,意大利的《团结报》或者荷兰的《真理报》所举办的盛大招待会)由原来微观社会中的宗族仪式改为受人欢迎的热闹的集会,在那里可以听到爵士音乐和流行歌曲的演唱,可以喝“可口可乐”饮料,在那里还设有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临时售货台,更有现代艺术的演出。西欧共产党人转向世俗社会这一点,还特别可以从他们对议会以及对获得官职的可能性所抱的新的态度中看出来。

西欧共产党人在冷战期间对这些方面的态度引起了这么一种推测,即认为他们实际上并不想要管理国家(更不用说想发动一场革命了),而只是满足于永远做无产阶级的群众领袖,或者充当苏联对外政策的代言人,而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或稳定性的问题(根据情况的不同,提法也各不相同)则既不出力,也不介入,更不受同化。西欧共产党被看作是社会体制中的一个怪物,亚历山大·韦特常常这么说:“没有共产党,无论什么都是不可能的;有了共产党,无论什么也都是不可能的;反对共产党,无论什么还都是不可能的。”

西欧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初期放弃了举行暴动的想法以后,就安于担任群众领袖的角色,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地位是一种公认的对派地位。共产党人自称唯有自己才能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满分子讲话,引导他们,并合理地阐明他们的要求。只要其他党派不反对这一垄断地位(例如扬言要同无产阶级政党竞争,或者要用改良的手段来减少政治上不满分子对现实的不满),共产党人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起着群众领袖的作用,因此有人认为他们决不会为了谋求真正的政治权力而牺牲这种地位。但是,把共产党看作是群众领袖,那还只注意到了上面我们谈到的三个权力中心的一个:即共产党工人,他们的乌托邦愿望是由西欧共产党给他们表达出来的。事实上另外两个权力中心是能够迫使共产党作出同它的群众领袖的职责不相容的行动的。

比如,苏联就利用共产党来替它的对外政策辩护。这导致法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初期以暴力罢工和街头暴乱来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在有的工人看来是一种叛乱的行为,它也使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工人的事业受到了损失。莫斯科再三

要这些共产党在对待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在对待 1948 年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在对待 1956 年的布达佩斯起义,在对待共同市场,在对待以色列等许多方面都采取完全不符合共产党工人意愿的以及不得人心的立场。后来到了冷战结束时,苏联又看到,这些共产党可以利用其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在它们参加的联合政府中,能够更好地维护俄国人的对外政策。这种又一次违背群众领袖职责的做法,非常适合各西欧共产党官僚的胃口,与此同时,他们的政治野心也越来越大了。

因此,这两个权力中心都迫使西欧共产党超越了仅仅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范围,使它们朝着积极参与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推进。这种积极参与,不仅同群众领袖所要起到的绝对敌视的反对派作用完全不一样,而且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在土耳其的共产党)给予那些莫斯科所赞赏的政府的“外部支持”也截然不同。要各西欧共产党同意参加议会,他们只要扩大和发展一下自己多年来一直行使着的职责,只要做得比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评论家所愿意承认的更始终如一就行了。对共产党在议会中所发表的演说作些分析,就可看出他们为了坚持捍卫其群众领袖这一身份所使用的说教是非常含糊其词的,也很少提到马克思、列宁和革命。但是,在他们的选举投票中,特别在他们议会委员会内部的工作中,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一直对议会制度作出了贡献。芬兰共产党在战后很长时期内担任着公职,甚至就在它没有担任公职时,要任命一个莫斯科所支持的国家首脑(如近年来的吉科宁),也需要有它的选票。塞浦路斯的共产党,即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虽然没有担任公职,但它也同样帮助马卡里奥斯这个莫斯

科所密切关注的国家首脑维持其统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共产党再三对它们的议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对议会委员会和议会走廊谈判方面的影响比在议会大厅里的影响更多。

意大利共产党也长期利用了意大利的大部分立法是在议会委员会通过的这一情况来为自己服务，因为秘密讨论是在议会委员会进行的，各方的利害关系是在那里磋商的，有效的修正案也是在那里弄到手的。在蒙太西多利奥宫的议会大厅里，意大利共产党正在推行一种看来是有步骤的、但又是毫无结果的反对行动，让天主教民主党内任何热中于推翻当届内阁的流派都可利用它的选票。但在议会大厅外面，由于意共热中于出席委员会会议，也依靠该党及其专家所准备的情报摘要，意共在下议院的议员们成了成功的立法者。他们所提出的修正案有百分之四十五可被接受；假如这些修正案不能在委员会通过，有时他们就说要求助于公开辩论以威胁委员会的多数。因为意大利共产党通常总是投票赞成采纳了自己修正案的法律，尽管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并不喜欢这一法律；这样，意大利在1948—1968年间颁布的法律，其中就有四分之三是共产党投过赞成票的。1968—1972年的左中派联合政府曾通过了一大批改良主义的立法，而意大利共产党完全可以声称，他们都是有份的。

法国共产党作为立法者没有意共来得成功。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仍然喜欢妨碍议事进程而不愿提修正案（尽管它对议事进程的阻碍已从1950年具有历史意义的顶峰降了下来）；而且还因为其他党派，特别是戴高乐派对法共参加议会充满冷酷无情的敌意。在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共产党要打倒一个

政府是能够办到的，而到了第五共和国，当这么做已不再可能的时候，法共就继续利用波旁宫的议会大厅来为其群众领袖的煽动性宣传服务。当法共煽动公众对法律提出修正要求时，他们往往是情绪激动，但又不切实际。而一旦有个修正案被接受了，它又不会自动地对整个议案投票表示赞同。不过法共在议会委员会中的表现还是很积极而实际的，它可以夸耀自己投了一系列积极的以及有建设性的票。法国共产党确实已日益变为拥护议会制度的党，并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反对戴高乐和蓬皮杜政权的总统至上倾向是出自（或至少是求助于）颇有名望的保守主义。法共对“个人统治”的批判，不仅仅主张牺牲行政部门的职权，而谋求“由议会来掌握政府”，而且还表示了他们信奉甚至已经是过时的议会机构，如参议院这类机构。这个共产党曾经一度恪守列宁有关要使资产阶级议会成为他们的舆论工具的忠告，而现在，共产党人对执行议会制度竟表现得如此小心翼翼，这简直是太可笑了。

这样，共产党人在议会民主中的反对派角色已超越了其群众领袖的职责范围，但是人们仍然设想西欧共产党人并不真正想要管理国家，或者即使想要管理国家（在其他政党看来），他们也还是不可能作为共同分担公职的候选人。这些推测不仅是由对共产党有研究的学者们提出来的，这些学者了解共产党害怕国内分裂，害怕在他们一旦上台后会出现“法西斯分子”的暴力反对；提出这种推测的还有在民意测验中被问到的一般公众。关于法国共产党，一长串的民意测验表明，直到1972年，法国人才渐渐地重又得出这种概念，即认为法共是确实想要赢得政权的，而且它也越来越适合于分享政权了。自相矛盾的是，法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可信性在日益提高，而

同时人们对它的不信任感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关于这一点可作如下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党的官僚为进一步扩大其政治野心(精确地说是想当部长的野心)所作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但共产党的基础又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作为共产党基础的工人为了表达他们的乌托邦思想需要共产党作为群众领袖和政府的反对派，但他们自己又不想被共产党的官僚所统治。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接近选举的时候，对党的不信任看来就有所增加，而在其他时候，大家又抽象地承认它有分享政权的权利。因此，只有让参加民意测验的人区分下列两种情况，即：认为共产党人总的说来是“适合管理国家的”，还是自己想让共产党来统治(特别是在立即可能实现的时候)，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才是人们所能理解的。这就使相信民意测验的人得出了这样自相矛盾的结论：共产党人越是看来快要夺得政权，就越难得到这个政权。

在任何情况下，西欧共产党的官僚为了力图提高它作为执政党候选人的可信性，就不得不在好几条战线进行奋斗，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它必须对付自己的基础由于怀疑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以及国家机关的腐蚀性而对自己所产生的不信任。莫斯科宁可要一个强大的、亲苏的、资产阶级政府(例如，戴高乐主义者的政府)而不要一个态度暧昧的本国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西欧共产党在一些情况下还必须设法克服莫斯科的这种有所偏爱的做法。西欧共产党还得处处招架它的传统政治对手的攻击。对于法共和意共——这两个党同芬兰共产党一样，都已经有了可获得执政党地位的机会，但都还没有成为执政党——的攻击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即共产党并非真的不再想做工人区的群众领袖而真的要加入政

府担任公职；共产党不会通过合法的和平手段去谋求政权；共产党一旦执政后不会容忍反对派和多党制；共产党一旦掌了权，就不可能通过选举再把它罢免了。下面我们将依次探讨上述各点。

执政的决心

看起来也许好象很奇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威胁说要搞革命的政党，竟需要人家来证明他们是真正地想要掌权的。然而，他们太习惯于自居为群众的领袖了，对一切政府都要加以咒骂，以致引起了怀疑。另外，除了原来的德国共产党，其他西欧共产党看来都不曾有过夺取政权的机会，而各西欧共产党都知道这一点。雅尔塔协定以后，西欧共产党人的地位（虽然希腊或许不是这样）似乎都被各大国所排挤了。众所周知，西欧共产党的领导人担心他们一旦在发生社会危机的时期（比如在1968年的法国），赢得了大量权力，这就有可能触发反革命事件，甚至遭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干涉。最后一点是，他们也担心在同社会民主党人分享权力以后，在他们的工人基础看来，这就是一种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妥协，正如芬兰共产党在1944年以后以及嗣后在1965年后所做的那样。因此，当西欧共产党人在六十年代末看到有可能弄到部长职务时，他们就觉得需要证明他们具有执政的决心。

从1969年起，阿门多拉就坚持主张，“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参政党——这不仅是竞选的口号。这意味着参与制定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掌权不再是遥远的未来的（“在革命以后”）事情，为此，党需要向现存制度推荐自己以及制定一些相应的策略。法国共产党为了上述这些理由，于1971年发表了它的

第一个“民主政府纲领”；接着又发表了一个文件，回顾它在战后掌权的情况。

通向掌权的和平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一些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作不流血过渡的情况，但是列宁却没有这样设想过。这是列宁修正马克思主义很关键的一点。列宁认为：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但是，武装起义最终是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重新修正了列宁的教义（因此获得了中国给予的修正主义者头衔），他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告诉人们说：在一些“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在西欧，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即由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爱国力量”（原文如此），能够赢得议会中的多数票和实现激进的社会改革。瑞典党在1953年就是这样说的。在同一年，陶里亚蒂抓住这一点，把它写进了意共的党纲中，而法共在它培训其骨干分子的文件中，引进了赫鲁晓夫讲话的精神。甚至连因遭受迫害而转入地下活动的西班牙共产党，在1956年至1960年期间，也发现只有当群众的处境“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时才可以进行武装斗争；因此它选择了合法的做法。

赫鲁晓夫以其权威地位，选择了一条不相干的语录把这条新的路线说成是列宁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从此就引起了中国人、托派和所有极左派的猛烈抨击。这一点一直被看作是一种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然而运用这一学说时，也一直带有很重大的保留。赫鲁晓夫坚持只要“反动分子”不起来反抗，这种向资本主义以后社会的过渡，就可能是和平的过渡。赫鲁晓夫还坚持认为，“在1917年由于俄国和国际上的资产阶

级组成了反革命……而迫使工人和农民拿起武器，这就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样，布尔什维克便被当作这些“采取和平行为”的样板而推荐出来。陶里亚蒂一开始就提出了同样的限制条件：他承认暴力还是可能要被那些顽固地“企图要阻止进步力量坚定不移地前进的反动分子所使用的”。瓦尔德克·罗歇也作了同样的阐明，他说：“这决定于剥削者违抗人民意愿的程度。”路易吉·隆哥认为同中国人的分歧，倒不是西欧共产党人已经断然放弃使用暴力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阻挡反动派不公开诉诸暴力”，从而使这种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有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进行。法国共产党也仿效了路·隆哥的这种论点。

另外的一个保留是：“和平的”并不意味着是“符合宪法的”。例如，布拉格1948年的政变可以继续看作是正规获得政权的一个例子，而实际上这是希特勒式做法的一个翻版。“和平方式”也并不意味着是“议会方式”。赫鲁晓夫在提出这新学说时说过，和平过渡只有在“激烈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才可能发生。陶里亚蒂说：这意味着在议会厅以外所进行的群众性的激烈的斗争。隆哥说，这将包括“群众的压力和所发生的冲突，甚至包括暴力的行动”；芬兰共产党还特别列举“各种由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所搞的运动以及工人示威活动”。在这以后的年代里，西欧共产党人从来没有不提到“危机、国与国之间的交战或者尖锐冲突这样一些不可避免地必将到来的时刻”，而在那些时刻，和平取得政权的做法将会活跃起来。意大利共产党还说，那个时刻还将包括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和共产党人控制街道等情况。法共领导人带威胁性地提到一些社会骚动有可能导致左派不通过任何正常的选举而掌

权这一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考虑继续在和平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西欧共产党不仅比其他政党对于和平及不使用暴力这一概念更具有灵活性，而且在他们考虑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方面，也没有其他政党来得明确。共产党的左派批评家们说，他们并不认为更多使用暴力是可取的，但是共产党人的和平取得政权的方式也可能出现使用暴力的情况；由于西欧共产党人抱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以及误认其对手已失去信心等幻想，他们是不愿让其追随者和同盟者对使用暴力的可能情况有所思想准备的。上述观点说明这些左派批评家们大概对于西欧的社会结构是具有一种较公正的估价的。

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不择手段来获得政权的共产党，能够容忍其他政治党派吗？以各兄弟党的实践为例，共产党传统的学说是：一个共产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意味着一个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而又危险的阶段里，要实行一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其他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以后也没有必要容忍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因为在这个阶段里应该只有一个阶级。而这就是一党制的基础。

对于一个已经放弃了靠自身力量来夺取革命政权计划的政党来说，这个学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不利条件。因为没有任何政党会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谋求和平取得政权，而于一旦成功时，却要付出遭受共产党镇压的代价。因此，多列士在1963

年5月宣称，“社会主义政权实行一党专政的理论是斯大林的一个错误”。需要多党制这一点，在以后就掺合到法国共产党的学说之中了。到1966年，关于不仅仅在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本身也需要多党制（至少社会主义的党与共产党人要共同执政）这一点，就更明确了。事实上，“所有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工作的党派”都应加入政府。到1968年，德国的共产党接受了同样的原则，西班牙共产党则宣布一党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它对落后的国家是适用的，但对现代的环境则不适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就从共产主义的术语中消失了。法共在1964年拒绝从党章中去掉这个词，但到1971年却没有写进它的《施政纲领》中。法共领导最后一次引用这个词，好象还是在1966年。假如其他西欧共产党引用了这个词，这仅仅为了要坚持说明它不是指“大老粗专政”，它也不会模仿东欧的实践，但它能构成最先进的民主形式。

但是，这种对西方政治惯例的让步也有其种种保留和条件。马歇在举例说明什么是他所指的多党制国家时说，“在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六个是一党制，而在其他八个国家中是两党或两党以上的多党制”。保加利亚、波兰和东德的农民的党、天主教的党和社会主义的党的遭遇，使同共产党结成联盟这一点对西欧各政党几乎没有吸引力。但是，马歇认为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以致他常常重复它。此外，公认为一党制的苏联，也一直作为一个享有民主、言论自由、人民掌权的榜样展示在人们面前。总的来看，西欧各共产党也承认东欧社会有某些不足之处，也认为那里犯了一些“错误”，那里有时有破坏法律的情况，但他们却不愿意详细说明东欧共产党政

府镇压政敌,以及不能容忍批评等“短处”。

未来的同盟者想知道究竟哪些种类的政治党派能够为西欧共产党的政府所容忍。起先,直到大约1964年,人们认为只有那些“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工作”的党派是共产党的政府所能容忍的。人们猜测这只包括很少几个党,直到1968年,当布拉格的杜布切克政权(它要比任何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都来得左)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而废黜后,人们才看清楚了。从1964年开始,西欧共产党才答应让“民主主义者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党派担当一个角色。“民主”这个词在共产党的术语中也可作狭义的解释,因此,在面临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这个词也就从1966年起被丢弃了。从此以后,任何“在社会主义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党,都可有资格发挥自己的作用。很明显,法律在一个新的政权下会有变化。譬如,就可以把反对党说成是以前的剥削阶级为重新获得政权并复辟资本主义而组织的破坏活动,从而就宣布反对党为非法。

人们可以继续用政治游戏(西欧共产党的政治对手所玩弄的政治游戏)迫使西欧共产党作出一个又一个口头上的让步,但仍然得不到一点儿关于西欧共产党今后意图的确实情况,也没有注意到他们越是“自由主义化”,就越暴露了他们对西欧社会中权力的实质所抱有的幻想。说他们在当前所采取的立场——即认为可以不必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而只通过先进的民主制度就可以到达共产主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邪说,这不过是一个枝节问题。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事先就谴责了这种观点,因为他已看到了这种观点的愚蠢性。马克思曾告诉蒲鲁东说,对人权宣言,对“1789年的原则”,或者对共和民主的任何凭想象的引伸和发展,都不

可能导致共产主义。其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使我们倾向于对马克思当时所宣告的这一真理要反过来加以陈述,即:任何一个人权得到尊重、共和民主得到维护的社会,都不能容忍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西欧共产党人所想象的“先进的民主”是一种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同常识也不一致的幻想。他们先假定经济力量还跟今天一样没有变化——只是对一些垄断企业实行了国有化,但让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所有的“非垄断”商业都保持原封不动——他们还预先假定各政党、工会和报刊的权利都仍维持不变,而西欧共产党的少数派(或充其量也不过是暂时在选举上拥有百分之五十一多数的左派)却完成了使全国其他的人都深感不快的“激进的社会改革”。这种状况正如1973年的智利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不过是向反革命的过渡而已。从不正确的关于资本主义“垄断”理论所得出的政治结论只承认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同其余人民之间的区别,而混淆了其他的一切区别。这样他们就产生出认为可能以民主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由于日益民主化,而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了。

选民的裁决

是否能够通过投票表决使一个共产党政府下台呢?对于这个问题,西欧共产党人给予了各种回答,其中最明确的、毫不含糊而又最可靠的一个回答是:不行!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时代,就象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或由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一样。因此,设想每四、五年就从这一个历史阶段向其前面的一个历史阶段来回往返,这是很荒谬的(共产党人说是“不科学的”)。可是,既然西

欧共产党到处的选票都很少，而且他们的官员只有同其他的左派势力合作时才有希望捞到官职，他们参加内阁这件事就象事情本身那样，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创举了。因此，那些未来的同盟者坚持要知道，一旦西欧共产党人用那些手段掌握了一些政权后，又在下一次选举中落选的话，他们是否会同意退出政府呢？回答是含糊其词的，因为他们想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把其入阁当官说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另一方面则还要消除同盟者对自己的疑虑，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什么事情都是空谈。从1965年起，芬兰共产党内的现代主义分子提出了各种保证，说在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后，仍可保持公民自由权和多党制，但他们仍然不愿承认，芬兰共产党在“把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后，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瑞典共产党似乎是第一个在1965年明确地阐明可以用通常的选举方式免除自己的职权。同年，意大利共产党开始朝着类似的鲜明立场转变，1972年，由于意共强烈坚持自己这一立场，以致它跟法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已经不一致了。对于法共来说，它更顽强地坚持，“不可能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法共是运用了这样的转换办法的：它说今后的选举可能改变政府，但决不可能改变政权。一直到1973年的竞选运动之前，法国共产党才十分明确地承认，法共的退却是可能的，但这并不是从共产主义退却，而是从“先进的民主制度”退却；在这种“先进的民主制度”下，最适宜建立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当这种联合政府的主张在选举中被击败以后，法共就更强调这种提法了。

这种对正规的民主制度所作的让步附着着通常的保留态度。西欧各共产党都坚持说，正在酝酿中的“下一次选举”要

在修改了选举法中的一些规定，以及修改了那些可能对左派不利的选区划分以后，按照比例代表制来进行。另外，由于西欧共产党十分激烈地论证说，正规的议会民主是“装潢门面”的，掩盖了资本主义的骗局，例如，运用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的报刊来为阶级利益服务，人们就不能指望他们会逐条逐点地遵守议会民主的准则。换句话说，即使共产党确实已决定要搞西欧现存的议会政治，由于他们对于议会政治的看法是愤世嫉俗的，所以人们也不能认为他们已经改邪归正了。

西欧共产党人出于他们想当部长的愿望，作出了让步，这种让步的诚意究竟比过去大些还是小些，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对于西方社会所抱的幻想弄得模糊不清了。关于共产党人“有没有改变”的争论长期搞不清楚，其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欧共产党人对此问题是如此的勉强和虚假，而使他们感到整个问题就象马歇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由于共产党人认为，有一些利益对于绝大多数人（除垄断者外的每个人）说来都是共同的，而某个政党是能够有效地代表这些利益的，他们认为即使假设这样的党会被“群众”赶下台，那也是不合逻辑的。“这个问题只有在当权的左派不遵守自己的诺言时才会出现。……如果当权的左派所采取的措施能满足全体工人阶级的愿望，那么政权的更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正如我们已阐明的那样，共产党认为政策是阶级利益的表现，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决不会犯严重错误的。因此，关于这样一个政府所可能犯的错误问题，就应该视为纯粹是理论性问题了。这样看来，所谓退回来的想法（不仅是指从共产主义退回来，甚至就是从先进的民主制度的过渡阶段退回来），都不过是对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无谓考虑而已。一

切今后的选举所可能决定的是，这个政权是以怎样的速度朝着共产主义前进的。这种自信心的基础是，社会连带主义者^①的平民主义，而支撑它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理论。

政治冒险主义

西欧共产党人在一些问题上对他们的学说做了修正，诸如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容纳政治反对派以及遵守西方的议会规则等。这只有一些人相信，而另外一些人是不相信的。于是引起了很多争论：西欧共产党是否“已经真正地改变了”。人们持怀疑主义态度可能是有道理的，也无法让人不怀疑。西欧共产党（在这方面一般也包括左派社会党人）毕竟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以来都是同时采用两手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西欧共产党人从未在立即达到全部目标和逐步达到目标这两者之间作一成不变的选择；列宁主义实际上是被当作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政治战术学的。因此，西欧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前后出现了时左时右的表现——忽而这一个月是声色俱厉的、革命的，忽而下一个月却在进行微妙的、传统的议会交易。因此在每件事情上——或者几乎在每件事情上——他们今天所说的都是早已阐明过的，但不久以后他们又说的是截然相反的话。不论他们说什么自由、民主或宽容之类的话，这都同他们党的整个历史，同列宁主义的理论，同已经掌权的兄弟党的实践是不一致的。在任何情况下，西欧共产党的力量被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条件和特殊定义所削弱了。

^① 社会连带主义，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认为利害相关的社会组织是以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为基础的。——译者

然而，与其试图估量他们的诚意，或者解决西欧共产党是否“已经真正改变了”这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倒不如看看迫使政策改变或使政策受到制约的具体的势力。推动党在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内部采取新政策的势力就在于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官僚集团。西欧共产党和其他政治集团一样，都受着要求掌权的欲望所推动，尽管如此，它也不能简单地接受民主的信念，甚至不能假装这样做。如果靠虚伪和口是心非就行了的话，他们就不会固执地要说那些使未来的同盟者感到沮丧的限制条件和有所保留的话了，例如他们说，和平的手段包括可以在街头使用暴力；可以宽容反对派，只要它不反对共产党掌权；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危险的单行道，等等。如果口是心非就够了的话，那么，为把权力弄到手，他们将答应一切，然后再不择手段地抓住它不放。但是不管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他们也不能把革命的词藻抛弃掉。

上述作法的原因之一是：西欧共产党在政策宣言上的改变，通常比日常实际作法上的改变要慢。新路线只是昙花一现般地立即消失在对老路线的冗长的重申之中。因此，西欧共产党的文献带有模棱两可和内部行话的特点，研究这些文献的人必须注意分析预示着重要转变的细节变化，才能解释这种文献。在理论纲领中正式表达出来的某一个党的思想，其变化要比实际行动慢，这样它的行动就带有了机会主义色彩，而它的理论则带有了虚伪的色彩，这可能就是这种一般规律中的一种情况。另外，西欧共产党思想上的保守主义也有其特殊原因。制订政策的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官僚集团需要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工人和苏联站在他们一边——而他们两者也

需要本国共产党用一块革命的遮羞布来掩盖自己的改良主义真面目。党的官僚在谋求同社会民主党合作以争取部长职位的时候,它的表现是非常革命的。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工人在这个时候需要得到他们的领袖不会抛弃他们的保证。另外,共产党还必须消除这些工人对改良主义的信念,否则他们就会同社会民主党人同流合污而改变自己的信念(就象大多数其他工人那样),使西欧共产党失去本国的基础。苏联统治阶级在和平共处时代同样需要其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同盟者,来反复证实其革命教义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这就能使下述的无稽之谈在和平时代变得合法化,并且要让人们一直记住它。这个无稽之谈说:唯一的敌人是“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是在华盛顿、列宁格勒,还是在布拉格。西欧共产党在抛出这些革命口号的同时,玩弄着议会游戏,这么做很合苏联统治阶级的胃口。因为,进入了通向政权的议会走廊以后,就使共产党便于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影响,并且还可提供符合他们意图的情报。

西欧共产党转而搞议会活动是否能持久,人们对此表示怀疑,但从西欧共产党自相矛盾的宣言中或者从人们对于其虚伪性所表示的非难中也都难以找到答案。怀疑的理由是,认为西欧共产党玩弄如此复杂的三极游戏太冒险了,因此是不可能长期搞下去的。试图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西欧取得政治权力,又要同社会民主党搞合作,又要得到生活在新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具有乌托邦思想工人的支持,还要得到处于国际权力斗争现实中的苏联统治阶级的默许,这样的—一个十分松散而又互不连贯的计划,是没有可靠的前途的。怀疑的原因也是由西欧列宁主义党本身的组织结

构问题引起的。一个党，对自己的党员实行消息封锁，对其领导成员采取指派的制度，而除了对社会主义政党最狭隘的传统观点外又对一切都拒之门外，象这样的党的机构能够在议会民主方面起作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西欧共产党现在不承认葛兰西的思想是正确的，这种思想认为，共产党的等级森严的党组织预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形象；西欧共产党认为养成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绝对遵守纪律的习惯，是实行自由管理的一种思想准备，这种观点显然是阴险狡猾的。由于西欧共产党还在为东欧兄弟党的专制制度作辩护，它在这一点上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最后，令人怀疑的另一个原因是：西欧共产党甚至对他们思想上最相近的近邻如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和极左分子，都一点不能容忍；对于这些人，西欧共产党是毫不留情地向工头和秘密警察加以告发的。

跟所有这些怀疑相比，实践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西欧共产党的实践是搞选举主义、搞议会政治，以及搞修正主义。人们可能会反驳，这些只不过是指他们所选择的手段而已。但是，政治就是关于运用什么方法和什么手段的问题，其他都是空话。一个正在为革命而工作的党，同另一个同意采取议会改良主义手段的党，是一种不同的政治现象；虽然那另一个党坚持说，它的最终目的也是革命。一个党参与议会机构的程度已经同西欧那些主要政党没什么两样的时候，它是不会只因为它的选举同盟者不同意自己的看法，就要去推翻现在的社会的。西欧共产党一条接着一条地采纳了代表民主信念的项目，虽然他们在采纳时显然是很勉强的，但这也说明了西欧共产党的这种向民主信念靠拢、并进而结合成一体的过程。上述情况在 1973 年选举后的法国共产党表现得特别令人注

目。当时它为了设法消除引起选举人沮丧情绪的因素，而发表了关于私有财产和公民自由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声明。法共在这六个月内，实际上是在从事于保护小店主和极左分子的活动。

叙述这种民主冲淡了西欧共产党的革命纯洁性的现象，并不是要证明西欧共产党已经成为“跟其他党一样的政党”了，也不是要说明它们现在已经是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派别了。这种演变是可能的，这方面的例证也有一些。但是，人们也需要记住，从西班牙到芬兰的几十个例子都证明，欧洲各国的议会已经成为政治冒险家的政党的角逐的场所。西欧共产党的官僚们安抚苏联统治阶级和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工人的同时，又在利用其列宁主义的机构来追求政治权力，他们的这种作法已超过了社会民主党新变种的作法，他们活象一帮子政治冒险家。共产党跟社会主义的党或其他大的政治团体不一样，它在力量悬殊的不利条件下下了很大的赌注：进行一场需要大多数人同意的而却由少数人去完成的革命。如果说共产党是危险的，倒并不是因为它是爱搞阴谋的、不真诚的和伪善的，而是因为它沉溺于平民主义的幻想，并以此来代替他们对已经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念。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这就会导致它低估和贬低它的反对派。共产党低估了在西欧社会里任何广泛的改革都会遭到的那种反对的情况（就象当时意共随便谈论“通向革命的改良主义道路”的时候那样），因此它就冒着这样的一种危险，即陷入于一种被人认为是由它自己招惹来的暴力反应之中。西欧共产党相信正确的政策不需要有反对派，例如马歇在阐明东欧为什么是处于平静的统治状况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因而，它会

走向压制批评家的道路(虽然它是满怀好意的)。因为这些批评家站在平民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理论的立场上是不可能为人民说话的。“我们在人民中间没有敌人。我们唯一的敌人是一小撮大垄断资本家”，法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家就是这么说的。在当权的情况下，面临着在“人民”中有着各种不同的和对立的利益冲突，并面临着在执行任何政策时都可能遇到的不满和反对，抱有上述这些错觉是危险的。雅各宾派有过类似的幻想，其后果是那样地可怕，直到 1925 年，一本苏联的小册子还在回忆“断头台政治”的种种可怕情景。不过，上述这本小册子《列宁主义问题》的作者，署名是：约瑟夫·斯大林。

欧洲的联合与防务

西欧共产党鉴于过去起着苏联对外政策宣传机构的作用，而现在它们就开始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了。既然这些同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相一致的新理论都是为了选举时机会主义的需要，那么这些理论在各党之间就可能有所区别，甚至看起来似乎是同苏联的目的相冲突的。要下这样的结论，即西欧共产党的一些政策同苏联的政策事实上确实是相矛盾的，人们一定会踌躇莫决。人们首先要问：莫斯科同西欧共产党之间是否不存在分工。一种显而易见的差异毕竟是始终存在着的。这种差异是由于苏维埃政权是作为一个“革命的国家”而存在这一性质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一)苏联作为一个政府，当它实际上并不想寻求盟友和援助时，也得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二)苏联是一个致力于颠覆其他国家的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因此，从 1917 年起，莫斯科一直奉行一种“双重政策”，即一方面根据国际法同各国政府

相处,同时又支持有朝一日能推翻本国政府的各国共产党。带有上述含意的双重政策,被西欧各国共产党俯首听命地接受了,甚至达到为了俄国的利益而不惜自己的党被解散(1937年的波兰共产党就是这样被解散的),或者宁可自己遭到莫斯科的盟国的迫害(如地中海地区常常发生这种情况)的程度。这种不一致也可以解释为时间性的问题:今天搞外交,明天搞颠覆——直到1956年苏联采取了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政策为止。从此以后,西欧共产党丧失了其潜在的革命角色的作用。它们可以继续预言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但这只能由已经展示了其优越性的已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来实现,而不能由西欧共产党用武装革命的方式去加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行列中来实现。

双重政策使西欧共产党变得日益尴尬。当莫斯科公开支持戴高乐时,法国共产党还在斥责他是半法西斯主义的篡权者;但是法共只得设法以清洗塞尔温·卡萨诺瓦为代价,屈从于莫斯科。当莫斯科反对“合并”时(为了莫斯科的地中海政策),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设法压制塞浦路斯希腊人中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希腊共产党人能原谅莫斯科对迫害共产党人的雅典独裁政权献媚。但当莫斯科开始要扶植佛朗哥政权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大多数人起来造反了(当时波兰却供应煤炭来帮助破坏西班牙矿工的罢工)。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紧张关系,促使西欧共产党开始设想新的对外政策,以谋求解脱。它们的任务是特别地困难,因为和平共处既是一种允诺,同时也是一种威胁。和平共处展示了西欧共产党同各国民党派之间新的合作的前景,但却使这种前景在共产党工人中丧失了革命的可信性。其结果是各

国共产党只得这么争辩说，共处并不涉及莫斯科同华盛顿之间任何势力范围的划分，并不排除真正的革命的政党在西欧的首都执政掌权。这种论点甚至认为：必须否认 1945 年 2 月在雅尔塔会议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盟国之间曾经在欧洲划分过势力范围。这种论点还认为：必须否认在各共产党国家中存在着一种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反对派可以从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今后莫斯科可以干涉西欧，以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而是因为共产党工人可以从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中得出如下的结论：美国早已享有一种类似的权利，可以首先阻止这样一个党上台执政。最后，这种论点还必须更坚定地否认这么一点，即 1970 年夏天尼克松先生和勃列日涅夫先生所达成的缓和协议，是撇开欧洲国家首脑所搞的超级大国勾结。这种缓和可以导致戴高乐派和中国人所称的苏—美共同统治世界的局面。总之，这种论点必须否认一些明摆着的事实。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西欧较大的共产党就优先考虑了对外政策的问题，它可在不一定要触犯苏联的情况下，在国内的选举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例如法国共产党在戴高乐 1969 年退休时，就利用这机会把自己装扮成超戴高乐派，并抨击戴高乐的追随者——乔治·蓬皮杜、雅克·沙邦-戴尔马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说这些可怜的爱国家者“偷偷地把法国带回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说他们放弃国家主权，经常地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法共想以此来夺回过去曾输给戴高乐的选票。这种做法首先遇到的难处是：他们不得不把否认有任何大国共同统治世界这一点也放进去，而戴高乐主义外交政策的精髓就在于：除非小国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否则大

国共同统治世界的危险就始终存在。这种论点是在1973年至1974年间，由法国外交部最后一个戴高乐主义者米歇尔·若贝尔明确地提出来的。实行上述做法的第二个难处是：当法国共产党使出了最大的力气和各种欺骗手段来谴责那些不爱国的倒退派时，莫斯科装作视而不见，对历届法国政府继续给予过去曾给予戴高乐那样的友好的待遇。正当法共察觉到法国政府出现了新“大西洋主义”偏向的时候，或者正当法共实际上在进行竞选斗争的时候，莫斯科对巴黎政府却表示非常满意，这些做法使法共一再地处于窘迫的境地。这种显而易见的冲突在1974年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选举期间和选举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法国共产党想尝试建立一个“全国阵线”，建立一个广泛的爱国者同盟，来反对这位可能是亲美的总统——莫斯科曾帮这位总统竞选上台（在竞选运动期间莫斯科大使故意吹捧德斯坦），以后又对他表示很尊敬。即使在法共的争夺选票与莫斯科的外交之间有着冲突，莫斯科也还是有理由担心戴高乐的继承者会退回到美国体系中去。莫斯科因此非常满意于这样的分工，即由法共来谴责政府所可能想要采取的政策，而这个政府却又不断地在外交方面从苏联的不明朗态度中得到好处。

同样地，莫斯科并不会因西欧共产党在对北约组织问题的战术上动摇而惊慌失措。西欧共产党不再激动而强烈地反对这个军事联盟已有很长时间了，这种激烈的反对是以1949年和1952年的巴黎骚动为标志的。莫斯科当时也放弃了对那种“和平运动”的支持，而赞成同华盛顿直接谈判。西欧共产党一方面密切注视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发展，这种做法可能使苏联感到不安；而同时它又保证在其执政时不坚持要

自己的国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少不立即退出来。确实是这样：已经在政府里担任了重要职务的几个西欧共产党，并没有为使本国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作出任何行动；而正在设法谋求官职的几个共产党，也已给予它们的同盟者以某些“保证”。挪威共产党曾要求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冰岛共产党人在掌权前和下台以后对于凯夫拉维克这一北约基地问题，比他们1971年至1974年执政期间表现得更为大惊小怪。当葡萄牙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曾赞成对北约组织的军事设施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而当共产党人在1974年获得了部长职位时，他们却又赞同让葡萄牙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当然，冰岛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在脆弱的联合政府中都处于不牢靠的小伙伴的地位，因而如果它们坚持象脱离北约组织这样一项重要的措施，是不会得到足够重视的。还有，既然西欧较大的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所可能得到的也不过就是这么一种权力，这些共产党也就可能仿效这些小党的做法。争取在北约国家政府中有些共产党人当部长，尽管这种做法同共产主义的理论并不一致，但苏联却可以从这种安排中得到明显的好处。

法共在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以致不能为法国社会党人所理解，尽管这个调子在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谱成的。1962年12月，瓦尔德克·罗歇宣称，尽管共产党人主张全面反对北约组织，但他们将不会以法国脱离北约组织作为同社会党人合作的一项先决条件。这种“让步”不久就变得没有针对性了，因为戴高乐接着领导法国在1967年脱离了北约组织的军事组织（但

并未脱离同盟)。法共勉强地赞同了这个行动,但仍认为由于法国同北约组织武装力量之间的一切联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这是确实的),并由于法国仍留在同盟中,它就仍然是隶属于美国军事战略的卫星国。法国共产党在戴高乐继承者当权时加强了对北约组织的攻击,还报道戴高乐的继承者秘密同意法国重新加入这个军事组织的迹象。因此,法国共产党在1970年和1971年同社会党人商谈一个共同纲领时提出,法国应该完全脱离北约组织,但是到了1972年,在修改后的共同纲领的正式文件中,对法国脱离北约组织这问题却采纳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折衷方案:

政府将表明其赞成同时废除大西洋条约和华沙条约的立场。……法国在拒绝重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时,保留其签订防御联盟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权利。……政府将表明其决心,让法国朝着不依赖任何政治—军事集团的方向前进。关于法国作为一个大西洋同盟的成员将承担多少义务的问题,应按照这一精神予以解决。

当M·密特朗把这段文字的含义解释为:法国共产党已经同意让法国在其他一些防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一直留在北约组织同盟里的时候,法共发言人驳斥说,这些都不是共同纲领中所包含的内容,而恰恰相反,一个左派的联合政府将谋求独立于大西洋集团之外。从此以后,法共坚持强烈地反对这个联盟,但同时却又表示它愿意参加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对脱离北约组织并没作出明确的表态,或者至少还没有立即作出表态。

由于意大利的安全比法国更明显地依赖于北约组织,意共的活动就处在一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战略环境之中。尽管

如此，意共还是循着同样曲折的道路走向同样暧昧的立场。从1969年起，“宣言”的反对派就开始谴责意共，责怪他们放弃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批评，还责怪他们默默地同意了意大利无限期地保留其在北约联盟中的成员资格。意大利社会党人当然也说他们的印象是意共已不再坚持意大利“单方面退出”北约的主张了。然而，在意共受到压力时，他们的领导人还会说他们依然要求意大利应该退出北约组织。他们确实已经把退出北约组织服从于这么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条件，即当所有的军事集团都已解散的时候才退出北约组织。阿曼多拉说过：

我们必须使意大利摆脱各种集团，这对我们意大利人具体地说就是意味着要摆脱北大西洋同盟，但我们采取的方式必须体现一种保证，即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我们将加入社会主义集团……意大利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不意味着倒过来要搞与另一方的结盟，而摆脱各种集团，就为这一点提供了保证。

贝林格进而指出，在1972年可以“从发展的角度，而不再从冷战年代静止的角度来看待北约组织”。

这意味着：

摆脱把我国缚在北约组织上的枷锁这一决定性问题，不能把它贬低为一项拥护或反对这一军事条约的简单声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斗争越是同欧洲的一场要求摆脱美国霸权统治的全面的欧洲解放运动相一致，以及越是同一场争取逐渐超过对立的集团（直至这些集团最后消逝）的解放运动相一致，这种斗争就会变得越有成效。

意大利的社会党把这种“发展的”远景解释为：意大利共

产党将参加政府，而这个政府把退出北约组织的日期无限地往后推迟，但当贝林格受到压力要他明确表态时，情况却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

人们可能设想我们脱离北约组织有一个过程，是一个具有各个不同阶段的分离过程。应当首先正视那些更为紧迫的问题，如：外国基地的存在，以及我们拒绝军事上的一体化等问题。但这个过程应该最后达到完全断绝这种关系……要是你问我：你大概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吧？那么我会断然地回答：不。

既然西欧共产党人抱有西欧独立国家不武装和不设防的见解，并把自己置于苏联的图谋之下（虽然他们设想华沙条约会“瓦解”），他们很显然就无所谓防务政策了。他们坚持主张既要独立又要裁军，这就导致产生一种毫无内在联系的爱国主义与不抵抗主义的混合物，因为他们所说的独立是对美国而言的，而他们所说的裁军是对苏联而言的。对专业军队和庞大的防务预算进行抨击，这是欧洲大部分左派共同的任务，法共除了抨击这两点以外，还特别指出要政府拆除核力量。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签订了一项共同纲领，但它只要求停止发展核力量（而不是要摧毁它）。这件事不过表明这个问题跟脱离北约组织问题一样，都孕育着今后法国共产党同社会党这两个伙伴之间的各种误解。

西欧共产党反对在全国范围内搞有效防务，也反对在北约组织范围内搞有效防务，它们甚至还更坚决地敌视西欧联合防务力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不过是人所公认的推测）。自从法共在1954年同戴高乐派联合起来主张废弃欧洲防务共同体以来，它一直警觉地指责任何有关西欧防务合作的建议，认

为这种建议是那支计划中的欧洲军的复活。西欧共产党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同苏联的利益从来没有这样明显的分歧，因为苏联担心一种新的防务实体也许可能会在它的西部边境给予德国较大的影响和自主权，虽然这一实体的军事火力比美国目前在西欧所布置的军事力量要差。G·阿门多拉在1973年承认，共同的西欧防务政策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他的承认并没有在任何方面破坏了西欧共产党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阿门多拉还指出“现实的问题”在于实行“积极的中立”政策，抵制“那种花钱很多、而又危险的幻想，即幻想用核武器来装备欧洲的第三种力量”，从而维护“欧洲对于美国而言的自主权”。

西欧共产党反对欧洲联合防务的做法，是它们全面拒绝支持该地区的超国家机构（诸如那些可能从欧洲经济共同体演变出来的超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它们始终敌视欧洲团结这一概念，这种态度也是与欧洲共同体直接有关的六国共产党（以后扩大到九国）以及保持中立的和非共同体成员国的共产党所共有的态度。人们有时认为共产党的这种敌视政策有两个例外。而所以有这两个例外的原因是很容易加以说明的。首先，据说意大利共产党一直是比较“亲欧洲”的，它甚至还劝诱其他西欧共产党要持更能讨人喜欢的态度。任何这种劝诱都完全没能使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丹麦共产党信服，这几个共产党过去从来没有象在1974年1月布鲁塞尔西欧共产党会议上那样直言不讳地反对欧洲联合。此外，经考察证明，意共本身的立场并不是亲欧洲的，因为亲欧洲这一用语是主张西欧联合的人所使用的。同其他西欧共产党比较，意共是最先同意要尽可能地夺取欧洲机构内部的任何地盘，

诸如夺取在斯特拉斯堡的所谓欧洲议会或者在布鲁塞尔的欧洲执行委员会的议会走廊等地的地盘。在那里，意共显示了自己的政治眼光，但它的目的是要使其反对超国家机构和反对美国势力的做法变得更为有效。法共最终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一点也没有减少它对欧洲共同市场及其一切工作的批评。

意共所赞同的欧洲组织，并不是一种政治实体，它比较近似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它是“欧洲各国之间(包括东欧和西欧)的一种合作体系，不管它们的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如何”。意共还认为这种欧洲组织是：“一个民主的多国家的组织，它可以应付单独一个国家所没有能力解决的一些难题，譬如金融危机、资本流动、控制跨国公司、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等。”至于欧洲统一运动，这将会是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没有政治灵魂的欧洲联盟。

我们所假定的另一个例外是：苏联再三表示“重视”或承认(赫鲁晓夫在1962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都表示过)共同市场，表示这是它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一个“具体的现实”。西欧共产党及时地赞同了这一立场。这种立场意味着苏联准备把欧洲九国经济共同体看作是生产国际化的一个方面，看作是苏联可望从中得到好处的一种进程，譬如苏联可从中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并为苏联产品找到西方市场等。因此，莫斯科是乐于促进经互会(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欧经济联盟)同共同市场之间的谈判的，只要这样做可使苏联得到上述那些好处。这就象莫斯科也准备同美国、日本和各个单独的欧洲国家打交道一样(只要罗马条约允许其成员国有权与非会员国单独做生意)。反过来说，苏联并不认为共同市场为

了照顾其政治特征而有权在九国边境阻止生产的国际化。这就是西欧共产党人把九国称作“小欧洲”的原因；这个“小欧洲”至多不过是通向从大西洋一直伸展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的欧洲或大欧洲的一个阶段。他们有时还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跨国的经济合作（目前苏联领导人对跨国经济合作有着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关欧洲统一和防务这一糟糕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就是从这个物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西欧共产党打算要消除主观上的这种赘生物的形成过程，并要促进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这一在政治上不统一、在军事上不设防的欧洲，能够在俄国人的领导下搞经济合作。

苏联作为一个大国，不得不把欧洲问题放在同对华关系同等的地位（后来又放在同样的范围内）来考虑。莫斯科同西欧共产党之间关于对外政策明显的不一致就是在这一点上形成的，它直接涉及到各国共产党要求自主权的问题。在1973年到1974年这整整两年中，苏联压西欧共产党赞同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这只能是一次要西欧共产党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效忠于莫斯科的会议，而其主要目的（西欧共产党人是这样猜测的）将是宣布把中国和受中国保护的国家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在这方面的担心倒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它所担心的是，如何在最终诉诸武力时能在道义方面为自己辩护。如果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故乡、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来的共产党都表示赞同把中国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这将为苏联在处置难以对付的邻国方面大开方便之门。即使是最冷酷无情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必须大造舆论，把对方名声搞臭。更直接有关的是：通过世界共产党的这么一项

联合声明，苏联就可以为自己最终干涉“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如铁托以后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进行辩护了。

在另一方面，西欧共产党将把这次会议看作是莫斯科将庄严重申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中心的一次会议。西欧共产党也许会为北京的被开除而流几滴眼泪（虽然与莫斯科公开争执的那些西欧共产党会痛苦地失去中国和罗马尼亚对它们的支持），但是西欧共产党不可能同意牺牲它们在中苏争吵期间在争取自主权方面已经得到的全部利益，从而恢复“一党中心制”。1974年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各国共产党集会期间苏联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当压力已经明显地无效时，俄国人的报纸便极有选择地报道那次会议的情况。苏联报刊接着还进一步刊登了尖锐批评芬兰、西班牙和日本共产党的文章，因为这三个共产党作出了显示自己独立性的故意卖弄的姿态。

即使上述的会议最终召开了，它还将同时引起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智斗，因此关键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这一点我们认为值得坚持的。对于各个西欧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党的官僚机构方面的问题，也就是他在必要的时候它们可以不经苏联的认可，就具有运用列宁主义机器的能力。对于莫斯科来说，这就是强权政治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如何同中国斗争，以及如何东欧实行霸权统治的问题。此事的下一步主要地并不是去确定西欧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将能获得多大程度的自主权，而是要决定它们将怎样运用这种自主权。换句话说，由于苏联害怕中国，这就不仅使西欧共产党的这种自主权成为可能，而且还影响这种自主权的发展方向。只要西

欧共产党由于怕被怀疑是受到中国人的启发，因而严禁实行进取的左派政策；同时也只要由于怕在俄国的西方战线造成危险和引起新的责任而排斥革命的冒险活动，西欧共产党人所得到的自主权就只能应用于右派所指的含义，即应用于谋求同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以外的政党结成选举上的同盟。

政治上的结盟

共产党人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就是把平民主义同寻求结盟这两方面不恰当地结合起来。共产党同“为了一小撮牟取暴利者的利益而跟全国对立”的党相竞争时，是把自己作为“群众”的代理人出现的；但另一方面，共产党承认这些群众是全体选民中的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对西欧共产党来说，它们要全力以赴地维护形成时间还不长的盟友的原因……这样就允许了它们同民主政党的友好合作，等等，等等”。革命的少数派（包括过去的西欧共产党在内）声称要区分群众的实际利益和表面利益，以此来为自己居于少数这一不重要的地位自圆其说。多数选票代表的是人民的表面利益，而少数所要代表的是真正的也即长远的利益。但是当个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要强迫人民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标，而成了一架选举机器时，这样的共产党不论其单独存在还是在联合政府中，都必然渴望现在就获得选票的多数。因此，寻求结盟成了西欧共产党最大的瘾头，因为结盟能使西欧共产党赢得选票，或分享政府的官职。正如法共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12月直言不讳地宣称的那样：“共产党人没有比尽一切努力以扩大和巩固其同社会党人以及其他共和主义者的联合更为重要的职责

了”。

自从列宁以来，西欧共产党就运用“阵线”这个军事上的名称来称呼这些联盟，并使用了煞费苦心的烦琐哲学，按照其阶级基础来划分这些阵线。据说“统一战线”包括全体无产阶级，“人民阵线”则包括中层阶级在内，而“民族阵线”则超出阶级的范围，把渴望维护国家独立的“爱国者”和“垄断资本家”的受害者也包括在内。由于共产党的理论太粗略了，不带有指导性，也由于这种理论只是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我们划分各种不同的联盟最好还是以大家熟悉的、议会集团中的从左派到右派的系列来加以区分。

当赫鲁晓夫在 1956 年建议同各种“进步的”力量，甚至同普通一般的“爱国”力量结成联盟时，意共急忙采纳了这种意见。1957 年意共在党的八届代表大会上明确地放弃了自己原先所确认的、必须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结成革命动力的说法，而赞成工人阶级同中产阶级结盟。然而，意共并不企图比其他西欧的政党对这些不明确的“中产阶级”作更多的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因为这些中产阶级是意共在寻求结盟时所需要的对象。直到十年以后，这些“新阶级”才成为西欧共产党所热烈辩论的一个主题。非无产阶级力量被看作是过渡时期可能争取的联盟者。1957 年以来在莫斯科召开的一连串共产党会议上还把这种力量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力量”，是“反帝的”力量，而西欧共产党应该同这种力量合作，以保证“和平与安全”。这里所谓的“和平与安全”，不过是指保卫苏联的外交政策而已。只有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当西欧共产党有了自己明确的政治抱负以后，这些联盟才的确具有了具体的、当地的内容。

西欧共产党先向邻近的社会民主党提出合作的建议。在共产主义历史上,建议同社会党合作并不是什么新的做法,尽管通常总是紧接着就对社会党进行谴责并同它们竞争。库特·舒马赫说:“就象该隐和亚伯^①一样,社会党和共产党是两兄弟。”不过结盟的目的倒是新的,例如,多列士在1936年曾宣称,即使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也只是意味着把苏维埃政权安置在法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并不意味着“一种庸俗的、在内阁方面合作的政策”。然而,这种庸俗的在内阁方面合作的政策,正是西欧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提出来的。法共在1968年12月发表的“马恩河畔香比尼宣言”中,把这种政策称为“先进的民主”。同年同月,法共开始了同社会党人的谈判,这些谈判就在三年半以后以同社会党人签订了左派的共同纲领而告结束。贝林格在1969年把上述这回事看作是一种具有战略改革意义的“历史性集团”的形成,而阿曼多拉由于声明意共准备立即实行在政府里联合社会党的政策,而使全体党员情绪不安。

这种为了实际而有限的目的所提出的要结盟的建议,对共产党来说,必然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牺牲,因为共产党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曾不断地谴责社会党人即使不是法西斯的代理人和骗子,也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和骗子。特别对于较小的共产党来说,恶狠狠地非难社会民主党一直是它们的主导思想。对于象德国共产党这样的党,强迫它同其政敌社会党人进行不必要的合作,这么做即使不是政治上的自杀,也会造成德国共产党党员和德国共产党的选民的思想混乱。更糟的是,

^① 据基督教《圣经》,亚当的长子该隐曾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译者

追求联盟会引起嘲弄。西德和英国的社会党是大党，它们不需要这种“帮助”，并且会轻蔑地以伤害人的语言来拒绝接受这种“帮助”。这些在政治上没有意义的姿态，可能暗示了这么一点，即小党不得不遵循一个在某处制定的、唯独对大党有好处的共产党的总政策。然而，小党也从选举的策略以及同社会党和左派社会党进行议会合作的策略中得到报偿。在冰岛，共产党得到的报偿是担任了政府中的官职；在斯堪的纳维亚，它们得到的报偿是在议会中有了新的权势。在挪威，从1972年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在反对共同市场的运动中起到了作用，接着又得到了利用议会来发泄其反对北约组织的情绪和表示其拥护国有化的机会。在瑞典，小小的共产党从1970年起就能够使社会民主党一直执政，并侵蚀其左翼，影响其立法，尽管社会民主党故意不把由于共产党的赞成票导致他们在议院里得到多数这一点计算在内。甚至连德国共产党要求合作的建议，也在德国社会党左翼中得到了响应，特别在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得到了响应。所以对于这些共产党来说，向右派靠拢并结成联盟这一政策，比之在整个斯大林主义的第二“冰河时期”它们所忍受过的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更为适宜。

对于大一些的共产党来说，好处还不止于这些。在罗马、巴黎和赫尔辛基，共产党的这种政策看来是通向掌权的道路。因为如果共产党大一些的话，社会党相应地就要小一些了（这是由于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因此，共产党出于自己要当部长的野心，就更需要得到社会党的支持。然而，即便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票加在一起，也不会成为多数。在左派实际上已分裂为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国家里，正由于左派的分裂，他们就很少能赢得比1917年前老社会党更

多一些的选票——社会党过去最多曾获得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法国，当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盟正式达成时，两党加在一起的选票曾徘徊于总选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这跟意大利的左派（由意大利共产党 + 意大利无产者团结社会党 + 意大利社会党）所获得的选票一样多了。在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1962年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一一点五的选票。这种情况使西欧共产党要求进一步向右派扩大其政治联盟。

西欧共产党的官僚目前同西欧的其他党派一样，渴望获得政府官职，这明显地就是他们愿意在意识形态上作出牺牲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可以把这种急于夺取政权的政策同英国、瑞典或西德社会民主党缓缓地逐步取得约达半数选票的政策作一对比。自然，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首先在亲自由党的劳工党所控制的一些政府部门或者在同右派“大联合”中取得官职，但是共产党人如果不承认他们正在采取一条为自己的理论所明确谴责的道路，他们就几乎不可能援引这些先例了。有三点事实可表明西欧共产党渴望赢得政府官职。第一，在有些国家里，社会党是一个大党，它本身就有力量可以执政，而且可以把共产党象一个侏儒似的驮在自己的肩上，那么，共产党就不会提出要同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合作的要求。在英国、西德或瑞典就没有出现这种让步的情况（二十年前，在1944年到1945年期间，英国共产党确实曾要求成立各党联合政府，但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种反映，它反映了在进入和平年代的头几年里要求保持战时同盟的这么一种愿望）。第二，共产党全然不顾马克思主义的告诫，提出要越来越向右靠拢搞合作，他们提出要在左派力量虽小而好斗的国家搞专政，

因为他们陶醉于模仿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右派专政的政治前景。最后一点是，在一些国家里，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官职对于共产党人似已近在咫尺，然而却又更难以到手（这一点是与我们前述的自相矛盾的论点相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希望同右派合作的要求就越来越迫切了。

希腊“国内”共产党在军人政权的统治下，采取了一条广泛联合的政策，企图把“爱国统一战线”中的反对派势力同围绕着安德烈娅·帕潘德里奥的力量的反对派势力协调起来。后来在1974年，希腊恢复了民主制度，嗣后，希腊共产党的两个派别都参与了希腊共和国，并谋求同它们的右派结盟。葡萄牙共产党是完全依附于莫斯科的，如果它的反对派被允许参加1973年的选举的话，它可能会去联合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和社会党人来与之竞争。为了消除其资产阶级同盟者的顾虑，葡萄牙共产党暂时停止了其A R A小组（这跟那些地方革命者不一样）的暴力活动，后来又于1974年参加了军政府。在这方面，它成了主张长期搞“各党派联合阵线”的思想的极端派；而这种思想过去一直遭到极左派的嘲笑。西班牙共产党则从表示愿意同一切反佛朗哥势力合作，发展到愿同“非垄断寡头的资产阶级”合作，然后又愿同“寡头统治集团的成员”、天主教会的僧侣集团、西班牙军队合作，甚至一直发展到愿同君主政体合作。为了替教会和佛朗哥的军队辩护，西班牙共产党否认自己过去搞宗派是犯了“左倾错误”，并宣布：只要是公开站在民主立场上的任何组织，不论其过去怎样，它都准备与之进行谈判（它还暗示他们已经在秘密地这样做了）。

在自由民主国家中，西欧共产党也同样变得很混乱。比利时共产党1972年提出同天主教民主党合作，甚至同其中支

持政府的那些人合作。1971年，冰岛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分裂的两翼“自由派”和“正统派”，发现他们在愿意同改良主义者一起参加政府这一点上，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芬兰共产党人当时已同社会党和一个中间党共同执政三年了，只是因为这个党分裂成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派别，后来才退出了政府机构（分裂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官职引起的关系紧张）。甚至那个好笑的闹宗派的荷兰共产党，也要求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切民主主义者以及进步人士”共同组成政府。

西欧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意共和法共，主张同除了垄断寡头这一魔鬼以外的任何人广泛地进行合作。这种主张在他们进入政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时候，尤为坚决。意共和法共确实已经结束了它们过去相互误解的历史。1973年5月的罗马会议标志着“两党关系的新开端”。该会议宣布它们一致愿意同“所有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包括“天主教徒中代表广大群众的力量”共同合作。从1972年以来，法共已经把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同意识形态混杂的法国社会党人和同一部分激进派联合起来的左派联盟”中。当这种联合在1973年的选举中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以后，法共就把它扩展到包括传统上一贯敌视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力量。在1974年总统选举中，法共还向戴高乐献殷勤。而意共则比法共走得更远，步子更快。

六十年代初，意共热中于同南尼社会党人保持联盟，生怕这些社会党人同社会民主党重新联合起来，加入中一左联合政府而使自己陷于孤立（南尼社会党有一段时期，确实既同社会民主党重新联合，又加入了中一左联合政府）。到了六十年代末，意共又热中于另一个问题：在接受政治联盟方面，应

该对社会党的右派接受到何种程度？在1968年至1969年，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变得公开化了，争论中主要有两股思潮，一股思潮以阿门多拉为代表，赞成在坦率的修正主义纲领或最低纲领的基础上，同社会党人合作；另一股思潮以彼特罗·英格拉奥为代表，主张采取一种更为革命的、最高纲领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为了吸引那些投天主教民主党票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进步人士。阿门多拉的政策，得到“红色地带”地方政府里共产党官员的支持，但他使基层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工人和党内官僚中的新托派知识分子感到震惊。左派围绕“宣言”这个文件所表露出来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妥协政策的强烈反应。然而当这种反抗蔓延的时候，人们看到英格拉奥的思想即使不被他本人，也可能被别人发展到吓走其政治盟友的地步，而如果它要赢得政权，它就需要这些政治盟友；同时这种情况也会引起苏联的强烈反感。1968年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当时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工人决定一如既往地仍然效忠于苏联，他们抛弃了最高纲领派的知识分子。这样，现在以贝林格为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采取的妥协办法是：把阿门多拉所主张的最低纲领提交给英格拉奥所想象的较广泛的选举基层，把两者结合起来予以实施。为了这个目的，意共开除了反抗者；这样，意共就作为一个讲究秩序、主张改良、主张多党制、只是不能容忍极左分子的过火行为、并准备越过它的反教权的社会党人盟友的领导同梵蒂冈妥协的党而在全国出现了——所有这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分裂天主教民主党，或至少可以从天主教民主党内把许多选民争取过来。它设想，这条路线足以使天主教民主党失去很大的社会支持，从而迫使被削弱了的天主教民主党接受共产党参加其执政的多

数派地位——贝林格曾设想在 1970 年能做到这一点；他从 1971 年起就提出，这条路线甚至还会迫使被削弱了的天主教民主党接受共产党参加政府内阁。1972 年选举时应用了这种策略，它成功地清除了左派分子（虽然不幸的是，它把它的外围组织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也一齐清除掉了，因此后来不得不将其残部吸收到意共中来），为党赢得了额外的五十万张选票。但是，这既没有分裂天主教民主党，也没有“改变它的模样”，更没有贬低它的地位。事实上，天主教民主党有一段时期在一个中—左联合政府里执政，1972—1973 年的安德雷奥蒂内阁把全部左派赶出了政府部门。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说，这种解决方式可能是最糟糕的了，在安德雷奥蒂辞职以及新中—左联合政府在 1973 年 7 月组成以前，意共一直是提心吊胆的。在这以后，意大利共产党采取了一种它称之为“新型反对派”的姿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合作。

就在那时，智利的阿连德政权在血泊中被推翻了。就象倒运的杜布切克政权，曾被意共奉为样板一样，阿连德政权也被意共奉为样板。共产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追随英格拉奥还是追随阿门多拉，不论贝林格的妥协是不是有效果，共产党都永远不可能在选举中赢得可靠的多数——一种能经受迫使阿连德下台的强大压力的多数。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合可以不稳定的多数统治斯堪的纳维亚，但不能统治具有法西斯主义历史和曾发表起义宣言的国家。因此，意共采取了一条本质上是新的策略，虽然，其内容所包括的不过是意共十年来为了赢得部长职务而进一步提出要扩大同右派的合作而已。意共向天主教民主党领导提出“历史性妥协”的建议（“历史性妥协”这句话是为了附和葛兰西所提出的“历史性集团”

这一说法，但这两者的含义大不相同)，表示共产党人愿意越过英格拉奥曾想加以诱惑的天主教中的进步人士，甚至在必要时越过阿门多拉曾想诱其退出中一左政府的社会党人，而同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在罗马共同执政。

这种妥协不仅需要放弃使用革命的手段去夺取政权，而且也需要放弃使用议会的手段去夺取政权，因为这种妥协不是在议会讲坛上作出的，而是两党首脑在蒙太西多利奥宫的密室里密谋出来的。但是，由于这是意大利议会民主的正常程序，也是法国第四共和国议会民主的正常程序，所以，它只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搞这种妥协还必需放弃分裂并削弱天主教民主党的希望，并且要冒这样的险，即威吓社会党人产生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正在他们背后联合起来的想法。重要的是，“红色地带”的政界人士立即通过了这条新路线，埃米利亚地区的共产党主席吉多·范提宣称，“历史性妥协”已在他的地区取得成效，同时，他利用这个机会，对以“新多数派”为基础的全部夺权活动已在埃米利亚地区开始的情景作了回顾。接替范提当上了波伦亚市市长的雷纳尔托·萨格里欢迎这条新路线，认为从统一的左派政纲的意义上讲，这是一次同“阵线派”的决裂。然而在基层，对于这条新路线的反应即使不是持敌对的态度，也是有所保留的。一切的含糊不清最终都雾消云散了：共产党的领导人要的是官职，什么意识形态问题，统统见鬼去吧。

既然共产党官僚的政治野心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就引起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否还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呢？当法共同左派签订共同纲领的时候，苏共派了一个代表来参加了他们的党代会，对法共的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的思想及政策

提出了警告。苏联所表露出来的其他不满，也为专门研究西欧共产党内部机密的专家们察觉出来了（至于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态度却是明确的。北京报纸认为左派联盟是“法国社会党人与其他一些党派的联盟”）。然而，当勃列日涅夫赞同“西欧共产党同包括社会党在内的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采取合作行动的时候”，他对法共同左派签订共同纲领也就明确地讲了许多好话。广泛联合的政策不仅已在完全从属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内实行（如葡萄牙共产党），而且也在公开同莫斯科争吵的党内实行了（如西班牙共产党）。苏联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意见有分歧，或者有些犹豫不决。同时，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设想：苏联共产党的利益同各西欧共产党官员们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一致的。每一项这一类的革新创议也当然都受到了具有同样政治野心的其他西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欢迎，这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在法共同社会党人签订了共同纲领以后，意大利、芬兰、德国和荷兰等国的共产党，就立即向它们本国的社会党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事实上这种政策对西欧共产党来说，即使不是冒险的，也仍然还是困难的。这种政策必须把莫斯科、本国的工人基层以及未来的政治盟友这三方面的要求加以平衡。例如，一面要保证能得到未来政治盟友的合作，另一面效忠莫斯科仍是一种经常性的义务，而且还决不能把这种义务抛掉。把共产党同莫斯科的联系看作是一种义务的，倒不是西欧共产党的选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选民对这种与他们关系不大的问题是比较不太关心的），而是那些被邀请来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西欧其他政党的政治领导人。他们着眼于以民主方式更换政府，因此，对于同一个为苏联在更换合法政权方面所出现的种

种做法(如等待斯大林逝世,杀害贝利亚,突然驱逐赫鲁晓夫下台等等)进行辩护的共产党合作感到犹豫。共产党还为用坦克镇压市民的波兰和东德政府辩护,为刁难、迫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并压迫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苏联政府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想要得到西方政界的支持,也是困难的。尤其恼人的是,共产党人竟要向天主教的党送秋波,并要《真理报》取消关于共产党人肩负着宣传战斗的无神论的责任这一说法。有的共产党曾把杜布切克政权作为一个高尚的和尊重盟友的共产主义的榜样加以宣扬(正如意共是明确地这么提的),后来却只好眼看着它遭受兄弟党的消灭,这是一个重大的妥协。他们对这种致命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援助”方式作了简短的谴责,随后语气就缓和了,再后来就偃旗息鼓,而且再不重提了。这是不能使它的未来的盟友满意的。因为毕竟他们自己也要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同共产党人合作不会危害自由,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因此,他们继续向共产党的领导施加压力,要求谴责入侵捷克和其后的所谓捷克“正常化”问题。法国社会党人为这个问题于1973年举行了大会,并邀请了法共领导人出席大会。在响应盟友的呼吁,要对1972年的布拉格清洗问题进行谴责这方面,意大利共产党表现得很坦率,法共则比较含糊其词,而芬兰共产党在试图找到一种可为有关各方接受的姿态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没有一个西欧共产党能够承认这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就是由于他们向其他西欧共产党推荐的那种社会主义而受到迫害。

苏联有关机构抨击西欧共产党的同盟者社会党,诸如苏联大使阿勃拉西莫夫1972年抨击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者苏联放出的恶毒宣传,譬如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在1973年所干

的，所有这些事都使西欧共产党同样感到很尴尬。最后，作为西欧共产党的支持者苏联，同西欧各国政府的和睦相处，对于一个反对党来说也是不利的。譬如，莫斯科不仅同戴高乐派和蓬皮杜派政府和睦相处，而且同希腊的军人政府，同佛朗哥大元帅的政府以及凯塔诺博士的政府都和睦相处。

在其苏联权力中心及其未来的政治盟友之间既已四分五裂，西欧共产党官僚集团也就不得不安抚一下它的工人基层，因为共产党工人看到他们的群众领袖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他们所憎恨的天主教徒和好而感到惊恐。在把合作同加倍的谩骂结合起来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困难。瑞典社会党执政时瑞典共产党异乎寻常地猛烈地抨击它，经常把极左分子谴责他们共产党人搞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的说法，用来谴责社会党人。法共也用极左分子通常谴责自己的词句来谴责社会党搞基层“选举主义”，并谴责他们胡乱收罗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追随者。法共在共同纲领的整个准备阶段和宣传阶段叨叨不休地反复攻击社会党，这使密特朗“坦率地感到不能容忍”，然而，法共当时的抨击并不是要对着密特朗，而是针对怀疑自己领袖的共产党员工人和激进分子的。这种怀疑起源于基层，通过几个大区，于1972年和1973年在法共中央委员会内部表现出来。在意大利，情况也是这样。强烈反对宗教的共产党基层，对于意共提出要同天主教的政党合作感到很厌恶，虽然意共最愿意干的恐怕还是同前总统萨拉加特所领导的民主社会党密切合作。

不信任社会民主党，这是西欧共产党工人的基本心理状态。因为有些工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西欧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从社会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要使共产主义和社

会主义这两匹马并驾齐驱大概需要有一定的绝技。西欧共产党激进分子和他们的领袖们都知道，这种并驾齐驱在西欧的通常结局，是共产党人受社会党人的欺骗。社会党人表示不信任共产党人，通常是举出 1949 年布拉格政变这一例子来作说明；而共产党人不相信社会党人，则可以举出他们许多搞诡计和背叛的例子来作证明，这些例子已经收藏在共产党人的民间传说中了。在工人共产党人看来，象奥洛夫·帕尔梅，安东尼奥·希奥利蒂或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政客，都是一些阴谋家，他们利用无产阶级的词藻来赢得政府官职，然后就把自己赖以爬上来的梯子一脚踢掉，进而为资产阶级办事。诚然，西欧社会党在选举联盟和议会合作方面的反复无常，很可能会引起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不信任。赫尔曼森对瑞典社会党就表现出这种慎加警惕的态度，他怀疑瑞典社会党准备退回到它以前执政时曾利用过的右派联盟方面去。乔治·马歇为了同样的理由，长期以来要求“为一项立法签订一个合同”，但是没能实现。根据这个立法，万一他们的社会党人盟友想要在议会走廊另找自己的伙伴的话（这是他们在整个第四共和国期间的惯技），共产党人就可以强行解散议会。法国改为总统制以后，更加增加了法共的上述担心。利用共产党的选票直接选进爱丽舍宫总统府的法国社会党人，要比在波旁宫的社会党人更容易背叛，而西欧共产党的激进分子是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芬兰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执政，在西欧共产党中具有最长时间的经验，芬兰共产党的拥护者认为，结盟使这个党吃的苦头最多。

如果对于这类事情的担心在激进分子的头脑里占最主要地位的话，西欧共产党的官僚集团是意识到同社会民主党的

合作可能有腐蚀自己的基础的危险的。它的选民坚信，在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内部的改良活动是决不能与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一起得到实现的；而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是要遵循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才能取得的。这种信念已经受到宣传工具腐蚀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如今正在侵蚀这一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故乡，而在五十年前刚形成这种信念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当人们看到西欧共产党人接受了社会党人的做法时，这种信念也就不能不受到削弱。1972年，密特朗自吹自擂说（由于说得不恰当，被矢口否认了），他的党可以最终赢走二、三百万张共产党人的选票，乔治·马歇对此轻蔑地嗤之以鼻；但是，马歇并没有急于建立共产党人同社会党激进分子的联合“基层委员会”，1972年至1973年间，他从事的左派联合运动，已降格为一次，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同社会党人的联席会议了。接触会带来传染病。法共于1973年重整旗鼓恢复了工厂车间的基层党组织，以便抵消社会党在工厂的影响。共产党人那年在法国选举中的主要目标是要战胜社会党人，使自己成为左派的主要力量（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左派联合阵线会获胜）。如果西欧共产党人在努力要赢得国家政权的时候，忘记了他们半个世纪以来的使命——即要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夺取政权，那么，赢得国家政权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总之，对西欧共产党来说，同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政策是危险的，更不要说同右派力量结盟了。因为这牵涉到以下几个方面。为了使本国的盟友放心，西欧共产党就必须同它们的权力中心之一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们还要考虑到这种结盟会在另一个权力中心，即在激进的工人中间引起对自己颇

有根据的怀疑。这么做还会遭到托派分子、毛派分子和其他左派分子的攻击；在这些人看来，西欧共产党人已经在对他们的左派输了理了。自从1968年以来，没有一个西欧共产党不因受到左派分子轻蔑的攻击而深感痛苦。这种困难处境在共产党人进入联合政府任职的时候，更为加剧了。芬兰共产党发现从1966年至1970年，选民的支持显著下降。在包括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执政后，芬共赞同了政府采取的势在必行的贬值措施，还采取了一些不得人心的必要措施，以维护新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扮演了民主政府中的少数派伙伴（且不说是人质吧！）。西欧共产党在自己谴责过的政权内担负起责任，这确实给自己的党带来了破裂，使自己成为社会党的一个无用的同盟者。

当西欧共产党提出同社会党右派也要搞结盟，就象意大利共产党于1973年提出“历史性妥协”那样，平民主义和极端选举主义等做法，看来好象会使共产党变得涣散。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各国共产党所拥护的这种政策，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抵抗运动的反法西斯民族联合政府和战后重建时期的民族联合政府相比较。但是当七十年代在意大利重新恢复这种联盟的时候，它必须设法煽起一种所谓出现了“法西斯的威胁”的论调来为自己辩护，虽然这种“法西斯的威胁”跟新法西斯化运动，即“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有限可能性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在意大利存在着法西斯的危险，即民族—社会连带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的危险的话，它倒并不是存在于“意大利社会运动”之中，而是存在于共产党—天主教党—社会党—自由党—共和党—社会民主党所共同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的幽灵之中，这个联合政府除了“意大利社会运动”以外，

不会有任何反对派。

当政府不能满足政界的要求时，人们就议论要吸收一些不满社会现实的人到政府里来分享官职，以“扩大多数”。这种做法，在意大利（就象在法国和芬兰一样）的政治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他们不考虑把政权转让给采取不同政策的任何一个或几个政党——这在上述三国当然很可能是不切合实际的——他们既不考虑改变当届政府的政策，也不考虑由反应迟钝的政府班子来贯彻其政策。只有在出现政治危机的期间，人们才会承认，联合政府越是扩大，政绩就越是糟糕这一教训。于是，接着有一段时间是独裁的或“清一色”的政府执政。然后重又开始了扩大为多党联合执政这一过程。然而当这种很普通的想法由意大利共产党提出来的时候，就容易遭到不寻常的反对。意大利共产党承认，假使左派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多数，那么它所想要实现的政策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且必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对。意共作出这样的论断：同样一套政策，只要拥有较大的多数，就可能是切实可行的了。然而事实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只有共产党人的平民主义偏见才使他们设想存在着这么一种政策，它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为大多数欧洲人所接受，并能够为百分之七十或甚至为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所共同接受。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只有以不明确和可加以曲解的纲领，才能把这种多数集合起来。当意大利共产党提出“历史性妥协”时，就小心翼翼地对一个如此广泛的联合政府的纲领只具体地提了反法西斯和民族团结这两点内容。

在意大利，这种“各党派联合阵线”论的谬误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天主教民主党之所以是一个不完善的政党，正因为

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妥协”的产物，是一种“能够沟通各阶级”而又没有共同政策的“历史性集团”。这种“历史性集团”恰恰就是葛兰西、墨索里尼和德加斯佩里等人都认为是最能把意大利治理好的那种政党。在天主教民主党的乌合之众里面再把共产党加进去，这除了使共产党有机会将其党员“混进”政府各部门之外，并不会推进意大利的事务，也不会推进共产党的事务。首先，天主教民主党已表现出它对其反对派具有潜移默化 and 予以削弱的能力。这使天主教民主党成为比社会党更加危险的同盟者，而共产党内的纯粹派对社会党人已经表示害怕了。第二点，共产党人如果想要在这种大联合的政府里推行其独特的政策，那么他们就会遭到很多猛烈的反对，就好像他们在左派联合政府里执政而只占一票多数时所遭到的那种反对一样。总之，那种同议会制度并行不悖的、前后一致的政策，即使少数派政府也是能够贯彻执行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样的例子在西欧已经不少。而同国家经济、社会道德、军事状况不相适应的和前后不一致的政策，不通过革命，就不能够为暂时的多数派所贯彻执行——不论多数派是如何庞大，也不论这种多数是由于选举上的误会还是靠在议会中讨价还价、相互让步才得到的。前后一致的政策并不是靠什么“孤立法西斯分子”，或者靠把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垄断资产阶级（即一小撮牟取暴利者）而产生出来的。在这种平民主义观点的掩盖下，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追求其他具体的目标，但是他们是在冒险地这样做。

试图预测西欧共产党作这样的冒险或任何类似的冒险会有怎样的结局，这可能是徒劳的。除了在讲拉丁语的欧洲部分地区和芬兰的多变的政治生活中任何党派所面临的捉摸不

定的事情之外，以及除了人们对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三国的独裁统治的继承问题有着很大的疑虑之外，各西欧共产党都有一个它自身的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的形式问题。在西欧共产党的内部结构中，三种不同的力量正处于互相竞争的状态，在各个西欧共产党内，这三种力量的对比也各不相同。近来，这三种力量中的一种，即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在几个国家中已经成功地推进了它的政治野心。这就引起人们作出这样的预言：这些西欧共产党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一派而融合到西方的政治体制中去。这不是不可能的，尽管列宁主义党的组织结构和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工人是它的重大的障碍。西欧共产党的第三个权力中心即苏联的影响，使事情增添了尤为难以预测的偶然因素。在国际事务方面，也就是说在这个全然不能加以预测的领域内，西欧共产党人卷入的程度比西欧其他政党更多。苏联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怎样，将影响它在西欧的企求，而苏联对许多西欧共产党的影响将成为苏联力图在西欧取得它所需要的东西的一条途径。我们指出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我们回顾这些力量在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所相互起到的作用；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使那些预言家灰心丧气了。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